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博士學位論文

反思歷史唯物論：  
「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介入

Rethink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Intervention of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指導教授：萬毓澤 博士

研究生：張又升 撰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 謝辭

這本論文能夠完成，有賴許多師長與朋友的幫助。謝謝萬毓澤老師擔任指導教授，在我書寫的這段期間告知重要材料，並適時給予鼓勵與建議，本文部分章節正是延續老師曾經寫過的題目而來。謝謝葉浩、張其賢、洪世謙和陳宜中四位老師擔任口委，在口試時提供許多寶貴的意見和友善的批評，這些提問在未來的漫漫長路上還會遇到，我也會在適當時機深入處理。謝謝王遠義老師雖然無法擔任口委，卻花了不少時間親自在電話中勉勵我，分享學思歷程。

另外，謝謝已故孫善豪老師帶我們細讀馬克思和康德，儘管日後許多看法已與老師不同，卻總是得到充分的聆聽與對話。謝謝論文難產時，林淑芬老師聽我表達焦慮，因為大學上了老師開的後結構主義課程，才沿著各種有趣而重要的論著走到今天，儘管現在並不直接處理歐陸思想家的作品，卻仍保持濃厚興趣。謝謝郭立民老師當初認真備課、清楚講課，讓思想啟蒙甚晚的我在剛上大學時第一次被政治哲學的威力震懾到，儘管現在並未繼續相關研究，未來還是希望能持續接觸。謝謝林志宏老師開拓我的史學視野，讓我借書，同時謝謝易澄介紹中研院史語所工讀機會。謝謝林碧炤老師贈書，在校園巧遇閒談國關理論真是意外又開心。謝謝小依和 Jason 哥幫忙下載資料、名鈔讓我在休學時使用圖書館資料庫和借書、翊夫告知口試相關訊息，也謝謝服役時明珠姐的體貼照顧。

還要謝謝在我讀書之餘一起品酒談心的老朋友士堯，以及一起做音樂、辦活動、實踐台灣聲音藝術的夥伴，仲其、大旺、阿璋、小二、世揚、欣蓮、宗昀、嘜塔、Jared、丁丁、阿德、大頭、巫巫、阿豬、啟光、婉玉、郁齡和 fish 等，如果不是你們，我大概不會那麼晚畢業（笑）！不過就算時間重來，愚鈍如我想必還是原路再走一回，沒有絲毫後悔。謝謝廣瀨與我暢談對第四國際的關注，也謝謝曾經參與薩爾瓦多游擊隊的 Bob Ostertag 跟我重構 70 年代美國世界體系分析學派盛行時的場景，認識兩位前輩是在學院外活動的一大收穫。謝謝簡妙如老師一起喝清酒、吃拉麵，討論台灣獨立音樂場景的狀況。謝謝前女友在我寫論文備感壓力時的包容與忍讓，祝妳幸福，夢想成真。感恩家貓 Mars 主子在書堆上跑跳睡覺、翻肚討摸。還有許多有待感謝的人事物，感恩的心～OK 感恩～

最後，謝謝爸媽對我的無盡疼愛與照顧，願您們永遠健康，笑口常開。



## 摘要

歷史唯物論是馬克思主義核心成分。生產方式和社會形構組織了生產力、生產關係與統治關係等重要概念，以此分類社會結構、解釋社會轉型和指引社會發展的可能方向。然而，這樣的歷史理論多少忽視了社會外在影響或複數社會並存與互動的事實，即「國際」或人類實踐的水平向度。由托洛茨基提出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既根源於這個傳統，又改造了這個傳統；在羅森堡的詮釋和問題意識下，我們可以關注並補足上述缺失，儘管這個規律有待更多開發與應用。

本文從歷史唯物論的原則出發，以馬克思對分工的討論、世界體系分析、格申克洪對工業化進程的思考和卡林對演化理論關鍵要素的應用等資源為基礎並與之對話，探討「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在 20 世紀初被提出和近十年來復興的本體論及方法論內容、理論脈絡和重要意涵，將它延伸至歐洲封建主義時代，以示其普世性，最後重述而不背離歷史唯物論的信條。

關鍵字：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不平衡與綜合發展、托洛茨基、羅森堡、國際向度、多重本體論、複數本體論、分工、世界體系分析、格申克洪、卡林、演化理論



## Abstrac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a central component of Marxism. Mode of production and social formation organize some important concepts such as force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relations of rule to categorize social structure, explain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show some direction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wever, this kind of theory of history to some extent ignores external impacts of a society, or the fact of societal coexistence and interaction – “the international” or the horizontal dimension of human practice. The law of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drawn by Leon Trotsky from world and Russian history roots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n the one hand and transform the same Marxist tradition on the other. With the help of the interpretations and problematique of Justin Rosenberg we can focus on and correct these deficiencies, though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itself requires more explorations and applications.

This dissertation starts from the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ased on and entering into dialogue with Marx’s texts on division of labor, World System Analysis, Alexander Gerschenkron’s thoughts o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several key factors of evolutionary theory used by Alan Carling, this dissertation then sets to discuss the ont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contents, theoretical contexts and significance of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being propounded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nd re-examined in recent decades, furthermore, extending it into the epoch of European feudalism to show its universality, and finally restating but not deviating from the doctrin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Keywords: Marx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Leon Trotsky; Justin Rosenberg; the international; multiplicity ontology; plural ontology; division of labor; World System Analysis; Alexander Gerschenkron; Alan Carling; evolutionary theory.





## 目次

<b>第一章 引言</b> .....	<b>1</b>
第一節 提問 .....	2
第二節 本文主旨與性質 .....	5
第三節 章節安排與限制 .....	11

### 第一部份

<b>第二章 歷史理論與馬克思主義</b> .....	<b>21</b>
第一節 歷史哲學的問題 .....	22
第二節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 .....	34
<b>第三章 歷史唯物論的原則</b> .....	<b>39</b>
第一節 從生產出發 .....	40
第二節 交換關係 .....	49
第三節 統治關係與革命 .....	56
第四節 生產方式、社會形構與社會體系 .....	64

### 第二部份

<b>第四章 從資產階級革命到不斷革命</b> .....	<b>73</b>
第一節 統一前後的普魯士及德意志地區 .....	74
第二節 在過去與未來之間的馬克思與恩格斯 .....	78
第三節 資產階級革命爭議 .....	84
第四節 不斷革命 .....	97
第五節 不斷革命的今日相關性 .....	102

<b>第五章</b>	<b>托洛茨基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規律</b>	<b>105</b>
第一節	從 1861 年前後到 1917 年之前的俄國	105
第二節	「不平衡發展」與「綜合發展」	112
第三節	本體論意涵：與世界體系分析對照	121
第四節	方法論意涵：與 Alexander Gerschenkron 對照	130

### 第三部份

<b>第六章</b>	<b>複數問題：國家體系與資本主義</b>	<b>143</b>
第一節	國家體系、複數問題與國際歷史社會學的可能	144
第二節	封建遺緒：政治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153
第三節	現實主義環節：Alex Callinicos 的觀點	162
第四節	資本主義（或多個資本）的「不平衡綜合發展」	166
第五節	在生產方式之外：Justin Rosenberg 的質疑	171
<b>第七章</b>	<b>作為普世規律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b>	<b>177</b>
第一節	Justin Rosenberg 對全球化理論與現實主義的批判	178
第二節	「國際」的本體論問題	183
第三節	邁向普世方案	188
第四節	延伸建築隱喻：回到馬克思	198

### 第四部份

<b>第八章</b>	<b>歷史延伸的可能：對 Alan Carling 再進一解</b>	<b>213</b>
第一節	封建主義「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難題	213
第二節	G. A. Cohen 的兩個命題	216
第三節	Robert Brenner 的社會財產關係	222

第四節 對 Alan Carling 的整合再進一解 .....	230
第五節 絕對主義與「不平衡與綜合發展」 .....	241
<b>第九章 結語 .....</b>	<b>255</b>
<b>參考文獻 .....</b>	<b>263</b>





## 表次

表 1	生產方式的四種定義 .....	70
表 2	資本來源的階段性體系 .....	134
表 3	資產階級革命執行者的階段性體系 .....	137
表 4	「資本主義需要國家體系嗎？」諸立場 .....	162
表 5	延伸建築隱喻 .....	207
表 6	「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四種類型 .....	214

## 圖次

圖 1	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交換關係與統治關係.....	61
圖 2	封建主義的生產關係、交換關係與統治關係 .....	61
圖 3	封建主義的誤認／資本主義的鏡像 .....	62
圖 4	延伸建築隱喻 .....	209



## 第一章 引言

經濟史家 Thorstein Veblen (1915: 82) 評介一次大戰前的德意志帝國時曾指出，工業發展活化了這個王朝國家，但方式跟先前的時代大異其趣：

技術進步不是在德國產生的，而是從說英語的人們那裡，最終幾乎就是完全從英格蘭那裡直接或轉手地借來的。同時，德國堅持不接手技術層面之外的英式用法與慣習，結果給出了一個與英國對比的異例，那就是展現了英國人執行的工業技藝 (industrial arts) 之現代運作狀態，卻缺乏說英語的人們這麼做時，所共同長成的各個制度與法令特徵。德國把英國發展現代技術的經驗結果，跟近乎是英國現代工業制度發生之前常見的其他生活技藝 (arts of life) 綜合起來，以至於德國人能採用英國的技術遺產，卻不用為其思想、用法和慣習的常態付出代價……。

從這段引文能夠大略看到，在不同國家遊走的技術會深受不同制度的影響，Veblen 之所以被譽為制度經濟學的創始人，多少由此可見根由。不管企業之間還是國家之間，這種發展程度落後者學習進步者、直取其最新技術的現象，已經以「落後或後進 (者) 優勢」(privilege of backwardness/latecomers) 之名被廣泛討論 (Ozawa 2004, Schneider 1984: 169, Selwyn 2011)，部分經濟學者也據此探究一國產業發展狀態及策略 (瞿宛文與安士敦 2003)。

「落後或後進 (者) 優勢」的邏輯不只被經濟學者應用在國家、產業和企業發展，還被革命者應用在社會關係的改造、革命戰略的制定，乃至人類歷史進程的分析。俄國十月革命的領導人之一托洛茨基 (Leon Trotsky) 提出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就是相關思想的體現。此一規律歷來受到馬克思主義者的重視 (Davidson 2017, Löwy 2010)，這也是本文的研究對象與發想來源。

## 第一節 提問

為了敘述方便，我先用自己的話把托洛茨基提出「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歷史脈絡，同時也是「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代表性內容概括如下：

自從與歐洲諸國密切接觸以來，沙皇出於國際競爭考量（特別是在 19 世紀中葉克里米亞戰爭失敗後），不得不引入資本主義的技術和制度，既有的封建主義遂與資本主義在俄國相遇。在俄國的「不平衡發展」下，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在俄國「綜合發展」，形成了複雜的階級關係。由於較高的生產力可自他國引入，不待社會內部漸進發展，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衝突及其促進的階級矛盾在短時間內加劇，無產階級得以在一國之內（領導農民）率先發起革命，進入社會主義，接著在世界範圍內因其他國家無產階級的加入而持續革命，進而達到社會主義。

因為處於殘酷的國際競爭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落後」的俄國反而成為革命先鋒，帶頭爭取社會主義。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相對於「先進」的西歐諸國，俄國的歷史進程反而具有「後進優勢」，更可能率先擺脫資本主義。在列寧與托洛茨基之前，多數馬克思主義者的革命觀都與此相反，把希望寄託在西歐這個生產力更高的地區。

上述概括尚有多處值得討論，不過它的基本意涵更發人深省，我們的提問也由此而來，以下分歷史和理論兩個方面來看。

### 一、歷史方面

若俄國發展確如托洛茨基所言，與資本主義歐洲處於「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格局，在 1917 年十月革命之後進入社會主義、發生革命的「跳躍」，那麼往前追溯，19 世紀的德國是否也有類似經驗？身處法國革命的巨大衝擊與餘韻中，普法的「不平衡發展」格外明顯，普魯士統治階級的警惕和「由上至下的革命」帶動了一群敏於商業活動、不得不面對農村生產關係變革的貴族。在他們的仔細調控下，資本主義在德國紮根，「綜合發展」使貴族適應了資本主義，經濟突飛



猛進，最終在 20 世紀前半葉誕生了野蠻而保守的政治。

繼續追溯，我們是否也能如此看待法國革命？難道不正是英國自 17 世紀末以來的強大，與法國處於「不平衡發展」的格局，後者才在 18 世紀歐陸和海外殖民地戰爭一再落敗、破產，最終不得不學習資本主義（如重農學派的出現），儘管為時已晚，「由上至下的革命」並未發生？因為英國革命的早發、漸進與相對和平，法國統治階級一方面未能及早意識到改革的迫切性，另一方面 18 世紀自英國引入的技術尚處工業革命開端，生產力的拔高不夠強勁，「相對低度」的「綜合發展」使它不像後來的普魯士一般，小心翼翼地搶先自我改革，最終資本主義只能以「由下至上的革命」爆發，產生後世馬克思主義者列為典範的「資產階級革命」。

那麼，可否再往前追溯，找出英國邁入資本主義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前提？至此似乎「山窮水盡」，很難再行推論，勾勒出一部從前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再到社會主義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史」了，畢竟托洛茨基是在資本主義既存和擴張的過程中提出這個規律的。不過，他自己確實認為「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具有普世性，將它延伸至前資本主義到資本主義的過渡階段似乎不是不可能，但要如何構想此一階段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

不可否認，這番揣想來自從龐雜歷史中找出一個方向的誘惑，要避免誘惑引發幻覺，只能踏入具體的研究。可是即便從非常宏觀的視角來談，一本專書也很難完成這項任務。暫不說 20 世紀以前西歐的長遠歷史，托洛茨基和後世馬克思主義者至少已經把這個規律應用到當代其他地區，對中國、墨西哥、土耳其和伊朗等國的歷史社會發展和革命展開分析 (Duzgun 2018, Matin 2007, 2013, Morton 2010, 2013, Trotsky 2011)。這些考察突破了 19 世紀以降的民族史學，適合與當今盛行的世界史或全球史對話。

## 二、理論方面

除了上述的宏大史觀，「不平衡與綜合發展」規律要求我們慎重考慮個別社會受到的**外部影響**，畢竟生產力的提高、生產關係的改變和階級關係的複雜化都可以是（部分地）受到其他社會刺激的結果。自 17 世紀末彼得大帝以來，俄國積極吸取西歐經驗；19 世紀中葉戰敗後，亞歷山大二世更試圖取消農奴制，積

極引進資本主義的技術和制度。正是在俄國與歐洲所處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格局，托洛茨基才有「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視野。如果把外部影響上升到本體論和方法論，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就會大受影響。

在本體論上，作為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歷史唯物主義／論（historical materialism）的「建築隱喻」顯然不夠周全。因為托洛茨基描繪的理論圖像已經不只涉及「基礎」（不管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還是僅指生產力）和「上層建築」（如政治或意識形態）有何因果關係、如何避免決定論等經典爭論，還包括「對外政治」——用今天常見的話來說，就是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一直沒有被顯題化的「國際關係」（international relation）——和「對外經濟」——也就是以商品交換關係為基礎的貿易和金融活動等，儘管馬克思的《資本論》對商品交換有深刻討論，但很不幸的，建築隱喻的模型並未將它納入；即便是後來世界體系分析所倚重的分工（這是商品交換的重要基礎），在《資本論》的討論也很有限。

對外政治和對外經濟是「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關鍵：國際競爭刺激政治行動者（沙皇或統治階級）引入新技術，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或資本主義的擴張則使新技術的引入更具可能性和便利性。必須注意，即使多了這兩個面向，**內部影響**——個別社會的發展本身——並沒有被取消，它只是和外部影響融合起來，產生更複雜的互動。

在方法論上，當我們應用歷史唯物論分析歷史進程時，不只必須比較個別國家的異同，還要看出它們的**連結**及其共同構成並身處其中的**整體**。社會科學常見的「比較方法」往往預設被比較單位之間的分離；問題是，若單位之間是**先後影響**的呢？例如比較普（德）法資本主義的出現時，正好應該注意前者不只晚於後者，其路徑更是有意避開後者曾經引起的暴亂局面。此外，俄國（奧地利亦然）參考過「普魯士式道路」，法國也試圖學習英國農業。在這一連串彼此連結的過程中，純粹的比較還是可能的嗎？不僅如此，先後影響本身並非偶然，而是資本主義擴張下難以抵擋的態勢，故每個單位皆受此一整體或過程的影響，不是只有「前項對後項的影響」而已。

歷史和理論是密切相關的。首先，如果沒有在方法論上兼顧比較、連結和整體性的觀點，就很難勾勒出「英—法—普（德）—俄—中……」這一連串革命列車和世界史進程。其次，就算勾勒出來，如果沒有在本體論上賦予歷史唯物論外部影響或「國際」（the international）(Callinicos 2004, Rosenberg 2017)，我們也很

難把「不平衡與綜合發展」放回歷史唯物論，呈現基礎和上層建築在這個規律下的適當關係。一旦如此，帶有國際向度的龐雜歷史就會從理論溜出去，馬克思主義者也將面臨一個重大問題：當歷史與理論發生衝突，特別是歷史突出了理論沒有觸碰的現實領域時，該以何者為依歸？

這就是 20 世紀初俄國革命與第二國際發生對立的根源。在激昂的群眾前，托洛茨基選擇了歷史，然後以「不平衡與綜合發展」試圖說明生產力低落的社會仍有可能引領革命，只要把它放在國際競爭和資本全球化的脈絡，召喚他國無產階級完成「不斷革命」。至於德國社民黨的馬克思主義元老們，則選擇了理論，一個忽略外部影響或國際向度的歷史理論，一如既往地等候革命的條件成熟。我們已經看到，歷史與理論的衝突最後直接爆發在政治上：第二國際政治破產，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移至東方。

在許多問題上（如俄國革命形勢的判斷、史達林的政治清算、法西斯主義的崛起等）托洛茨基堪稱「先知」(Deutscher 2003a, 2003b, 2003c)，但他並沒有花時間研究「不平衡與綜合發展」這個資本主義擴張的格局或「規律」對歷史唯物論造成的影響，更沒有把前者融入後者或讓後者擴充至足以容納前者。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對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貢獻良多，同樣重要的是，「不平衡與綜合發展」也引起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革命。

在歷史和理論面前，本文選擇理論（儘管很難不與歷史沾上邊），旨在探討「不平衡與綜合發展」跟歷史唯物論的關係，尤其是它如何出之於歷史唯物論又用之於（並補充）歷史唯物論。為此，有必要了解歷史唯物論和「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各自的內容和兩者的差異；在什麼意義上「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繼續以歷史唯物論為基礎，在什麼意義上又改變了歷史唯物論；兩者的整合如何可能，我們手邊是否有任何理論資源（不管出自馬克思本人，還是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協助這項計畫；當然，「不平衡與綜合發展」於近十年來復興和托洛茨基當時提出的脈絡差異也很重要。

## 第二節 本文主旨與性質

本文是一篇歷史理論著作，並且與歷史理論中有關本體論的主題更相關。因此，探討「不平衡與綜合發展」與歷史唯物論的關係也是為了研究兩者本體論的

差異與整合的可能。

「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由三個特質所組成。第一，複數本體論，即**多個單位並立與互動之事實**。放回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在最抽象、普世性的層次上，單位指的是社會，多個單位就是**多個社會**；進入較具體的、「占支配地位」的領域發揮作用的特定歷史時期，單位進一步指向不同對象，如國家（封建主義時代）和資本或企業（資本主義時代），因此也可以是**多個國家和多個資本**。我們始終且必須直接面對的，都是多個單位並立與互動的事實，而不是把單一、無輪廓的抽象單位的類型、轉型和發展方向，套用到現實中的個別社會，然後遇到外在影響時才臨時加入相關變因。基於複數本體論，在討論現實中個別社會的類型、轉型和發展方向時，一開始就要把其他社會的影響列入。

本文提到的幾位當代學者，如 Justin Rosenberg 和 Alex Callinicos，之所以注意複數本體論（儘管後者並未直接這麼談），是因為關心全球化現象及其相關論述對國際關係學科的影響以及國家體系與資本主義的因果關係。因此，複數本體論往往被代稱為「國際」，指的是人類實踐不可避免的水平向度，而不只是字面意義的「國家之間」。這個用語的實質意義比所謂的「國際關係」（international relations）——即國家之間甚或國家管理者之間的競爭與學習等互動——廣泛太多，也包括交換關係等。這裡的「廣泛」與「狹隘」之別，是就抽象與具體而論的：論及抽象的意義時，便偏向本體論的探究；論及具體的意義時，指向特定歷史時期和人類社會的現象。在描述與分析現象時，如果缺乏本體論作為基礎，便無法區別特定現象是一時的或恆久的、是更傾向表現還是掩蓋本質。反之，如果無法妥善描述與分析現象，作為基礎的本體論也無法彰顯。

第二，三層次本體論。在複數本體論的基礎上，單位之間的互動一方面影響個別單位內在的性質，另一方面共同形成外在於它們的整體；同時，這些單位則繼續保持複數形式和差異。整體一旦形成，將施加作用力在這些單位，後者在回應整體的作用力時，不只相互影響，這些影響更會延伸到彼此內在的性質。這些單位在受到外在影響（即其他單位的作用力）之後，自身性質又會與之融合，繼而「反射」至其他單位，隨後影響這些單位構成的整體。

這裡的「三層次」在於：**單位內在性質，單位之間互動和單位之間共同形成的整體**。對應到現實，並以現實指稱本體論層次，本文分別稱之為「國內層次」、「國際層次」和「世界層次」。三層次的關聯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清晰展現：「不

平衡發展」包括了國際層次和世界層次，「綜合發展」則發生在國內層次。在這些層次中，最特別的是國際層次，因為它呼應了複數本體論，立基在多個單位並立與互動的事實；至於國內和世界層次，則屬於單數本體論：這裡的單位要麼指向個別社會，要麼指向多個社會構成的整體，都是從單位內在來關注其類型、轉型和發展方向，不強調單位之間互動的影響。「世界體系分析」就是從世界層次展開研究的著名學派，本文要探討的歷史唯物論往往聚焦在國內層次，「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則兼具這兩個層次，但納入國際層次。

第三，歷史的變速。基於複數本體論和三層次本體論，個別單位的類型、轉型和發展方向都是複雜的，不只受到自身內在性質的規定，還會不斷受到外在影響。因此，歷史不能僅僅從個別社會內在的性質來看，還需同時考量其他社會。這些影響一旦與內在性質融合，發展步調就可能「變速」。在此，「跳躍」是重要主題，馬克思主義者在關注「不平衡與綜合發展」時往往集中在這個面向，相對忽略了作為其前提的前述兩種本體論。「不平衡發展」除了屬於國際和世界兩個層次，也代表各個單位在發展步調或歷史進程上的差異：進步和落後，或者先行和後進。當它們不得不競爭和學習——競爭要求單位的複數形式和差異，否則無所謂競爭，因此屬於國際層次；學習發生在世界層次，因為所學之物必須跨境流通、從一個單位傳播至另一個單位，為此，多個單位必須形成一個或強或弱的整體——時，落後或後進者可能吸取前例經驗，發生「綜合發展」，這又屬於國內層次。跳躍來自「綜合發展」，主要發生在後進者，但這並不是說先行者不會跳躍，而是說先行者可能曾是後進者。必須注意，跳躍僅僅是變速的一種，「綜合發展」也可能不發生跳躍。

由於「不平衡發展」的各個單位還會將其「綜合發展」的結果置入國際層次和世界層次，最終多個單位形成的整體、進而是人類歷史，將不可能是均質、等速的。這時，我們的視角又切換到整體，不再是非個別單位，儘管兩者如前所述都屬於單數本體論。從這個整體出發，「不平衡發展」就是內在的，而不是像討論個別單位時，要求我們設想其外在性或其他單位的影響；「綜合發展」同樣也發生在這個整體中，如矛盾最激烈的部分。若干世界體系分析的學者就是這麼做的。

那麼，從「不平衡與綜合發展」探討社會類型、轉型和發展方向時，依憑的概念是什麼？在托洛茨基筆下，不外乎歷史唯物論提供的生產力、生產關係、階

級鬥爭和生產方式等範疇。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生產關係或生產方式（兩者分屬不同抽象層次，後者又有不同定義）確立社會類型；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衝突以及階級鬥爭，則是社會轉型的動力；生產力長期而潛在的發展多少指引了社會的發展方向——上述範疇又相互影響，共同決定了整個社會。然而，我們時常預設它們發生在個別單位內，或者多個單位形成的單一整體，不管是在國內層次還是世界層次，與「國際」或國際層次無甚關聯。換句話說，可以從「不平衡與綜合發展」找到歷史唯物論的範疇，但反過來從這些範疇演繹出「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卻是有困難的，因為後者引入了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相對陌生的新規定「國際」，即強調單位的並立與互動。

關於「國家」，特別是現代國家，馬克思主義向來有許多討論和爭議，相關文獻非常豐富，不管是就**性質**（相對中立的、屬於社會體系中的一個層次，或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底共同事務的委員會」，帶有強烈階級傾向）還是**出現**（歷史上如何誕生自封建主義生產關係，理論上如何因為資本的利益而存在）而言。不過如前所述，「國際」針對的是人類實踐的水平向度；與國家相關時，具體表現為國際關係和國家體系；與生產或經濟相關時，又指向各種交換關係。馬克思主義在這方面的文獻就算有，也沒有被顯題化，至少一般來說，不被認為是重大貢獻。畢竟在本體論上，水平向度要求我們正視單位的並立與互動，而不只是單位內在的性質（類型）和據此而來的變化與走勢（轉型與發展方向）。在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的經典敘述中，我們可以輕易找到垂直向度的表述（如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衝突與適應、生產關係內部階級鬥爭與聯合），但在水平向度，似乎只在政治經濟學的範圍內才受到足夠的重視。

上述宣稱可能會面臨兩點質疑。首先，歷史唯物論諸範疇及其關係主要出自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且僅止於其中若干段落（本文會再引述），馬克思甚至不曾用過「歷史唯物論」一詞；即便像 G. A. Cohen (2000) 盡可能蒐羅馬克思其他著作中的相關看法，據此重建其歷史理論，也已經是後世所為，非馬克思自己的完整思考。如此一來，我們還能把歷史唯物論奠基在馬克思一生龐大著作群的幾個段落嗎？嚴格來說，當然不行。然而，只要歷史唯物論是正當的、必要的；只要承認在各種版本和學派的歷史理論中，馬克思主義佔有一席之地；只要研究者不滿足於把歷史唯物論應用到歷史研究和社會觀察、使它僅僅以「實踐狀態」存在，還企圖在理論上重構它，那麼除了聚焦在這些段落、考掘其深意，

同時參考後世研究者的相關說法，還有其他辦法嗎？

其次，馬克思怎麼會沒有思考「國際」問題呢？一方面，《資本論》對交換關係和（多個）資本競爭這種同屬人類實踐水平向度的現象有豐富討論；另一方面，不管是馬克思晚年對俄國的關注，還是他長期針對世界各國（除了歐洲，還包括美國、中國和印度）的政論時評，不都再再顯示了他的「國際視野」嗎？的確，但它們遠遠沒有達到「歷史理論」的抽象程度。<sup>1</sup> 如果馬克思在這方面的文字可以納入歷史唯物論（是的，是該納入，但少了一個本體論基礎來收攏），因而「馬克思主義欠缺水平向度」的說法不成立，那麼，我們又在什麼意義上——舉例來說——確認韋伯（重視戰爭對現代國家出現的刺激，以及行動者之間的權力鬥爭等，這也是一種水平向度的考察）和馬克思、受韋伯影響的歷史社會學者（如 Theoda Skocpal 和 Michael Mann）和馬克思主義史家及歷史理論研究者的主要差異呢？如果嚴格採取文本研究的路徑，任何一位典範奠基者的思想都可能複雜、豐富到難以定性，卻難免見樹不見林。我們要做的，是在與其他思想家構成的叢林中，識別一位經典作者的傾向與首要關懷；在馬克思的著作中，就算有不少談論地緣政治和世界市場的段落（或初步嘗試及願望）<sup>2</sup>，任何一位研究者應

---

<sup>1</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一版的第八到十卷，收錄了不少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各國革命與社會發展的思考（Marx and Engels 1956-83a, 1956-83b, 1956-83c），其中包括〈中國革命與歐洲革命〉、〈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和〈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等名篇，此外尚有論及土耳其問題和東印度公司的篇章，第十卷最後更收錄了馬克思討論西班牙的遺稿。在俄國方面，晚年馬克思的關注眾所皆知，本文介紹托洛茨基「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第五章）時，也會帶到馬克思與俄國民粹派的通信。在思考「資本主義邊陲」（以俄國為例）的問題上，Shanin (1983) 對馬克思的討論仍是不可繞過的經典。從這些文字出發，「地緣政治匱乏」（geopolitical deficiency）（Teschke 2008: 166）或可被稍事彌補，我們也能嘗試構思更完整的歷史理論。然而在其中，多個社會之間互動的因果作用力程度還是取決於一個世界性經濟整體的發展。舉例來說，在〈中國革命與歐洲革命〉中，雖然馬克思提到「不僅各國統治者和他們的臣民之間、國家和社會之間、階級和階級之間發生衝突的跡象日趨嚴重，而且現時的列強相互之間也發生衝突，這種衝突正在一步步緊張，以致非動武不可，非訴諸國君的最終憑據（*ultima ratio*）不可」，但仍認為「戰爭或革命，如果不是工商業普遍危機的結果，都不能深刻地震撼歐洲，這種危機的到來總是由英國先發信號，因為它是歐洲工業在世界市場上的代表。」（Marx and Engels 1956-83b: 116）撇開可能引起的歐洲中心論批評不談，以複數本體論為基礎的地緣政治（如戰爭）和國際關係，最終隱沒在以單數本體論為基礎的資本主義世界市場「普照的光」中。

<sup>2</sup>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Marx 1956-83a）和《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草稿）導言》（Marx 1995a: 220-1）都提到他的研究計畫，包括「對外貿易」和「世界市場」，也有「國家」或「國家對外：殖民地」，但很可惜，他沒有足夠時間加以實現。當我說馬克思主義欠缺水平向度思考時，並不是說這個傳統的奠基者「不曾思考過這個問題」，而是說他既未實現，更沒

該都不會否認其畢生力作和生前公開作品仍是探討——以一國或抽象社會為模型的——資本主義運動規律的事實。

簡言之，本文不採取文本研究或思想史的途徑<sup>3</sup>，無法一一檢視托洛茨基或馬克思「不斷革命」和「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思想和脈絡，而是從他們的關鍵文本和當代論者的提問及相關爭議出發，分析「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邏輯、相較於馬克思主義傳統的特殊性和對歷史唯物論的修補，**勾勒林相而非樹貌，將一套思想視為特定人類社群（馬克思主義者）持續對話、相互批評、試圖整合、重新詮釋下共創和共享的成果，而不是單一個人的「私有財產」**，儘管必須承認，確實有兩三位大家留下了最細密可靠的奠基性說法，值得持續深入研究。

此外，本文進行兩項目前似乎無人從事的工作：首先，回到馬克思有關分工以及「共同體」過渡到「社會」的段落，說明「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複數本體論或「社會多重性」基礎有何經典依據，藉此擴充歷史唯物論；其次，重新詮釋 Carling 整合 Cohen 和 Brenner 的方式，指出「不平衡與綜合發展」與演化理論核心概念（而非整個演化理論）的連結以及在資本主義起源（以封建歐洲為主）時期運作的可能，將「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延伸到前資本主義。

---

有將這些面向上升到「可以簡要地表述」、「指導其研究工作的總結果」的歷史理論層次：「國際」不重要嗎？當然重要，但如果它重要，相對於生產關係和生產力，又處於什麼位置？這個規定與既有的歷史唯物論範疇是什麼關係？相較之下，托洛茨基更清楚地指出「國際」——具體表現為各國之間的競爭與學習——對俄國歷史發展的影響。

<sup>3</sup> 研究途徑不只是「有意識地選擇」特定方法的問題，有時候還是「無意識地認同」特定主張的問題：我們要在作者的文本中找尋真理、正確認識其思想，還是要在世界中找尋真理、正確認識其運作？這兩個問題當然無法分開，我們在正確認識作者思想的同時，也藉此認識世界；在認識世界時，更不可能不憑藉前人的努力。問題是，現實中的研究者和行動者往往會在這兩個方面有所傾向。本文傾向在世界中找尋真理，而非特定或單一作者的文本。這並不代表可以擺脫那些重要著作或任意詮釋，反而還必須調動許多文本，在多位作者——有典範奠基者，也有當代詮釋者——的對話發掘深意，在他們的著作中了解其提問，提出一套分析世界的架構，最後納入經驗資料。用當今台灣社會科學或我就讀的政治系學術部門的分工來說，本文不是「(政治)思想」的研究，更屬於「經驗理論或方法論」的研究（儘管再「後設」一點）。雖然我不贊同這種過於決絕的分工，但在實務上，這似乎比較方便闡明本文性質。誠如下一節提到的，本文的限制與其說是未能細緻爬梳單一作者的文本，不如說是未能將架構應用到現實世界或納入經驗資料，只能暫時擺放在歷史理論的本體論部分。



### 第三節 章節安排與限制

作為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歷史唯物論有一定程度的普世性，儘管受到一些挑戰：部分學者不認為「基礎與上層建築」能夠適用於前資本主義時代。雖然「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對歷史唯物論有所修補，但同樣逃不過能否延伸到前資本主義時代的質疑。托洛茨基提出的規律，似乎主要發生在資本主義擴張時期或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的相遇，用以指引社會主義的可能。「不平衡與綜合發展」能否延伸到前資本主義時代？相對於「社會主義的出現」，「資本主義的出現」能否在這個架構下重新思考？

不可否認，將「不平衡與綜合發展」限制在資本主義出現後的時空，可以說是最正當、最能凸顯「不平衡與綜合發展」解釋力的作法 (Löwy 2010, Mandel 1970, Weeks 2001)，現有馬克思主義文獻論及「不平衡與綜合發展」時，也多把資本主義擴張時期當成該規律應用的舒適圈。然而，這麼做一方面不能充分反思「國際」影響社會關係的程度，另一方面也不能說明為什麼這個規律「正好不那麼適用於」（但並不代表不存在）資本主義起源時期或前資本主義時代。本文參考關注這個問題的西方學者 (Anievas and Nisancioglu 2015, Rosenberg 2010)，同意「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在資本主義擴張時期的確有最清晰的形式；不過，在資本主義出現之前也有較為模糊的、不易指認的「洪水期前 (antediluvian) 的存在」 (Marx 1995a: 42)。正因如此，它才能像歷史唯物論這個母體一樣具有普世性，能夠作為一個抽象的前提，在前資本主義時代被歷史化、具體化，不只限於資本主義。

本文分為四個部份，沿著上述兩個方向鋪陳，一是「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對歷史唯物論（缺少水平向度）的修補，二是這裡所說的普世性問題。第一部份從歷史哲學說起，介紹歷史唯物論的原則，駁斥「基礎與上層建築」這個「硬核」不適用於前資本主義時代的說法，以示其普世性；第二部份回到托洛茨基「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內容、「資產階級革命」的爭議脈絡和「不斷革命」的實際提出，並透過與當代學者及學派 Immanuel Wallerstein 和 Alexander Gerschenkron 的對話，分析「不平衡與綜合發展」本體論和方法論意涵；第三部份探討「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普世性問題，從政治馬克思主義者、Alex Callinicos 和 Justin Rosenberg 有關資本主義與國家體系關係的討論，切入 Rosenberg 將「不平衡與

綜合發展」延伸至前資本主義時代的嘗試；第四部份除了結論之外，也重新詮釋了 Alan Carling，從另一個角度思考「不平衡與綜合發展」應用在前資本主義或資本主義起源問題的可能，呼應第一部份。

**第一部份**分為兩章。第二章簡介歷史哲學和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的特質，目的是在若干基本問題所刻畫的地圖上，標出本文抽象程度的「上限」：一方面必須認識這些基本問題、與之參照，掌握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的特質，另一方面不深入它們，因為它們不屬於歷史理論（而更屬於歷史哲學）的工作範圍。這些問題包括史學的真實性、真理的政治性、書寫的方法、解釋的框架和史學的性質。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跟這些問題都有關係，只是特別集中在解釋的框架上。

第三章是第二章的延伸，描述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的實質內容，如生產力、生產關係、階級鬥爭、統治關係（上層建築）和革命等概念及其關聯。這一章除了概要的工作外，還有兩個目的：第一，為建築隱喻添加交換關係，因為嚴格說來，歷史唯物論少了這個部分就是不完整的；第二，簡單地比較歷史唯物論的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指出後者儘管政治結構占支配地位，但歸根到底仍然被經濟規定，這是為了駁斥一種建築隱喻只限於資本主義的質疑。這兩個目的也有「預示」的性質：「不平衡與綜合發展」一方面需要交換關係，另一方面也可能延伸到封建主義。

**第二部份**由第四章和第五章組成，主要探討托洛茨基「不斷革命」的內容及其概念脈絡，從「資產階級革命」和「不斷革命」的概念出發（第四章），進入托洛茨基提出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規律（第五章）。第四章在徵引若干數據建構德國 19 世紀改革和發展的基本狀況之後，以馬克思與恩格斯的文本呈現他們對資產階級革命的看法，引導出與托洛茨基「不斷革命」類似但又不盡相同的「不間斷的革命」；同時，回顧了資產階級革命的爭議，並以部分馬克思主義者提出的「後果主義」來捍衛這個典範，然後根據托洛茨基的文本陳述不斷革命的邏輯。我們將看到，這個概念既包含又超越了資產階級革命。最後，反思不斷革命在今日的相關性，我同意部分馬克思主義者的主張：它並沒有「不平衡與綜合發展」來得重要。

第五章同樣徵引若干數據建構俄國 19 世紀農奴制解放前後的基本狀況，以此作為理解托洛茨基提出「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歷史脈絡。接著，就托洛茨基的關鍵文本分別詮釋「不平衡發展」與「綜合發展」，特別指出托洛茨基強調的

「不平衡發展」雙重性：國家之間的對立和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趨勢。此外，他很謹慎看待「綜合發展」，並沒有事先指出其結果。有了這些概念，我們一方面透過和世界體系分析的互補，指出「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本體論意涵；另一方面也回顧 Alexander Gerschenkron 對歐洲工業化進程的思考，指出「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方法論意涵。

第三部份分為第六章和第七章，介紹「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當代復興，這與國關學者 Justin Rosenberg 的推動有關。第六章表示，後冷戰的全球局勢迫使馬克思主義者不得不思考「資本主義與國家體系」的關係或「資本主義高度擴張的現在，為什麼國家體系依然健在」的問題。國家體系代表的國際關係以及更抽象的「國際」或「複數問題」，向來不是馬克思主義在行的領域。我先後介紹政治馬克思主義和 Alex Callinicos 對這個問題的思考，最後導引到 Rosenberg 對 Callinicos 的質疑：「國際」是人類實踐一個根深蒂固的水平向度，無法被生產方式完全吸納。在此之前，則稍微談到資本主義內部或眾多資本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

第七章開始討論 Rosenberg 對上述問題的關注，以及他力圖在以社會關係解釋現代國家體系出現的同時兼顧「國際」的學思脈絡。為此，我回顧了他對全球化理論和現實主義國關理論的批判，正是因為前者有取消「國際」的可能，Rosenberg 才設法提出不可化約的「國際」，這種做法似乎和他對現實主義的批判不相容。此後的 Rosenberg 開始把「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當作普世規律，有別於一般馬克思主義者將視之為資本主義擴張模式。我大致同意他的做法並嘗試把「不平衡與綜合發展」整合進歷史唯物論的架構（這是 Rosenberg 認為該做但一直沒有做的計畫）。最後，我回顧了馬克思有關分工的討論。雖然馬克思沒有明確指出「社會多重並立與互動」的事實，但他在藉由分工討論「共同體」到「社會」的過渡時卻暗示了這點。

第四部份包括第八章和結語。第八章嘗試把「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延伸到封建主義內部。這是一個難題，畢竟它的經典形式發生在資本主義的擴張過程（因而與封建主義碰撞），所謂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總是給人兩種生產關係共存的印象；這樣一來，「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普世性就不成立了，而托洛茨基自己是承認過這種普世性的。本章回到歷史唯物論的兩個根本概念，也就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考察 G. A. Cohen 與 Robert Brenner 的對立，以及 Alan Carling 對他

們的整合。我對 Carling 以演化理論整合兩者、說明資本主義起源的方式再進一步，在他的兩個命題之外，添加了「競爭學習命題」。把這三個命題一起看，其精神便無異於「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因此後者確實可能應用到封建主義及其過渡到資本主義的時期。隨後舉了幾個封建歐洲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例子，包括英法百年戰爭的互動、德意志地區和中東歐政治體的變化和重商主義競爭。第九章是結語，概要地回顧本文內容。

在正式開始之前，有必要自白幾處本文的限制，也順道說明「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對歷史唯物論來說是一種什麼樣的「介入」(intervention)。

第一，作為一個長時段的歷史社會分析框架，「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已經被世界各地馬克思主義者應用，這個框架本身也來自各國的歷史與互動，因此參考文獻理應涉及多國語言。由於學力不足，我使用的文獻僅限中英文，故本文頂多只能參與和參考當前國際中英文學術社群之意見。

第二，就像科學哲學不可能脫離科學實踐，「歷史哲學」——歷史理論是它的一部分，下文會提到這個頗有爭議的用語——也不可能脫離史學實踐，而史學實踐又不能與史料、現象或古往今來的各種事物脫鉤。所以在需要的時候，本文還是會以有限的能力做一些歷史敘述，當然這是有「以論代史」之嫌的。基於當前學科分工的正當性和論文篇幅的限制，這種做法也許可被接受，但仍有重大限制。

第三，由於本文在研究「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和歷史唯物論時，涉及許多子題和有助於理解這個题目的相關概念，但它們畢竟是配角，所以相關介紹有些零散。舉例來說，第六、八章提到政治馬克思主義，第三章也有批判它的意思；第六章第三、四節分別在不同脈絡提到了馬克思方法的非演繹性質。在一些值得單獨討論的主題上，我也只能略盡簡介之責，好比「再版農奴制」和「農業資本主義」的問題，更不用說在重大歷史事件上有些冗長的補充。基本上這種情況也與前述情況有關：「不平衡與綜合發展」調動了太多既有理論資源，我不可能深刻討論它們，只能在盡量加以介紹之後，虛心接受批評。

第四，題目設定對書寫有一些影響，這裡需要花一點篇幅說明。誠如前述，「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出之於歷史唯物論又用之歷史唯物論。在處理這個兩面性時，我有點進退兩難。

先說出之於歷史唯物論的部分。無論「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在西方目前多麼受重視，它都稱不上「主流」，更不用說在台灣。<sup>4</sup> 與主流相對的不是「少數」，「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討論是否受歡迎是另一個問題。令人困擾的是：在擇題與寫作的類型上，它是一種「支流」。

我當然不可能貶低這個題目的價值，而是想指出一個尷尬的事實：由托洛茨基提出的這個命題其實要求作者與讀者對特定領域（此處即馬克思主義的傳統）有一定程度的事先認識，而一旦有了這些認識，能再充分談論的就不算多了。這樣的窘境與「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身分有關：在理論上，它高度依賴歷史唯物論，因為它是這個典範的一種「變體」(variant)；在歷史上，它高度依賴具體的歷史社會（和國際）動態，因為它是現實的抽象規律，也是現實的分析框架。只要了解歷史唯物論到一個程度，或者對揀選的案例有充分可靠的觀察和描述，說穿了，提出「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只是「臨門一腳」或「畫龍點睛」。的確，這「一腳」和「點睛」需要智識上的突破、洞見或創新，但相關工作卻深深奠基在和延伸自大量的先備知識和理論傳統。

大概也是因為這樣，托洛茨基從未專文說明「不平衡與綜合發展」（革命事業占據了他大半輩子），當代詮釋者 Justin Rosenberg 也只有在訴諸經驗性和歷史性的著作時，才更有力地說明了這個規律，否則純就理論（而且不進入歷史唯物論）而言，則顯得單薄許多。本文之所以在討論「不平衡與綜合發展」之前花了相當篇幅勾勒歷史唯物論的輪廓（第三章），介紹資產階級革命的爭議、不斷革命的思想（第四章）和 Rosenberg 面對的理論問題（第六章），道理也是一樣：我們不可能不先了解「不平衡與綜合發展」**依賴的理論對象**，只是這樣就不免給人「顧左右而言他」的感覺。雖然我盡可能深掘「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深義，但似乎很難避免這種狀況。

我無意為自己的書寫能力開脫，也相信有更好的方式避免上述狀況，但「不平衡與綜合發展」更類似**理論預設**或**推論結果**，要詳述就必須繞道，正面談論反而不夠，我也是在這個意義上說它是一種「支流」。老老實實將它當作方法應用

---

<sup>4</sup> 就我所知，台灣學界只有萬毓澤 (2006) 翻譯過 Michael Löwy 有關「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短文；賴忻延在社科普網站「菜市場政治學」(<https://whogovernstw.org/2017/03/22/hsinyenlai/>) 評論 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 (2015) 的專書時，在 Rosenberg 的問題意識下提到了「不平衡與綜合發展」。

在個案研究 (case study) 是比較適當的呈現方式，不過這麼做卻忽視了同樣重要的事實：在歷史理論上，托洛茨基的經典命題改變了馬克思主義，所以我還是選擇了理論而非歷史。

再說用之於歷史唯物論的部分。「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給歷史唯物論帶來的創新在於複數本體論的引入，具體來說，就是強調國家之間的對立或社會之間的共存與互動，我們也會從這個觀點重探歷史唯物論的樣貌。然而，人類開拓的理論及精神世界是很「擁擠的」，很難找到一個地方不被某個思想派別盤據，對馬克思主義來說的創新之處，對其他典範或思想流派而言可能正是很根本、很老套的，好比從來就標舉國家之間對立的國際關係現實主義學派，以及一開始就憑著「種群」(population) 立基在複數本體論的演化理論。那麼，我們需要「引現實主義或演化理論入關」嗎？它們應該「入關」到什麼程度？在它們背後，沒有其他更勝此任的典範或思想流派？面對這些問題，我只能繼續留守馬克思主義，畢竟「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終歸是托洛茨基這位馬克思主義者提出的，也更受到馬克思主義者的重視，否則繼續深入其他學派和領域，本文將會非常發散。

不能否認，非馬克思主義的相關思考很重要，我只能重新詮釋整合了演化理論的馬克思主義者 Alan Carling (所以不是演化理論本身，而頂多是演化理論的核心概念)。此外，不能忽視的是，在歷史唯物論增添了「國際」之後，我們如何分配此一向度和既有社會關係的「權重」？在附錄中，暫時取用社會科學哲學機制主義的解釋方式，以及亞里斯多德對因果關係類型的思考回答這個問題，而這些討論現在仍在社會科學哲學界熱烈進行著。

創新之處即傳統的不足之處。把非馬克思主義關注的焦點引為己用後，歷史唯物論多大程度上還是馬克思主義的？我不認為「馬克思主義」這個標籤非常重要，但它是給思考方式分類、廓清工作範圍的方便法門，也給本文設下一個篇幅限制。只是面對問題時，這個方便法門還有多少語言和概念可以回答？「不平衡與綜合發展」正是答案，它來自馬克思主義，卻有打破這個傳統、向外探求的衝動。我們無法大方地「從『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觀點反思歷史唯物論」，好似這樣一副眼鏡外在於這個傳統。事實上，這副眼鏡正是這個傳統自己模模糊糊打造出來的，而它之所以需要眼鏡，就是因為有些事物——國際——看不清。戴上眼鏡後，確實可能讓歷史唯物論看清事物、回答問題，但歷史唯物論也可能「不那麼馬克思主義」了。雖然我力圖捍衛馬克思主義的精神，但也不免感到左支右

紕。這固然是因為思考與寫作能力不成熟，卻也是被「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理論性質所決定的結果，因此才把它稱為對歷史唯物論的「介入」或「干預」：讓它的「硬核」更堅固，卻也多少打亂了原有套路。







## 第一部份





## 第二章 歷史理論與馬克思主義

本文只討論特定版本的歷史理論，即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為此，有必要先為歷史理論刻畫一張地圖。<sup>5</sup> 歷史理論是歷史哲學這個領域的分支，「歷史哲學」在今天可能讓人想到以法則統攝（甚至取代）龐雜現象的史家，如黑格爾和現在比較少人提到的湯恩比和史賓格勒。有別於此，我把歷史哲學和「（社會）科學哲學」看作一類，旨在以哲學問題反思人類實踐：在科學哲學中，反思的對象是科學實踐；在歷史哲學中，則是史學實踐。<sup>6</sup> 以此類推，當然還有許多有關特定實踐領域的哲學，好比政治哲學和生物哲學。

學科名稱的類比指出了一個事實，即**人類實踐無法與理論脫鉤**。我們可能馬上會遇到一個爭議，而這個爭議已經是「歷史哲學式的」了：這裡的「理論」是**先行的**，有侵害事實、削足（事實）適履（理論）的危險（例如根據現行史料來看，黑格爾和湯恩比的著作站不住腳，這正是人們避談「歷史哲學」的原因）；還是**後來的**，出自具體研究歷史現象之後的整合？下文還會遇到這個問題，這裡先不回答。

歷史哲學關注的問題可以分為五類：第一，**史學的真實性**，即史家提出的命題如何呈現歷史真理或真相，這是一個認識論問題；第二，**真理的政治性**，這個問題的探討方式更接近現在所謂的「知識社會學」，涉及史家認識歷史真理時的價值判斷及其社會根源；第三，**書寫的方法**，指的是史家組織命題的方式，如分析或敘事，這與語言問題有關；第四，**解釋的框架**，也就是史家闡述過往社會現象發生、維持與改變時依憑的本體論；第五，**史學實踐或學科本身的性質**，涉及能否及如何區分自然與社會／歷史的本體論問題。這五類問題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歷史唯物論——中都清楚反映出來。

---

<sup>5</sup> 本節受 Carr (2018) 和 Walsh (1967) 的經典著作啟發，儘管還是以我自己的話來說。

<sup>6</sup> 注意：不是**歷史本身**，正如科學哲學的反思對象也不是**自然本身**。現在人們幾乎摒棄的「歷史哲學」或「自然哲學」，就是直接以思維處理歷史和自然，而不是史學實踐和科學實踐。根據 Walsh (1967: 13-5) 的區分，這應該稱作「思辨的歷史哲學」，而本文要做的則屬於「批判的歷史哲學」。在這個意義上，歷史哲學有其獨立存在的價值與正當性。對於 Walsh 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詮釋類似先驗的真理，而非經驗的假設，因此屬於思辨的歷史哲學 (*ibid.*: 26-7)，本文不同意，畢竟「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就是對歷史唯物論「硬核」的修正（見下文），只有對經驗的假設才需要修正。

## 第一節 歷史哲學的問題

在依序介紹這些問題之前（它們都足以用專書篇幅來討論，但為了盡快進入本文，我將直接指出我的立場），需要先認識「歷史」和「史學」的差別。歷史是過去的一切事物，這些事物具有一定動態，這代表它們不斷改變，而這個過程維持至今，直到我們反思、研究並寫下相關文字的當下。因此，歷史是時間總體的一個大段落，不是全部，儘管它持續吞噬著當下；此外，所謂「過去的事物」也只能就發話者或研究對象來說，因為當下很快會成為過去。

史學則是研究歷史的學問，在它作為一種人類實踐因而也處在時間中、持續被吞噬的意義上，史學也是歷史的一部份，所以有「史學史」。不過既然當下是存在的、可與過去區分開來，那麼總有一部份時間在過去襲來前尚未被吞噬，人類也就能由此出發，研究過去事物，這是為什麼史學不總是史學史而史家能夠帶著當下關懷研究過去。歷史無法被直接而全面地認識，總是要在史學中被間接而局部地認識，因此史學固然有一部份會成為歷史，歷史也有一部份屬於史學，能夠經過史家的選擇和敘述被認識。

### 一、史學的真实性

作為歷史研究的過程或結果，史學著作是由大量命題構成的。這些命題承擔了兩個任務：一方面要符合歷史事實或過去的事物，另一方面本身必須依照特定邏輯相互關聯。如果沒有達成第一個任務，很難說正確認識了過去的事物，就算命題之間有緊密的邏輯，讀者認識的也只是史家的說法，而非歷史。如果沒有完成第二個任務，同樣無法正確認識過去的事物，因為命題之間的無序或無關不能起到解釋的作用，也不能賦予讀者意義，就算「史實」躍然紙上，也只是一堆雜多。

史家固然很清楚這些問題，實踐起來卻很難有個準。不論是否有意為之，更傾向完成第一任務者，在哲學的認識論上要求「符應」（correspondence），命題要正確描述或反映事實；傾向完成第二任務者則要求「融貫」（coherence），命題之間要能根據特定邏輯推論，它們指向的事物也有特定關係（Walsh 1967: 73-90）。之所以有這個分歧，是因為歷史事實與社會現象雖然都是經驗性的，但作為過去的事物，畢竟已經消失，我們只能憑其「痕跡」（如社會或自然留下的文字、圖

像和任何物質)來推論和重建事實,而推論和重建的過程本身就需要特定邏輯及相關概念來指引;當然,就某些最基本的痕跡而言,是可以比較直觀地或輔以特定技術在經驗上加以確認的,好比一兩百年前良好保存至今的戶籍名冊。

沒有哪一位專業或業餘的史家只採取其中一者,故符應論和融貫論是一種「傾向」。黑格爾和湯恩比之所以被批評,不是因為他們不考量經驗現象,而是因為他們過於強調命題的邏輯乃至體系。前文提到的削足適履,指的就是把歷史事實強塞至史學架構的暴力。然而,我們頂多只能說這樣的史學著作是比較「差」的,卻不能說它「不是」史學著作,畢竟反過來說,單單確認一件過去事物的存在而不論其意義和關係,也是另一種偏頗;即便鉅細靡遺描述了過去事物,如19世紀30年代蘭克(Leopold von Ranke)標榜的「如其所是」(*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 (Carr 2018: 8),所謂「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的「話」也不可能不在特定問題架構——對史家和讀者來說皆然——被「說出」和「聽懂」,而這些問題架構正是由命題和概念構成的。

因此,我們只能假設:史家總是多少根據當下的邏輯或體系來研究歷史。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可以輕易將這些命題編入這套邏輯或體系,這時後者看起來並不重要。然而,這不代表它們不存在,尤其是當新的歷史事實或過往的事物被確認,而這些邏輯或體系又無法加以收編時,問題就會浮現,而浮現的時刻就是史家校正其邏輯或體系的時刻,校正後仍需下一次的事實確認和體系收編,史學的真實性就在這個往復徘徊的過程中逐步逼近歷史真相。

對此,E. H. Carr (2018: 29-30) 總結道:「史家從暫時選出的事實,也從據此——被他人或他自己選出——而來的暫時詮釋出發。當他工作時,透過彼此的交互行動,詮釋以及事實的選出與排序經歷微妙且或許部分無意識的轉變。這個交互行動涉及當下與過去的交互性,因為史家是當下的一部份,事實則屬於過去。史家和歷史事實對彼此來說都是必要的。缺乏事實的史家是無根且無望的,缺乏史家的事實則是死去和沒有意義的。因此,我給『何謂歷史?』的第一個答案就是:這是史家及其事實的持續互動過程、當下與過去無止盡的對話。」

## 二、真理的政治性

命題之間按照特定邏輯或體系構成的關係，不只能讓史家組合歷史事實、認識過去事物，它們本身可能就是史家在當下社會生活與行動的產物。史學既然是人類的實踐，就會成為過去，而史家作為史學實踐者，也鑲嵌在必然成為過去的社會中，因此不可能不受社會上各種力量所影響，這些力量有非常多，我們只限制在政治。雖然史學的真實性可能因此受侵害，但若史家無法發現和說明自己所受到和正受到的影響，那麼史學真實性的侵害恐怕會更嚴重。

這裡的關鍵在於：史家是否有意識地將其倚賴的邏輯或體系舉出，並交代倚賴它們的原因和動機；具體而言，就是在書寫的操作上是否巧妙地呈現或分出一點篇幅給「歷史哲學」（當然不一定要言必及此，但作者應該透過某些方式在其生涯中表明這方面的心跡）。在今日細密的學術分工和專業化要求下，這種做法若非被否定，至少也被認為是不重要的，畢竟除了歷史事實本身，這些邏輯或體系似乎不應該來自別處。這就回到了前述的「符應」說，而我們知道少有歷史事實會「自己說話」，過去的事物也不是自然就有意義和秩序的。無論如何，史家意識到自己的預設和著作的政治來源與效應，都有助於考量更全面的問題，而這些並不是與他們本業無關的。

雖然史家跟他的研究對象一樣，都是社會的產物，但這並不妨礙認識超越特定社會的普世原則（見下文「解釋的框架」），好比不管從事哪些行動，任何人都必須存活下來，並且總是處在複雜或簡單的社會關係中。這些原則用來確認許多年代久遠的事物，如考古殘骸的功能和意義，而作為真理，它們是不容政治干預的。反過來說，普世原則正好也是測試史家及其著作是否因政治立場而偏廢言論的石蕊試紙。因此，就像符應和融貫不能偏廢其中一方，政治立場的特殊性和真理的普世性固然是對立的，卻不相互排拒，它們始終在一個張力中共存。

此外，史家接受特定政治立場——或更廣泛地說，關心所處社會的特定現象與問題——不只不代表其書寫與思考是「任意的」，甚至有這方面的意識才能形塑其強韌的關懷和寫作動機。用建制化的學術用語來說，這不就是「研究動機」嗎？Carr (2018: 35-55) 舉了不少例子表明史家的著作往往因為作者鑲嵌在社會中、帶著獨特關懷而有著截然不同的深意，好比著有《羅馬史》的德國史家蒙森 (Theodor Mommsen)。如果不了解 1850 年代德國正經歷現實政治 (*Realpolitik*) 時期，其筆下的凱薩和西賽羅就無法反映蒙森渴望強人救國、不滿絮叨辯論家的

心思。<sup>7</sup> 撇開政治和真理的問題不談，對讀者來說，不能察覺或缺乏這方面深意的著作也不好看、沒趣味。<sup>8</sup>

即便史家著述的動機是學術性和科學性的，也很難避免著作問世之後，在有意無意的詮釋下被鑲嵌進政治鬥爭。二十多年來，新清史研究對中國史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衝擊已經引起爭議 (Ho 1998, Rawski 1996, Waley-Cohen 2004, 汪榮祖 2014)。如果蒙元和滿清是內亞民族的征服王朝分支（據稱，滿清王室自始即把漢語學習與普及當作綏靖政策的一環，宮廷始終以滿文為溝通工具），那麼何來稱之為「中國」的獨立對象和歷史？這顯然是政治問題，我們就不再舉台灣史研究與統獨之爭為例了。

### 三、書寫的方法

歷史既然是一切過去的事物，這些事物就是各式各樣的；不只如此，它們涉及的層次也有許多。舉例來說，古代君王不計其數，史家可為某位作傳，也可跳脫個人層次，書寫他所處的朝代，這時不論環繞在歷代君王還是涉及庶民社會，書寫的範圍都拉大了。或者，跳脫斷代史，改寫國家或民族史，涉及的時間跨度就拉大更多，成為國族（通）史；如果僅針對特定領域書寫，就成為專題史，如經濟史或社會史。此外，近二十年來，打破國族藩籬的全球史研究勃興，書寫範圍可能從原始人類延伸到數位時代。這些書寫的對象都是過去的事物，隨著發生的層次不同，事物就不僅止於人類個體（君王），還包括了人類群體（朝代和國族），甚至包括人類本身。

這些事物發生在時間中，它們出現、生長、衰退或消失，史家的討論不可能不涉及時間，因此書寫時必須要有「敘事」：服從時間的推動，逐步呈現事物及其元素（或更微觀的事物）的發展。敘事本身有許多問題，好比隨著史家的對象不同，單一句子可以細緻描述君王慣用器皿的雕花與材質，也可以粗略描述他好

---

<sup>7</sup> 在馬克思主義這裡，葛蘭西分析馬基維利的《君王論》時，我們都知道他的重點無非是探問義大利何時及如何能有一個「當代君王」，一個真正回應人民需求、足以應付消極革命的共產黨 (Thomas 2017)。不提馬克思主義者，看看當今台灣獨派和台派愛戴的中國作家劉仲敬 (2017, 2019)，我們也可以發現不管他多麼旁徵博引地談著世界史，目的都是以他所謂的「民族發明」和「內亞秩序輸出論」來瓦解中共政權和大中華史觀。

<sup>8</sup> 陳寅恪在《柳如是別傳》中說過「詩若不是有兩個意思，便不是好詩」，這裡的「兩個意思」或「二義」分別就是字面上、研究成果的意思和行文背後、作者動機的意思，見王汎森 (2011)。

戰的一生，更可以大筆一揮，概括整個朝代走向。這是句子與事物的「比例尺」或「密度」的問題。

此外，更重要的問題或許是敘事本身的意義。史家必須排列描述的事物，編年史就是按照發生的時間陳列事件，提醒讀者在當下被吞噬之前發生了什麼。然而，面對編年史和任何敘事，我們不可能不追問：後來的事情與先前的事情有什麼關係？當史家先後記下美國獨立和法國革命時，從符應論的角度來看，無疑正確地描述了它們的順序，但這是否代表美國獨立「影響」甚至「導致」了法國革命？這涉及下一個問題，也就是解釋。不過這裡還是先聚焦在敘事。

一旦探究事物出現的原因，敘事似乎就不夠了。畢竟原因可能有很多，多個原因更可能同時發生。假若每一組原因通向結果的鏈條都構成一則敘事，多重敘事就只能交由不同段落和章節「同時」進行，儘管史家不可能「同時」書寫，讀者也不可能「同時」閱讀。這種情況仍然保留了敘事，而真正的麻煩在於有關解釋的不同認知。

舉例來說，在解釋 15、16 世紀英國的土地買賣或圈占時，我們發現相較於歐陸其他地區，這並非某一農民或地主的單獨行為，而是越來越普遍的現象。如此一來，解釋就不能只追溯農民或地主的動機，或者任何先於並刺激他們行動的人事物，還要探討市場這個「事物」的邏輯，而市場是一種代表商品交換關係的制度，甚至在當時的英國已經是一種基於「新生產關係」而來的交換活動。在此之前就算早有商品交換行為，但當土地買賣或圈占流行起來，與其把無數商品交換當作原因來描述（這是不可能也是無意義的，何況原因也不只是商品交換的盛行），不如直接分析這種社會關係的邏輯，而這麼做就跳脫了敘事。<sup>9</sup>

這種情況也發生在敘述層次較高的事物上，好比橫跨數世紀、有興有衰的地中海商業史；用年鑑學派常見的話說，就是「長時段」(*longue durée*) 的對象。

---

<sup>9</sup> 其實敘事和分析的差異（和對立）問題並不限於史學著作，理論著作亦然，只不過後者「所敘之事」並不是歷史，而是理論。《資本論》的讀者往往對馬克思的「敘述方式」感到有些困惑：時而是具體的歷史敘事（這樣的段落較少，如資本原始積累的討論），作者按照時間的推動在書寫，時而又脫離歷史，看似仍有時間上的先後順序，實則著眼於概念分析（好比第一章貨幣發展的段落）。事實上，當作者企圖呈現心目中某個研究對象的**整體**形象，偏偏書寫本身只能線性進行時，必然要思考從何下手。史家的敘事正好符合線性書寫，但一次性描寫整體形象的需求仍然存在；理論家的敘事則礙於線性書寫而不得不跟著「理論時間」（而非歷史時間）來書寫，只有這樣，整體形象才能逐步被描繪出來。



句子與事物「比例尺」或「密度」越低的敘述，往往越要依靠大敘事。由於再多的（小）敘事都無法詳盡填補或證成大敘事，以至於必須跳脫敘事，轉往分析，而這時的歷史對象也就跟著轉變，成了某種共時的結構或深層的社會關係，走向敘事的對立面。<sup>10</sup> 當代史家經過 20 世紀的各種史學革命或轉向後，今天應該能靈活運用結構分析和傳統敘事，不拘泥於其中一者。<sup>11</sup>

#### 四、解釋的框架

誠如前述，史學的對象可以隨著主題的改變而改變；若史家探詢事物之間的關係，這個關係本身也可以是一種事物，而因果關係則是最重要的關係。這時，正確描述因果關係這個「事物」就等同於成功地解釋。史學不只意在描述，更意在解釋，只有成功地解釋才完整地描述了過去的事物，讀者也才獲得因果關係方面的意義。

史學真實性的問題也與解釋有關。符應和融貫不只是針對過去的事物，也是針對過去事物之間的因果關係而言，史家總是根據某些框架進行解釋，在遇到過往出現的新事物時繼續以此解釋，直到既有框架無法負擔這項任務，轉而自我修正，之後再重新解釋。解釋的框架大概有三種，以下依序指出。

##### （一）歷史行動者的動機

第一種是回到歷史現場，即現已被吞噬的、曾經存在的當下，去探討行動者的動機。這種做法的正當性在於：歷史最終是人造的，而不是某種抽象的精神或神意所為，而人類個體是有意識和反思能力的生物，即便受到外在刺激，也是基於某種程度的理性而行動的。回到歷史現場，是為了避免目的論或後見之明將後來的觀點施加在歷史現場的行動者。

---

<sup>10</sup> 對結構的分析除了透過各種概念，有時也透過統計數據和量化方法來呈現。對此，部分史家曾不無哀嘆地表示敘事傳統的消逝 (Le Roy Ladurie 1979: 111)，而其他人則認為敘事將以其他方式再興 (Stone 1979)。

<sup>11</sup> 史家的書寫方式不只涉及「敘事和分析」。從語言學和文學的角度切入，治史手法也與前述史學的真实性和真理的政治性等問題有關，尤其歷史是已經過去的事物，我們不得不以語言——確切地說，應該是「論述」——來重構或再現它們，而這個過程必然涉及各種論述規範和類型，當代在這個主題上最引人矚目的著作或許是 Hayden White (1973, 1987)。

在這個意義上，解釋事物的存在或變化就是指出行動者的動機。<sup>12</sup> 只要做到這點，史家就完成了解釋。至於解釋的過程，則可以透過敘事從行動者受到的外在刺激說起，直到行動者的動機和最終的施作。我們可以說，有待解釋的事物作為結果，行動者的施作和動機就是原因，而當後兩者作為結果，外部刺激又是原因。因果關係在此表現為一組鏈條。<sup>13</sup>

這種解釋方式有兩大問題。首先，不要說過去，即便是現在，我們也不可能知道並確認另一人類個體的動機。這個典型的「他心」問題移植到遙遠的過去只會更難解。

其次，即便確認了歷史行動者的動機，我們也不能「預測」他們據此採取的行動及後果，何況就算動機只有一種（通常不只一種），據此而來的行動和後果也可能不只一種；當眾多行動和後果中只有一種延續下來，成為史家所欲解釋的對象時，如何說明懷有該動機的行動者正好會導致史家所欲解釋的事物？

---

<sup>12</sup> 把這裡的動機延伸為行動者的「思想」或精神世界，這種解釋方式便可追溯至 Benedetto Croce 和 R. G. Collingwood 這些唯心主義思想家或歷史哲學家，尤其是考量後者的經典論述：「對科學家來說，自然總是且僅僅是『現象』，這並不是說它在現實上有什麼缺陷，而是說它是呈現給科學家的智識觀察的景觀；不過歷史事件從來不只是現象，從來不只是凝視下的景觀，而是史家為了識別其中思想而必須看穿而不只是看到的東西。」(Collingwood 1956: 214, cf. Walsh 1967: 48-9 粗體為筆者所加) 雖然我們在這邊關注的是歷史現場，即過去的某個當下，因此要洞悉行動者的動機似乎很困難，但若輔以下文提到的「人類普世原則」或「人性」，這也不是不可能的，只消一方面認為「一切歷史都是思想的歷史」(Collingwood 1956: 215)，另一方面又主張「全部歷史都是當代的歷史」(Croce 1960: 12)，則過往的思想便能傳承至且凝聚為現在的思想，史家要進入歷史行動者的內在就不是難事。

<sup>13</sup> 如果不考慮行動者動機，那麼就可以將外部刺激視為先行事件，行動者的行動過程或結果視為待解釋事件。基本上，歷史解釋就是找出作用於待解釋事件的先行事件。這裡涉及歷史是否為一門科學的問題（見下文）：如果不是，則對部分史家來說，歷史解釋就是在找出先行事件（不管是盡可能多還是羅列幾項重要者）之後，詳盡描述它們作用於待解釋事件的過程，這個過程可能是高度偶然和複雜的，難以得出一個法則；如果是，那麼根據 Hempel (1942) 的看法，就要經過多次觀察與統計，歸納出先行事件導致待解釋事件的重複現象，也就是「當……（先行事件）發生時，被解釋事件發生」的法則，然後依照實際上先行事件是否發生，再從該法則演繹出待解釋（或預測）的事件。這個經典的涵蓋法則（covering law）模型立基在經驗主義（這也是實證主義備受批評的地方），其問題在於：重複現象（先行事件多次導致特定事件）本身就應該被解釋，怎麼會拿它來解釋另一起特定事件？而且嚴格說來，某些事件先於待解釋事件之前發生，不等於它們「導致」待解釋事件的發生，先後兩起事件只有「相關性」。下文提到的機制式解釋試圖糾正這種觀點。

這裡有一個區別很重要：社會科學的預測往往針對相對於當下 ( $T_n$ ) 的未來 ( $T_f$ )，雖然成功解釋當下未必能預測未來，但兩者的脫節就算不是可欲的，至少是可理解的；有別於此，史學的「預測」針對相對於過去 ( $T_p$ ) 的時空 ( $T_x$ )，這個時空是被史家掌握的既存事實，晚於過去，早於或等於昭然若揭的當下 ( $T_p < T_x \leq T_n$ )。換句話說，史家固然不能以後見之明來說明歷史行動者動機，卻也不能假裝不知道在行動者可能採取的行動及其後果中有某個延續至隨後的時空 (即包括了  $T_n$  的  $T_x$ )，最終被史家觀察到，成為所欲解釋的對象。

因此，如果在解釋了過去 ( $T_p$ ) 事物的同時不能連帶說明行動者隨後 ( $T_x$ ) 的行動及其後果，我們就無法從過去回到當下 ( $T_n$ ) 或晚於過去的時空 ( $T_x$ )。的確，行動者在過去和當下都一樣，行動及其後果充滿多樣性，難以預測，但歷史解釋的特殊和困難之處就在於：必須在成功解釋的同時，也成功「預測」，說明何以某些行為在發生之後還會延續下來，否則任何晚於過去的事物之發生和被察覺，都將淪為偶然；換句話說，解釋項必須是被解釋項的充要條件，**歷史解釋要能在走向過去之後回到當下**，所謂的歷史必然性是在這個意義上說的。

訴諸行動者的動機 (假設能夠做到) 僅僅是「走向過去」，但因為動機與確定的行動及後果、以及在這些行動及後果中延續至今的某一個或某幾個，很難有一對一的相應關係，因此很難「回到當下」。若無配套條款就直接「回到當下」，恐怕有目的論之嫌。要避免這些問題，必須採用另一種解釋框架。

## (二) 歷史中的社會關係

第二種是自行動者的動機退一步，回到他們的外在刺激。不過這些刺激不是前述如鎖鏈般可清楚分出先後順序的「原因」，而是由行動者、行動者之互動和各種物質在他們之間的分配所**構成和表現**的社會關係。只要身處其中，行動者就有產生特定動機和行動的傾向；外在刺激就是行動者無處不遇的「條件」(condition)，這樣的條件限制 (condition) 了行動者，也讓行動者得以行動。在歷史哲學的脈絡下，我們稱之為社會關係；在 (社會) 科學哲學的脈絡下，則稱之為機制 (mechanism)。<sup>14</sup>

<sup>14</sup> 這裡有四點要注意。第一，社會從來就不只由人類個體或行動者及其互動所構成，還包括各種人造物和隨時介入社會的自然，所以我在這邊提到了「各種物質」。第二，社會關係**本身**不是經驗性的，也與時間無關的，我們必須在面對特定現象時假設它，並伴隨之後的證明，才能說它

因此，要解釋某個過去 ( $T_p$ ) 的事物，就可以直接訴諸這個機制，而不是特定一個或一群人類個體的動機。由於身處其中就可能產生某些動機和行動，解釋和預測就可能同時發生。解釋：之「所以」會有某件事物發生，是「因為」特定機制。預測：行動者只要在機制中，「必然」會有產生某些動機和行動的傾向，導致我們稍後 ( $T_x$ ) 或現在 ( $T_n$ ) 所看到的、有待解釋的事物。

我稱上一種解釋框架為「動機式解釋」，這一種則是「機制式解釋」。機制式解釋雖然和動機式解釋一樣都回到歷史現場，但不用「神入」行動者就能達到一定程度的預測。這裡的預測並沒有到「誰」在「什麼時間和地點」產生「什麼具體行動」的程度，而是一種以關係為基礎，針對行動及其後果來分類和條列，再觀察哪些行動者落入特定類型的推論方式。

仔細來看，這種解釋也不是沒有問題。首先，機制所倚賴的關係從何而來？雖然它限制行動者又賦予他們行動的條件，行動者藉此產生各種經驗現象，但關係本身卻不是經驗性的。除了透過行動者的行動（包含他們之間的互動以及與物質的各種關係）過程和後果，我們其實無法直接認識社會關係本身。它不是一個沒來由的「模子」，不靠行動者及物質的互動就能事先存在，之後行動者再置入其中。要認識關係，必須從行動者導致的經驗現象（行動及相應後果）回推，在本體論上加以設想，再以經驗現象證成。無論如何，行動者及其所處關係和構成之機制在不同層次上——本體論和認識論——相互建構。

其次，由於引入了社會關係的概念，過去 ( $T_p$ ) 和稍後 ( $T_x$ ) 的事物都同樣處在社會關係中。如果  $T_x$  與  $T_p$  的社會關係屬於同一類型，那麼把該關係當作外在刺激，確實能同時做到解釋和「預測」。然而，若  $T_x$  的社會關係與  $T_p$  的社會關係屬於不同類型；換句話說，行動者的行動和後果在隨後的時空中已經重新組成另一種社會關係，並再度受到這個新關係限制、藉此採取行動，我們就不能繼續以舊關係來解釋，更不用說預測。

---

在本體論上存在；因此，嚴格說來，我們的理論圖像不應該是行動者、行動者的互動和各種物質去「填補」社會關係內涵的若干「空位」，因為空位本身不可能先於這些人事物而存在，所以本文說的是：社會關係不只由這些人事物「構成」，更要經由它們「表現」。第三，承第二點，當我說行動者「身處」或「處於」社會關係時（下文還會見到這種說法），並不是指「他們填補了若干空位」而是指「他們成為那些構成和表現社會關係的（既存）行動者」。第四，承前三點，機制不等於關係，關係是機制的一部份，而機制是已經藉由行動者、行動者互動和各種物質表現出來的關係，由於這些人事物只能發生在時間中，機制就是一個與時間相關的過程，單單是關係本身是與時間無關的。

要解釋這種情況，方式有三：第一，訴諸待解釋事物在  $T_x$  所處的新關係，但這麼做沒有回到過去，並未保有**歷時**向度，毋寧只是一種結構性解釋，僅限於**共時**向度；第二，為了保有歷時向度，回到  $T_p$ ，考慮行動者動機和行動，但這就違反了機制式解釋，重拾鎖鏈式因果思考；第三，保有歷時向度的同時，回到讓歷史行動者產生特定動機和行動的  $T_p$  舊關係，這是唯一可行的方式。可是既然行動者身處舊關係，如何在行動過程和後果產生新關係而不依賴既有路徑？令行動者傾向特定動機和行動的社會關係是如何改變的？——這其實是前一個問題的歷史版本：行動者及其所處關係和構成的機制，如何可能改變？

第三，一旦提出上述問題，同樣的麻煩會再度浮現：即便舊關係改變了，改變的結果如何正是史家所欲解釋的事物？歷史解釋固然講究「走向過去」、回到歷史現場、拒絕目的論，卻不能不「回到當下」、以歷史行動所通往的從後見之明來看已然確立的方向為依歸。

關係本身無法自我改變，它的改變只能依靠置身其中的行動者，而行動者無論如何都有一定程度的理性，行動必然從清楚或模糊的動機出發，這是動機式解釋的重要性；此外，就算行動者對於後果有所「預期」，也不可能「預測」，因為行動往往是高度複雜的。不論動機和行動是否繼續承擔舊關係賦予的傾向，也不論他們是否預測到行動後果，行動之後通常會有三種狀態：第一，舊關係不變，一般來說這是最常見的；第二，改變舊關係，而改變的結果並沒有延續到稍後或現在的時空，因此不是史家所欲解釋的事物，這也很常見；第三，改變舊關係，改變的結果延續到稍後或現在的時空，而這又是史家所欲解釋的事物，這是非常困難，甚至是千載難逢的。

如果不能指出第三種狀態的可能性條件，歷史行動者就只是「剛好」做了改變，而改變的結果也「剛好」就是所欲解釋的事物。為了避免這個問題，有必要納入另一種解釋框架。

### （三）人類普世原則

前文在討論史學的真實性和真理的政治性時，曾指出符應和融貫、政治或社會力量與歷史真理往往共同存在的事實，因此不可能有純粹主觀的、理論的、黨派的立場，它們始終和客觀的、經驗可證明的、大家不得不接受的歷史真相形成

張力。歷史解釋同樣也包含了許多張力。

動機式解釋有個體主義傾向，因為它相對減輕了關係（或環境）對行動者的決定性，可是必須同時考量這些面向才符合整體主義。雖然機制式解釋具有整體主義的精神，但又傾向特殊主義：透過社會關係的確立，歷史行動者的動機和行動儘管不再過度紛雜或偶然，卻被鎖進一套具有特定邏輯的結構中。它們賦予行動者的傾向都是特殊的、特定的，就算我們說明了行動者對舊關係的改變，也很難說明改變的結果會從「這個」特殊轉向「那個」特殊，彷彿脫離了既有結構的限制，何去何從就成了大哉問。

如果機制式解釋的特殊主義有上述困擾，我們就應該往普世主義探求，找出歷史行動者先後在不同社會關係影響下也保有的共通性：人性（human nature）（Walsh 1967: 65）。換句話說，他們的動機（和理性）以及據此而來的行動，不只受到社會關係或結構的刺激，還會從中多多少少「流瀉」出去：一方面對未來抱有超越現有社會關係的想望，另一方面從過去汲取若干超越現有社會關係的經驗。

因此，史家未必要以神人的方式才能了解某一位歷史行動者，也未必要將行動者鎖進特定社會關係，也可以運用一種推論方式：在特定關係中，當普世原則被侵害或強化時，行動者會怎麼做？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回到歷史現場考察社會關係和行動者動機，因此不否定動機式和機制式解釋。正如社會關係承認行動者動機，普世原則也承認特定社會關係。納入人類普世原則是在特定社會關係之外添加另一向度，為歷史解釋帶入本體論的張力。

針對機制式解釋面臨的問題，我們可以說：在特定關係中，行動者的常見動機和行動之所以只是「傾向」，而非「命定的走向」，正是因為社會關係作用時普世原則也在作用。此外，舊社會關係改變時，也是普世原則更清楚地指引方向的良機，這個方向所代表的新關係可能被認為更能滿足普世原則，歷史行動者不至於陷入茫然。史家在憑著社會關係「走向過去」之後，在該關係改變時，才能憑著這個普世原則「回到當下」，不至於在避免目的論時被扣押在歷史現場。

## 五、史學的性質

提到普世原則，很容易令部分史家想到自然科學，似乎只有自然科學能夠建立普世原則，因為它的研究對象不涉及理性、動機和自我意識等，研究者可以直接探究對象發生的「原因」(cause)，而不是「理由」(reason)；一旦涉及後者，人類似乎就可以擺脫最終立基在物理上的因果關係，總是產生各種偶然性、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規律因而很難被建立。立足在人類社會——不同社會有不同文化，它們在時間上先後發生，也在空間上四處分布——的歷史不可能不涉及自我意識，以及由此衍生的動機和理性等，歷史因此不可能成為科學，社會和自然之間有一道嚴格的界線。<sup>15</sup>

如前所述，社會和自然確實不同，但對其他史家來說，兩者的劃分卻沒有那麼嚴格，它們仍然有某種共通性。首先，人類或任何人類個體，就算憑著自我意識和各種動機來行動，也不能駁斥一個唯物主義的根本事實：肉身的存在是自我意識持續運作的前提，而肉身屬於生物層次，僅僅就這點來說，許多動物也和人類差不多。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還是能從自然科學的角度來研究人類，不管是細胞學還是演化生物學，由此建立人類普世原則。社會層次的變化會影響這個最根本的層次，但頂多只能調整它、改變它，卻不能取消它。除了涉及肉身的生物層次（這個層次是自然和社會的交界），規律也可以進一步發生在社會層次。

其次，人類確實具有自我意識、或多或少的理性和各種動機，但為了維持肉身的存在並參與各種社會實踐，不可能不藉此成為行動者，與社會中的其他行動者和物質保持互動。這些互動展開的關係（這個關係在時間中表現為一個過程）雖然出於某些動機，因此必然與動機相關，但必須注意，它們本身沒有動機、理性或自我意識，由互動構成的整體也是一樣，無所謂動機、理性或自我意識。舉例來說，「對話」本身沒有動機、「市場經濟」本身也沒有自我意識，我們最常提到的「社會」也不會基於某些理由而發生變化；有特定動機的，是參與對話的行

---

<sup>15</sup> 此外，與前述「書寫的方式」相關，現代史家必須多少透過敘事來展示歷史，賦予前後關聯的事件某些意義。然而，自然卻被有待（或已被）發現的規律所支配，科學家更傾向以分析的方式來書寫。延伸這個對立，史學通常又被期待精確描述事件，因此連同行動者的動機和思想等因素，構成了鉅細靡遺的偶然集合，（自然）科學則被要求普遍地提出可能性條件，由於可以排除行動者的動機和思想，因此形成概括性極強的單一必然規律 (Walsh 1967: 37-42)。

動者，有自我意識的是參與市場經濟的行動者，因為某些理由而展開行動的也是人類個體。

如果只有不具備自我意識等特質的對象才能談論規律、法則或普世性，那麼為什麼人類的互動、社會實踐和關係不能呢？對話可以有「規範」，市場經濟可以成為「看不見的手」，而社會也可能有一個「歷史進程」。事實上，前述的「機制」就是一個取法自然科學的用語。蘋果自樹上掉落的萬年例子，並不是要告訴我們此前颳了一陣強風，或者果實已經成熟、枝桠再也承受不住它的重量。它們固然是蘋果掉落的原因之一，但掉落之所以能被預期和預測，是因為重力。重力是發生在兩個以上物體之間的關係，因此是機制的一部份，只要有某個物體身處重力場，就有某種運動的「傾向」。社會關係作為一種機制也是如此。

無論如何，人類歷史兼有自然和社會兩個部分，也許後者更為主要，但前者卻持續發生作用。自然和社會固然不同，界線卻沒有那麼嚴格。

## 第二節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

歷史理論比歷史哲學的範圍小一點，也離經驗世界近一點。歷史理論是旨在解釋或反思歷史解釋如何可能的概念體系，因此聚焦在前述的第四個問題。雖然如此，它還是時常碰觸到其他四個問題。

由於這個體系是大量命題構成的，同時也由特定史家有意無意地應用，所以在面對新發現的、尚未解釋的過去事物或歷史事實時，它可能因為無法有效解釋而顯得捉襟見肘，最終必須校正既有命題，然後在校正之後，重新試圖解釋。用史學真實性的話來說，為了使命題與歷史「符應」，必須改變命題既有的「融貫」狀態，好比擴充、改寫或附上但書。命題「融貫」之後，必須「符應」歷史，達到校正的目的。

這個過程並不容易，它同時涉及史家的政治立場（即真理的政治性，如堅信立場而拒絕校正命題，反倒認為歷史事實沒有被完整呈現）、書寫方式（他／她可能是一位引人入勝的敘事者，卻不是條理清晰的分析者或反之）和「世界觀」（他／她可能堅持認為人類與自然界的其他生命無異，均可在單一法則下書寫其發展，或者認為人類特立獨行於自然界，因此必須著重在精神世界引發的各種現象）。



現在正式來看看馬克思主義。有關上述（歷史）哲學問題和相關應用，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中已有豐富討論，特別是在「辯證」（*dialectics*）或「辯證唯物主義／論」（*dialectic materialism*）等關鍵字下（Ollman 2003, Ollman and Smith 2008, Paolucci 2007, Sayers 1985）。我把這個部分視為本文抽象程度的「上限」，不再繼續討論，只消知道其形貌以便自我定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要往「歷史唯物主義／論」探究<sup>16</sup>，它是介於前述「上限」和更為具體的「下限」之間的解釋體系<sup>17</sup>，「下限」是與經驗世界直接相關的命題，包括一二手史料的內容和史家留下的經驗性描述與結論。這個解釋體系確實有點「不上不下」，但不如說它是連接上與下、抽象與具體的橋樑。

歷史唯物論與史學實踐密切相關，但就像科學哲學幫助科學實踐「省力」（*under-laboring*）而非取而代之一樣，對馬克思和恩格斯來說，歷史唯物論「絕不提供一個配方或圖式，好據以刪改各個歷史時期」，其作用是「簡化歷史材料的整理、指出歷史材料的各個層次之間的順序」（Marx and Engels 2016: 26）。雖然如此，歷史唯物論並不是史學實踐的附庸，因此無法三言兩語交代完畢。馬克思和恩格斯這種「史觀」（*ibid*: 46）也面臨歷史哲學的各種問題，並且提供了某些答案。

首先，作為解釋體系，歷史唯物論有一套關於人類社會與歷史的本體論，也就是著名的「建築隱喻」，下一章會介紹大致輪廓。這個本體論是說明社會結構持存、轉型和歷史發展方向的若干原則，以便研究者實際進行解釋。Callinicos (1995: 95-109) 認為，歷史理論有三個部分或次級理論。第一，結構理論（*theory*

---

<sup>16</sup> 雖然「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在史達林筆下已經僵化（它們是《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章節名稱），但其他馬克思主義者已經從各個路徑予以批判和解析，現在不應該再將它們想像為鐵板一塊的教條。

<sup>17</sup> 一般來說，比歷史唯物論再抽象一些但又不到辯證唯物主義程度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人類學（*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不考慮特定社會關係，直接以普世的人或人和自然的關係為討論對象。歷史唯物論很難和這個領域分開，尤其是強調生產和生產力的提高時難免對「人性」或「人學」抱有某種看法。Cohen (2000: 356) 認為生產的意義在歷史唯物論和哲學人類學中是不同的（在前者，生產多少是社會和環境強迫的；在後者，則是自然中人類自發進行的），兩者應該分開，儘管哲學人類學被駁斥的話，歷史唯物論也會面臨同樣下場。本文承認哲學人類學屬於不同的抽象層次，但不把它當作完全獨立的理論領域來討論，適當時還是會引入。連同稍後提到的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就包括了下列幾個抽象層次：辯證唯物主義、哲學人類學、歷史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和事件性的經驗研究（如《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之類的形勢分析著作）。

of structure): 說明構成一個社會的基本關係, 這些關係不依賴具體個人而獨立存在, 但也為他們提供了佔據其中、進而發揮力量的空位。下文會指出, 這相當於建築隱喻的「生產關係」, 而以此進行解釋就相當於前述的機制式解釋。第二, 轉型理論 (theory of transformation): 說明不同社會類型之間的深層改變, 而不只是對社會進行分類。這個理論相當於特定生產關係中的「階級鬥爭」, 無法與結構理論脫鉤, 因為社會的改變不可能是 (生產) 關係的自我改變, 一定涉及懷有特定動機或理性的行動者, 所以轉型理論必須包括前述的動機式解釋。第三, 方向性理論 (theory of directionality): 對人類歷史進程的總體樣態提出說明, 不管進步、倒退還是循環。在建築隱喻中, 這個部分相當於「生產」或「生產力的 (潛在) 提升」, 可以避免社會轉型之後「迷失方向」, 因此這種說明也相當於前述訴諸人類普世原則的解釋框架。

其次, 歷史唯物論是一套「研究綱領」<sup>18</sup>, 能夠在認識論上反思史學真實性的問題, 而建築隱喻就是這套研究綱領的「硬核」。經驗世界的各種現象與變化能證明也能否證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面對否證, 馬克思主義 (研究) 者必須捍衛硬核。本文關注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就被若干作者 (Burawoy 2009, Callinicos 1990) 視為歷史唯物論遭逢俄國革命 (在生產力落後處爆發革命的現象) 時, 由托洛茨基提出的「保護帶」, 試圖使這個研究綱領在新的時空下繼續適用。保護帶一旦通過考驗, 研究綱領就更具解釋力、越顯進步, 硬核也就有效地擴充了; 反之, 如果無法提出保護帶或最終無法捍衛硬核, 研究綱領將越來越退步, 最終在科學上遭到淘汰。本文希望指出「硬核在保護帶捍衛下擴充的本體論」或「保護帶和硬核的整合結果」。為此, 我們首先要了解作為硬核的建築隱喻究竟有什麼內容。<sup>19</sup> 這與前述認識論的「符應」與「融貫」問題有關。

---

<sup>18</sup> 研究綱領之說可參照 Imre Lakatos (1978) 的「科學研究綱領」(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概要言之, Lakatos 批判性地承繼了 Karl Popper 的思想, 提出了一種較精緻的否證論: 科學研究總有一套綱領, 而這套綱領又有一組不受經驗檢證的陳述作為其「硬核」(hard core), 屬於形上學 (用本文的說法, 即本體論); 若遭否定, 則綱領可謂徹底崩潰。在硬核周圍, 有一些輔助性假設 (auxiliary hypotheses) 作為其「保護帶」(protective belt), 盡可能地避免經驗的否證。科學家一方面會以消極性詮釋 (negative heuristic) 的方式去形塑保護帶, 設法捍衛綱領的內核; 另一方面也會以積極性詮釋 (positive heuristic) 的方式根據既有硬核來解釋各種現象, 暫不論經驗上的反例。面對反例, 若科學家能夠新創某些輔助性假設成功解釋之, 進而調整綱領本身, 則該研究綱領就是「進步的」。

<sup>19</sup> Little (1986: 40) 也區分了歷史唯物論和政治經濟學, 但在「理論」要能直接進行解釋的意義

第三，歷史唯物論是科學與政治之間的緩衝區或潤滑劑。研究綱領的進步與退步、在科學上的持存與淘汰是有政治後果的。托洛茨基提出「不平衡與綜合發展」不只捍衛了歷史唯物論的硬核，更活化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與此相反，第二國際只能走上政治破產一途。法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 Louis Althusser (1990) 曾經指出：哲學介於科學與政治之間，同時以它們為「賭注」(stakes)，既要在一方面保有真理，又要在另一方面站穩立場；以科學的證據捍衛政治立場，在政治的關懷下從事科學研究；在這個過程中，完全有可能兩敗俱傷。<sup>20</sup> 在追求「真實」的目標面前，史學研究是一門科學；至於從研究結論抽取政治意涵、基於某些政治動機而展開研究的做法，既防不勝防，亦非不正當。歷史唯物論——歷史哲學中特別關注意義的概念體系——連結了具體的史學實踐和政治實踐。作為一門概念與實踐體系，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之所以複雜而有機，正是因為涉及了科學（史學實踐）、哲學（史學實踐的反思）與政治（改變或維持社會關係的立場與行動），而且大方接受它們之間的糾結。這是前述真理的政治性問題。

第四，歷史唯物論的對象適合時間跨度大或事涉人數眾多的大規模現象，好比帝國主義的歷史或各國革命的社會條件，不論書寫方式是敘事還是分析。本文第七章以「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反思資本主義的起源，敘述時雖然會輔以若干編年史式的事件，但還是以分析為主。必須承認，如果要嚴格而完整地解釋宏觀現象，研究者需要暫時離開社會類型之間的轉變（見前述的轉型理論）這種大規模的歷史過程，深入個別社會，找尋內部的「運動規律」(laws of motion)，就像馬克思在《資本論》所做的那樣。然而，這必須進入政治經濟學，而這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另一個比歷史唯物論更具體、更接近經驗世界的領域，本文無法處理。這不是因為它不重要，而是因為歷史理論的討論是正當的，有資格成為獨立的研究對象；一旦如此，就必須省略一些細節，即前述的「下限」。

最後，歷史唯物論關注的大規模歷史過程就算沒有包括人類的全部歷史，至少也包括了前資本主義到資本主義的歷程，以及若干人類歷史早期的發展。之所以能夠如此，是因為「唯物主義／論」部分：從人類的基本生存需求出發，而這

---

上，他不認為歷史唯物論（或歷史唯物主義）是一種理論，而至多是一種「研究綱領」或用馬克思的話說「指導原則」(Marx 1970)。

<sup>20</sup> 該書多個篇章都可以見到 Althusser 採取這種獨特的哲學定義，這個時期的他已經擺脫「理論主義」，同時考量了政治的作用。這邊的簡述參考了 Domingo Sanchez (2015) 第七到第九點的清楚總結。

樣的思路具有普世性。作為關注人類社會持存、轉型和發展方向的解釋體系，它因此能觸及自然，因為人類確實有一部分的層次是生物的，和地球上其他生命無異。晚近已有少數馬克思主義者嘗試整合演化理論和歷史唯物論 (Carling and Nolan 2000, Nolan 2002)，可見對他們來說，自然和社會儘管不同，在大方向上卻邏輯一致。由於試圖擴充某些當代學者的說法，本文也略微提到演化理論，用「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加以補充。此外，人類社會更會反過來作用在自然，「人類世」或「資本世」的概念爭議就是一個例子 (Moore 2002, 2017a, 2017b)。



### 第三章 歷史唯物論的原則

第二章把「建築隱喻」的本體論視為歷史唯物論的「硬核」。在本章開始之前，先回顧一下馬克思著名的兩段文本，它們可謂建築隱喻的出處：

從直接生產者身上榨取無酬剩餘勞動的獨特經濟形式，決定著統治和從屬的關係，這種關係是直接從生產本身產生的，而又對生產發生決定性的反作用。但是，這種由生產關係本身產生的經濟制度的全部結構，以及它的獨特的政治結構，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經濟形式上的。任何時候，我們總是要在生產條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產者的直接關係——這種關係的任何形式總是自然地同勞動方式和勞動社會生產力的一定的發展階段相適應——當中，為整個社會結構，從而也為主權和依附關係的政治形式，總之，為任何當時的獨特的國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隱蔽的基礎 (Marx 2003a: 894)。

首先，「生產條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產者的直接關係」與「勞動社會生產力」相適應；其次，「無酬剩餘勞動的榨取」來自該關係；再次，「統治和從屬的關係」又來自「無酬剩餘勞動的榨取」。雖然如此，政治結構還是會「反作用」在「基礎」上。

這個段落強調這些層次的**結構關係**，另一個段落則聚焦在它們的動態、彼此的衝突，進而是**歷史過程**：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只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 (Marx 1956-83a: 8-9)。

馬克思主張，生產力會發展，並且將同曾經與之「相適合」、現在或最終卻成為其「桎梏」的生產關係衝突，引起「社會革命」。此外，法律、政治和「意識形式」以生產關係及其總和的「經濟結構」為（現實）「基礎」，它們則是「上層建築」。

接下來根據我的理解對歷史唯物主義正面立論，不與特定作者對話。雖然如此，本章還是有一個主題，即駁斥過度強調封建主義剝削方式和「政治結構」的立場。「外於經濟的強制」當然是存在的，可是過度強調卻有忽略經濟基礎在封建主義中依舊重要的危險，甚至可能讓歷史唯物論的有效性限縮在資本主義。為此，有別於歷史唯物論的常見介紹，我特別納入了交換關係的概念，希望歷史唯物論的有效性至少能延伸至封建主義。這樣的延伸，也是為本文將來討論「不平衡與綜合發展」時做一個預演。

## 第一節 從生產出發

歷史唯物論的核心概念是「生產」。人類——不管是哪一個時代、哪一個社會、哪一個階級的成員，都是各具差異又同屬智人的無數個體——歷史的首要前提是透過生產來生存或「活著」。馬克思和恩格斯是這麼說的：

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就必須能夠活著。但是「活著」首先就包括了吃、喝、住、衣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行動就是生產出「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生產出物質生活本身，而且這也是從千萬前年迄今，每天每刻都必須被履行的一個歷史活動、是所有歷史的一個基礎條件。(Marx and Engels 2016: 32)<sup>21</sup>

---

<sup>21</sup> 馬克思和恩格斯這個看似普通、甚至有點粗俗的出發點，從當時德國哲學界的主流來看是很驚人的。歷史唯物論把「肉身／肉身性」(corporeal/corporeality) 對象化、從人與其他動物的共同點或交界處來研究人類社會的方法，被 Joseph Fracchia (2005, 2014: 3) 譽為「哥白尼轉向」。這也讓馬克思主義和達爾文（及受其影響的演化理論）的對話成為可能。參酌達爾文的思考，兩人能為自然史和人類史的鴻溝搭起一座橋樑，邁向皆與「肉身」相關卻截然不同的兩個領域的單一科學 (Fracchia 2014: 7)。

自然界的生物誠然也要「活著」，與人類有共通性，但「活著」是人類歷史的首要前提，而非終極目標，首要前提只是邁向終極目標的必要條件。人類還有其他需要，包括適時的休閒與對自由的追求 (Sayers 1998: 53-5)，因此總是身處「必然王國」和「自由王國」(Marx 2003a: 928-9)。自然界的生物儘管也需要延續物質生活，卻不似人類能以「生產」的方式延續。人類歷史是介於生物和社會兩個層次之間的整體。

生產是勞動力與生產資料或物質生產力的結合，能夠開啟勞動過程。這些活動屬於社會層次，不論哪一個時代和社會，都大量而持久地發生。在人類歷史早期，生產和勞動還是同一件事。<sup>22</sup> 所有生產都包含勞動，而勞動必須持續一段時間，不是短暫的或不穩定的，所以生產總是「再生產」，這是普世原則。

為了再生產，產品不能在生產之後全數耗盡，生產資料也不能一次性地完全耗損，勞動力同樣必須持續再生產，而勞動力承載者除了「活著」，往往還試圖繁衍，「再生產」因此也從社會層次跨至生物層次：

生命的生產，無論是在勞動中產出自己的生命，或是在生育中生產出別的生命，現在就立即表現為一個雙重關係——一方面是自然的關係，另一方面是社會的關係——「社會的」的意思是：許多個人的共同活動……。(Marx and Engels 2016: 34)

放眼社會層次，我們可以看到人類歷史的多數時期為了生產和再生產，直接生產者總是嘗試與生產資料持續而穩定地**結合**。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社會上有一群行動者**壟斷**生產資料，導致生產資料與直接生產者**分離**。如果不存在壟斷和分離，是沒有必要結合的，而只有結合，直接生產者才能勞動。可是一旦如此，他們就要付出維持自身生存所需之外的時間，無償為壟斷者勞動，即**無償勞動**。相

---

<sup>22</sup> 勞動和生產是不同的概念：前者偏向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結合後發揮勞動力的物理過程，而後者則涉及該過程開啟前的組織和規劃。在人類歷史早期，這兩個步驟是不分的，勞動必然是生產，生產也必然要勞動。然而，在人類歷史的多數時期，勞動力與生產資料分離；由於生產資料被壟斷，壟斷者得以免除勞動，由勞動者負責。這時，生產分為「間接的」與「直接的」：間接生產旨在使生產資料與勞動力結合，組織勞動過程，結合者或組織者未必要親自勞動；實際開啟勞動過程的是勞動者，他們才進行直接生產。在這個意義上，直接生產者是勞動者，免除勞動者只是間接生產者，「勞動」和「生產」分家。

對於維持生存的必要勞動，這些無償勞動也可稱作**剩餘勞動**。視時代而定，剩餘勞動的結果可以是產品，也可以是使商品藉以交換的價值。

由此出發，馬克思試圖區分社會類型並解釋歷史過程的變與常。直接生產者（或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分離程度，在本質上規定了一個社會的形式。

凡是社會上一部份人享有生產資料壟斷權的地方，勞動者，無論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須在維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以外，追加超額的勞動時間來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生產生活資料，不論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貴族，伊特魯里亞的神權政治首領，羅馬的市民，諾曼的男爵，美國的奴隸主，瓦拉幾亞的領主，現代的地主，還是資本家 (Marx 2003b: 272)。

不論生產的社會的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要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離的情況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產因素。凡要進行生產，它們就必須結合起來。實行這種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會結構區分為各個不同的經濟時期 (Marx 2003c: 44)。

使各種經濟的社會型態例如奴隸社會和僱用勞動的社會區別開來的，只是從直接生產者身上，勞動者身上，榨取這種剩餘勞動的形式 (Marx 2003b: 251)。

「壟斷／分離」而後「結合」，結合後則必然有「剩餘勞動」的榨取，也就是「剝削」。這幾個步驟大致表現在上面三個段落。

生產資料「壟斷／分離」的不同形式就是生產關係，我們聚焦在兩種類型：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歷史唯物論的「生產關係」(relations of production) 指的是勞動力和生產資料——按照外延定義（見下文），它們包括了「生產力」的所有項目——在社會行動者之間的分配。由於行動者也是勞動力的承載者，為了方便敘述，下文只聚焦在「生產資料的分配」，暫時擱置「勞動力的分配」<sup>23</sup>。生

---

<sup>23</sup> 要全面討論勞動力的分配必須涉及勞動者無法佔有勞動力、勞動力歸他人所有的情況。這裡



產資料的分配有「全有」、「多一少」和「有一無」三種類型。

「全有」指的是在生產資料（生產工具和原料）方面，社會全體行動者具有大致完整的項目和再生產的足夠份額，每個成員能直接生產，進行一段時間的勞動。這種生產關係屬於人類歷史早期，人類個體需要透過相對穩定的整體（即共同體，如家庭、部落或公社）中介彼此。這種生產關係有時被稱作「原始共產主義」，全體行動者對生產資料的佔有是基於「自然所有權」。<sup>24</sup> 當然我們也可以說這個時期的整體壟斷了生產資料，而所有個體都與生產資料分離，這裡的「壟斷／分離」與以下兩種狀況不同。

「多一少」和「有一無」雖然不同，但兩者的關係比「全有」的情況親近。「多一少」指的是社會的部分行動者佔有生產資料的局部項目而另一部分行動者佔有另外一些項目；或者，部分行動者佔有大量的所有生產資料項目，另一部分行動者雖然也佔有所有項目，卻是少量的，甚至無法據此穩定生產和生存。「有一無」指的則是部分行動者完全不佔有生產資料的任何項目，而另一部分行動者完全佔有所有生產資料項目。

---

的佔有當然有程度之別：一時或永久、間接或直接。只要必須進行無償的剩餘勞動，嚴格說來，勞動力承載者就無法完全佔有自己的勞動力，因為在勞動過程中，一部分的時間和勞動成果必須貢獻給其他人，後者間接地（好比壟斷土地使勞動者必須付出剩餘勞動，這是封建主義的情況）或一時地（好比購買勞動者一段時間的勞動力，這是資本主義的情況）佔有他人勞動力。然而，它們不同於勞動力直接且永久地被他人佔有的情況，即成為「奴隸」。奴隸雖然有自己的勞動力，但他們作為生產資料附屬於「主人」，形同物質生產力，如農具或機械。本章不討論奴隸制，只在其他章節涉及種植園經濟或再版農奴制時稍微提及，儘管這些案例並非典型奴隸制。

<sup>24</sup> 在這種生產關係下，「個人把勞動的客觀條件簡單地看作是自己的東西，看作是使自己的主體性得到自我實現的無機自然。勞動的主要客觀條件本身並不是勞動的產物，而是已經存在的自然，……擁有土地財產……這就和他的皮膚或他的感官一樣，是他活動的前提。」人類個體這時幾乎與其所處的整體融合為一，這個整體甚至包括周圍環境。畢竟「孤立的個人是完全不可能有土地財產的，就像他不可能會說話一樣，……把土地當作財產……總是要以處在或多或少自然形成的或歷史地發展了的形式中的部落或公社占領土地（和平地或暴力地）為中介。」(Marx 1995a: 477) 這裡不討論「亞細亞」(ibid.: 471, 466-7)、「古典古代」(ibid.: 470, 472) 和「日耳曼」(ibid.: 475-6) 等共同體的次類型。無論如何，個體勞動是以共同體或公社的存在為前提的。隨著土地開墾、擴張和隨之而來的奴隸俘虜和統治階級的出現，個體將視勞動條件及其所有權為個人勞動成果。一旦個體和公社成員身分脫離，一方面其他個體就可能喪失自己的財產，另一方面公社也可能瓦解。「所有這些共同體的目的就是把形成共同體的個人作為所有者加以保存，即再生產出來，……這種客觀存在方式既形成公社成員之間的關係，同時又因而形成公社本身。但是，這種再生產必然既是舊形式的重新生產，同時又是舊形式的破壞。」(ibid.: 486)

不管「多一少」還是「有一無」，「直接生產者」（即實際發揮勞動力的勞動力承載者）和「間接生產者」（即壟斷生產資料的行動者，由於不勞動，只負責組織勞動過程、安排勞動力與生產資料的結合，因此其生產是「間接的」）雙方都無法在第一時間生產和生存，因為不經過結合，勞動過程就無法開啟。此外，生產資料的壟斷者還會試圖代表「全有」意義上的社會整體，儘管相關的共同體此時已經瓦解。正是這一點使這兩種型態與「全有」區分開來，我們根據「壟斷／分離」的**程度**進一步區分它們。

一旦結合發生，勞動過程開啟，直接生產者就要為生產資料壟斷者貢獻滿足自身生活之外的勞動時間。作為一種社會關係，生產關係為（未）分配到生產資料的行動者留下了有待填補或佔據的空位，只要身處其中，他們的理性、利益和隨之而來的實踐動機就會受到影響；其中一方能夠剝削另一方，並且設想如何更有效地剝削；另一方則不得不提供剩餘勞動，不管他們是否意識到，或者在意識到之後是否及如何反抗。依照該空位區分的行動者或人類個體獲得了「階級」的屬性，由於出自同一個「壟斷／分離」格局，階級之間是相互依賴和定義的，不可能有此無彼。

這時，雖然勞動過程已經展開，人類為生存而（再）生產的事實再次確立，但在人類整體中已經有部分行動者不用勞動。勞動原本是人類的普世任務，現在轉由特定階級承擔，進入特定生產關係的人類分裂為不同階級，儘管各個階級的成員終究還是人類。前面提到的「全有」格局，即立基在自然所有權的原始共產主義，並未使人類分裂為階級，我們可以把它——生產和勞動還沒有分為「間接生產」和「直接生產」（勞動）——視為階級在人類歷史上出現的前夜。

以下先討論「有一無」和「多一少」兩種型態，也就是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再來看看生產力的定義，然後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互動下的階級鬥爭。

#### 一、生產關係：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

「有一無」的情況就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此，勞動者與生產資料完全分離，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之外一無所有，既沒有生產工具也沒有原料（「無」），即無產階級。雖然他們不再被束縛於土地，因此是自由的（勞動力並未分配給土地

壟斷者)，這樣的自由卻是出賣勞動力的自由；與他們對立的另一群行動者則完全壟斷生產資料（「有」），即資本家或資產階級。

當他們的勞動力作為商品賣出，供購買者（資本家）使用，也就與生產資料結合了。開始勞動之後，他們不得不為勞動力的購買者無償勞動，而**勞動者生產的價值將大於他們生產自身勞動力的價值**。資本家只付出購買勞動力的價值，即工資（以貨幣為形式），而不是使用勞動力之後勞動者生產的所有價值，其中的**差額就是剩餘勞動**；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剩餘勞動又表現為剩餘價值**。這部分涉及了與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對應的獨特交換關係，下文將提到。

由於勞動者生產的所有價值只是勞動力購買者個人「使用」勞動力這種商品的成果，故全歸資本家所有，剩餘勞動／價值就在這個過程中一併移轉給後者，該過程就是剝削。資本主義的剝削方式或形式不外乎購買和使用勞動力商品，不需要喊打喊殺或曉以傳統習俗的大義。

值得注意的是，只要勞動者沒有「勞動力」（商品）的概念，僅有「勞動」（行動）的概念，就很容易認為資本家購買的是勞動成果，即勞動生產的所有價值，而非生產勞動力商品的價值。如此一來，剝削將很難被察覺到，這又是因為客觀上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與某種獨特的交換關係結合起來。同樣的，只要研究者沒有區分「勞動力」和「勞動」，剩餘價值和剝削也很難被認識。

**「多一少」的情況則是封建主義生產關係**。在這種生產關係中，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分離並不完全；或者說，沒有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徹底。我們可以從兩種情況來描述這種生產關係：第一，間接生產者對生產資料的壟斷並不及於所有生產資料，勞動者可能沒有原料（土地），但卻有生產工具，因此必須為了土地而臣服於壟斷者，即地主；第二，勞動者具有所有生產工具和原料，卻因為土地規模過小或持續戰亂，無法穩定再生產，最終仍要臣服於土地壟斷者。在這些情況下，勞動者不用出賣勞動力、不具有出賣勞動力的「自由」，卻束縛於土地上，人身（勞動力的承載器）「不自由」。

為了完全生產或穩定生產（再生產），勞動者同樣必須為生產資料壟斷者無償勞動，付出剩餘勞動。不過，**他們並沒有「出賣」勞動力，剩餘勞動不表現為剩餘價值，而多半是地租（或稅收，這與「生產方式」的差別有關，見下文），形式包括勞役、實物和貨幣**。剝削的事實沒有那麼難察覺，因為他們顯然必須直接為地主耕作（勞役）或從耕作成果撥一部份繳予地主（實物與貨幣）。封建主

義的剝削方式建立在習慣或強制，而這也對應了獨特的交換關係。

## 二、生產力：使用與發展

既然在不同生產關係中都必須勞動，這個普世原則就有一些共通元素，也就是「生產力」。生產力的**外延定義**是指原料、生產工具和勞動力，前兩者合稱生產資料或物質生產力，前述生產關係所分配的生產資料都是生產力。在與生產相關（有助或有礙於生產）的意義上，原料肥沃度，生產工具效能與耗損率，勞動者的體力、知識、技巧和勞動過程的組織等都算是生產力。

所謂的生產，就是這些生產力的使用 and 發揮，而它們的使用 and 發揮總是發生在社會關係中。當生產資料處於特定分配狀態，因而與直接生產者分離、被間接生產者壟斷，作為一種力量的生產力就尚未發揮出來，只是「潛在」的生產力。當生產資料與直接生產者結合、勞動過程開啟，生產力才能發揮和使用。生產力的**內涵定義**就是發揮和使用之後，單位時間內勞動成果的品質與數量，這個意義上的生產力規定了人類有多少生存和（再）生產之外的自主行動時間。

把生產力的外延和內涵定義整合起來，就必須考量一組區分：生產力的「限度」與「程度」。任何生產力（外延定義）都有其本質，即生產力（內涵定義）發揮出來之後所能達到的最強或最大限度；在實際發揮出來的過程中，生產力可能只在該限度中達到某個程度。因此，當我們說生產力「提高」時，往往有兩種意義：第一，充分發揮，也就是最強或最大程度地「使用」既有生產力；第二，擴張或拔升既有生產力可以發揮的最強或最大限度，也就是「發展」它。

歷史唯物論有一個基本主張：**綜觀歷史，生產力（包括以上兩種意義）有提高的傾向，而人類有提高生產力的理性或動機**。在客觀上，提高生產力有助於人類縮短生產時間，獲得生存和（再）生產之後更多的自主行動；在主觀上，人類能夠感受提高生產力的好處，實際進行或至少避免生產力降低。必須注意：所謂的「傾向」和「理性」都不必然發生，它們會因為阻礙而受挫。事實上，生產關係就可能是明顯的阻礙。不過，既然生產力有提高的傾向，而人類又有提高生產力的理性，那麼不管處在什麼類型的生產關係，只要有機會，生產力都多多少少會提高，被充分使用或進一步發展。

這邊存在一個經典問題：既然生產力的發揮不可能不發生在社會關係，進而  
是生產關係中，而生產力的發揮又是人類生存的普世任務，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何  
者更具推動或推動歷史之決定性？能否找到一個「主要動因」(prime mover)  
(Hilton and Hill 1953: 340)？如果確認了主要動因，那次要動因與它的關係是什  
麼？

嚴格來說，幾乎沒有一位馬克思主義者會有意偏廢其中一者。問題始終在於  
如何構思和陳述兩者關係<sup>25</sup>，而這有時與作者的出發點和討論主題有關，好比  
Laibman (2007) 從相當宏觀的演化角度論證生產力的決定性，Harman (2004) 在  
討論資本主義起源問題時，強調不可忽略生產力在封建主義時代的成長，以及對  
生產關係造成的影響；但仔細看來，他們都不否認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作用。  
Brenner (1985, 2007) 認為，封建主義時代的生產力確有成長，作用卻遠不到使  
生產關係轉型的程度；Wickham (2008) 同意封建主義生產力的成長，但不認為  
會與生產關係發生衝突，甚至還能很好地適應它。Hindess and Hirst (1975) 儘管  
表示生產關係是最首要的，卻承認勞動過程中技術的必要性，這些都是歷史唯物  
論的有機組成元素。

### 三、階級鬥爭：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互動

原始共產主義作為一種生產關係，意味著即使沒有階級區分，人類也必然在  
一定的社會關係中生產。一旦導致階級出現的生產關係確立，雖然行動者仍屬人  
類，但生產關係空出的階級位置卻可能與行動者的人類理性衝突。當然，生產力  
還是可能提高，而行動者的動機將受到階級理性影響。

舉例來說，被剝削者不得不付出剩餘勞動時，為了保有更多的勞動成果或減  
少（剩餘）勞動時間，可能會設法「發展」生產力；至於剝削者「發展」生產力  
的原因，也可能是為了更有效率地獲取剩餘勞動。嚴格說來，這時的剝削者和被  
剝削者雖然都獲得更多自主時間，卻違反了「人類為生存而生產的首要前提」，  
因為一方不再勞動，另一方卻要為不勞者而不是直接生產、求取生存的自身而勞

---

<sup>25</sup> 一個比較謹慎的方式仍然是根據不同抽象層次及其互動和社會結構發展的不同時期來擺放這  
兩個範疇。1980 年代開始，受到 G. A. Cohen (2000 [1978]) 以分析哲學的方式回歸馬克思文本探  
討這些問題的影響，出現一批學者重新討論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不妨參考他們的整理與  
反思 (Rigby 1998, Shaw 1978)。

動。無論如何，生產關係這時還有助於生產力的提高，剝削雖然存在，但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雙方都能滿足生存所需，階級鬥爭——**強化或反抗剝削、對剩餘勞動的爭搶或保有**——不至於太劇烈。

反過來說，既然受到階級理性影響，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也可能不「發展」生產力，只充分「使用」既有生產力。為了保有自己的勞動成果或減少（剩餘）勞動時間，被剝削者寧可花費更多時間反抗剝削者，甚至以中斷勞動過程威脅剝削者。剝削者當然也會以各種手段加重剝削，如延長被剝削者的勞動時間、降低工資或提高地租等。在這些情況下，生產關係已經明顯不利於生產力的提高，甚至無助於生產力的發展，階級雙方都在損耗既有生產力。由於長遠來看，生產力終究有提高的傾向，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矛盾將加劇，階級鬥爭也會更激烈。

各種生產關係在歷史上剛出現時，往往能提高生產力，或至少讓生產力提高的程度較前一生產關係多。不僅如此，生產關係還能維持一段時間；沒有一個生產關係是「稍縱即逝」的，否則我們就不可能身處其中，掌握有關生產關係的各種概念。然而，只要生產力或快或慢地提高，剝削行為長期下來又侵害這些生產力，既有生產關係就不可能一直存在下去，深受其害的被剝削者必將起身反抗剝削者，危及生產關係的再生產。無論如何，生產關係在維持一段時間後，將很難像剛出現時一樣順暢地促進生產力。

在激烈的階級鬥爭之後出現的新生產關係，若能維持一段時間，那勢必在一開始時（相對於前一生產關係）能提高更多的生產力。因此，歸根到底，生產關係的轉型與持存以能否提高生產力為指標。然而，轉型的落實和既有生產關係的再生產，不可能純粹依靠階級空位所構成的「關係」和生產力的「力量」等抽象存在，還必須涉及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具體行動，也就是發生在生產關係中的階級鬥爭及其結果；在這個過程中，**人類理性**將持續和**階級理性**衝突或重合，不同階級的理性也會彼此衝突或重合，影響鬥爭過程和結果。對行動者來說，他們不會知道鬥爭的結果，但當結果確立時，往往更能提高生產力。

這裡牽涉另一問題：如果生產關係中的行動者根據階級理性行動（有時甚至會以階級成員的個體利益為優先考量，犧牲階級利益），如何斷定即將到來的生產關係可以確保生產力的提高？生產力難道不會倒退嗎？如果這是可能的，如何證明生產力的「發展」，即歷史唯物論的根本命題：生產力有提高的傾向，而人類有提高生產力的理性？就算生產力在新的生產關係中確實提高了，也只是偶然

的，因為鬥爭雙方並非從人類理性出發，生產力的提高不過是階級鬥爭的意外結果。

除了這個歷史的必然性／偶然性問題<sup>26</sup>，對（新）生產關係與生產力因果關係的說明也是問題。當我們說特定生產關係的出現與持存是「因為」它能使生產力提高，亦即具有提高生產力的「功能」時，真的提供了合理的解釋嗎？這難道不是「倒果為因」的功能論主張嗎？第七章會透過 G. A. Cohen 的著作討論這個主題。以上問題尚不包括生產關係和生產力在定義上的考察；對此，已經有許多馬克思主義（研究）者討論，分析馬克思主義者（Analytical Marxism）<sup>27</sup> 頗有貢獻，本文將略為提及 Jon Elster 與 Cohen 的對話。

## 第二節 交換關係

歷史唯物論並沒有直接討論交換關係，為了本文的發展，這邊提出一點我自己的看法。它沒有生產關係首要，卻如影隨形地跟著生產關係。交換關係可以分別從「內在」和「外在」於生產關係兩個面向上來談。

為了勞動，直接生產者必須與生產資料結合。間接生產者或生產資料壟斷者不可能把生產資料讓渡或贈與直接生產者，他們只能透過交換關係開啟勞動：相應於直接生產者事先給出勞動力（資本主義），或者事後給出勞動力發揮之成果（封建主義），間接生產者必須給出生產勞動力的對應物，即工資（資本主義），或者使直接生產者保留部分勞動成果（封建主義）。待勞動過程展開，直接生產者就必須付出剩餘勞動。

---

<sup>26</sup> 「必然性」與「偶然性」的對立之所以成為問題，是因為我們可以把歷史唯物論視為一種方向性理論，一種解釋社會發展方向的理論，也可以把歷史唯物論限定為「轉型理論」，即解釋社會結構改變的理論（見第一章第四節）。階級鬥爭的結果可以改變也可以維持既有生產關係，階級鬥爭被設定為社會結構轉型與否的「機制」。就此而言，最終影響生產力的生產關係似乎是偶然出現的。如果是這樣，這個機制如何和生產力的進步整合起來、轉型理論如何和方向性理論配合就是一個重要問題，第七章會試著回答，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考量複數本體論的重要。

<sup>27</sup> 分析馬克思主義者用分析哲學的方法與術語，包括概念分析、形式邏輯、數學、計量經濟和統計工具，處理馬克思作品中帶有實證及規範意涵的主題，嚴謹地重述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傳統的中心思想 (Parijs 2015)。Cohen、Brenner、Philippe Van Parijs、Jon Elster 和 John Roemer 都曾是倡議此一途徑的「九月小組」(September Group, Cohen 和 Elster 召集的兩年一次研討會) 成員，其他介紹可見 Wright (1995)。

這個一來一往的交換關係「內在」於生產關係，能開啟勞動過程、使「分離／壟斷」重歸「結合」，而一旦結合就必須持續地再次結合，生產關係才能再生產，所以交換關係也具有使生產關係再生產的功能。此外，特定生產關係大致上對應了特定交換關係，例如生產資料在資本主義下的分配（前述「有一無」的情況）對應了普遍的商品交換或市場經濟，在封建主義下的分配則對應了政治保護關係（見下文）。無論何種生產關係，只要生產資料的分配有「分離／壟斷」，就需要交換關係。

從「外在」方面來看，交換關係又超過了生產關係而與之不同，這可以從兩點來談。第一，為了生存，行動者需要不同的使用價值或產品，由於自己無法生產全部項目，因此要透過交換的方式取得，這些產品可能出自不同類型的生產關係。第二，行動者的生產往往侷限在少數使用價值上，因此透過交換，他們必須進行分工。當然，在人類歷史早期，分工還很低落，交換不發達，人類必須生產許多生活所需；雖然如此，人類很早就從事交換，即便在中世紀歐洲，也不存在完全的「自然（或封閉）經濟」（Bloch 1962: 66-7）。

交換關係的形塑來自「不同使用價值（在人類個體或群體之間）的分配」，正因為不同人類個體或群體有不同的需求、生產不同的使用價值，交換才有發生的必要，不管內在還是外在於生產關係。交換行為本身是一來一往的，因此多少是平等的；即便客觀上不平等，主觀上交換雙方至少要有一方認為平等。如果仍然認為不平等，必然有其他因素導致他們接受不平等交換。交換的發生或完成不可能建立在雙方都認為不平等的基礎上，即使可能也不長久。這裡的預設是：若交換出於不平等的強制關係，人類個體或階級不可能不反抗，故單方面認為「強制能夠令交換發生」是不對的。這個預設有助於稍後對封建主義交換關係的分析。

### 一、資本主義交換關係

資本主義的交換關係是以交換雙方之外的「第三方」——物化了的抽象人類勞動，即金錢——為媒介的。表現交換關係的主要制度就是市場，交換的具體事物則是商品，勞動力是各種商品之一；至於金錢本身，本質上和歷史上都曾是商品。交換的行動者是買賣雙方，而交換的原則是平等的，亦即等價交換。抽象人類勞動和金錢不會憑空冒出，而是人類長期交換勞動產品所導致的。



市場讓勞動者作為賣家出售勞動力這個獨特商品，也讓資本家購買它、使用它，進而佔有使用它之後的所有成果。這邊我們要區分一組概念：**剝削方式**和**剝削條件**。資本主義的「剝削方式」是購買和使用勞動力，即雇用，這發生在交換關係中。資本家不能強制無產者拿出剩餘勞動，而是要根據私有財產的性質，佔有購買和使用勞動力之後所產生的剩餘——這些剩餘「歸資本家所有」。資本主義的「剝削條件」則是生產關係：生產資料與直接生產者的「分離」或生產資料被完全「壟斷」的狀況。生產關係與交換關係必須共存，因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是生產資料被壟斷或與直接生產者分離的空洞格局，本身無所謂「結合」；同樣的，若沒有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存在，即一批除了自身勞動力之外一無所有的行動者，以及等待勞動力以便與手邊生產資料結合的行動者，資本主義交換關係就很難存在，因為行動者沒有交換的動機。**資本主義的「剝削條件」讓「剝削方式」成為可能，更讓生產持續。**

當剩餘價值產出並轉移至資本家，後者必須出售商品，交換關係這時不再是為了結合生產資料與勞動者而「內在」於生產關係，而是「外在」於生產關係，有著實現剩餘價值、滿足不同使用價值之結合的使命。一旦剩餘價值實現，資本家獲得相應數量的金錢，便能用其中一部分擴大再生產，繼續購買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結合它們並剝削剩餘價值，進而提高（充分使用與發展）生產力，最終使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再生產。

**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形成「主客觀合一的經濟結構」**：「結構」是兩種以上社會關係的相互預設和鑲嵌，不易更動，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構成了這樣的結構：資本家的剝削方式（透過交換關係購買和使用勞動力）有助於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再生產，勞動者在其中產生的價值又流向交換關係，持續增殖；整個過程不需要非經濟力量（如統治關係）來完成，儘管並不排斥，所以是一個「經濟」結構。**主觀上**，為了賺取超額利潤或至少存活下來，眾多資本必須競相發展生產力；**客觀上**，資本主義整體的生產力也會發展，接著再度促使個別資本家跟進，形成一個主客觀合一的循環。

## 二、封建主義交換關係

沒有「第三方」保證的交換關係同樣存在，只不過建立在交換雙方的私人同意。封建主義交換關係就是「雙方同意」的總集，這裡的「雙方」從農民與地主

一直延伸到地主（領主）與君王，這樣的序列非常多。我們說過，封建主義生產關係並不是直接生產者徹底喪失或間接生產者徹底壟斷生產資料的狀態。為了更完整地結合直接生產者與生產資料，使勞動得以持續、生產穩定再生產，封建主義交換關係有必要存在。

有論者可能會說，跟資本主義比起來，直接生產者不算一無所有，因此地主要榨取他們的剩餘勞動，無法、也無須像資本主義那樣動用市場力量購買而後使用（雙向的、多少是平等的），而是必須透過「強制」（單向的、不平等的）的方式。我不同意這種說法。

在封建主義生產關係中，領主和君王需要勞動者在土地上耕作的程度，並不亞於資本家需要勞動者在工廠內勞動的程度。如果資本家提供工資給勞動者，換取他們在一定時間內供資本家使用的勞動力，那麼地主也提供了各種保護，讓勞動者向他們繳納地租（或稅收）。就算地主不依靠市場而是訴諸習慣或各種非經濟因素來收租（或收稅），也不代表農民是完全被迫的。事實上，在中世紀晚期西歐，許多面對戰亂的農民即便有土地，也自願以此換取地主或領主的庇護，以求穩定再生產。<sup>28</sup> 承認地主提供保護，並沒有否定保護本身僅有表面性甚或欺騙性；這樣才能解釋何以封建主義的剝削明明比資本主義赤裸、激起大量反抗，生產關係卻歷經了數個世紀之久。

正是這種「剩餘勞動—保護」的雙方交換，而非立基在抽象人類勞動這個第三方的普世交換，使封建主義生產關係持續。有生產資料的壟斷，就有生產資料與直接生產者的結合，不管壟斷的程度如何，都會有大致上相應的結合方式，可是封建主義的生產關係與交換關係仍然和資本主義的不同。

**封建主義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形成「主觀的準經濟結構」。**封建主義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之所以只是「準經濟結構」，是因為兩者並沒有到相互預設和鑲嵌的程度，交換關係深受統治關係影響，與之形成政治結構（見下文），本身無法像資本主義一樣，獨自或直接「內在」或「外在」於封建主義生產關係，必須始終以統治關係為中介。在這種情況下，地主把剩餘勞動或產品投入在軍事技術的開發與相關設備的購置，與其他階級成員競爭，設法把更多土地與農民納入個人保護。**主觀上**，從個別地主的階級理性來說，這些開發與購置有助於佔有更

---

<sup>28</sup> 此外，獨立農民的力量是很弱的，見 Bloch (1962: 245-7)。

多土地與農民，更有效率地獲取更多剩餘勞動或產品、充分地使用生產力。客觀上，從發展生產力和社會剩餘的長期增長來看，這麼做是有害的，因為一方面剩餘勞動或產品都被戰爭給「打掉」了，另一方面明顯的剝削形式和任意追加的租稅也容易引起反抗，最終將有礙生產關係的再生產。

可是，這並不妨礙封建主義的「剝削條件」仍是「經濟的」：剝削仍然依靠生產關係，沒有這個關係，就無所謂交換，勞動過程也不會開啟；就算交換關係浸透著政治，生產關係本身——生產資料「壟斷／分離」的格局——也始終是經濟的，必然持續發揮作用。如果因為生產資料部分項目在很大程度上被壟斷，剝削方式要訴諸「外於經濟的強制」<sup>29</sup>，所以判定封建主義生產關係是政治的，那麼在同樣意義上，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不也是政治的嗎？不要忘了，原始資本積累的殘暴如何造就了《資本論》的分析對象。<sup>30</sup> 無論如何，就算封建主義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並不構成資本主義意義的「經濟結構」，生產關係的本質仍然是「經濟的」；由於有統治關係的中介，也不能說完全與交換關係無關，所以只和它構成「準經濟結構」。

---

<sup>29</sup> 本文把「超經濟的經濟」都改譯為「外於經濟的強制」，見馬克思 (Marx 2003a: 893)：「在直接勞動者仍然是他自己生活資料生產上必要的生產資料和勞動條件的『所有者』的一切形式內，財產關係必然同時表現為直接的統治和從屬的關係，因而直接生產者是作為不自由的人出現的；這種不自由，可以從實行徭役勞動的農奴制減輕到單純的代役租。在這裡，按照假定，直接生產者還佔有自己的生產資料，即他實現自己的勞動和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所必需的物質的勞動條件；他獨立地經營他的農業和與農業結合在一起的農村家庭工業。這種獨立性，不會因為這些小農（例如在印度）組成一種或多或少帶有自發性質的生產公社而消失，因為這裡所說的獨立性，只是對名義上的地主而言的。在這些條件下，要能夠為名義上的地主從小農身上榨取剩餘勞動，就只有通過**超經濟的強制**，而不管這種強制是採取什麼形式。」（粗體字為筆者所加）。

<sup>30</sup> 本文特別提到「剝削方式」(modes of exploitation，這是政治馬克思主義者 Benno Teschke 和 Hans Lacher 等人的用法)，是為了呼應 Jairus Banaji (2010: 41) 說的：「生產關係不能簡單地化約為剝削形式 (forms of production)，這既是因為生產方式 (mode of production) 包含了那些比在直接生產過程中更廣泛的關係，也是因為勞動的部署、勞動過程的組織與控制以複雜的方式和歷史的生產關係『相關聯』。」他反對 Dobb 僅從農奴制 (serfdom) 或「剩餘勞動的強制榨取」等簡單範疇 (simple categories) 來談資本主義在英國的出現 (ibid.: 52-3)。根據前文定義，如果把生產關係 (剝削條件) 等同於剝削形式，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固然還是「經濟的」(透過市場交換並使用商品的剝削形式仍然是一種經濟行為)，封建主義生產關係卻完全成了「政治的」(透過強制和習慣而來的剝削形式是「外在於經濟的」行為)；這樣一來，建築隱喻就只限於資本主義而無普世性了。雖然如此，由於相當重視商人資本對資本主義出現之影響，Banaji 有把生產關係的概念過度擴充之嫌，反而混淆了生產關係和生產方式，我在下文會加以區分。

從馬克思有關建築隱喻的兩個段落已經看到，**交換關係是缺席的**。不過眾所皆知，馬克思的《資本論》花了許多篇幅討論交換關係在資本主義中的邏輯，第一卷就是由此出發的。<sup>31</sup> 為什麼馬克思重視的交換關係不見於建築隱喻？還是說交換關係能夠歸類至「基礎」或「上層建築」其中之一，或者被視為它們之間的「閣樓」或「夾層」？

交換關係在歷史唯物論的缺席帶來許多困擾。部分馬克思主義者 (Teschke 2003: 165-7, Teschke 2005: 3-26, Wood 2002: 61-4) 將資產階級革命和資本主義起源等問題的討論限於生產關係（和生產力）和統治關係，甚至是剝削方式，這是非常不夠的。由於不承認資產階級能夠透過商品交換滲透封建主義生產關係，他們便認為，資產階級這時的剝削方式與地主階級無異，資產階級革命也就消失了。

此外，1950 年代開始的「過渡論戰」(Transition Debate)——我把這場論戰視為「資本主義起源」爭議的第一波——也顯示，視生產關係中的階級鬥爭為封建主義轉型動力的途徑，一直無法與視商品交換為舊秩序「溶解劑」(solvent) (Dobb 1963: 77) 的途徑整合。在 1946 年出版的《資本主義發展研究》(*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中，Maurice Dobb 反對當時風行的「皮林命題」(Pirenne Thesis) (Pellicani 1994: 24)——11 世紀後歐洲由於商品貿易復甦、城市與市場的發展，封建經濟開始衰退，資本主義於是興起——並認為，封建經濟的衰退應從歐洲內部的階級矛盾來看：在這個生產體系中，統治階級不得不設法提高收入，直接生產者壓力增加，持續反抗，最終導致體系崩解，擁有土地的小農因貧富差距拉大而產生資本主義 (Dobb 1963: 42)。Paul Sweezy (1978: 42) 則重拾皮林命題駁斥 Dobb，表示外部原因才是封建主義轉型動力：「長途貿易是創造性力量，在為了使用而生產的舊封建體系中，產生為了交換而生產的體系」。由於兩人都承認 14 到 16 世紀是一個過渡時期，問題是如何思考其社會性質，故這場辯論稱作「過渡論戰」。<sup>32</sup>

---

<sup>31</sup> 不要忘了馬克思開宗明義表示，他要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Marx 2003b: 8 粗體為筆者所加)。如果我們同意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是歷史唯物論在更為具體的層次上的組成部分（儘管兩者有著不同的關懷），就應該把交換關係在建築隱喻中的缺席給問題化。

<sup>32</sup> 這場辯論刊於美國期刊《科學與社會》(*Science and Society*)，隨後由 Rodney Hilton (1976) 集結成冊，參與者還有 Eric Hobsbawm、Christopher Hill、Georges Lefebvre 和 John Merrington 等

從另一個角度看，商品交換的前提以交換關係為基礎的分工。受 Immanuel Wallerstein (1974, 1980) 的影響，從（國際）分工進行分析的理論家們從 1970 年代以降展開了大量研究，能夠「溶解」封建主義的交換關係被延伸至國際、甚至是洲際範圍，資本主義起源不再是歐洲或英國的內生現象，而是全球貿易作用的結果，「世界體系分析」途徑至今已然成為一個學派。不過，與之對立並繼續從階級鬥爭探討封建主義轉型動力的「政治馬克思主義」亦不惶多讓。

雖然批評 Dobb (Brenner 1978)，但和他一樣，Brenner 認為封建經濟的衰退來自歐洲（特別是農村）內在的「社會財產關係」(social property relation) 和階級行動者的「再生產規則」(rule of reproduction)，生產方式轉變的動力來自階級鬥爭。他批評兩種資本主義起源說：G. A. Cohen (1986) 的生產力提升論和 Wallerstein 的貿易促進論。Brenner 認為，Wallerstein 把奠基在國際分工上的商品貿易視為歷史動力，是馬克思主義版本的「斯密主義」(Smithian)，這麼做等於把人類理性直接當成資本主義出現的動力，忽略了特定社會關係的（用本文的話說）階級理性；憑藉貿易的獲利需求，新的生產關係並不會出現，我們要問的始終是它出現的機制。

雖然 Wallerstein 並未直接回應 Brenner<sup>33</sup>，但分工和貿易提供的宏觀視野已經使許多學者不滿 Brenner 和 Dobb 過度聚焦在農村和英國的作法，批評他們的歐洲中心論偏見（最猛烈的批評可見 Blaut 1993, 1994）。我們可以把「Brenner 論戰」(Brenner Debate) 算做資本主義起源爭議的第二波<sup>34</sup>，而眾所皆知，上述

---

政治及經濟史家。

<sup>33</sup> 或許覺得沒必要再多說什麼，Wallerstein (1992) 在十多年後的著名文章〈西方、資本主義與現代世界體系〉(The West, Capitalism, and the Modern World-System) 中才大致表達了對 Brenner 和其他類似論者的意見。事實上，早在《現代世界體系》(The Modern World System) 第一卷，Wallerstein (1974: 127) 就藉由評價 Laclau 對 Frank 的看法說過：「定義一個體系之『生產關係』的，是整個體系的『生產關係』，這時〔16 世紀〕的體系是歐洲世界經濟。自由勞動誠然是資本主義的根本特色，但並非所有生產組織的自由勞動都是如此。」(粗體為筆者所加) Laclau (1971: 24-5, 33) 認為，資本主義是一種「生產方式」，不是 Frank 的「為市場而生產」，生產方式最重要的問題是生產工具的占有與否。對此，Wallerstein 說：「就馬克思論證的字面意思來看，Laclau 是對的，但就馬克思文字的精神來說，則否。」這裡的意思應該很明顯：我們必須掌握「總體」的特質，而非侷限於個別環節，哪怕在它們之中有一個是最具決定性的。這種觀點與 Banaji 從「運動規律」來看生產方式非常類似。

<sup>34</sup> 這兩波論戰可參考 Žmolek (2013) 的簡要整理。「Brenner 論戰」來自 Brenner 對「新人口論」代表 M. M. Postan 和 L. R. Ladurie 從人口結構與循環解釋西歐封建主義轉型的批評 (Aston, Aston

兩個學派的分歧已經不只是理論上的，更是政治上的。<sup>35</sup>

### 第三節 統治關係與革命

生產關係中的剝削者在獲得（並實現）剩餘勞動成果之後，一般來說會把它們分成兩個部分使用：第一，滿足生存所需；第二，投入生產關係的再生產。第二個部分又可分成兩個部分：第一，用來或多或少、視時機而定地提高生產力，藉此維持既有生產關係；第二，投入統治，從生產關係外部穩固生產關係。**統治又有兩做法：由另一群行動者執行，或者由剝削者自己執行。**我們先討論第一種情況，即資本主義的統治關係。

#### 一、資本主義統治關係

獲得剝削者轉交剩餘的行動者，將成為**表面上的**統治者，透過政治、法律和意識形態使既有生產關係再生產，這就產生了統治（與被統治）關係：權力（包括暴力）在社會行動者之間的分配。這些統治者之所以是「表面上」的，是因為他們並未直接涉足生產，他們享有的剩餘勞動成果只是「第二手」的，來自於剝削者。因此，**實質上的**統治者仍是直接涉足生產——間接生產而不勞動——的剝削者；就剝削者透過統治者（和統治關係）來穩定生產關係而言，剝削者——資產階級——就是統治階級。換句話說，在各種權力中，物質權力是最根本的。

然而，基於三個原因，統治關係相對獨立於生產關係、在生產關係外部。首先，統治本身並非事事皆與生產有關，統治關係仍有自主性，不只是生產關係的附屬。其次，生產關係的再生產不只依靠統治，還可（暫時）依靠生產力提高，統治關係並不獨佔生產關係再生產的方式。第三，在生產資料「壟斷／分離」的情況下，只要憑藉交換關係就可以實現「結合」，無須直接依賴統治關係，所以

---

and Philpin 1987)。

<sup>35</sup> 這裡再次碰到歷史唯物論的「臨界性」：處於科學和政治之間。不管是依賴理論、不平等交換還是世界體系分析，都為冷戰時期第三世界主義或不結盟運動提供了理論基礎。從商品交換關係帶出的國際剝削關係有一個大致的政治結論：要取消中心國家（如歐洲和北美強權）對邊陲地區（如拉美、非洲和東南亞）的剝削，一定程度斷開與中心的聯繫是必要的。對相關主張的理論家和政治家來說，邊陲地區的勞動者處境遠比中心國家的糟糕，甚至可以說，前者之所以有那樣的處境多少是因為中心國家「勞動貴族」的出現。

統治關係外在於交換關係和生產關係構成的經濟結構。

統治關係最終依靠剝削，而剝削又來自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統治關係對經濟結構的需要很明顯。與此相應，經濟結構也需要統治關係。在交換關係方面，金錢貨幣必須統一，等價交換必須落實，即契約必須履行，違約必須受懲罰；訂約的自由必須有所保障，勞動力（商品）的賣買雙方皆享此自由；等價交換的邏輯——最終依靠「人類」的概念，把所有人類個體視為平等的——也要成為交換雙方的信念。在生產關係方面，生產資料壟斷的事實在法理上作為「私有財產」被保障，財產關係就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據此，使用勞動力商品之後生產的所有價值才能歸資產階級所有，儘管它們全由無產階級勞動所產生。

資本主義國家是統治關係的主要制度。由於統治關係以經濟結構為基礎，國家也不能脫離經濟結構，即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的循環。統治關係對權力的分配深受交換關係影響，公民（或「市民」）在政治上的平等和自由，以交換關係中的平等和自由為前提，也以生產關係中的不平等和不自由、剝削與反抗為前提。至於對國家公民身份的追求和捍衛，是繼續掩蓋被剝削者身分，還是能協助緩解剝削，是階級鬥爭與民主所要處理的問題之一。

## 二、封建主義統治關係

現在來看看第二種情況：剝削者自己擔任統治者。事實上，要有一群行動者不涉生產、專職統治、僅靠剝削者轉交之剩餘來過活，社會的分工和總體剩餘必須達到一定程度。在該程度尚未達到時，為了穩固生產關係而實行的統治，就只能交由剝削者階級自己來負責；用《共產黨宣言》的話來說，尚未有「管理自身事務的委員會」。這時，他們既是生產關係中的剝削者，也是統治關係中的統治者，地主同時就是領主或君主。同一個或一群社會行動者可以同時處在多種社會關係中。

由於沒有一群獨立的行動者專職統治，剝削者兼職統治最經濟的方式就是「將統治寓於交換」，封建主義交換關係「剩餘勞動—保護」中的「保護」及隨之而來的臣屬就是具體的統治手段，交換關係因而和統治關係相互預設與需要，形成**政治結構**，可與資本主義經濟結構類比。因此，**封建主義的剝削方式之所以是「外於經濟的強制」**，不只是因為直接生產者沒有和生產資料徹底分離，還是因為

交換關係和統治關係太過密切。誠如前述，僅僅透過單向的、不平等的強制，不可能長期剝削，剝削還取決於直接生產者覺得他們與統治者正在進行交換，因而多少是平等的，於是臣屬地主，繳納各種因應領主和君王心意以及時局變化（特別是戰爭）而增長的地租。這種情況就像資本主義交換關係和生產關係構成的迷霧一樣，使勞動者和研究者難以發現剝削的事實。

然而，交換關係和統治關係構成的政治結構，還是要以生產關係為基礎。如果不是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不完全分離，或者剝削者對生產資料的不完全壟斷（見前文），結合就沒有必要；如果結合沒有必要，交換就沒有必要；如果交換沒有必要，剝削者就不可能「寓統治於交換」，權力也不可能發生在交換關係。交換關係和統治關係構成政治結構，生產關係只是「經濟的」或「具有經濟性」，並不和交換關係構成經濟結構，頂多只是準經濟結構。

總之，不管是封建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經濟（領域）都起著最根本的規定作用。<sup>36</sup> 只不過在封建主義中，經濟只以生產關係為代表；在資本主義中，經濟卻以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的循環為代表，形成一個結構。政治結構的作用在封建主義最顯著，在資本主義中反而相對隱晦。用 Althusser (2005: 179, 201-2) 的話說，在封建主義中政治是「占支配地位的結構」(structure in dominance)，但經濟在「歸根到底」(in the last instance) (*ibid.*: 25) 的意義上仍具有決定性；而資本主義的經濟同時也是「占支配地位的結構」。

---

<sup>36</sup> 一些主張「辯證」觀點的學者，由於過度強調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相互作用——特別是封建主義以「外於經濟的強制」進行剝削的例子——幾乎毀了歷史唯物論的硬核。必須注意，就算辯證發生在對立的兩造（不管是基礎與上層建築，還是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之間，這兩造也不是平等或平衡的，而是傾向生成差序等次，總之是「不平衡」的。Hindess and Hirst (1975: 233) 陳述的封建主義邏輯捍衛了經濟的最終決定性：「沒有直接生產者對特別是封建主義生產關係的臣服、因而是勞動過程被那些生產關係結構化，就不可能存在專屬於封建主義生產方式的剩餘產品榨取方式。經濟層次 (economic instance) 以政治／意識形態為存在條件，但只有透過封建經濟的結構剝削才能發生。剝削在封建主義生產方式中發生於經濟層次的狀況不亞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經濟的本質及其存在條件不同，但剝削所在的層次並無不同。……封建主義生產方式使封建的經濟層次成為必備的。」這裡的「經濟層次」可對應到本文不斷提到的「壟斷／分離」格局。沒有這個格局，就沒有直接生產者的臣屬，也就不會有剝削；在封建主義中，這就是地主對土地的壟斷 (*ibid.*: 233-6)。



之所以花了一些篇幅引入交換關係的概念，討論封建主義的統治關係，是為了回答一個有關「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爭議。<sup>37</sup> 如果「外於經濟的強制」是封建主義的剝削方式，換句話說，剩餘勞動的榨取必須依靠政治或法律等「上層建築」，那麼還能說上層建築「豎立於經濟結構之上」嗎？政治在封建主義就算不是決定性的，至少不重要性不亞於經濟。如果是這樣，建築隱喻是否只限於捕捉資本主義，因此它本身應該跟著「歷史化」，甚至拋棄基礎與上層建築、經濟與政治的區分？Perry Anderson (1974: 403-4) 表示：

在階級社會中，所有資本主義之前的生產方式，都以外於經濟的強制手段從直接生產者身上榨取剩餘勞動。資本主義是歷史上第一個「純粹」以經濟形式從直接生產者身上汲取剩餘的生產方式。此前所有其他的剝削方式（modes of exploitation）都以外於經濟的處置——血緣、習俗、宗教、法律或政治——來運作。因此，原則上不可能把它們從經濟關係本身單獨挑出。……故不能不透過政治法律和意識形態上層建築來定義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呼應 Anderson 看法的當代學者不少，好比 Ellen Wood (1995) 以及試圖以辯證精神活化（或摧毀？）建築隱喻的 Derek Sayer (1987)。這種觀點固然根據剝削方式為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做出明快的區分<sup>38</sup>，卻有把前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自生產關係撤出、將它限制在生產力或各項生產技術、甚至拒絕經濟決定性或首要性的嫌疑，畢竟各種上層建築似乎貫穿了經濟基礎。

前文已經指出封建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的不同，後者是一個由特定生產關係——生產資料在社會行動者之間按照「有一無」分配的「壟斷／分離」格局——和與之對應的交換關係（普遍商品化和市場制度）形成的結構，而

---

<sup>37</sup> 除了這裡討論的問題之外，基礎是否包括生產力（畢竟生產力不屬於特定社會，不限於特定生產關係，發揮生產力一直是人類的普世任務）、上層建築的元素有哪些、「意識形式」是否就是大家時常提到的「意識形態」等問題，在此暫不追究。

<sup>38</sup> 前文說過，剝削方式和剝削條件不同，不管前者在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中有何不同，都必須以始終包含了生產關係的後者為前提；我也以 Banaji 的提醒為註腳，指出不能用剝削方式來代替生產關係。

前者憑著它的生產關係——生產資料在社會行動者之間按照「多—少」所分配的「壟斷／分離」格局——仍然使經濟起著「歸根到底」的決定性，政治結構「占支配地位」的事實並不妨礙這個事實，因為沒有這種生產關係就不會有地租的繳納，也就沒有封建主義剝削方式，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區分是可行的。

我同意 Hirst (2009: 115) 對 Anderson 的批評，建築隱喻的模型仍然有效，只不過經濟基礎必須歷史化；換句話說，封建主義有其「專屬的」經濟和政治（結構），只不過與資本主義的不同，有待建立：

Anderson 忘了，像「佔有」(possession) 之類的範疇必須根據每一個生產方式來**概念化**——它們不是被給定的。事實上，封建地租提供了剝削者控制生產資料和勞動者再生產條件的形式。同樣的，**經濟的本質也不是被給定的**——它必須根據每一個生產方式概念化。經濟的全部形式並不是都像資本主義經濟，它們也不能被化約為技術。

回到交換關係。交換可以不為了生產資料與直接生產者的結合，而是為了交換雙方消耗和生產不同使用價值，也就是前述「外在」於生產關係的意義。封建主義的統治關係確實與交換關係相互預設和需要。可是，由此而來的政治結構卻不僅止於「剩餘勞動—保護」的交換關係（從農民到地主，從領主到君王），還包括統治者／剝削者對軍事技術的開發和相關設備的購置，當剩餘勞動（地租）以貨幣的形式呈現時，農民也需要換得一定數量的貨幣。這些行為仰賴商業或貿易等商品交換關係，在制度上即市場。

「商品—（金錢）—商品」和「剩餘勞動—保護」都是交換關係，前者是商品交換關係，後者是政治交換關係。**憑著這個共通性，它們有可能互換與生產關係的位置，改變與生產關係相互預設和鑲嵌的程度。**在歷史上，曾經臣服於封建主義政治結構的商業活動將進入轉型後的生產關係，成為資本主義交換關係，與之鑲嵌。在封建主義生產關係下，資本主義的交換關係還未能完全嵌入其中、與之構成「循環」，因為在這樣的交換關係和生產關係之間，橫互著整個龐大的統治關係。

綜上所述，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在生產關係、交換關係和統治關係上的連結方式可用以下兩圖表示。RP 為 Relation of Production，生產關係；RE 為 Relation of Exchange，交換關係；RR 為 Relation of Rule，統治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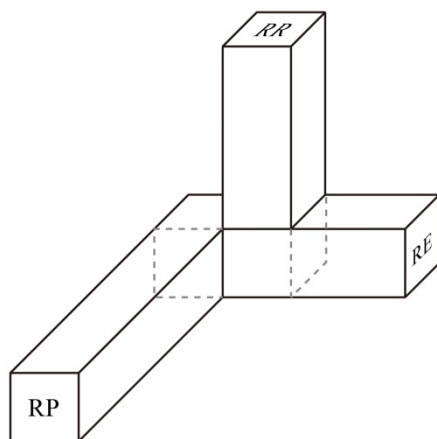


圖 1：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交換關係與統治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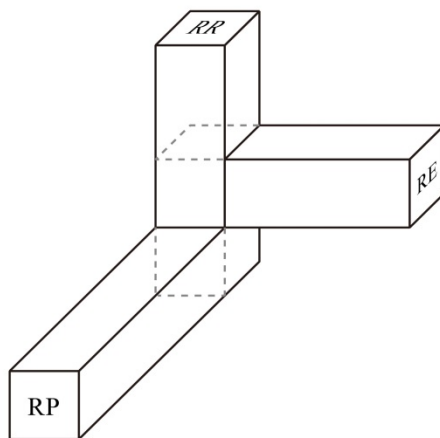


圖 2：封建主義的生產關係、交換關係與統治關係

在資本主義方面，RP 和 RE 兩塊積木構成一個直角，RE 連接在 RP 側邊。這一方面代表剝削方式是（商品）交換關係，另一方面代表生產關係作為剝削條件，影響力更具決定性。RR 對 RE 的影響比對 RP 更直接，因為資本主義的剝削方式並非統治關係，後者不深入生產關係，只能透過交換關係間接影響生產關係。

RR 和 RE 也構成一個直角，但 RR 又連接在 RE 的側邊，這代表相對於政治，經濟結構的影響力更具決定性。在此，資本主義的積木只有兩層：第一層由 RP 和 RE 的直角構成，第二層則是置於第一層之上的 RR。

在封建主義方面，RP 和 RR 構成一個直角，這也是前文提到的爭議之處。統治關係確實是一種剝削方式，但當 RR 連接在 RP 側邊時，RE 也連接在 RR 側邊，兩塊積木又構成一個直角，這就是前文說的「寓統治於交換」，或者說交換關係與生產關係沒有到相互預設和鑲嵌的程度，在兩者之間總是「卡著」一道統治關係、以之為中介。RR 連接在 RP 側邊代表 RP 作為剝削條件，影響力更具決定性；RE 連接在 RP 側邊、兩塊積木構成直角，代表它們一同作為剝削方式，構成政治結構，而 RE 在 RR 側邊代表 RR 更具決定性，「阻隔」了 RP 和 RE 的連結。與資本主義不同，封建主義的積木有三層：第一層是 RP，第二層是 RE，第三層是相對獨立於 RE 的 RR。

如果拒絕封建主義由經濟或生產關係起著「歸根到底」的影響力，甚至否定建築隱喻延伸至封建主義的可能，就是把圖 2 向左 90 度翻轉，然後加長 RR 積木，結果就是圖 1 的鏡像（顛倒的對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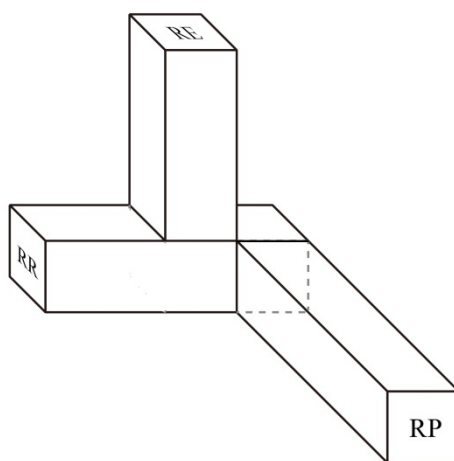


圖 3：封建主義的誤認／資本主義的鏡像

RP 和 RR 兩個積木構成直角，由於 RP 連接在 RR 的側邊，統治關係的影響力就比生產關係更具決定性；統治關係不只變成生產關係的剝削方式，還進一步決定

了生產關係，成為剝削條件。此外，交換關係也沒有在統治關係介入生產關係的同時「插上一腳」，甚至處在社會外部，不被考量。注意：圖 3 跟圖 1 都只有兩層，圖 3 的交換關係和圖 1 的統治關係都處在第二層；然而，藉由虛線透視，圖 1 呈現出統治關係與交換關係的互動，圖 3 卻沒有以虛線透視呈現交換關係與統治關係的互動，RE 積木直接被「擺在」RR 積木上方，這意味著封建貿易其實並不在持此主張者的視野中。這多半是政治馬克思主義者的途徑，也是認為建築隱喻不能延伸到封建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傾向；諷刺的是，把封建主義視為資本主義的鏡像本身就是一種延伸。

### 三、革命

延續「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討論，我們來看階級鬥爭促成生產關係轉型的問題。當生產關係已然或正在轉型，也就是從特定類型變化到另一類型時，階級鬥爭也必須從生產關係進入統治關係，從經濟鬥爭上升到政治鬥爭。生產關係的轉型——「過渡」——是一段長久的歷史過程，交疊著新舊兩種生產關係。這個過程是一場「社會革命」，革命的大致完成尚需「政治革命」的爆發與成功，即統治關係的轉型，新生產關係才能在新統治關係下出現、確立和再生產。反過來說，政治革命的結果長遠來看也必須有利於已然或正在轉型的生產關係，最終才能成功、成功才能持久。生產關係仍然是剩餘產出的樞紐。總之，革命不能只集中在生產關係，還必須上升到統治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統治關係的轉型可能協助生產關係的轉型和維持。例如，當統治者意識到生產關係正遭到被剝削者推翻時，完全可能有限度地「搶先」改變現有生產關係，這樣的改變往往不到轉型的程度，反而推遲了轉型的進程；被剝削者也可能在生產關係有了初步改變時，以政治革命加速改變、促成轉型。這些情況意味著統治關係仍有一定的獨立性，行動者亦非被決定的命定者。不過，這仍未更動生產關係的首要性，因為行動者都遵循了如下事實：第一，光靠政治革命，生產關係不會轉型（轉型必須與提高生產力的傾向與理性衝突，並由激烈的階級鬥爭和社會革命點燃），統治關係的轉型本身不可能完全改變生產關係；第二，政治革命只有在生產關係已然或正在轉型時才可能完成，進一步為新生產關係「助產」。

## 第四節 生產方式、社會形構與社會體系

把上述範疇整合起來，將它們的關係與互動當作一個整體提出，據此劃分歷史時期、認識社會性質，就是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的功用。

面對歷史，依照不同主題和需求，史家可以用很抽象也可以用很具體的方式來研究，因此有必要提出其他整合上述概念的方式。接下來，我們要依序討論生產方式、社會形構與社會體系。

### 一、生產方式

生產方式有三個定義。第一，專指勞動過程和生產工具或技術等，即狹義的「生產的方式」或部分的生產力項目。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這樣使用（粗體為筆者所加）：

……不改變他的勞動資料或他的勞動方法，或不同時改變這二者，就不能把勞動生產力提高一倍。因此，他的勞動生產條件，也就是他的**生產方式**，從而勞動過程本身，必須發生革命。……在研究我們上面考察的那種形式的剩餘價值的生產時，我們曾假定**生產方式**是既定的。而現在，對於由必要勞動轉化為剩餘勞動而生產剩餘價值來說，資本佔有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或者說現存形態的勞動過程，並且只延長它的持續時間，就絕對不夠了。它必須變革勞動過程的技術條件和社會條件，從而變革**生產方式**本身，以提高勞動生產力，通過提高勞動生產力來降低勞動力的價值，從而縮短再生產勞動力價值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 (Marx 2003b: 366)。

第二，專指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整合，這可能是當代馬克思主義者最常使用的。Hindess and Hirst (1975: 10) 就說：「生產方式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有條理的結合 (articulated combination)。」Callinicos (2004: 41) 則表示：「歷史唯物論的基本概念就是生產方式的概念。若要詳細說明某個生產方式的性質，就必須說明生產方式之下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特定結合方式。」

生產方式往往根據生產關係來定義和命名，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封建主義生產方式」，因為這樣最能凸顯不同的社會類型。若根據生產力的外延定義（生產工具、原料和勞動力），我們或許可以大致推斷所處的時期，卻難以劃分歷史時期。<sup>39</sup> 然而，以生產關係來命名生產方式或許便於分期，卻未能將統治關係和交換關係等「再生產機制」（mechanisms of reproduction）(Wolpe 1980: 7) 列入考量。

第三，恐怕是最麻煩的，也就是生產關係、生產力和各種「再生產機制」的整合。首先，若交換關係不只限於前述生產資料與直接生產者的結合，更涉及不同使用價值的交換，而交換的雙方或多方可能屬於不同生產關係，便不容易以特定生產關係來命名生產方式，進行歷史分期。其次，統治關係本身也可能不和生產關係完全同步或相應，以生產關係命名可能造成和前一點相同的問題；不僅如此，如果不同類型的生產關係同時存在，統治關係是否也有很多種？

緩解這些問題可以這麼做：雖然把交換關係和統治關係都納入考量，但暫時假定統治關係與生產關係同步或相應，而交換關係（不同使用價值的交換）連結的各個生產關係也屬於同類，**即生產關係只有一種**。這麼做只能符合很有限的現實，也就是單一生產關係普遍化的社會。或者說，在現實通常不會只有一種生產關係，而是有多種生產關係、相當複雜的前提下，這麼做的好處就是能夠專門分析單一生產關係、交換關係、統治關係和生產力互動的邏輯，《資本論》就是採取這種方式（雖然並未討論統治關係）。本章到目前為止的討論，也是假定它們立基在同一類生產關係上，即封建主義或資本主義。因此，前文雖然沒有以「生產方式」之名稱呼，實際上已經將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視為一種生產方式。這是前述第二種定義的擴充。

---

<sup>39</sup> 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 (Marx 1956-83d: 144) 為了解釋生產力和社會關係大致的對應，特別從生產工具變化的角度來推斷社會關係的變化：「社會關係和生產力密切相聯。隨著新生產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隨著生產方式即保證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係。手工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為首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為首的社會。」這個段落除了機械論的傾向外，當然也有其他問題：如果工業資本家也生產了其他重要的生產工具，好比使用電力、發明電燈（一般來說，就是所謂的第二次工業革命開端），人類是否又進入另一個新的社會關係？還是說，也可以同時用電燈（而不只是蒸氣磨）來判斷同一社會關係？對歷史分期來說，這些做法過於瑣碎，但並不代表用生產工具來命名人類歷史階段是不可行的，只要該階段內生產工具的變化不大、速度不算頻繁或項目不至於太多，尚且容易加以分類，如我們都知道的「(新) 石器時代」。

「生產方式」由於涵蓋了更多範疇，是比生產關係更具體的概念，因此**能夠當作生產關係的次類型來使用**。然而，以上三種定義都沒有把再生產和多種生產關係的關係真正問題化：如果單一生產關係尚未遍佈社會，社會中有兩種以上的生產關係並列和互動呢？我們需要第四種定義，這超越了生產方式這個術語。

## 二、社會形構

若要分析多種生產關係的並存與互動（以及它們各自的再生產），我們必須以若干生產方式為組件，研究其組合，即「社會形構」。這時的生產方式**只能採取前述的第二種定義**，因為在一段時間內，我們無法確定再生產機制（如統治關係、交換關係）將最有利，因此歸屬於哪一種生產關係；或者反過來說，哪一種生產關係最能在其中再生產。

假設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並存與互動，而再生產最有利資本主義，那麼這就是一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占支配地位」的社會形構；同理，若再生產最有利於封建主義，這個社會形構就由封建主義生產關係「占支配地位」。這兩種情況都趨近於第三種定義的生產方式。《資本論》第二卷難得提到了不同生產關係——馬克思稱為「社會生產方式」——並列而資本主義「占支配地位」的情況（粗體為筆者所加）：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發展，已經占統治〔支配〕地位的時代，……在產業資本或者作為貨幣或者作為商品執行職能的流通過程內，產業資本不論作為貨幣資本還是作為商品資本的迴圈，是和各種極其不同的社會生產方式的商品流通交錯在一起的，只要這些生產方式同時是商品生產。不論商品是建立在奴隸制基礎上的生產的產品，還是農民的產品（中國人，印度的佃農），還是公社的產品（荷屬東印度），還是國家生產的產品（如在俄羅斯歷史早期出現的以農奴制為基礎的國家生產），還是半開化狩獵民族的產品等等，它們都作為商品和貨幣，同表現產業資本的貨幣和商品相對立，既進入產業資本的迴圈，在剩餘價值作為收入花掉時，也進入商品資本所包含的剩餘價值的迴圈，也就是說，進入商品資本的兩個流通部門。作為它們來源的生產過程的性質如何是沒有關係的；……因此，商品來源的全面性，市場作為世**



界市場的存在，是產業資本流通的起點 (Marx 2003c: 126-7)。

方便起見，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占支配地位」的社會形構可以分別稱作「資本主義時代」和「封建主義時代 (epochs)」(亦可見 Marx 1970: 21)，屬於「第四種」生產方式的定義。這種定義比第三種更具體，因為考量了多種生產關係（它必須從不同生產關係的並列出發），又抓住了「占支配地位」的生產關係（通過了再生產機制的特定生產關係）：這是「一種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隱沒其中。這是一種特殊的以太，它決定著它裡面顯露出來的一切存在的比重。」(Marx 1995a: 48)

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之所以能夠「占支配地位」，進而和其他生產關係共同構成「資本主義時代」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因為資本能夠進入再生產領域或使整個再生產領域導向它。在這種情況下，就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受到在它的發展階段以外的生產方式的制約」，它還是會：

盡可能使一切生產轉化為商品生產；它實現這種趨勢的主要手段，正是把一切生產捲入它的流通過程；而發達的商品生產本身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產業資本的侵入，到處促進這種轉化，同時又促使一切直接生產者轉化為雇傭工人 (Marx 2003c: 127)。

這裡的「再生產機制」就是商品流通，只要同時存在的非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也有商品生產，就不得不讓位給資本主義。這些無法再生產的生產關係，通常只有兩種命運：被迫轉型，跟進主流生產關係；或者，保留既有形式，但承擔「占支配地位」生產關係的再生產功能。這時，它們雖然可能看起來像平常定義中的生產關係，我們卻不能直接以此指認它們，而是必須置之於宏觀時代中來判斷，因為只有「時代」或（第四種定義的）生產方式，才決定了其中所有元素的（經濟）「運動規律」(Marx 2003b: 10)。<sup>40</sup>

---

<sup>40</sup> 「當生產方式不過是歷史運動規律 (historical laws of motion) 的一個明確總體 (totality) 時，諸生產關係也就成了這個給定生產方式的函數。簡言之，任何明確的生產關係的特質都不可能起決定作用，除非運動規律本身已經被決定。」(Banaji 2010: 60) 這個提醒很重要。馬克思的《資

總之，社會形構和生產方式是不同的概念。第三種定義的生產方式較第二種定義的具體，因為涉及了生產關係的再生產；社會形構又較第三種定義的生產方式具體，屬於第四種生產方式的定義，因為涉及了多種生產關係，而它們都會設法再生產、出現「占支配地位」者。<sup>41</sup>

### 三、社會體系

「社會體系」與社會形構不同。後者是多種生產方式的共存與互動，而生產方式是與生產相關的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等領域構成的「切面」；前者則包括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本身等領域，這些領域並非全部都與生產相關，故社會體

---

本論》是因為假設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普遍化（雖然第二卷短暫考慮了其他生產關係的存在）才提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並視之為一個總體，特別是在第三卷整合了生產和流通兩大領域之後。這時，我們會很自然地認為（特定）生產關係能夠決定整個時代，甚至把生產關係等於生產方式。不過，當多種生產關係並存且一時之間無法判定何者更「占支配地位」時，問題就浮現了：哪一種生產關係能夠「代言」生產方式這個總體，進一步主宰時代、為歷史設下運動規律？這涉及了許多與生產沒有直接關係的元素，其中就包括了再生產。

<sup>41</sup> 關於「生產方式」和「社會形構」的討論曾在「構連」(articulation)的問題下引起爭議：不同生產關係共存和互動時如何再生產？如何思考它們發生關係時（構連或）共同構成的總體？該總體有何性質，偏向「占支配地位」者，還是可能出現均勢狀態而無「占支配地位」者？正是在1960、70年代，第三世界或資本主義邊陲國家面對資本主義擴張時，因為不得不在舊有生產關係轉型與否的問題上選擇，構連遂被提出。

「再生產（機制）」和「生產關係」何者更具決定性在此成了爭論焦點。爭論方大約有三種立場。第一，如 Banaji 所述（見前註），既然必須從「運動規律」判定諸生產關係互動後的總體性質，特定生產關係就不是最首要的，由多個生產關係形成的社會形構亦然，畢竟後者只是構連的結果，性質如何充滿變數；如此一來，不如保留最終確定下來的、可以再生產的生產方式，以此思考社會整體就好，社會形構的概念是多餘的（Wallerstein 也有這種傾向）。第二，從總體的視角來考量社會性質，直接拋棄生產方式，保留社會形構，因為構連本身正好充滿各種變數，70年代後期的 Hindess and Hirst 即做此轉向；為了保持差異和變化，受 Althusser 思想影響的相關學者（包括後來也轉向的 Ernesto Laclau）甚至進一步拋棄生產關係，僅僅把社會形構視為各種「實踐」的集合。第三，如 Poulantzas 和 70年代前期的 Laclau 則認為，就算必須經過構連、形成一個總體，這個總體仍然是多個生產關係（在再生產機制上）角力的結果，能夠決定總體性質者必然屬於其中之一，因此，生產關係以及據此定義的生產方式才是最重要的。關於上述立場的理論探討，最好的整理是 Harold Wolpe (1980)，也可參考 Foster-Carter (1978)。

Banaji 的提醒很重要（亦可見 Balibar 1970），特定生產關係本身確實無法決定再生產後的社會總體性質。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就特定生產關係本身來討論，否則若它在再生產機制上通過考驗，我們還是很難判定社會總體的性質；即便它和其他生產關係起到「綜合發展」，我們還是需要知道是「什麼」性質之間的綜合。此外，在特定時代下，總是可能出現其他迥異於主流生產關係（生產方式）的生產關係。因此，再生產和生產（關係）固然是不可分的，卻屬於不同秩序。

系又比社會形構更具體。

雖然如此，社會形構顯然和社會體系不可分。不管是第幾種定義，社會形構和生產方式（如其名稱所示）關心的都是與生產相關的生產關係類型、轉型、持存、並列／互動與主宰／從屬，社會體系關心的是不同領域的關係。事實上，建築隱喻本身就與社會體系有關，否則就不會有作為「政治」和「經濟」領域的統治關係和交換關係。不過，這畢竟是從社會形構的角度來看社會體系。

從社會體系來看社會形構，雖然「占支配地位」的生產關係決定了社會形構這個總體的運動規律，但不同生產關係會相互作用；這時，發揮作用的將不只是生產，政治、意識形態（乃至文化）也會加入。我們可以從兩個層次來看。

微觀地來看（在短暫的時間內和特定的空間中），這個過程就構成了所謂的「形勢」（*conjuncture*）：在其中有能力主導未來走向的，不再只有經濟領域；就算經濟領域仍然最重要，不同生產關係和階級利益也會彼此交錯。矛盾不是單一的，而是多重的；多重的矛盾也不是簡單並列的，而是會融合起來。列寧和托洛茨基面臨的 1917 年，特別是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間，就屬於高度複雜的形勢，不只國內經濟問題和階級鬥爭重要，國際政治的影響更不可忽視。正是身處革命的浪尖，托洛茨基回顧了俄國歷史，從「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框架分析當時形勢的根源。

宏觀地來看（在相對長的時間和廣大的地理空間中），「占支配地位」的生產關係所形成的時代又有不同「時期」或「階段」。舉例來說，資本主義時代可以分為「市場資本主義」、「壟斷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階段」）和我們現在所處的「後工業」、「後現代」或「多國資本主義」時期（Jameson 1991）。這些時期不會因為先後交替就脫離資本主義時代，而是在其中變化。社會體系的不同領域都為變化起了推波助瀾之效，如（國際）政治就是「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的重要決定力量，文化則有助於「後工業」或「後現代」資本主義的出現，或者，我們可以根據 1990 年冷戰終結的結果，把當前的資本主義階段定性為「多國的」。<sup>42</sup>

---

<sup>42</sup> 晚近有關「時期」與「形勢」的討論可見 Callinicos (2005)。他用「時代」（*epoch*）和「形勢」的區分回應 Justin Rosenberg (2000, 2005) 對冷戰之後「全球化理論」（*Globalization Theory*）盛行所做的形勢分析。這裡的「時代」和我們用來捕捉「占支配地位」生產關係所形成的「時代」雖然用語一樣，不過意思不同。Callinicos 根據 Perry Anderson 和 Fredric Jameson 探詢現代主義（*Modernism*）起因的方式試圖在形勢（最微觀的分析範圍和視角）與生產關係（或生產方式，最宏觀和抽象的概念）之間找出一個類似「潮流」的中觀層次，即時代。我引用馬克思和 Banaji

下表是生產方式的四種定義。它們是依序引入不同規定的結果：一開始是生產力（第一種定義），接著是生產關係（第二種定義），再來是再生產機制，但限於單一生產關係（第三種定義），然後是不同生產關係之共存並設定占支配地位者，即社會形構（第四種定義）；最後是引入生產之外的領域。這個順序從最抽象和簡單的規定出發，然後以抽象性遞減的方式 (Lindenberg 1992)，每一次引入都是「非演繹的具體化」(non-deductive concretization)<sup>43</sup>，每一種定義和規定都有停留下來獨立分析的價值。

定義	第一種	第二種	第三種	第四種／社會形構	社會體系
具體					不止於生產
↕				多種生產關係	意識形態
			再生產機制	再生產機制	政治
		生產關係	單一生產關係	占支配地位者	經濟
抽象	生產力				

表 1：生產方式的四種定義

由於涉及多個生產方式，社會形構的概念非常重要。生產方式之間的互動都可以在這個概念中討論。不過必須注意，即便包括多個生產方式，社會形構指的「社會」始終是單一而抽象的，沒有固定指涉的對象。它可以是「國內社會」，也可以是「國際社會」或「世界」，但卻與多個社會或多個國家的並列與互動無關。托洛茨基納入國際機制或複數本體論之後，大大改變了這種思考模式。

所使用的時代則傾向 Callinicos 的生產關係或生產方式。至於形勢的概念，可見 Lahtinen and Koivisto (2012) 對馬克思主義各家說法的簡介。

<sup>43</sup> 第六章第四節為了討論資本主義（或多個資本）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還會簡要回顧這個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使用的方法。「非演繹的具體化」參考 Callinicos (2001: 240, 2007: 542)。

## 第二部份





## 第四章 從資產階級革命到不斷革命

勾勒完歷史唯物論的輪廓後，是時候進入「不平衡與綜合發展」了。可惜翻看幾部重要著作，這個概念總被托洛茨基當作分析俄國社會的架構，鮮少專門討論，畢竟這些分析不是出於理論興趣，而是為了他的革命戰略「不斷革命」(permanent revolution) 辯護。如果馬克思未能寫下的哲學總是以「實踐狀態」存在於政治經濟學批判，那麼「不平衡與綜合發展」之於不斷革命也是一樣。

要理解不斷革命的創新，不妨將它放到馬克思主義有關「資產階級革命」(bourgeois revolution) 的討論來看。長期以來，資產階級革命往往給人「特定行動者(資產階級)為了一個清楚的目標(確立資本主義)共同行動(革命)」的印象，所以檢驗歷史上是否真有這樣一群人意圖實踐這份事業(如 17 世紀中葉前後的英國革命和 18 世紀末的法國革命)就成了這個概念是否有效的關鍵。對此，當代已有不少爭論。

從 Davidson (2012, 2015) 所謂「後果主義」(consequentialism) 的觀點來看資產階級革命，不僅能為這個不斷被批評的概念保有一定的有效性，便能銜接到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理解其創新之處。作為一種深切考量了形勢變化和階級鬥爭靈活性的革命戰略，不斷革命進一步反顯了「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本體論和分析方法。

本章從馬克思與恩格斯對歷來資產階級革命的評價開始(第二節)，依序介紹資產階級革命爭議(第三節)、不斷革命的邏輯(第四節)及其在今日的相關性(第五節)。我尊重「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在不斷革命中的實踐狀態，所以還是花了一些篇幅討論不斷革命及其與資產階級革命的關係。不過在此之前，有必要認識馬恩評價資產階級革命的時空脈絡，即普魯士及德意志地區「由上至下的革命」過程(第一節)，一方面這是資本主義出現之後以「不平衡與綜合發展」進行全球擴張的一個環節，另一方面這也是托洛茨基分析俄國與歐洲「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前哨站。

## 第一節 統一前後的普魯士及德意志地區

在 1806 年的耶拿戰役後，普魯士失去了大量領土，德意志地區亦有多處被拿破崙占領。在國際政治上，封建主義生產關係迎擊資本主義，不得不正視其挑戰。對於在 18 世紀便遭逢資本主義（英國）挑戰的法國來說，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強大力量恐怕還沒有這麼清晰；不過，對於受到巨大打擊的普魯士來說，展開「防禦性」的現代化改革 (Wehler 1985: 29, 31) 或「由上至下的革命」卻是迫在眉睫的要務。在普魯士積極邁向絕對主義的數個世紀內，德意志地區的生產力已經有所提升，只是尚未達到與生產關係發生激烈衝突，因而必須改變的地步。現在，既有生產關係——以封建主義的農奴制為代表性制度——開始改變了。這不是一蹴可及的，也受到外在因素影響甚鉅。

### 一、農業改革

在西歐資本主義出現和擴張的過程中，中東歐一直扮演穀物輸出、供給生活必需品的角色。為了從貿易中獲取更多資金，領主加強對農奴的剝削，這些資金被用來投入戰爭，主權和領土持續分裂。

在 18 世紀之前，由於普魯士逐漸擴張，碎裂的領土開始減少。受到法國革命影響，19 世紀的改革由施泰因在威廉三世治下發起，農奴制於 1807 年「十月敕令」廢除，農民自此在法律上有了人身自由和自由選擇職業及遷徙的權利。由於違反容克利益，改革的主事者很快被迫去職，1810 年改由哈登貝格接替首相一職；儘管改革繼續，卻朝更加顧及地主利益的方向前進。1816 年，新的敕令更申明，只有富農才有贖免封建義務的權利，改革越來越縮水。

由於必須償付大量贖金或割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土地給領主 (Gray 1986: 123-5)，農民在法律上雖然自由了，在社會上卻陷於困境。土地規模難以過活的農民只能將獲得的土地再轉賣給地主，向他們承租，繼續以做日工的方式過活。種種封建義務直到 1848 年革命都還殘存著，只有大部分上層富農和少數下層貧農真正獲得解放。1850 年 3 月，政府迫於革命壓力才同意取消貧富農的封建義務，取而代之的又是高額人身贖金。

究竟封建義務的「贖免」是什麼意思呢？恩格斯 (Engels 1965a: 367-8) 曾諷刺地說過：「是這麼一回事。老爺向農民收取一筆錢或一塊地以後，就應該承認



農民剩餘下來的土地是他的自由的不擔負賦役的產業，儘管過去屬於老爺的全部土地都是從農民那裡掠奪來的！」他在《關於普魯士農民的歷史》繼續說：「這個『理性的國家』的有名的開明土地立法只追求一個目的：從封建制度下挽救一切還可以挽救的東西。……我們可以認為，農民為了擺脫非法地加在他們身上的賦役而交付給貴族和官廳的款額，至少也有 3 億塔勒，而且可能達 10 億馬克。10 億馬克，只不過把在四百年內掠奪去的土地以免徵賦役的形式挽回很小很小一部份！」(Engels 1965b: 285, 8-9)

直到 1860 年代，這些封建殘餘才幾乎廢除，在此之前，農村已經出現集體貧困，大量付不出土地贖金的農民淪為貧農和無產者；同時，城市還沒有足夠的工業發展能夠雇用這些勞動力。反觀地主，依舊保有許多封建特權，如領主裁判權和警察權，其經濟利益頂多是轉換形式，政治利益很難說有巨大改變。

這種基於強烈政治考量的農業改革後來被列寧 (1988: 205-6) 稱為「普魯士式道路」，其精神就是哈登貝格向德皇表示的：「自上而下地做法國人自下而上地做的事」(邢來順 2006: 76)。關於改革的邏輯與後果，馬克思 (1965: 559-60) 也評論過，並且將普魯士的情況與俄國並列：

普魯士……被擊潰後，它的政府感到只有經過一次巨大的社會更新……才能挽救它自己和全國。它在封建王朝的範圍內，把法國革命的成果小規模地移植到普魯士去。……俄國在克里木〔克里米亞戰爭〕的戰敗……在國內揭示了它的社會制度和行政制度的腐朽。在這兩個國家裡，大膽的社會改革都受到了阻礙，都有其侷限性，因為這些改革都是由君主賞賜的，而不是由人民取得的。雖然如此，仍然發生了一些巨大的社會變革，這些變革取消了統治階級的最惡劣的特權，改變了舊社會的經濟基礎。

## 二、工商業發展

「巨大的社會變革」基本上從 60 年代展開。西部大舉工業化，東部眾多農村勞動力轉往西部，終於成為工業的勞動大軍 (王琪 2002: 184-5)。由於回收了許多農民土地和贖金，領主獲得充足資本，土地規模跟著擴大。從 1811 到 1890 年，他們的地產面積擴大了三分之二 (Wehler 1985: 11)。大面積土地更容易經營

——在農奴制下，農地是無所謂「經營」的——農場，一方面農村工業（如酒、糖和麵粉的製造）興起，另一方面地主們也利用剩餘投入城市工業的發展。

改革的成果現在比較明顯了。從 1816 到 1866 年的半個世紀裡，普魯士可耕地多了一倍，從佔有總面積的 26.5% 上升到 51.4%，收成多了三倍。以農業生產力的提高為基礎，人口也快速增加，1815 到 1840 年人口成長率 37%，1840 到 1860 年則是 26%。由於勞動力越來越多，1850 年開始有許多人移民海外，其餘則設法轉往城市 (Wehler 1985: 12-3)。在 1800 年時，德國的務農人口還占總人口的 62%；到了 1850 年時，降為 55%；1871 年統一之後，已經降至 49.3% (王琪 2002: 188)。

與此同時，德國也開始翻轉國際貿易的「邊陲」位置。1870 年，在出口到英國的品項中，39.7% 為工業品，原料和食品仍有 34.7% 和 25.6% (邢來順 2003: 78)；隔年，在總出口商品中，成品和半成品已經占了 51%，原料和食品則分別占 25% 和 24%。1880 年代後，德國和美國作為工業化的後起新秀，出口貿易超過了法國。70 年代開始，美俄穀物迅速湧入，德國在世界市場上第一次遭逢競爭對手，穀物輸入超過輸出 (Pinson 1989: 239)。面對 1873 年的經濟危機，德國工業製品亟欲出口，反對英法廉價鋼鐵的進口，因此工農資本家和地主一改過去對自由貿易的支持，共同採取了保護主義 (邢來順 2003: 79)。

商品出口的提升有賴鐵路的興建和關稅同盟的建立。1835 年，第一條客運鐵路建成，首次以蒸汽機為動力；到 1850 年，德意志地區已有 6,000 公里的鐵路；1871 年統一時，則有 21,481 公里。不只商品在各個城市與鄉村之間能夠較以往更順暢地流通，勞動力也更容易遷徙。關稅同盟在 1834 年建立時，雖然只有十八個國家加入，漢諾威、布萊梅、漢薩城市興趣缺缺 (邢來順 2001: 39-40)，稍後的效益卻有目共睹。同盟除了降低商品買賣的關稅，也保護了初生工業的發展，成為後來德意志統一的基礎。「關稅同盟與鐵路興起成了連體嬰，對德意志工業化的開始有相輔相成的功能。」(王琪 2002: 189)

1783 年，德國安裝了第一台水力紡紗機；1814 年，光是薩克森就有 28 萬枚機械紡錠；至 1831 年，德國已有 1,000 台以上的機械棉織機。30、40 年代可說是德國的第一次工業革命 (邢來順 1999: 85-6)。由於得益於英國的示範，後起的德國能夠在廢除農奴制的同時展開工業化（自然的、零星的工業化當然在此之前已經存在），而這個過程在英國可是歷經了三百年以上。

除了輕工業，重工業也迅速發展。鐵路建設在此頗有助益，因為它特別需要煤礦和鋼鐵。1815年，魯爾煤田開始有效開採，40年代部分煤田已使用機械開採。在1820年，德國的煤產量有120萬噸，1840年已經來到260萬噸，1850年更迅速飆升至670萬噸，1870年則到了3,400萬噸。在生鐵方面，1823年，德國產出僅4萬噸，1840年為17萬噸，1850年21萬噸，到了1870年，則跳躍到139萬噸 (*ibid.*: 87-8)。雖然遭遇1857到59年的第一次世界性經濟危機以及1866年的短暫衰退，但迅猛的煤鐵發展加上關稅同盟，最終把奧地利排除出德意志的政治版圖，小德意志的路線確立，1866年的普奧戰爭只是普魯士對兩強爭霸「在政治上加以收場而已」(邢來順 2001: 41)。

### 三、階級鬥爭

從前文可推知，在1850、60年代之前，由於德國工商業發展剛起步，城市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不可能強大。1816年，農民「解放」才沒多久，全德十二個大城市加起來的人口是75萬，只相當於當時法國一座巴黎城的人口，很難期待強大的城市資產階級出現。1831年，在普魯士的252,000架織布機中，大部分都是農民從事副業時所用，全職的自由織工很少，勞動者與土地的關係還很密切(孫炳輝 1995: 96)。即便統一前夕，全德務農人口仍有近50%(見前文)。再加上主權的持續零散、多頭，即便階級鬥爭已經發生在各個地區，團結也沒有那麼容易。

因此，對1848年革命以及1850年起各項動亂的參與者而言，主要的敵人仍然是代表封建主義的容克。資產階級的利益就算最終與地主階級衝突，在後者為了於國際競爭中存活而「搶先」展開的現代化過程中，前者也只能依附後者，不可能帶領無產階級一起反抗。此時的無產階級要麼尚未形成自己的穩固利益，要麼形成之後早早就知道要「伺機而動」，因此也被資產階級嚴加提防，畢竟雙方都可能參照英法革命的階級鬥爭前例。

至於地主階級，當然更清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在歷史上的行動，畢竟這就是他們搶先現代化的另一個動機：避免「被革掉命」。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難想見何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當時關注的正義者同盟(1837年成立於巴黎)以及親自領導的共產主義者同盟(1847年由遷往倫敦的正義者同盟改組而成)不是祕密結社，就是將組織設置在其他國家。正是基於前述時空脈絡，馬克思和恩格斯

在思考革命路線時，才提出了類似「不斷革命」的說法。

革命團體真正能夠有組織地公開活動、在各國有規模有計畫地串連，如第一國際，都是 1860 年代開始的，因為這時正是德意志地區工業革命的迅猛時期。與此相應，1864 到 1873 年總共發生了 903 起罷工。1871 年有 188 起罷工，1872 年有 215 起，1873 年 255 起，這就是甫建立的德意志帝國前三年的情況 (Wehler 1985: 18)。1875 年，拉薩爾的工人聯合會 (1863 年成立於萊比錫的全德工人聯合會) 與貝貝爾及李卜克內西領導的艾森納赫黨 (1869 年成立於艾森納赫的德國社會民主工黨) 在哥達合併為社會主義工人黨。1878 年俾斯麥推動「反社會主義者法」以來，社民主義工人黨反而快速發展，1898 年選舉獲得了議會 27.2% 的席次，1890 年正式更名為「德國社會民主黨」，1892 年終於合法化。值得注意的是，特別是從 1860 年代起，工人生活已經相對穩定。受惠於技術進步，1850 到 1860 年，生產效率提高了 8.5%；1860 到 1870 年，更達到 42% (Wehler 1985: 17)。面對糧食上漲，工人的實質工資並未縮水。不只透過保護主義，德國的工業發展更在銀行的戰略性協助下，持續向外擴張，這些都有益於緩解德國工人受到的壓迫。

在 20 世紀前夕，德國已經成為侵占新幾內亞、東非和中國膠州灣等地的帝國主義列強之一，經濟進步，具有十足現代形式，而政治則繼續在包括俾斯麥在內的幾任宰相獨裁手腕下，越發傳統而保守：「俾斯麥平衡地把傳統和現代元素融合起來，而這正是典型的波拿巴主義。」(Wehler 1985: 59) 憑藉「由上至下的革命」，由普魯士率領的德意志地區在一百年的時間內，就從農奴制走向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階段。面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由德國社民黨主導的第二國際轉向了民族主義，政治信用破產。革命的火炬轉向了東方。

## 第二節 在過去與未來之間的馬克思與恩格斯

現在從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當時資產階級的評價出發，看看「不斷革命」是如何被提出的。事實上，他們並未賦予這個概念太多明確而獨特的理論意義，所謂的不斷革命或「不間斷的革命」比較像是共產黨人革命目標的一般陳述，儘管依照後見之明，似乎可以將它視為托洛茨基革命思想的前身。在上一節大致交代 19 世紀改革的邏輯和進程之後，我們應該可以對兩人當時的複雜態度——同意

與資產階級合作、強調無產階級獨立行動的必要，甚至希望獲得農民支持以及認為當時革命「為時尚早」（恩格斯）——有更深層的理解：相較於英法兩國，他們在一段凝縮和跳躍的歷史中試圖掌握革命時機，這毋寧是非常困難的。

### 一、從英法革命到德國革命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8 年發布的《共產黨宣言》文末表示：「在德國，只要資產階級採取革命的行動，共產黨就同它一起去反對專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動性。」(Marx and Engels 1956-83d: 503) 不過，為了德國工人能夠在適當的客觀條件下起身反對資產階級，「共產黨一分鐘也不忽略教育工人盡可能明確地意識到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敵對的對立。」問題是，資產階級何時會採取革命行動？——真的會嗎？

兩個世紀前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了，半個多世紀前的法國資產階級也是。<sup>44</sup> 馬克思 (Marx 1956-86b: 124) 如此描述了兩國的革命：

在 1648 年，資產階級和新貴族結成了同盟反對君主制度，反對封建貴族和反對占統治地位的教會。在 1789 年，資產階級和人民結成了同盟反對君主制度、貴族和占統治地位的教會。1789 年的革命只有 1648 年的革命來做它的原型（至少就歐洲來說），而 1648 年的革命則只有尼德蘭人反對西班牙的起義來做它的原型。這兩次革命中的每一次革命都比自己的原型前進了一個世紀；不僅在時間上是如此，而且在內容上也是如此。在這兩次革命中，資產階級都是實際上領導運動的階級。

革命是會跨時空傳承的。在英法革命中，資產階級先後承擔起歷史任務，領導反對封建力量的運動。無產階級在當時雖然存在，但尚未形成「與資產階級不同的任何單獨的利益」，因此只能「為實現資產階級的利益而鬥爭」。

---

<sup>44</sup>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英國革命（內戰）和法國革命都非常關注，尤其是後者。就像同時代的知識份子一樣，馬克思也身處法國革命的餘韻與影響中，更曾動念要寫一本有關法國革命時期國民公會的书，儘管沒有執行。馬克思對法國革命的理解與評論可見 Löwy (1989)，馬恩兩人對英國內戰的詮釋可見 Hill (1948) 的整理。

英法資產階級革命不只是個別階級在主觀行動上的勝利，更是整個時代客觀需求的反映：

1648 年的革命和 1789 年的革命，並不是英國的革命和法國的革命；這是歐洲範圍的革命。它們不是社會中某一階級對舊政治制度的勝利；它們宣告了歐洲新社會的政治制度。資產階級在這兩次革命中獲得了勝利；然而，當時資產階級的勝利意味著新社會制度的勝利，資產階級所有制對封建所有制的勝利，民族對地方主義的勝利，競爭對行會制度的勝利……1648 年的革命是十七世紀對十六世紀的革命，1789 年的革命是十八世紀對十七世紀的勝利。這兩次革命不僅反映了它們本身發生的地區即英法兩國的要求，而且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反映了當時整個世界的要求 (*ibid.*: 125)。<sup>45</sup>

下一節在介紹資產階級革命的爭議時，會提到「階級的勝利」（主觀的）和「（新）社會制度的勝利」（客觀的）兩者的差異與關係。這裡的重點是，相較於領導這兩場革命的英法資產階級，1848 年三月德國革命中的「資產階級發展得如此萎靡、畏縮、緩慢，以致當它同封建制度和專制制度對峙的時候，它本身已經是同無產階級以及城市居民中所有那些在利益和思想上跟無產階級相近的階層相對峙的了。」

至此，資產階級的革命不再跨時空傳承，歷史進程中斷了。對馬克思來說，德國（普魯士）革命沒有前兩起先例的高度，「與 1789 年法國的資產階級不同，普魯士的資產階級並不是一個代表整個現代社會反對代表舊社會的君主制和貴族的階級。……它一開始就蓄意背叛人民，與舊社會的戴皇冠的代表人物妥協，因為它本身已是屬於舊社會的了……——這就是普魯士資產階級在三月革命後

---

<sup>45</sup> 馬克思在這邊的焦點顯然只有「兩場革命」，即英法兩國革命，因為推論到荷蘭這個「原型」時，他就停止了。如果荷蘭是英國革命的原型，那麼還可以再往前推嗎？這段引文在馬克思主義有關「荷蘭暴動」（Dutch Revolt）和荷蘭社會經濟史的討論中很常被引用到，也帶來另一個相對被忽視的問題：荷蘭暴動是資產階級革命嗎？誠如 Brandon (2007) 所言，雖然相關討論還很零碎，許多資料與分析有待系統性開發，但在 18 世紀末的法國革命爆發前後，荷蘭暴動對文人們來說可謂一起「著名事件」（*cause celebre*），歌德劇作《艾格蒙》（*Egmont*）便與爭取獨立、抵抗西班牙哈布斯堡王室的兩個角色有關，貝多芬亦譜寫過《艾格蒙序曲》（*Egmont Overture*）。本文仍聚焦在當代學者對英法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概念的爭議。

執掌普魯士國家政柄時的形象。」(ibid.: 125-6)。回到前一節最後的引言，馬克思自己很清楚：19世紀起的「改革都是由君主賞賜的」，我們似乎不能期待資產階級有什麼傑出作為。

## 二、「不間斷地進行革命」

在多次觀察與挫敗後，共產黨是否還應該「同資產階級一起」革命就成了一個迫切問題。1849年5月，普魯士政府查禁了《新萊茵報》(*Neue Rheinische Zeitung*)。工人運動的領袖們不是遭到囚禁，就是被迫流亡，馬克思屬於後者。1850年初，共產主義者同盟在倫敦聚會，《新萊茵報》重新發行。恩格斯(1998: 107-8)在刊登其中的《德國維護帝國憲法運動》表示：

從1848年六月革命失敗的時候起，對於歐洲大陸上的文明國家說來，問題已經是要麼由革命的無產階級來統治，要麼由二月革命以前的統治階級來統治。中間的出路已經是不可能的了。特別是在德國，資產階級看來沒有能力進行政治統治；在同人民的鬥爭中間，它之所以能維持自己的統治，完全是因為它又向貴族和官僚讓了步。……

雖然如此，維護帝國憲法的運動還是取得了重要的成果。首先，它使局勢簡單化了。它結束了無休止的妥協的企圖。在這次運動失敗以後，取得勝利的只可能要麼是以立憲主義稍加粉飾的封建官僚君主制，要麼是真正的革命。而革命現在在德國只有當無產階級的全面統治建立起來的時候才能結束。

其次，維護帝國憲法的運動在德國的那些階級矛盾表現得還不很尖銳的地方，大大地促進了階級矛盾的發展。……

革命失敗了，未來的方向卻明確了：無產階級統治。對資產階級的不信任在1850年3月的〈共產主義同盟中央委員會告同盟書〉中再次展現。馬恩兩人承認資產階級民主派在短時間內仍將勝利，無產階級難免要與他們暫時合作，但面對各種「花言巧語」，無產階級必須更謹慎，盡可能去觸碰私有制政策，干擾現有制度，以損資產階級威信 (Marx and Engels 1998: 394-5)。雖然「德國工人不

經過較長時間的革命發展的整個過程，就不能掌握統治權和實現自己的階級利益」，但

為了要達到自己的最終勝利，首先還必須靠他們〔德國工人〕自己努力：他們應該認清自己的階級利益，儘快採取自己獨立政黨的立場，一時一刻也不能因為聽信民主派小資產者的花言巧語而動搖對無產階級政黨的獨立組織的信念。他們的戰鬥口號應該是：不斷革命 (*ibid.*: 396)。

綜合下面段落，不斷革命指的是無產階級的三項行動：第一，盡可能地獨立，成立並堅定無產階級的「獨立政黨」；第二，延續資產階級為了「民主成果」而結束的革命，直到無產階級完成自身的任務，即消滅私有制；第三，在單一國家奪取政權還不夠，革命必須國際聯合，無產階級必須跨國合作，最終掌握生產力：

民主派小資產者只不過希望實現了上述要求便趕快結束革命，而我們的利益和我們的任務卻是要**不間斷地進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產階級的統治全都消滅，直到無產階級奪得國家政權，**直到無產者的聯合不僅在一個國家內**，而且在世界一切舉足輕重的國家內都發展到使這些國家的無產者之間的競爭停止，至少是發展到使那些有決定意義的生產力集中到了無產者手中。對我們說來，問題不在於改變私有制，而在於消滅私有制，不在於掩蓋階級對立，而在於消滅階級，不在於改良現存社會，而在於建立新社會。  
(*ibid.*: 389 粗體為筆者所加)

由此可見，「不斷革命」的意思是「不間斷地進行革命」，把資產階級曾經提出但因自身太過脆弱而無力實行的主張交由無產階級承擔，傳承過往的革命，最終跨越國家藩籬，直到消滅資產階級不敢觸碰的私有制。

從後面之明來看，這確實是托洛茨基「不斷革命」的前身。更有趣的是，在階級合作的問題上，馬克思 (Marx 1956-83c: 48) 還去信恩格斯表示：「德國的全部問題將取決於是否有可能由某種再版的農民戰爭來支持無產階級革命。」如果資產階級已經倒向封建地主，盡力維持獨立的無產階級又怎麼能不和同樣受到壓



迫的農民合作呢？顯然，馬克思初步考慮了農民與當時革命的關係，並且表示無產階級應該受到農民「支持」。這似乎意味著兩個階級的合作和革命（乃至未來的「專政」）不能平起平坐，而是要「由無產階級領導」。我們現在知道，「工農革命民主專政」或「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民主專政」是托洛茨基和列寧在階級合作上的爭論重點。

無論如何，「不間斷地進行革命」可能引起的相關問題在當時並未被積極討論，或至少像 20 世紀俄國革命前夕那樣激起廣泛的辯論，好比如何區別與銜接「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這些革命與資本主義的關係又是什麼？德國革命是否能「跳躍」以往英法革命的進程？馬恩兩人沒有明確答案，不斷革命比較像共產黨人終極目標的一般陳述，並未闖進歷史唯物論的層次，將其打亂或校正，因此也無法再從歷史唯物論出發，回頭來更細緻地關照這種革命理論的細節。

當三十出頭歲的馬克思 (Marx 1995b: 134) 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說「十九世紀的社會革命不能從過去，而只能從未來汲取自己的詩情」時，意味著過往革命進程的中止和新革命的展開，晚年恩格斯 (Engels 1956-83a: 594) 則承認：「當二月革命爆發時，我們大家關於革命運動的條件和進程的觀念都受過去歷史經驗，特別是法國經驗的影響。」一邊思索著未來，一邊受過去束縛；過去的束縛很清楚，但未來的道路卻很模糊。<sup>46</sup>

當未來到來時，結果卻讓人摸不著頭緒：在無產階級還「來不及」批評並爭取資產階級的民主時，資產階級民主在 19 世紀下半葉竟由最守舊的敵人實現了：

---

<sup>46</sup> 恩格斯 (Engels 1956-83a: 597-8) 回憶時，否定了當時革命成功的可能：「我們以及所有和我們有同樣想法的人，都是不對的。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剷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程度；歷史用經濟革命證明了這一點，這個經濟革命自 1848 年起席卷了整個歐洲大陸，在法國、奧地利、匈牙利、波蘭以及最近在俄國初次真正確立了大工業，並且把德國變成了一個真正第一流的工業國……兩大階級之間的鬥爭現在已遍佈全歐洲，並且達到了在 1848 年還難以想像的猛烈程度。……既然連這支強大的無產階級軍隊也還沒有達到目的，既然它沒有能夠以一次決定性的打擊取得勝利，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進，在嚴酷頑強的鬥爭中奪取一個一個的陣地，那麼這就徹底證明了，在 1848 年要以一次簡單的突然襲擊來達到社會改造，是多麼不可能的事情。」

1848 年的革命，和它以前的許多次革命一樣，有著奇特的同路人和繼承人。正是那些把這次革命鎮壓下去的人，如卡爾·馬克思常說的，變成了它的遺囑執行人。路易拿破崙不得不建立獨立而統一的義大利，俾斯麥不得不在德國實行根本的改革，不得不恢復匈牙利的獨立，而英國的工廠主們不得不使人民憲章生效 (Engels 1956-83b: 227)。

此外，沙俄也在 1861 年廢除農奴制，列寧 (Lenin 1984-90b: 174) 後來說：「頭號地主亞歷山大二世不得不承認，與其等待從下面來推翻，不如從上面來解放。」這是一個「由封建地主執行的資產階級改革」。

回望 19 世紀下半葉，馬克思和恩格斯面對的「資產階級與其敵人妥協」而「敵人又完成了資產階級任務」的歷史事實該怎麼理解？資產階級革命的時代是否早就在 17、18 世紀的英法兩國終結了，畢竟只有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才能稱得上是「資產階級革命」，而德國資產階級卻畏畏縮縮的？還是說，俾斯麥和亞歷山大二世因為執行了資產階級的「遺囑」，其改革也可算是「資產階級的」，所以他們也帶來了「資產階級革命」？這樣的話，英法革命又在什麼意義上還可以稱作「資產階級革命」呢？

### 第三節 資產階級革命爭議

馬克思和恩格斯固然否定德國資產階級的革命能力，不過並未挑戰「資產階級革命」的概念及其在歷史上的代表性事件：17 世紀中的英國革命和 18 世紀末的法國革命。馬克思以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解釋歷來政治權力的轉移，而這樣的革命不只是主觀行動的集合與勝利，更反映了客觀生產關係轉型的過程，英法資產階級革命因此是「資產階級所有制對封建所有制的勝利」。

這種「由下至上」解釋的途徑受後世推崇，如法國社會主義者 Jean Jaurès、受其影響的馬克思主義史家 Albert Mathiez，以及後來稱這個途徑為「古典社會詮釋」(classic social interpretation) 的 Albert Soboul (1979)。以此進行研究的 Georges Lefebvre 也認為，法國革命「只是給資產階級成為世界之主的長期經濟與社會演化加冕。」(Callinicos 1989: 3)

跟英國革命比起來，法國革命及其古典社會詮釋更是 20 世紀以來（親）馬克思主義者評析和解釋長時段歷史社會現象的指標。不過，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時代開始，德國革命就「偏離」了這個指標，在日後有關現代革命一次又一次的觀察與解釋中，對資產階級革命的典範日漸從遵循轉為挑戰，偏離指標的情況多到讓人認為有問題的不是這些革命或採取行動的階級，而是指標本身。「資產階級革命」反而成為有爭議的用語了。

下文先呈現研究者們對資產階級革命的重視。這種重視主要表現為「期待的落空」：正因資產階級革命的缺席或「流產」（Blackbourn and Eley 1984: 59），政治或國家的現代化程度才會這麼低落；因此，資產階級革命是存在的，其效果也是重大的，只是沒有發生在研究者關注的國家。這種「期待的落空」被用在 20 世紀前後的德義兩國是合理的，可是當它被用在作為指標本身的英法兩國，恐怕期待就只能轉為懷疑，一旦資產階級革命在英國和法國的存在也成問題，指標或典範的確立就是刻舟求劍了。我們還能為資本主義的出現拋下一塊定錨嗎？

#### 一、「資產階級革命」典範：從遵循到挑戰

1960 年代，德國史學界備受矚目的「Fischer 爭議」（Fischer controversy）（Mombauer 2013），可說圍繞著德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缺席而展開。這場辯論起先聚焦在一戰時的德國國家性質。根據 Kocka (1988: 3) 的說法，當時「德國『君主立憲』的非議會特質被看作一種資產，而非負債。人們對於一個有強烈國家主義傳統、有力又有效的公共服務、由上至下改革的長期歷史而非革命、自由放任和政黨政府感到驕傲。」在這種不同於西歐的「獨特道路」（*Sonderweg*）觀點下，德國一戰時表現出來的併吞主義和侵略性，被視為對各方面遭受西歐文化入侵的「防禦」。

與此相反，Fritz Fischer (1967: 3) 認為「德國人是唯一沒有訴諸民主力量來反抗舊統治團體，藉此自下（from below）創造他們國家的民族，反而對於統治集團竭力防範民主以便將國家置於股掌間『感恩地接受了』。」因此，恰恰是走上這種獨特道路，德國才在一開始就有意併吞歐洲國家，一次大戰既非偶然，德國的行動也非被動。此外，Wehler (1970: 154) 表示：「若要探索與德國工業史解放過程對立的社會帝國主義——你將能追溯出一條線，把俾斯麥、米顧爾……一直到國家社會主義各類變體的極端社會帝國主義連起來。」這些前工業化時代的

政治菁英固守著傳統社會，使德國 19 世紀的工業化相當片面，其影響僅止於經濟而不到政治，這才有了當時在一片民族國家的歐洲中竟出現德意志「帝國」(Kaiserreich) 這種獨特體制的情況。Barkin (1973: 29) 也說：「德國現代化沒有經歷成功的社會或政治革命。……容克寡頭在民族上仍然非常有權力，且在普魯士鄉村的地方政治上幾近萬能。1848 年和 1862 年想透過商業和專業階級將其權力移除的嘗試都失敗了。」總之，德國沒有像它的西歐鄰居一樣經過資產階級革命，最終付出了慘痛代價。

在義大利方面，葛蘭西的評論也是代表。他認為，因為義大利的分裂及其自由資產階級的軟弱，沒有能力和農民形成同盟、進行農業改革，「復興運動」(Risorgimento) 才會失敗，以至於這場運動只能作為「消極革命」(passive revolution)<sup>47</sup>，成為溫和自由派與封建秩序妥協的標誌。資產階級空下來的這個座位，後來留給了法西斯主義。當葛蘭西提到義大利資產階級的軟弱時，心裡想的是法國資產階級的壯大：「很清楚，要有效反對溫和派，行動黨就該和農村、特別是南方群眾連起來，成為『雅各賓』(Jacobin)。」不過葛蘭西認為，行動黨終究不是雅各賓 (Gramsci 1971: 79-82)，作為一個革命民主政黨，在義大利統一過程中，它無法形成資產階級的「領導權」(hegemony)<sup>48</sup>。就像 Perry Anderson 所言，葛蘭西是第一位從資產階級革命及其偏離 (案例) 來分析自身所處民族國家的歐洲馬克思主義者。<sup>49</sup>

---

<sup>47</sup> 這個概念是葛蘭西在評價法西斯主義時提出的，指的是這種意識型態：「透過國家在立法上的干預與統合式組織的手段，一國以強調『生產計劃』為由，對經濟結構做相對廣泛的調整；換句話說，生產領域的社會化和合作將在不影響到……個人或團體對利益的取用下增加。」(Gramsci 1971: 120) 他認為，這個行動由當時的統治階級來領導，使義大利能與其他生產力高度發展的國家競爭。然而，這往往成為統治階級鞏固其領導權和各種壓迫手段的工具；換句話說，雖然統治階級如此宣稱，但並不是真的將發展生產力當作目的，而是出於國際競爭考量。

<sup>48</sup> 除了參考《獄中筆記》有關行動黨的評價，葛蘭西在這裡的論證可見 Ginsborg (1979) 的梳理。

<sup>49</sup> 我不敢貿然踏入葛蘭西的豐富理論，可是應該注意「消極革命」(見註 47) 的概念能夠與「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架構契合 (Hesketh 2017)。不只如此，葛蘭西 (Gramsci 2011: 180) 的如下說法完全與「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精神相通，值得特別徵引：

必須記住，國際關係會與民族國家的內部關係糾結在一起，然後創造出獨特的在歷史上具體的綜合 (combination)。在高度發展的國家中誕生的意識形態可以在較不發展的國家中散播，並對本地交互作用的多重綜合 (combinations) 產生影響 (例如，宗教一直是這種國內—國際和意識形態—政治綜合的根源。此外，其他的國際形構 (international formations) 還

至於 Anderson 自己在 1960 年代影響甚鉅的一些篇章，就是指出英國經歷了一場早熟的、模糊的「資產階級革命」，資本主義發展因而有著不同於法國的獨特形式。為了剖析英國的「當前危機」(Anderson 1964)——即工人運動在政治上的相對貧弱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相對落後——有必要回到歷史，從結構性觀點（而非英國向來流行的經驗主義和上一代馬克思主義者總是抱持的人道主義）反思資本主義在英國出現的狀況和階級關係的演變。一方面，英國農業資本主義的早熟使貴族即早投入商業活動，而資產階級必須依附貴族；另一方面，無產階級也因此缺乏（誕生於 19 世紀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刺激，深陷統治階級的經驗主義和傳統主義泥淖 (*ibid.*: 39-40)。結果就是在這個首先經歷工業革命的國度，貴族和資產階級聯手對外反對法國革命，對內鎮壓工人，在帝國主義下，無產階級雖力圖反抗卻孤立無援，力量僅止於社會行動與身分的認同，無法上升到上層建築，形成並爭取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領導權及相關意識，最終不能為整個社會設定發展目標，有力地加以推動 (*ibid.*: 41-2)。

這個結構性的歷史反思顯示，雖然英國是資本主義先行者，德國（如前文所示）是後進者，但它們都面臨貴族掌權並「融合新與舊」的特殊處境。Anderson 的分析深受 Gramsci 對義大利歷史的看法影響，就資產階級取得政權而言，

這個過程在法國發展最豐富，而且帶有活躍和積極的政治元素。在德國，這個過程的演進方式在某些方面與發生在義大利的情況類似，在其他方面則與發生在英國的情況類似……在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在法國發生之前發生，我們有著和德國一樣在新舊之間融合的現象——儘管英國「雅各賓」，即克倫威爾的「圓顛黨」(roundheads)，也有著極端的能量。老貴族仍然是治理基

---

包括像是『知識團體』[intellectuals]……)。國際和國內力量的這種關係還被以下事實複雜化了，也就是在一國之內通常有許多結構不同的、在所有層次上力量關係都是分歧的民族疆界區域 (national territorial sectors)……。

葛蘭西花了许多心力討論國家的能動性，我們不妨將國家的能動性視為國際「不平衡發展」和國內「綜合發展」的中介，相當於普魯士和俄國「由上至下革命」的施作者。當然，葛蘭西面對的義大利（1919-20 年革命的挫敗，他自己身陷囚籠、為病痛所苦）不同於托洛茨基面對的俄國（十月革命前的有利形勢，革命領袖們殷切期盼著國際革命的援助），也因為這樣，他對國家能動性的討論更加豐富，在這個意義上，確實如 Burawoy (2009: 193) 所言：「托洛茨基視野的中止處，正是葛蘭西視野的起始點。」

盤 (governing stratum)，具有某些特權，而它也成為英國資產階級的知識基盤 (補充一下，英國貴族有著開放的結構，持續以獲自知識份子和資產階級的元素自我更新) (Gramsci 1971: 82-3 cf. Elliott 1998: 13-4)。<sup>50</sup>

所謂的「Nairn-Anderson 命題」(Nairn-Anderson theses) 固然有許多政治意涵和行動上的指引 (Elliott 1998: 19-20)，不過其歷史核心可以這麼概括：「英國產生了主要歐洲國家中最被調和、也最不純粹的資產階級革命。」對 Anderson 來說，英國內戰和光榮革命只是「資產階級革命」的「替代物」(proxy)，因為衝突並不是發生在資本家和封建地主兩個階級之間，而是後者中的不同部份，以

---

<sup>50</sup> 簡單交代一下英國內戰前後的政治脈絡。1603 年伊莉莎白一世過世後，因為沒有子嗣，故由蘇格蘭國王詹姆士一世繼位，開啟斯圖亞特王朝。堅信君權神授的他屢次與下議院衝突，在位期間任用寵臣 George Villiers，荷蘭海外力量則不斷攀升。同樣堅信君權神授的查理一世 1625 年繼位，1628 年議會通過權利請願書，次年查理一世解散議會，整整 11 年不再召開。為了對付蘇格蘭的起義和籌措經費，1640 年 4 月再度召開，但下議院新興貴族們強烈抵制相關稅收，於是 5 月又解散議會，史稱「短議會」(short parliament)。

隨著蘇格蘭起義越來越激烈，查理一世只好於 11 月再召開議會，這一次議會持續到 1653 年，史稱「長議會」(long parliament)，英國內戰 (1642-51) 正是在這個時期爆發。在君主與議會的對峙過程中，圓顛黨和騎士黨分別代表議會派和保皇派。長議會召開後，George Villiers 遭處死，星室法庭被廢除，一開始查理一世主動進攻議會，議會並未主張廢除君王，而是希望在節制其權力的前提下令其復位。1648 年新模範軍封鎖議會，形成殘缺議會 (rump parliament)，克倫威爾和圓顛黨決定處決君王，查理一世在 1649 年 1 月被公開送上斷頭台。

1660 年復辟時，查理二世已經大致接受議會對君權的限制，幾次英荷戰爭主要發生在其治下，英國海外勢力此時也開始擴張，漸漸取代荷蘭。查理二世晚年嘗試走向絕對主義，由於無合法子嗣，議會試圖阻止其弟詹姆士二世繼位。詹姆士二世 1685 年繼位沒多久就發生光榮革命，此即新興貴族擔憂絕對主義和天主教力量回返所做的努力，英國與荷蘭成為共主邦聯。君主立憲此後相當穩定。內戰的編年史式介紹可參考 Seel (2005)。

一般來說，英國內戰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解釋，代表者如 Hill (1966, 1980)，仍捍衛英國內戰的資產階級革命性質，並且至少會從都鐸時代鄉紳和貴族商人的崛起等長期社會經濟關係，來確立內戰的原因和劃時代意義。修正派比較著重短期分析和議會材料的研究，力圖證明內戰與過去歷史的延續以及君王與議會衝突的偶然性 (Russell 1990)。內戰的著作也與都鐸絕對主義 (的迷思) 和議會 (在多大程度上) 制衡君主的憲政傳統問題有關。晚近對英國內戰和斯圖亞特王朝史學修正派觀點的整理與評價可見 Keyon (1992) 和 Tim (2015)。出版時引起極大爭議的 Stone (1996) 似乎提供了一種比較混合或中道的觀點，既非馬克思主義也非修正派。他認為宗教問題比社會經濟問題更重要，而鄉紳直到最後一刻都設法保持中立 (Stone 1996: 161)，儘管 Stone 也詳細探詢了內戰的遠因。他在書中花了一些篇幅探討何謂解釋及革命理論，顯然史學實踐者不可能離開這些根本問題。

至於既有的「整個社會結構幾乎原封不動，土地貴族仍然統治英國」，這種情況已經成為「現代英國歷史的基本環節」(Anderson 1964: 28-30)。長遠來看，1960年代英國工人運動的危機即根源於此，而我們「必須重拾 1640 年和 1832 年未竟事業所遺漏的東西」(ibid.: 47)——只有完成資產階級革命，英國才能現代化，而這就有賴現今的資產階級：不是社會民主黨，而是自由主義資產階級。

我們看到，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筆下，與法國革命並列為資產階級革命兩大代表的英國革命，對 Anderson 來說，已經不足以作為資產階級革命的範例。如此一來，昔日的指標只剩法國了。不過也正是在這裡，資產階級革命的概念遭遇了最重大的挑戰。這些挑戰針對法國革命史的若干階段、若干重要主題而來，彼此構成一個整體，被稱作法國革命史學的「修正主義」(revisionism)。在此僅簡述修正主義的兩大特點。<sup>51</sup>

第一，即便繼續根據社會階級的力量來詮釋，在修正主義者看來，資產階級也不再被認為是歷史進程的主要動因。簡言之，法國革命前夕，資產階級和地主的利益界線並不清楚，前者一方面積極買官受爵，試圖獲得跟地主一樣的政治特權；另一方面，又試圖把現代技術應用到農業，以便榨取農民的剩餘勞動，獲得跟地主一樣的經濟收入，因此遭激烈抵抗。換句話說，資產階級和地主共同進行「封建反動」(feudal reaction)。不僅如此，分析革命議會成員的社會階級，則多半是官員、律師和其他專業人士等 (Cobban 1970: 100-2, 1999: 67)，並不是向來代表資產階級的工廠主或商人。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在很重要的程度上，是反對而非支持資本主義的興起力量」(Cobban 1999: 168)。

第二，從第一點可以看到，如果革命是存在的（不管是否支持資本主義）而社會階級的利益又差異不大，那麼說明革命爆發比較可行的途徑，似乎應該從社會詮釋轉往政治或意識形態詮釋。Francois Furet 和 Denis Richet 就是這麼做的 (Callinicos 1989)。他們不否認資產階級革命，甚至還認為這場革命在 1789 年到 1791 年間並沒有和守舊勢力妥協。然而，在說明革命從攻陷巴士底監獄（1789 年 7 月 14 日）開始，到恐怖時期 (the Terror，從 1793 年 9 月初到 1794 年 7 月

---

<sup>51</sup> 這個龐大的領域實在難以在有限篇幅內深入討論，下文主要參考 Callinicos (1989) 非常有幫助的整理，輔以部分原典的徵引和相關事件的說明。在法國革命兩百年時，研究者們有相當熱烈的討論，Callinicos 該文亦寫於此。有關法國革命幾個重要主題的不同詮釋方式，可見 Kafker, Laux and Levy (2002) 編輯的集子。

底)，再到熱月政變（Thermidor，1794年7月27日），以及最後拿破崙的軍事政變這一連串史家們爭論已久的「脫軌」（*dérage*）<sup>52</sup>時，他們卻訴諸意識形態和政治力量的開展，也就是刺激群眾不斷奮起暴動的直接民主思想，以及各種啟蒙精神，而這些力量甚至是與社會結構脫節的。他們認為「雅各賓和恐怖統治的意識形態，是作為一個自主領域獨立於政治和軍事情境運作的。」1791年之後的激進化，未必出自階級利益或反革命勢力之威脅，而是意識形態的作用。

修正主義史家多半屬於自由派，在法國革命史學的詮釋上，與馬克思主義的主流傳統有所扞格或許並不令人意外。然而，馬克思主義史家也有受到修正主義影響者，其代表非加拿大馬克思主義史家 George Comninel 莫屬，他甚至走得比自由派更遠：直接否認整個革命的存在。

「法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詮釋長期以來宣稱的歷史有效性已經被推翻了。」（Comninel 1987: 3）和修正主義一樣，他認為「法國革命是在直接觸及剩餘榨取關係的基礎政治關係上的階級內部衝突（*intra-class conflict*）。它是統治階級內部

---

<sup>52</sup> 恐怖時期發生在吉倫特派（Gironde）和雅各賓派的激烈鬥爭之後，面對持續內戰和第一次反法同盟的威脅，國內風聲鶴唳，雅各賓派最終取得政權並走向恐怖統治。在1791至92年的國民立法會議期間，吉倫特算是激進的力量。他們曾主張召開國民公會暫停王權，但在遭到路易十六否決後，竟撤回推翻王權的訴求；1792年9月共和國建立之後，他們更積極反對革命。1793年1月，路易十六被送上斷頭台，全歐震動；同年10月，皇后瑪麗安托萬也死於斷頭台上。恐怖時期許多吉倫特派都有同樣下場，丹敦、羅蘭夫人和化學家拉瓦錫亦然。這些活動由1793年4月組成的公共安全委員會執行，國民公會授權，往往在未經詳細審判的情況下執行。

不過，恐怖統治也被認為是為了回應革命至今人民尚未滿足的需求而出現的。尤其是在6月，無套褲黨針對取消其選舉權和麵包最低限價等政策表達了強烈不滿，支持埃貝爾（Jacques Hébert）並要求進行政治清洗，雅各賓派隨後取得公安委員會主導權，實行獨裁。然而，不到一年的時間，恐怖統治的領導人羅伯斯比和聖如斯特等也在國民公會通過後遭到處決。雅各賓派的潰敗與恐怖統治期間幾位革命領導人不斷遭到刺殺（如馬拉）和處決（如與羅伯斯比發生衝突的埃貝爾），最終喪失抵禦保守勢力的根基有很大關係。在反對雅各賓專政的熱月政權主導下，先前的革命力量在白色恐怖時遭到更徹底的剷除，保皇派言論此時已經被允許公開了。托洛茨基（1972a）在《被背叛的革命》中就將史達林政權的崛起比喻為「蘇維埃的熱月」。

按照比較典型的馬克思主義解釋（Soboul 2015），「脫軌」可以理解為城市資產階級（由無產者和廣大農民在背後推動）和封建地主階級之間的身肉搏戰，政治動態和形勢在其中必然來得快，去得也快；用台灣時下流行的話來說，種種「風向」快到令人摸不著頭緒，「帶風向」的人或派系完全可能在下一回的鬥爭中被掩沒在新的風向裡。無論如何，革命力量在熱月政權的剷除造成日後再也沒有足夠力量抵禦保守勢力回籠。不過，1799年霧月政變後回籠的勢力也已經不是昔日的封建地主階級，而是下達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政策的軍事強人，資產階級革命終究還是給法國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對剩餘榨取這個基本要務的內戰 (civil war)。」(ibid.: 200) 在「內戰」爆發前的資產階級 (bourgeoisie) 並不是一個資本主義階級 (capitalist class)，也就是一群有著相同利益並以追求資本主義 (capitalism) 為目標的社會行動者。不只如此，「內戰」後的法國社會也仍然以「外於經濟的強制」手段為榨取剩餘的方式，因此並不是資本主義社會。法國要到第三共和時期 (1871-1940)，一個真正屬於資產階級或資本家的資本主義社會才確立下來 (ibid.: 180-205)。

儘管和修正主義的意見類似，Comninel 的分析卻有一個比較特別而且對馬克思主義來說可能更致命的地方。必須注意，受到自由主義影響的修正主義者在批評馬克思主義的詮釋時，除了提出史家重視（而馬克思主義者似乎有意忽略）的歷史事實作為經驗性的證明外，還順道針對了「一般社會理論」與歷史研究的關係發表異議 (Cobban 1999: 12-4)，本文第一章提過歷史哲學的相關反思。一言以蔽之，對修正主義者來說，馬克思主義「以論代史」或「以理限事」的做法基本上是不可取的。這確然是一個重要問題，可是跟這種批評比起來，Comninel 的版本更嚴重，因為他不只沒有排斥「一般社會理論」，而且還基於一套特殊的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來否定法國革命（「內戰」）。這就是第二章提到的特別強調封建主義生產關係下「外於經濟的強制」手段的途徑。

這種途徑現在被稱作「政治馬克思主義」，下文還會遇到，這邊只討論它的邏輯。首先，它強調生產關係（或社會財產關係）。在這個意義上可以稱作馬克思主義。可是它忽略了交換關係，特別是商品交換的作用。在封建主義的生產活動集中在農村的情況下，農村就成了理論和歷史的主要（甚至是唯一）對象，城市的貿易活動被忽略。其次，特別看重階級鬥爭。不過就像本文第二章「交換關係」和「統治關係」所示，農村剩餘勞動的榨取在此被設定為「單向」的，只有強制性，「雙向」的地租繳納和保護及其中的互惠性不被承認，這也與交換關係的忽略有關。如此一來，剝削、反抗和階級鬥爭就成了純粹的政治行動，若再視之為生產關係改變的原因，後者就被吸納進前者，生產關係的經濟性付之闕如，「基礎」的效力大打折扣。作為歷史唯物論的硬核，建築隱喻只能適用於資本主義，沒有普世性。

Comninel (ibid.: 104 粗體為筆者所加) 自己是這麼說的：「雖然馬克思主義者……為歷史做過重大貢獻，但歷史過程及其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動態，至今未被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實踐所掌握。」憑著上述邏輯，Comninel 的推論方式

其實很簡單：因為在封建法國共同剝削農民，資產階級與地主根本上屬於同一階級，並不是「資本主義」階級，他們對地主若有反抗，自然也不能稱作（通向、追求或確立資本主義的）革命，除非農民這群深受剝削的封建底層階級起身推翻生產關係。至於城市商人，由於基本上不參與生產，其作用力可以不提。關於資產階級與革命的性質，類似看法亦可見於其他政治馬克思主義者。例如與英國革命相比，Teschke (2005: 12) 就認為：「英國革命不是資產階級的 (bourgeois)，卻是資本主義的 (capitalist)，法國革命是資產階級的，卻不是資本主義的。」

上述批評可以分為行動者和結構兩個方面：在行動者方面，革命的發起者要麼不是資產階級，頂多是小資產階級，如律師之類的專業人士，要麼是不進行資本主義革命的資本階級；在結構方面，所謂的資產階級其實和封建地主共處同一社會關係，有著相同利益，如試圖買官、受封、剝削農民，屬於同一階級（只不過是不同群體），革命最終是統治階級內部的競爭。作為資產階級革命的代表，同時也是解釋其他社會發展的指標，法國革命遭到猛烈批評，連帶重挫了「資產階級革命」，甚至是整個歷史唯物論的有效性。

## 二、捍衛「資產階級革命」：後果主義的觀點

如果資產階級革命不能作為評價後進國家現代化的指標，「期待」本身就是錯誤的，「期待的落空」就是必然的，那麼批評者在批評時是否也對這個術語注入了某些「期待」？顯然，他們覺得這個概念之所以不可靠，是因為按照字面來理解，「資產階級」應該同時是「資本主義」的，而他們的批評之所以看起來有效，又是因為被他們批評的研究者也認為兩者應該等同，而他們證明了兩者事實上並不同。

問題是，「資產階級革命」這個術語能夠按照字面來理解嗎？如果它一開始就要求其他的理解方式，甚至必須「搭配」其他概念來理解呢？這邊我們再次面臨歷史哲學中命題和事實拉鋸的問題：究竟是事實駁倒了「資產階級革命」這個命題，因此後者並不「符應」前者，還是這個命題可以擴充，與其他概念進一步「融貫」之後「符應」事實？對嚴肅的馬克思主義來說，這又是一場政治兼科學的保衛戰了。那麼他們怎麼回應呢？大概有三種方式。

第一，與其說是捍衛這個概念，不如說默認其定義的寬鬆性。針對英、法、德等國的歷史比較，Poulantzas (1973: 183) 認為，我們本來就找不到一個「資產階級革命的示範性模型」，頂多「可以注意一個很明顯的共通細節：資產階級缺乏潛在能力在公開行動中執行屬於自己的革命。……這是在諸多資產階級革命的非典型特色後面的根本因素。」這種說法並沒有解決問題。如果「非典型」的案例多過指標本身，我們就很難定義資產階級，而所謂的定義，通常只能就其典型而論。這種回答與 E. P. Thompson (1978: 247) 對 Anderson 的回應一樣：「每個歷史在某些意義上都是獨一無二的。」可是，歷史**經驗**固然獨一無二，歷史**理論**卻不能建立在獨一無二的經驗上，而是必須嚴謹地以一般性收攏紛雜的經驗。這種放寬定義的方式其實犧牲了概念本身的科學性。

與此相反，第二種方式把革命放回社會經濟轉型的宏觀過程，卻也因此有化約主義之嫌。Mooers (1991: 3, 4) 指出，「說資產階級革命的模式不只一種或許是更精確的」，這是西歐過渡到資本主義的整體歷史過程使然。就像 Lukács (1971: 282) 表示的：「真正的革命因素是封建到資本主義生產系統的經濟轉型，因此在理論上，這個過程的發生……有可能無須革命資產階級帶起政治暴動。」Stedman Jones (1977: 86) 也有類似看法：「資產階級的勝利應該被看作財產關係特殊形式和控制生產工具的特殊形式，在全球層面上的勝出，而非一個世界觀清楚和一致的階級主體有意識地得勝。」Blackbourn (1984: 175 粗體為筆者所加) 在討論德國特殊性的問題時，更精確地表述如下：

如果我們要保留這個用語〔即資產階級革命〕，以不同方式應用它（不限於德國案例）會更有意義。我們應把注意力放在長期過程而非短期事件、靜默的經濟和社會變化而非戲劇性的政治插曲、**行動的後果（effects of actions）而非行動者意圖（intentions of actors）**。至少在本世紀以前，……藉由非英雄式地征服權力，在歐洲諸國中，資產階級已經極富特色地成了統治階級。其力道與權力根源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並在支配市民社會時架構起來。正是這些，而非特定的國家形式，才應得到資產階級革命這個標誌。……

但是，這樣一來，我們就無法說明在什麼意義上還需要政治行動、暴動和最終的革命，更無法解釋資本主義在歐洲的擴張在政治上採取民族國家的形式。雖然如

此，Blackbourn 對「行動後果」和「行動者意圖」的區分卻很重要，而「社會經濟變化的長期過程」固然根本，他也沒有否定行動者對此有一定的影響力。這就把我們帶到第三種捍衛「資產階級革命」的有力觀點。

就像下一節會看到的托洛茨基一樣，在《未完成的革命》（*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中把，Isaac Deutscher 曾把俄國十月革命視為資產階級革命和無階級革命的合一，並指出 Christopher Hill 和 Hugh Trevor-Roper 對克倫威爾的革命是否為資產階級革命的爭論太過概要（schematic）、在歷史上並不現實，會讓資產階級革命顯得像個迷思、在西方似乎不曾出現過一樣（Deutscher 1967: 21）。

的確，他說：「在清教徒的領袖中，鐵殼號（Ironside）的司令官中，在雅各賓俱樂部中，席捲巴士底監獄和入侵杜勒麗宮的首領中，資本主義企業家、商人和銀行家一點也不顯眼。不管在英國還是法國，在革命期間或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內，他們並未執掌權柄。較低階的中產階級、城市窮人、庶民大眾、無套褲漢（sans-culotte）組成龐大的暴動軍團。在英國，領袖多半是『鄉紳農民』；在法國，領袖多半是律師、醫生、記者和其他知識份子。暴動最後終於軍事專政，也隨處可見。」然而，

只要我們以更廣泛的標準接近他們，觀察他們對社會造成的一般衝擊，革命的資產階級特質一點也不會憑空消失。他們最實質也最持久的成就，就是掃除有礙資產階級財產及其相應社會關係之增長的社會與政治制度。當清教徒否定國王武斷徵稅的權力，當克倫威爾為船主們保障英國對其他國家貿易時的壟斷位置，當雅各賓黨人革除了封建恩惠和特權，他們通常默默地創造了一些條件，得以讓手工業者、商人和銀行家從中獲取經濟優勢，最後甚至是社會與政治上的高位。資產階級革命創造了資產階級財產滋長的條件。正是這點，而非鬥爭中的特殊結盟，才是資產階級革命的根本不同處（*ibid.*: 21-2）。

同樣的，Callinicos (1989) 也說：「資產階級革命必須被理解成促進資本主義的革命，而不是由資本家有意識製造的革命。重點要從製造資產階級革命的階級轉往這個革命的後果——轉往從中獲利的階級。」他更強調：「資產階級革命是一種

政治轉型——國家權力的變化是大規模資本積累的前提和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的建置。」

這種觀點的要旨在於，把革命行動放入更宏觀的生產關係（資本主義）轉型中，即第一節所提到作為「階級的勝利」基礎的「（新）社會制度勝利」。既然是「轉型」，就代表特定生產關係尚未發展完成，還侷限於社會的「局部」地區，如農村或城市，並且只反映在社會的「局部」制度，如市場而非國家。這種發展過程又可進一步分為初始時期和擴張時期。

因此我們可以說，資本主義的初生或起源只發生在某些地區和制度，只要資本主義尚未健全，就要接受資本主義與非資本主義共存的狀態，資本主義的障礙就有被「掃除」的必要，因為部份行動者的利益必然因為既有制度的留存受到損害。當損害程度日益高漲，不滿到了一定程度，尚未被資本主義化的制度——如代表統治關係的國家——就不得不面臨確立自身性質的時刻，在作為資本主義繼續發展的條件和障礙之間抉擇。

因為上述過程的存在，革命行動者及其意識才有安插進來的必要和空位。資本主義與非資本主義共存的情況，使政治行動者面臨了複雜的歷史情境。不管是否認識到生產關係正在改變、改變會如何影響社會，政治行動者必然會關注自身最迫切的利益，採取相關行動。問題是，在統治關係上捍衛自身利益的意圖，是否會與移除或確立某種生產關係連結起來？就算連結起來，誠如第二章所說，這樣的「階級理性」能夠進一步與「人類理性」連結起來嗎？這是政治行動者自己都很難確認的，他們完全可能不支持有助自身利益的制度，或者反而支持有損自身利益的制度而不自知。

面對這些不確定，我們唯一知道的是：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出現，並且正在擴張——亦即能夠再生產——時，**無論政治行動者的意圖及結果為何，只有能夠促成資本主義發展的才會留下來。**<sup>53</sup> Deutscher 和 Callinicos 的意思是：資產階級革命作為一種具有「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最後要正向地影響資本主義發展。Davidson (2012: 428) 把這種看法稱作「後果主義」(consequentialism)，不

---

<sup>53</sup> 注意這種論證方式與 Cohen 捍衛發展命題（見本文第七章第二節）方式的異同：它們同樣都是後果主義，可是 Cohen 並沒有像 Brenner 標舉階級鬥爭為機制（雖然他也提出了幾個可供參考的機制），反而流於功能論。在資產階級革命的問題上，這個機制很明顯（即階級鬥爭和革命本身），因此以「資本主義之確立」為後果並無功能論的疑慮。

只不否定行動者的意圖和身分，更肯定行動過程與結果的多樣性和複雜性；這種捍衛資產階級革命的方式，包容了歷史事實的豐富性和偶然性（前述第一種捍衛方式），也重視資本主義發展的總體過程（第二種捍衛方式）。

### 三、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

此外，後果主義觀點也表述了「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的關係。Draper (1978: 18-20) 整理出馬克思對這兩者的區分。所謂的政治革命，是在特定社會系統及其統治階級設下的邊界內所發生的政權轉移。當然，這既不排除轉移過程帶來的社會影響，更不否定該過程受到社會影響的事實，只要這些影響仍發生在邊界內。

政治革命是很常見的現象，通常與既有社會體系和統治階級的改變無關。一旦影響超越了邊界，就意味著社會革命的爆發。這時，政治革命就是社會危機爆發的場所，政權將轉移到另一階級，最終導致社會體系的轉變。在這個意義下，一方面社會革命最終要涉及政治革命，在其中達到高點；另一方面政治革命固然具有轉變社會系統、更替統治階級的決定性力量，卻不可能脫離社會體系長期累積下來的矛盾，政治革命因而成為社會革命的一個環節。

因此，資產階級革命首先是一種政治革命，只不過它又是社會革命的標誌性事件。由此看來，修正主義對這個概念的駁斥，其實就是將革命限制在政治革命並且既不承認它對社會革命的影響，也不承認它出自社會革命。

同樣重要的是，雖然資產階級革命可以不由資產階級自己來執行，如透過律師、醫生或封建地主之手，但並不排除資產階級自己執行的可能，只不過這是萬般可能性的一種；採取後果主義的觀點，我們還是可以在「廣義」的資產階級革命上「狹義」地指認法國革命中起主導作用的資產階級 (Heller 2006)。

最後，由於資本主義的持續發展和行動者的學習能力，我們將看到，資產階級革命亦可由無產階級來執行，後者甚至可以逕自將它轉換為「無產階級革命」——這正是不斷革命的核心。

## 第四節 不斷革命

把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思想放回俄國革命的脈絡，其原則大概可以這麼概括：「儘管俄國很落後，俄國工人階級能夠且將先於西歐工人階級掌握權力，不用通過延長且穩固的資產階級民主階段。」(Molyneux 1981: 17) 托洛茨基大約在 1905 年前後形成這種主張，在當時這是不太尋常的。

1903 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第二次大會上分裂為兩個主要派別，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前者認為，將要發生的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因此要由資產階級領導，目的是創立資產階級政府。後者的代表是列寧，同意革命將會是資產階級的，但不認為要由資產階級領導，因為後者在俄國實在太脆弱無力。革命要由無產階級和農民聯合，形成「工農的革命民主專政」，反對並剝奪地主財產。在獲得土地之後，農民會放棄革命，政權最終將返還給資產階級，由無產階級擔任反對黨，完成第一階段革命；待時機成熟，才發起第二階段革命，即無產階級革命。

托洛茨基同意資產階級革命的必然性，但認為在政治力量上，列寧高估了農民，小看了無產階級。農民的作用是支持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的數量儘管少，力量卻很大，因此將建立農民支持的「無產階級專政」；換句話說，農民固然參與革命，卻不領導革命，革命要由無產階級領導。後者一旦掌權，將不會把政權交給資產階級，反而會把包括土地在內的生產工具充公。於是，前述的兩階段革命將合而為一。此時無產階級必遭農民和舊有封建勢力抵抗，故需國際上（特別是西歐）的無產階級援助。

現在，我們來看看托洛茨基在《總結與前瞻》中「不斷革命」的整套論證。這一節主要以托洛茨基的文本為主，希望在有限的篇幅內，盡可能重述這個戰略思想的特徵。<sup>54</sup>

---

<sup>54</sup> 為了方便起見，以下只標記頁數，不含作者名字和出版年份。這裡的《總結與前瞻》來自托洛茨基 (1972b) 的俄文原文中譯本。與「不斷革命」思想有關的托洛茨基著作主要還有《1905》和《不斷革命》。傳記方面，除了 Isaac Deutscher 的經典外，也可參考 Tratcher (2003)；有關托洛茨基思想整體的介紹，可見 1980 年代前後的幾本代表作 (Hallas 1979, Knei-Paz 1978, Mandel 1979, Molyneux 1981)；包括托洛茨基思想在內的托洛茨基主義介紹，Callinicos (1990) 有簡要的敘述。本文並非托洛茨基研究，而是聚焦在「不平衡與綜合發展」與歷史唯物論的關係，因此只選擇托洛茨基的重要文本和段落來分析。

## 一、生產力與無產階級力量的國際性

他從俄羅斯在自然環境和歷史上相對於西歐的落後性開始談起。「我國歷史中的諾夫哥羅德時期雖然與歐洲中世紀的開端同時，但自然歷史條件（不利的地理環境和人口稀少）所造成的經濟發展的緩慢速度，必然阻礙階級形成的過程，並使其具有較原始的性質。」(9) 在這些條件下，俄羅斯面臨西歐的發展時，往往備感壓力。於是，國家很早就開始「抄襲西方」，並以一套完備的行政及管理機制組織起來(20)。從工廠、航海學校到出版，幾乎都由國家一手包辦，「資本主義……和全部科學，都是政府人為努力的產物，是人為地嫁接在民族愚昧的自然基礎上的。」(12) 雖然「**生產力的發展是社會歷史前進的基礎**」(9)，但俄羅斯政府採取這些政策「**並不是出於對發展生產力的決心，而是純粹出於財政上的考慮，部分是出於軍事技術方面的考慮。**」(13，粗體為筆者所加)

接著，托洛茨基試圖駁斥在落後的歷史條件下，無產階級缺乏革命動能之通說。當俄羅斯政府成為軍事強權時，吸引了歐洲資產階級的關注。事實上，18世紀末開始，荷蘭銀行就貸款給沙皇，直到19世紀末俄羅斯工業發展的鼎盛時期，大批歐洲資本更投注其中。由此看來，將「俄國工人階級動員起來的，大部分是歐洲的資本，即在法國和比利時的議會裡，取得政治權力的資本」(19)；通過國家的榨取，農民也「成了世界交易所的附屬品」(18)。農村生產的原料和生活必需品經由快速發展的交通工具進入城市，而城市則因面臨國際壓力，在手工業沒有發展完全的情況下，便轉換為資本主義大工廠，而後者則經由俄羅斯國家與西歐資本相連。

因此，當俄羅斯資產階級實際上都在「國外」時，迅速崛起的「本地」工廠卻製造了大批無產階級。由於大工廠是有計畫發展的，無產階級同質性高，佔全國生產力的比例亦高，再加上群聚在生產力集中的城市，使他們「起到不成比例的巨大政治作用」(18)。一反馬恩時代的德國革命，托洛茨基認為，「**早在19世紀中葉，政治解放的任務就已經不可能靠全民族〔由資產階級所代表〕同心協力地加以解決。**」(28，粗體為筆者所加) 換句話說，與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構想的革命戰略不同，資產階級的軟弱不等於工人階級的軟弱(31)；「僕人」不只不會和「主人」一個樣子，甚至可能比他們更早取得政權(33-4)。

就算跟歐洲國家比起來，俄羅斯的生產力相對低落，但這並不能直接反映無產階級的政治力量：



毫無疑問，工業無產階級的人數、集中程度、文化程度以及政治分量，都依賴於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的程度。但是這種依賴性不是直接的。在一個國家的生產力和它的各階級的政治力量之間，在每個特定時刻，**都夾雜著許多不同的國內和國際性質的社會和政治因素**，這些因素會使經濟關係在政治上的表現發生偏差，甚至完全變形。儘管美國的工業生產力比我國高十倍，但是俄國無產階級的政治作用、它對本國的政治影響，以及在最近的將來影響世界政治之可能性，卻比美國無產階級的作用和重要性大得難以比擬（32，粗體為筆者所加）。

可以這麼說：「政權轉到工人階級手中的時日，並不直接決定於生產力所達到的水準，而是決定於階級鬥爭中的關係，決定於**國際形勢**，最後還決定於許多主觀因素，如傳統、首創精神和戰鬥的準備……」（30，粗體字為筆者所加）可以看到，托洛茨基試圖在主張階級鬥爭的重要性時，保有生產力的最終規定性。儘管他並沒有在理論上詳細說明兩者的關係，但我們知道，兩者的關係必須被「國際性質」或「國際形勢」等力量中介。

## 二、跨層次互動：國際與國內

據此，托洛茨基質疑那些主張當前革命（必須）是資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因而只能侷限在其框架下的想法。他畫出了一道歷史革命的光譜：1905 年不同於 1848 年，更不同於 1789 年。

「法國大革命確實是一次民族革命。此外，資產階級爭取統治地位、政權和完全勝利的世界性鬥爭，也在民族圍內取得了階級的表現。」當時，無產階級不管如何批評和摒棄資產階級的革命傳統，最終仍要感激和保衛雅各賓主義。德國革命則是「中間情況」且是「最壞的情況」，在資產階級軟弱的同時，「無產階級也缺乏組織、經驗和知識」（22-5）。資本主義的發展固然「達到必然取消舊封建關係的程度，但還不足以使工人階級這個新生產關係的產物成為決定性的政治力量。」（25）在兩個階級的鬥爭下，雙方都不可能承擔歷史任務。

對托洛茨基來說，「中間情況」已經過了。他認為，當前俄羅斯的「資產階級革命」，不能建立在「一般社會學定義」上，而應該就其本身的特殊性來看。

雖然資產階級軟弱，但「資產階級革命的主角」（注意我所加的粗體字）已經輪到無產階級，後者將被「革命的全部進程推動著去執政」。這個執政是「專政」，最終會「打破資產階級革命本身的界限」（34-5）。

認真看待托洛茨基的比喻，資產階級革命既然有「主角」，那便是一齣有客觀基礎的歷史大戲，而角色的概念從來沒有限制「誰」來承擔。從後果主義的觀點來看，無產階級完全可以擔任主角，以行動吸引農民（為了打破地主的剝削）和其他非無產階級，如知識份子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甚至在執政時，非無產階級也都可以參與政府。在此，他回應了列寧的「工農革命民主專政」主張，認為最重要的問題不是聯合執政或專政本身，而是：「誰在政府中掌握領導權，並通過政府領導全國？」（36）答案是：由工人階級領導。

為了自身利益，農民雖然可能與資產階級結盟，但由於後者力量小，且一旦掌權，在既有條件下必然要向封建力量臣服（38），故農民真正的同盟軍和解放者仍是試圖推翻封建政權的無產階級。不過這也等於說，在俄國，要終結封建力量就要終結資本主義。因此，無產階級掌權後必然要實施社會主義，將私有財產公有化；這時，農民的利益就會與之衝突。

再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關係，這也是「不斷革命」的意義最能凸顯出來的地方。對托洛茨基來說，設想無產階級在其領導的革命成功後把政權交給資產階級是「最壞的烏托邦主義」（41）。掌權後，無產階級會逕自取消「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的區分，向社會主義過渡。在資產階級掌權的情況下，綱領的區分當然重要，能夠讓無產階級有基本的生活水平和鬥爭目標，對八小時工作日的爭取，本來就不完全違反資產階級的利益，故能成為社會民主黨的最低綱領。不過，在革命情緒高漲的情況下，這種程度的政策完全可能遭到資本家抵制，若無產階級要進一步鬥爭，資本家就可能以關廠來威脅。要免除這個資產階級專政下總是會遇到的問題，只能讓無產階級掌權。

托洛茨基認為，無產階級的選擇是很決絕的。一旦參加政府，社會民主黨就不可能

一方面事先對工人保證絕不對最低綱領讓步，另一方面又向資產階級保證不超越這個最低綱領的範圍。這樣一種兩面的保證是絕對行不通的。無產階級

的代表不是作為無權的人質，而是作為領導力量參加政府這一事實，將消除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之間的界限，這就是說，它將把集體主義提到日程上來。無產階級在朝這個方向前進中究竟該在什麼地方停下來，這取決於力量的對比，而絕不取決於無產階級政黨原來的意圖（44）。

總之，托洛茨基並不認同所謂的工農「民主專政」或「什麼資產階級革命中無產階級專政特殊形式」（44），畢竟由無產階級領導的專政，怎麼可能會不超出民主綱領或最低綱領的限制？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自己的社會主義革命不是兩個階段——它們之間是不間斷或不中斷的。

然而，正是受制於農民和資產階級，當無產階級越是明確地貫徹社會主義政策，其立足的根基也就越狹窄和不穩（41）。這時若無國際力量協助，陷入孤立無援的困境，「就必然會在農民被棄它的時候被反革命勢力所擊潰。」無產階級必須將俄國革命的命運「同歐洲社會主義革命的命運聯繫在一起。」（73）托洛茨基接著指出：「沒有歐洲無產階級直接的國家援助，俄國工人階級就不能保持政權，就不能把自己的暫時統治變成長期的社會主義專政。」（65）反過來說，其實「在歐洲封建資產階級反動勢力的逼迫下」（67），俄國無產階級本來就不得不主動把革命推進歐洲。

之所以採行國際主義，不只是出於政治考量，也是因為經濟上的技術落後。「在實行這些措施的時候，它〔無產階級〕一定能夠、並且一定會不僅依靠本國的生產力，而且依靠國際的技術，正如革命政策一樣，它不僅要依靠本國的階級關係的經驗，而且要依靠國際無產階級的全部歷史經驗。」（62）在托洛茨基看來，這並非烏托邦，畢竟國家對經濟的操作早在沙皇時代就是事實，無產階級專政只會更進一步使整體經濟社會化、國際化。「社會主義生產」是與在「個別國家閉關自守的範圍內」生產互不相容的（53）；無產階級專政後，經濟上的國際主義不只可行，更不可避免。

綜上所述，「不斷革命」可以根據兩個層次分為三個部分。從國際層次出發，第一個部分是俄國與西歐的不同，這也是無產階級相對強大的歷史根源，這是基於歷史上的跨國（或跨區域）比較而來的；第二個部分，革命發生之後，也應該在這個脈絡下被挽救、維持、甚至是擴張，這是跨國（或跨區域）的革命支援。這兩個部分分別是「不斷革命」的分析起點和推論結果。從國內層次出發，則須

兼顧階級聯合（無產階級與其它小資產階級合作，如農民）的靈活性和持續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必須專政且一經專政，就試圖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必要性，階級形構在此時的俄國是高度複雜的，此即**第三部分**。這個部分是「不斷革命」的核心內容或過程。托洛茨基在概念上的操作順序是：從國際層次出發，進入國內層次，最終又回到國際層次。

## 第五節 不斷革命的今日相關性

在古典馬克思主義傳統中，不斷革命是重大的貢獻和創新。從 1905 到 1917 年，托洛茨基一直保有這個獨特主張，即使是盧森堡和大部分時期的列寧，也沒有超出兩階段革命的框架 (Geras 1976)<sup>55</sup>。1917 年的十月革命和此前列寧發布的《四月提綱》(April Theses)<sup>56</sup> 進一步證明了「不斷革命」的有效性。

那麼「不斷革命」是否僅限於俄國和當時的無產階級革命呢？晚年領導第四國際時，托洛茨基表示，這是「落後國家革命發展的一般趨勢」(Trotsky 1974: 138)<sup>57</sup>。然而，若把（半）殖民地和第三世界國家納入落後國家，革命的具體任務就不只有民主和農民（土地）的問題，還必須包括民族獨立，這是當時俄國革

---

<sup>55</sup> 應該說得再仔細一點：一次大戰前後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其實都有注意到「不平衡發展」的現象，而且也多少有過類似不斷革命的思考，不過只有托洛茨基將它徹底上升為政治綱領，當時馬克思主義者——包括考茨基、梅林、梁贊諾夫、盧森堡和帕烏斯（托洛茨基受其影響甚深）——對不斷革命的思考，可見 Richard Day and Daniel Gaido (2009) 的重要選輯。

<sup>56</sup> 這裡無法交代《四月提綱》的內容，只能略提當時布爾什維克的革命理論及列寧這份文件的重大意義。二月革命後的布爾什維克其實和孟什維克一樣，都擁護臨時政府，並認為俄羅斯當前處於資產階級民主階段，布爾什維克應該按照建黨初期的理論，繼續做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反對黨或合法反對派。也因為這樣，布爾什維克在反對戰爭的立場上和孟什維克相去不遠。列寧在四月回到彼得格勒後所提出的《四月提綱》一反這種看法，表示資產階級民主已經完成，該是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時候，而國家政權也應該轉型為蘇維埃共和國。在與資產階級劃清界線的前提下，他主張將臨時政府的權力全部轉向蘇維埃，通過蘇維埃內部的鬥爭，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同時放棄帝國主義戰爭。這些主張在當時布爾什維克內部是很驚人的，列寧花了許多時間說服黨內領導層，而這個轉向也讓列寧與托洛斯基的立場越加接近。

<sup>57</sup> 整個段落是這樣的：「無產階級鬥爭中個別民主和轉型需求的相對重要性，它們的相互牽連和它們呈現的順序，是由每一個落後國家的特殊性和特定條件、以及在很大程度上由落後程度所規定的。然而，所有落後國家革命發展的一般趨勢可以被**不斷革命**的公式所規定，這無疑又是就俄國的三次革命（1905 年、1917 年二月和十月）所賦予的意義而言的。」(Trotsky 1974: 138)

命不用面對的。

對此，托洛茨基承認資產階級多少具有反對帝國主義的力量，甚至可能出現和無產階級競爭領導權的情況<sup>58</sup>。無論如何，必須根據這些國家在資本主義世界系統中的位置來具體分析。但既然要具體分析，「不斷革命」的概念還能承受多少當代經驗（特別是二戰之後）的多樣性？僅舉兩例：中國革命固然一度建立社會主義，卻不是由無產階級領導；古巴成為類似蘇聯的「國家資本主義」，革命卻是由知識份子領導。換句話說，就革命的**領導和結果**來說，它們都不是「不斷革命」(Cliff 2000: 44-5)。

為了修正「不斷革命」，Tony Cliff (1981) 在冷戰期間曾提出「偏離的不斷革命」(deflected permanent revolution)<sup>59</sup>，用來指涉革命領導不來自無產階級，而革命結果雖打破了前資本主義，卻持續受限於資本主義的過程。20 世紀的許多革命都屬於這一類型。雖然 Cliff 的「不斷革命」處理了革命在領導和結果上的「偏離」，卻未脫離打破前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革命；對此，Davidson (2015: 205) 就認為 Cliff 「雖然沒有使用這個術語，實際上卻把脫軌的不斷革命看作資產階

---

<sup>58</sup> 舉例來說，托洛茨基在 1938 年思考墨西哥的階級形構時，就認為民族資產階級會設法脫離帝國主義的掌控，因此他們必須和工人保持一定的合作關係。在這種情況下，「第四國際承認國家在爭取民族獨立時的所有民主任務，但第四國際的墨西哥分部在工人和農民面前，是和民族資產階級處於競爭關係的。我們與民族資產階級不斷地競爭領導地位，以便能在對抗國外的帝國主義者時確保群眾的勝利。」(Trotsky 1979: 785)

<sup>59</sup> Tony Cliff 的問題架構深刻地影響著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和國際社會主義者 (International Socialists 是雜誌名稱，也是托洛茨基派別名稱) 的理論傳統，本文引用了部分黨員理論家的著作，如 Alex Callinicos 和 Neil Davidson (後者現已脫黨)。Cliff 的著作旨在反思並批判托洛斯基的觀察與理論：「對於〔二〕戰後世界為何與托洛茨基的診斷相去甚遠的問題，我一直沒有答案。在接下來的幾年，我花了許多時間與努力發展出三個相連的理論來處理世界上的三個地區：俄羅斯與東歐，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這三個理論是：國家資本主義、持久軍備經濟 (permanent army economies) 和偏離的不斷革命。」(Cliff 2000: 42) 概言之，國家資本主義的提出是為了定義蘇聯性質，將之視為一個由官僚中心直接管理的大工廠，取消了馬克思所謂多個資本之間的競爭，而非社會主義國家。在國際層次上，蘇聯面對的壓力來自與西方先進國家的軍事競爭。軍事支出的特色在於不會進入生產週期，軍事部門的利潤率也不會進一步構成利潤率，蘇聯因此並無傳統市場經濟該有的蕭條／繁榮週期。以國家資本主義和持久軍備經濟分別解釋蘇聯（與東歐）和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特色和關係後，Cliff 繼而用偏離的不斷革命描述第三世界由非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這些地區最終步上的，多半是模仿蘇聯的國家資本主義道路，也是某種版本的資產階級革命。這「三頭馬車 (troika) ——國家資本主義、持久軍事競爭、脫軌的不斷革命——合而為一，構成一個整體，掌握了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人類處境的變化。」(Cliff 2000: 48)

級革命的現代版本或功能等價物。」這樣的修正在冷戰結束後還管用嗎？若今日資產階級革命在全球範圍內已大致完成了，不斷革命及其預設或「包裹」的資產階級革命乃至其「偏離版本」（既然革命成果止於資本主義，那就非常類似資產階級革命）還是有效的嗎？

僅僅根據具體任務來定義「不斷革命」試圖完成並超越的資產階級革命，即前述的民族獨立、農民土地問題和民主，則許多國家不是今日仍在進行，就是相當晚近才（部分地）達到，好比美國和英國直到 20 世紀才有普選權，更別提雖然政治獨立、經濟上卻持續受到他國壓迫的國家。在這種觀點下，與其說資產階級革命是必要的、「偏離的不斷革命」仍有其用處，倒不如說這般要求實在太過嚴苛，以至於很難（全部）達成。Callinicos 認為，所謂的資產階級革命，如上一節所述，應該就其有助於資本積累的整體結構來定義，而不是被特定政策所取代。但若如此，我們似乎更有理由相信蘇聯瓦解和東歐諸國轉型後，在全球範圍內主要的資產階級革命已經完成，畢竟資本積累正在全球猛烈進行。至少對 Davidson 來說，「不斷革命」及其「偏離版本」在今日並無迫切的相關性。

然而，這並不代表潛藏在托洛茨基著作中的另一個概念跟著失效。我們在前面曾總結了「不斷革命」的兩種觀點，即**國際主義和國內政治**，它們其實對應了「**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就像 Davidson (*ibid.*: 216) 所言，這個托洛茨基分析歷史社會時的基礎至今仍然存在，甚至「偏離版本」之所以會出現，也是這個複雜的運動規律持續運作所致。如果「不斷革命」的相關討論多少不合時宜了，甚至對非／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太過政治或充滿黨派色彩，那麼我們不妨轉個彎，從另一個角度切入「不平衡與綜合發展」。<sup>60</sup>

---

<sup>60</sup> Le Blanc (2005) 也認為「不斷革命」大有問題，但「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架構仍有效：「不管不斷革命理論有什麼問題，對嘗試了解歐洲及其他地方人類存在的發展與複雜性的史家、人類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家來說，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總體架構仍是有效的（也就是，作為一個有用的、具有啟發性的分析工具）卻是事實。」

## 第五章 托洛茨基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規律

不斷革命揭櫫的跨層次互動——「國際」與「國內」——蘊含了「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分析架構，這也是托洛茨基從資本主義擴張中提出的規律。在這個過程中，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面臨前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生產關係，兩者在國際政治交鋒、個別國家融合，為革命形勢提供了複雜契機，而融合的結果又重回國際政治，試圖獲取其他國家革命的奧援。「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在此屬於**兩種生產關係之間**的型態，至於其他型態的問題，下面幾章會談到。

開始分析前，第一節先簡介俄國農奴解放前後的發展。和前一章一樣，這是為了給稍後的理論提供基本的歷史脈絡。第二節從幾個關鍵文本出發，詮釋托洛茨基對「不平衡發展」與「綜合發展」的說明。在字面上，「不平衡發展」這個術語無法完整表達它的內容：除了不斷革命倚賴的「國家的對立」，還包括「世界經濟一體化與平均化的趨勢」。對托洛茨基來說，從這兩個方面思考「不平衡發展」才是「辯證而非機械地」理解。分析「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其他意義之後，第三節就「國際」與「世界」兩個層次另作說明。世界層次指的是世界經濟的出現，世界體系分析（World System Analysis）仍然是相關思考的重要資源。分工促進世界經濟的形成，為「不平衡發展」的國際競爭意義提供了矛盾的對立面。除了在本體論上以世界體系分析補強「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世界層次，第四節也透過 Alexander Gershenkron 對歐洲工業化進程的思考，指出「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在方法論上的特徵，最後以此特徵回顧不斷革命，呼應前一章。

### 第一節 從 1861 年前後到 1917 年之前的俄國

為了更具體地認識托洛茨基的理論，有必要大致了解 19 世紀俄國的工農業發展。這一節簡介 1861 年前後到 1917 年之間俄國的改變，聚焦在與本文主旨相關的部分，特別是能表現「不平衡與綜合發展」規律的工農業表現。

## 一、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編入與地緣政治競爭

俄國自 18 世紀末起，農村地租已折算為貨幣，貨幣經濟至少在非黑土區幾個省分持續發展，這也代表商品交換關係日益盛行，城市規模越來越大。19 世紀 30 至 40 年代，進城打工的農民增加，少數農奴經商致富；1850 年代末，中部工業區七省農民外出工作者約 88.7 萬人，地主控制區人數偏低，但農奴制還是限制了市場經濟和城市及工業發展。這時的俄國手工業主要發生在農村，與從前西歐發生在城市行會不同。

率領俄國工業從手工業進入工廠、在技術上轉向機械生產的產業是棉紡。在工業化起步階段的 1805 到 1808 年，彼得堡附近的亞歷山大國有手工廠引入了第一台蒸汽機和織布機，歷史進程比西歐國家「快」了許多。英國從農業資本主義（大約在黑死病之後的一百年間出現）到工業革命，少說也經過了三個世紀；在俄國，農奴解放前的 1835 年，已經出現了第一家機械紡紗股份公司，而且是英俄合資的。英國在 1842 年解除機械出口的限制，使俄國棉紗設備進口大增；到 1847 年時，國產紗已能滿足國內需求。在布匹印花方面，雖然家庭手工場很難與機器工廠競爭，但前者由於勞動力低廉，在後者存在的情況下還是維持了很長時間。1840 年代末開始，機器印花才有了進展。

重工業方面，俄國也深受英國影響。1833 年，憑著英國技術，莫斯科工廠開始生產紡織工廠用的設備和零件。雖然從 1830 到 1855 年，俄國機器製造業從 7 家發展到 25 家，機械製造仍以進口為主，無法建立國內工業；1826 到 1860 年，俄國進口設備更增加了 86 倍。這不只是因為本土技術相對不成熟，更是因為在農奴制下，自由勞動力稀缺，貴族進行資本主義式經營的動機不足（張廣翔 1994）。

農奴制方面，一直到 1858 年第十次人口調查，歐俄的男性農奴都保持在 1,000 萬人左右，勞役制和代役制（以貨幣地租取代勞役）農奴約占 89.29%，雖然比 1851 年第九次調查的 94.65% 少，人數還是十分龐大。這些農民高度依附土地，土地不是租賃來的，而是根據傳統獲得的。在代役制農民方面，由於地租採取貨幣形式，需要外出打工，從事基礎工商業，以非農收入貼補生活；在這個過程中，農民分化為貧富農，地主獲得貨幣地租之後往往投入非生產性消費，寄生性質明顯。在勞役制農民方面，地主以嚴苛條件榨取農業剩餘，出口糧食（李振文 2017: 130）。



俄國在 1754 年廢除國內關稅，1766 年允許出口糧食，在與鄂圖曼帝國的戰爭中更獲得了黑海一帶的沃土和良港。1846 年，英國廢除糧食關稅後，俄國糧食出口大受激勵，從 1780 年代末到 1861 年改革前夕，運送到莫斯科的數量增加了 4 倍，到彼得堡的則增加了 2.5 倍，隨後出口西方 (李振文 2017: 132)。地主為此大肆開墾，以勞役制取代代役制，農民更加束縛在土地上。相較於西歐農奴制在黑死病之後消失，恩格斯 (Engels 1956-83c: 124) 曾稱中東歐同一時期「農奴制重新復活了，再版了」。不只如此，農奴制在俄國更延續到 19 世紀中期以後。

總的來說，俄國自英國輸入工業製成品（特別是機械及其相關技術）並向西歐輸出農產品的格局非常明顯，屬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典型的「邊陲」；同樣明顯的是，重工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受到農奴制制約，雖然有了相對進步的技術，發展仍然緩慢。

馬克思 (Marx 1956-83a: 9)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說過：「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胎胞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1861 年改革發生之前，沙皇和貴族們不認為農奴制破產；事實上，這個封建主義的代表制度還是製造了大量生產力以供榨取和使用。如果是這樣，農奴制為什麼會被廢除，此後一個（貌似）新的生產關係又怎麼會出現？除了受到啟蒙精神影響，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地緣政治競爭。

在普魯士於 1806 年的耶拿戰役大敗並不得不開啟改革時，俄國反而在 1812 年的護國戰爭擊退了拿破崙，尼古拉一世的俄國甚至有「歐洲憲兵」之稱，儼然成了封建勢力的最後一座堡壘。這股聲勢讓俄國的改革進程延遲，不像普魯士一樣在 18 世紀前後必須發起「由上至下的革命」。好景不常，五十年後俄國也不得不廢除農奴制。這裡的關鍵是 1853 年的克里米亞戰爭。作為第九次俄土戰爭，英法加入後，戰爭變為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生產關係在演化路徑上的「選擇」：俄國的黑海艦隊仍以木帆船為主，不敵英法配備蒸汽機的裝甲戰艦。面對殘酷的競爭，唯有依靠更強大的武力才能生存，在普魯士改革風潮的傳播下，沙皇心知肚明提升武力所需的生產力——大量的鋼鐵與勞動力、新式的技術——已經不是舊有生產關係所能負荷的。

## 二、1861 年改革及其後的工業化

1856 年到 1857 年俄國農民動亂約 270 次，1859 年更高達 900 次。面對國際競爭和國內社會問題，登基不久的亞歷山大二世向貴族演說時表示：「農民和他們的地主之間存在著敵對情緒，不幸的是由於這種敵對情緒，發生了一些不符地主管束的事情。我深信，我們遲早會解決這個問題。我想，諸位是同意我的意見的，因而從上面解決要比由下面解決好得多。」(劉祖熙 2001: 15)

這場「由上至下的革命」是君主和貴族之間縝密籌劃的，結果並沒有使農民的處境改善。雖然農民被允許購置財產，不再有人身束縛，但是第一，以勞役為主的多項義務必須先執行完畢；第二，村社繼續存在；第三，最讓人痛苦的，就是贖金與配得土地的比例。一方面地主要求農民一次付清土地贖金，而這筆贖金遠高於當時市價（在非黑土地帶，相當於市價的 120%），其中包含了農民自己的人身贖金；政府只替農民墊付，為此設立農民貸款銀行；另一方面，贖買或分配到的土地相較於原本使用的，其實大大縮水（按照不同地區和地力，可能只有原本的一半，甚至是五分之一）(ibid.: 18-24)。

1861 年的改革還有很多細節。舉例來說，在贖金和土地分配方面，農民有兩種方案可以選擇。第一，以四十九年為周期，向國家償清債務；第二，拿回原本耕作土地的四分之一，不用繳納贖金，亦即「貧民分配」(Riasanovsky and Steinberg 1969: 346)。此外，在烏克蘭等地，土地不是分給農民，而是村社，由古老的農民集體來安排。在債務方面，這種政策實際上很難執行，以至於農民的欠款在 1905 年革命之後被取消，而此前的農民——本質上仍是農奴，因為憑著債務關係，他們再次束縛於「自己的」土地——已經繳交了 15 億盧布，領回的土地在當初只值 10 億盧布；南部地主則憑著價值 28 億盧布的土地獲得了 34 億盧布 (ibid.: 347)。村社方面，這種分配政策使農民個人無法擺脫低效率生產，缺乏競爭意識。

不僅如此，改革後的 20 年內更出現了工役制。由於地主直接獲得的土地贖金很少，多半是國家債券，因此若要將資金投入農業生產的現代化或工業建設，就必須出賣土地。在人口增長導致所占田地日益縮小的情況下，部分農民為了償付贖金，再次向地主承租甚或購買土地，帶著自己的生產資料在土地上耕作，成為半農奴 (劉祖熙 2001: 37)，農民分化於是又慢了下來。當他們進城工作（特別是中央工業區的農民），保留下來的村社又透過效期通常為一年的通行證限制

其移動 (*ibid.*: 38)。地主再次利用這些廉價勞動力，無法獲取或累積經營農場的經驗。因此，農業資本主義的發展深受農奴制殘餘的限制。

總之，1861 年的改革相當不徹底，列寧就認為「臭名遠揚的『解放』是對農民的無恥掠奪，是對農民施行一系列的暴力和一連串的侮辱……農民在多大程度上擺脫了農奴主的統治，他就在多大程度上處於金錢支配的勢力之下，處於商品生產的條件之下，處於對產生的資本的依附地位。1861 年以後，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這樣的迅速，只用了數十年，就完成了歐洲某些老國家整整幾個世紀才完成了的轉變。」(Lenin 1984-90a: 173-5) 隨著改革的期望，這種不徹底招來更多反抗：「1861 年產生了 1905 年。第一次『偉大的』資產階級改革的農奴制性質使發展受到了阻礙，使農民遭到了無限惡劣的和痛苦的折磨，但是它改變不了發展的方向，防止不了 1905 年的資產階級革命。」(*ibid.*: 178)

承前文，到 19 世紀中葉，紡織工業發展在各個部門都有不同的強度，依序是棉紡、毛紡、亞麻布和制絲。值得注意的是，1860 年，14 個最大的棉紡工廠集中了 60%的機械化紗錠，擁有 58%的蒸汽機功率。雖然俄國機械化生產還是很落後，但跟西方比起來，集中程度卻異常高 (劉祖熙 2001: 96)。在機器製造方面，99 個企業中有 22 個大工廠，其機械工人數量占全部的 76.3%，年產值佔全部企業的 83%，集中程度也很高 (*ibid.*: 100)。1867 到 1879 年間，工廠數量、產值和工人數量都上升，而工人數量的增長快過工廠數量，產值的增長又快過工人的增長 (*ibid.*: 106)，這說明了機械化的效果，又代表了工人相當群聚。莫斯科和彼德堡在這方面最明顯。

從 1870 年代起，俄國的重工業發展以鐵路建設為核心，冶金等相關行業跟著蓬勃。然而，有限的自由勞動力導致資本積累不足，使俄國必須引進大量外資 (佐以充分的政府補助) 和外國原料。再一次地，迅速而有計畫地設廠和生產又讓工人數量增長快過工廠增長數量；不只如此，由於倚靠大量外資，本地資本家數量少，一方面沒有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也相對零散。自由勞動力的缺乏使他們對來自農村的工人施以高工時的剝削。

在進入 90 年代之後，機械化的實施已經相當徹底。俄國的冶金工業是世界上發展速度最快的產業。1890 到 1900 年，生鐵產量增加了 2.4 倍，鋼產量增加了 4 倍多 (*ibid.*: 119)。南部兩大冶金工廠生產了 2,000 萬普特的黑色金屬，占南部工廠生產的 38%，集中了 31%的南部冶金工人。採煤方面，37 個最大礦坑雇用

了工人總數的五分之三，生產了煤總量的 70% 以上 (劉祖熙 2001: 120)。

鐵路除了串起各個重工業部門，也透過連接國內外市場刺激了貿易。不過更重要的是，它使受雇者更容易在工業城市之間流動，有助於勞動的社會化。工業無產階級就在這個過程中形成，到了 20 世紀初，大工廠和運輸企業只占全部企業的 18%，卻集中了五分之四的工業無產階級，為之後的革命提供了堅實條件 (*ibid.*: 123-4)。

### 三、階級鬥爭

農民的實質解放一拖再拖，直到 20 世紀初，村社仍大量存在，農民高額負債，土地日益集中在貴族手上。雖然是「普魯士式道路」的仿效者，但俄國社會很保守，改革成效極為有限 (王子夔 2018: 119)，這就讓農民暴動一波接一波。在財政大臣維特改革時期，1901 到 1904 年仍有 577 起農民暴動，其中以 1902 年規模最大，337 個村 15 萬農民參與；1901 年起，連年歉收導致農民開始主動奪回地主土地 (張廣翔 2010: 74)。

1905 年 1 月，在俄國工人要求選舉民代、實行宗教自由和進一步改革農業後，爆發血腥星期日的鎮壓，改革希望從此幻滅。時值日俄戰爭，既有工農抗爭順勢發展成革命。莫斯科鐵路工人罷工演變成全國政治總罷工，蘇維埃成為暴動和罷工機關，布爾什維克領導了莫斯科工人蘇維埃 204 名代表。在 10 月到 12 月革命最激烈的時候，農民也加入抗爭，燒毀地主田產，繼續搶奪土地。12 月 15 日起，沙皇以精銳部隊鎮壓月初發展成武裝暴動的罷工活動，最終革命撤出莫斯科的核心普列斯尼亞區，延續到 1907 年。

1905 年 10 月，第一屆杜馬通過改革法令，沙皇成為介於絕對君主和立憲君主之間的統治者；從這時起，資產階級和 (傾資本主義) 地主組成的立憲派一直試圖完成這種政治過渡，直到 1917 年二月革命之前，孟什維克和社會民主黨都以此為目標。立憲民主黨主張收購部分地主土地，轉租給農民。這種做法並未使後者擁有任何土地，實際上延續了過往的農奴制。在這回杜馬中，亦有農民組成的勞動派主張均分地主土地，這當然不被地主接受。布爾什維克則抵制這一屆議會。

1906 年 4 月內務大臣斯托雷平任總理大臣，7 月杜馬解散，1907 年 2 月第二屆杜馬召開。此前布爾什維克決定進入議會，透過積極宣講、提出與資產階級及地主對立的政策，吸收了大批工農支持者，導致立憲民主派在第二屆杜馬人數銳減，左翼代表大增。1907 年 6 月，斯托雷平指控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叛國，逮捕並流放社會民主工黨 65 名杜馬代表，解散第二屆杜馬，被稱作「六三政變」。1905 到 1907 年的第一次革命結束 (劉祖熙 2001: 207-30)。

斯托雷平上任後，決定取消農民贖金和村社土地佔有制，農民可脫離村社，土地更容易私有化。然而，第三屆杜馬開始，代表保皇派的地主與黑道和代表資產階級的立憲民主派更加沆瀣一氣，共同控制國務會議，地主財產不只沒有受到影響，對工農抗爭的鎮壓還越加嚴厲。1900 到 1913 年，大工業企業工人從 260 萬增加至 400 萬；1906 到 1912 年，卻有 600 個工會組織被封閉，760 個被拒絕登記，這時的工時皆達 10 小時，勞資對立激烈 (*ibid.*: 244-5)。這和 1905 年 12 月宣布的工人罷工合法化、1906 年 3 月工會合法化都大相逕庭。一戰爆發之前的工人罷工人數年年攀升：1912 年 72.5 萬，1913 年 88.7 萬，1914 年上半 1,250 萬 (Riasanovsky and Steinberg 1969: 410)。

總的來說，俄國統治階級在 19 世紀相對晚地認知到自己在國際競爭上的劣勢，再加上先進生產力在資本主義國家協助下帶來的成長，地主階級沒有強烈改革動機，「由上至下的革命」再三延遲和稀釋，走向與德國相反的方向。農民的客觀處境可謂「歹戲拖棚」，主觀意識則日益敢同地主鬥爭，並跟同樣受壓迫的工人合流。在資本主義的跨國引入下，後者在短時間內快速成長、集中於城市，而且跟資產階級和工廠相比，政治力量和人數都大到不成比例。

土地貴族與資產階級的合作能夠強化反動勢力，偏偏越是拖延改革日程、稀釋改革內容，越要面對日漸強勁的工農抗爭以及西歐和遠東帝國主義的進犯，尤其是世界大戰的拖磨。就此而言，工農階級已經有可能主導力量對比，只要再有一個吸收西歐經驗（就像引入資本主義的生產力一樣）、靈活應用到新形勢的社會主義政黨領導，革命的條件就更加充分；所謂的「靈活應用」，必須既延續又擺脫傳統模式，從另類歷史唯物論開展出新的革命戰略。

## 第二節 「不平衡發展」與「綜合發展」

掃視俄國在 1861 年前後的發展，不斷革命的根源應該更加清晰了。由此退回俄國歷史進程的分析，就需要「不平衡與綜合發展」把這些現象整合起來。

1924 年列寧死後，為了與史達林鬥爭，站穩政治和理論立場，托洛茨基總是不得不給自己的著作插入史達林這個「對照組」的說法。因此，要了解「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思想，除了尋找托洛茨基正面立論的著作，如《俄國革命史》的重要段落，從《總結與前瞻》這類旨在闡述不斷革命的著作「旁敲」之外，還需要對批評史達林的論戰著作「側擊」。接下來，我們先從《共產國際綱領草案（對根本原則的批判）》<sup>61</sup> 出發，切入「不平衡發展」。

### 一、不平衡發展

首先，托洛茨基簡要地說明了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

帝國主義以空前的速度和深度把各個不同的民族單位和大陸單位聯結成一個單一的整體，把它們置於最緊密、最必需的相互依賴的關係中，使它們的經濟方法、社會形式和發展水準日趨一致。

繼續讀下去，這個令人想起《共產黨宣言》中資本橫掃全球的段落，似乎比馬克思和恩格斯呈現的資本主義世界更複雜：

同時，它又是以如此互不相容的方法，以虎躍之勢，以襲擊落後國家和落後地區的方式來達到這個「目的」，結果就比以前各個時代甚至更劇烈、更具

---

<sup>61</sup> 寫於 1928 年，也是托洛茨基流亡海外的第一年。1927 年 12 月，他和季諾維也夫等人組成的聯合反對派在黨內鬥爭失敗，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被開除出黨（季諾維也夫隔年因自我批評而重回黨職）。托洛茨基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身分（1924 年選出）尚未消失，因此還能向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遞交這份抗議文件，其中特別批評了史達林的「一國社會主義」。1927 到 1928 年是俄國經濟的轉折期。1921 年開始的新經濟政策結束，反對派的主張被批評為「超工業化」，史達林開始實施農業集體化。在工業品缺乏的情況下，農村生產力無法提高，富農拒絕中央的糧食收購計畫，特別需要低廉糧價的工業發展窒礙難行（杜建國 2002）。

有震動性地破壞了它所造成的**世界經濟一體化和平均化的趨勢** (*ibid.*: 20)  
(粗體字為筆者所加)。

換句話說，國家之間既「相互依賴」又「互不相容」。這個矛盾的現象根源於資本主義的固有性質，而帝國主義只是「強化了這兩種趨勢」：

和以前的經濟制度不同，資本主義的本性決定它要不斷地實行經濟擴張，滲入新的領土，克服經濟差別，把自給自足的地方經濟和民族經濟變成一個在金融上**相互關聯的體系**，從而使它們相互接近，使最進步的國家和最落後的國家的經濟文化水準趨於一致。離開這個主要過程，就無法想像歐洲和英國以及美洲和歐洲之間的相對的**平均化**。各個殖民地的工業化，印度和英國之間差距的日益縮小，以及上面列舉的各種過程所造成的一切後果，也就無法想像了。……

資本主義使各國的經濟關係日益接近，使它們的發展階段趨於一致。但是，資本主義是以它自己的方法，即無序的方法，進行活動的。這些方法經常破壞它自己的工作，使**國家之間發生對立**，使**工業部門之間發生對立**，促進**世界經濟的某些部份的發展**，同時又**阻礙和推遲其它部份的發展**。只有通過這兩種根本趨勢——這兩種趨勢都是資本主義的本性所決定的——的相互關係，我們才能理解活生生的歷史過程的組織結構 (Trotsky 1970: 19) (粗體為筆者所加)。

在此，托洛茨基陳述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動態，是為了駁斥史達林對「不平衡發展」的指控。前一章說過，托洛茨基主張的不斷革命仰賴國際力量：一方面俄國之所以取得高度生產力、培養出政治力量強勁的無產階級，是因為受到西歐影響，輸入資本主義相關技術和組織；另一方面無產階級革命必須是跨國的，因為專政過程會受到國內力量掣肘，故需其他國家革命的奧援。這兩個方面與我們這裡的引文有關。在前一個方面，俄國受到西歐影響，是因為「帝國主義把不同民族單位和大陸單位連結成一個單一整體」，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一體化和平均化的趨勢」正在運作。在後一個方面，不斷革命的過程將會遭遇「國家之

間」和「工業部門之間」的對立，以及世界經濟不同部分的發展與阻礙。

史達林為了正當化「一國社會主義」之說，用上述兩種趨勢中的一種來批評世界革命：既然各國是對立的、有發展與落後的分歧，工人如何團結？世界革命又怎麼可能會發生？<sup>62</sup> 顯然，他沒有考慮各國漸趨「一體化」的力量。托洛茨基除了強調地方和民族經濟已經形成「金融上相互關聯的體系」，更指出各個國家在「向國際分工發展」(ibid.: 22) 的路上彼此依賴，因此一國社會主義反而不可能實現，史達林對「不平衡發展」的理解是「片面且不足」的 (ibid.:19)，只有「**辯證地而非純粹機械地理解不平衡發展的規律**，才有可能避免提交給六大的綱領草案所未能避免的那種根本性錯誤。」(ibid.: 20 粗體為筆者所加)。

嚴格來說，要詳細討論「不平衡發展」就不能像史達林一樣只偏重「各國對立」或「發展與落後分歧」的單一趨勢，還必須考量「世界經濟一體化」。只有這樣，才能說明生產力引入各別國家和求得國際革命奧援的基礎。有「分」就有「合」。

此外，托洛茨基也從宏觀的視野出發，簡單提到了人類歷史上資本主義出現的脈絡：

---

<sup>62</sup> 史達林特別從「對立」的面向解釋「不平衡發展」。作為主要起草人，他在《共產國際綱領》第四部份「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與無產階級專政」說：「經濟和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這種不平衡在帝國主義時代更為明顯和尖銳了。由此可以得出結論，絕不能把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看做是同時發生和到處發生的一次性行為。……，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只是在為數不多的幾個甚至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裡取得勝利。」(此處譯文參考「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托洛茨基從不否認國際無產階級革命並未「同時發生」和「到處發生」，也不是「一次性行為」，但十月革命爆發之後有誰不知道嗎？真正重要的是，不應「由此〔不平衡發展〕得到結論」說，社會主義只在少數或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勝利 (Trotsky 1970: 20-1)；應該說，**無產階級革命在資本主義——而且是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爆發」，但社會主義還不算「勝利」。**

此外，史達林理解的資本主義發展史是有問題的。以《答葉爾馬柯夫斯基同志的信》為例，他表示恩格斯的年代「還沒有資本主義國家不平衡和跳躍式發展的條件」(Stalin 1957: 193)。托洛茨基 (Trotsky 1970: 18-9) 對這個論斷直接回以兩個驚嘆號，並未在文本中多加說明。如果史達林是正確的，法國革命後從施泰因到俾斯麥的普魯士(德國)所實施的「由上至下的革命」又是受到什麼國際條件的影響？直接閱讀史的文件，完全可以理解托的不滿與困惑，尤其是看到史為了自立為列寧接班人而下的諸如此類的論斷：「資本主義國家發展不平衡的規律以及同這個規律有關的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可能性的原理，只是在帝國主義才被列寧提了出來，而且也只有在那時才可能被列寧提出來。」(Stalin 1957: 193)



整個人類歷史都受不平衡發展的規律所統治。資本主義在人類各個區塊的不同發展階段上出現，每個區塊都有自身的深層矛盾。這些區塊相當分歧的水平，人類在各個時代中不同區塊發展速率的極度不平衡，成了資本主義的起點 (*ibid.*: 19 粗體為筆者所加)。

「不平衡發展」是具有普世性的，這個規律把人類分為不同「區塊」，各個區塊都有自身的「深層矛盾」和「發展階段」。所謂的深層矛盾是否來自生產關係內部的階級鬥爭以及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關係動態？發展階段是否指特定的生產力水平以及與之相應的特定生產關係？托洛茨基沒有明說。不過，在歷史唯物論的典範下，這樣的推論應該是合理的。

無論如何，資本主義不是憑空出現，更不是在「平衡發展」的基礎上出現，而是在既有的「不平衡發展」上出現：「資本主義只是漸漸駕馭了它承繼下來的不平衡，打破它、使它成為其他樣子，並在其中運用自己的手段和方法。」(*ibid.*: 19) 從帝國主義強化的「兩種根本趨勢」來看，資本主義「駕馭」、「打破」和改變「不平衡發展」的結果，不是產生一個「平衡發展」的世界，而是讓它更加複雜：不平衡仍然存在，卻伴隨了全球經濟一體化、各國工業水平日漸趨近的互賴關係，而每一次的互賴都加深了既有的不平衡。Rees (1998: 266) 引用托洛茨基的哲學筆記 (Trotsky 1998: 97) 稱這個既同且異的體系是一個「差異化整體」(differentiated unity)。

托洛茨基的上述說法有兩個特點。第一，主詞都是「資本主義」，視角因此是一個全球性整體，屬於「世界層次」，不是就單一或若干國家來談的。第二，之所以要「辯證地理解」——也就是依靠**理解**，而非**字面意義**——是因為「不平衡發展」這個名稱無法同時囊括資本主義的「兩種趨勢」，只偏向其中一種，即「差異化」或「對立」，這也是為什麼史達林能「擇一」詮釋不平衡發展，「差異化整體」反而同時囊括兩者。

與第一個特點不同，托洛茨基在其他地方談及資本主義時，是針對個別國家之間的比較和差異而言的，這種視角也是馬克思主義者最熟悉的，即前文所謂的國際（競爭）層次。在這方面，《俄國革命史》是代表。托洛茨基現在關切的是落後國家和先進國家（特別是前者）的發展路徑。

在資本主義這個差異化整體中，落後國家面對生存壓力，只能設法提高生產力。托洛茨基再次提到不平衡發展「這個歷史過程的最一般規律」，而這個規律「在落後國家的命運中最尖銳而複雜地揭露了自身。在外在必然性的催逼<sup>63</sup>下，它們的落後文化被迫跳躍。」(Trotsky 2008: 5) 跳躍的方式就是吸收先進國家的各方面成果，不用經歷它們取得這些成果的所有過程，節省時間。

這裡雖然已經講到落後國家的「命運」和「文化」，但還處在國際層次，尚未進到國內層次，畢竟「催逼」和「跳躍」只能發生在先進和落後國家兩相比較的情況下。此外，如果沒有「世界經濟一體化和平均化的趨勢」，落後國也不能吸收先進國家的成果，至少無法這麼快地做到。針對這個「跳躍」現象，《俄國革命史》舉了一些例子：

一個落後國家吸收先進國家在物質與智識上的征服成果。但是，這並沒有奴隸般地追隨它們、複製其過往所有階段的意思。……它〔資本主義〕準備了且在某個意義上實現了人類發展的普世性和不斷性。也因為這樣，排除了不同國家在發展形式上的重複。雖然被迫跟隨先進國家，但落後國家的事物不會按照同樣順序發生。歷史落後的優勢——這個優勢是存在的——允許或迫使它們在某個特定日期之前採用已然是現成的東西，跳過中介階段的一整個系列。野蠻人拋下它們的弓與箭，一下子就拿起了步槍，不用走完從前這兩種武器之間的道路。美洲的歐洲殖民者並未再次從頭展開其歷史。德國與美國在經濟上甩掉英國的事實，也是因為其資本主義發展的落後才有可能的。另一方面，當英格蘭長久以來扮演資本主義先行者的角色時，英國煤業中保守的無政府狀態……就是它們在過去所付出的代價。…… (ibid.: 4)

在這個著名段落中，「歷史落後的優勢」是「跳躍」或「跳過中介階段的一整個系列」本身，而非跳躍的結果，好比在經濟表現上超越先進國家——托洛茨基沒有這麼說。至於「排除了不同國家在發展形式上的重複」和「落後國家的事物不

---

<sup>63</sup> 馬克思 (Marx 2002: 8) 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提到這個用語說，「『外在必然性』的意思只能理解成這樣：當家庭和社會的『法律』和『利益』同國家的『法律』和『利益』發生衝突時，家庭和社會必然依從國家的情況。」這個時候「國家的意志和法律對家庭和社會的『意志』和『法律』來說是一種必然性」。

會按照同樣順序發生」，他也沒有指明「不重複的發展形式」和「不按照同樣順序發生」的過程是什麼。19世紀的俄國民粹主義者反而提出比較確切的看法。

舉例來說，受到列寧 (Lenin 1984-90a: 261-8) 推崇的赫爾岑就說：「你們〔西方〕的勞動和苦難就是我們的教訓。歷史很不公平。後來者不吃嚼過的骨頭，而是〔有權〕享受〔餐桌上〕的最新菜色。人類所有發展不外乎在時間上忘恩負義〔的表現〕。」(cf. Gerschenkron 1962: 168) 至於確切的發展形式，車爾尼雪夫斯基則表明：「俄國走上了資本被用在經濟生產的經濟發展階段。……我們很快就要進入競爭規律在其中大肆作用的領域。」但是，「不管發生什麼改變，我們都不能貿然動到從前繼承下來的聖物和留存的習俗，它的所有悲慘遭遇，都會被一項無價遺產——我們不能貿然攻擊土地的共用——抵銷，現在西歐耕作階級的福祉靠的就是將它引入所帶來的重大報酬。但願他們的例子成為我們的教訓。」(cf. *ibid.*: 172) 阻礙工業發展的農村公社必須保留下來，因為對俄國民粹主義者而言，先進技術引入之後，公社可以作為組織新技術的集體生產形式，超越西歐資本主義帶來的苦難；跳躍需要的不是一個新社會關係，「不重複的發展形式」和「不按照同樣順序發生」的過程正是舊社會關係的保留，似乎既有組織和先進技術可以完美融合。<sup>64</sup>

---

<sup>64</sup> 這裡應該提一下馬克思覆信給查蘇利奇的部分段落 (Marx 2001: 456 粗體為筆者所加)：

在俄國，由於各種情況的獨特結合，至今還在全國範圍內存在著的農村公社能夠逐漸擺脫其原始特徵，並直接作為集體生產的因素在全國範圍內發展起來。正因為它和資本主義生產是同時存在的東西，所以它能夠不經受資本主義生產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積極的成果。俄國不是脫離現代世界孤立生存的；同時，它也不像東印度那樣，是外國征服者的獵獲物。

如果資本主義制度的俄國崇拜者要否認這種進化的**理論上**的可能性，那我要向他們提出這樣的問題：俄國為了采用機器、輪船、鐵路等等，難道一定要像西方那樣，先經過一段很長的機器工業的孕育期嗎？同時也請他們給我說明：他們怎麼能夠把西方需要幾個世紀才建立起來的一整套交換機構（銀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進到自己這裡來呢？

馬克思也將俄國與歐洲並置，清楚意識到雙方的「不平衡發展」和俄國的「跳躍」。這些文字儘管時常被引為馬克思史觀靈活性的證明，卻未必代表他同意農村公社應該或必然繼續存在，甚至等同於社會主義。馬克思在談及俄國「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ibid.*: 461) 的可能性時，是就「理論」而言的，「但是我們必須從純理論回到俄國現實中來」(*ibid.*: 460-3)。現實中的公社已經無法維持下去，因為阻礙太多人的利益，唯一的挽救辦法就是革命 (*ibid.*: 466-9)。馬克思並不像俄國民粹派一樣，對保留農村公社抱有太多的想像和信念。

托洛茨基和他們雖然共享相同的問題意識，也就是「不平衡發展」的觀察和因應之道的思索<sup>65</sup>，但其判斷一方面更大膽——應該改變而不是保留舊社會關係——另一方面卻謹慎許多——發展的過程和結果無法事先決定。在各國接觸頻繁的世界整體中，從先進國家「拿來」各種相對進步的物質、取其發展成果的做法是很常見的，但「拿來」之後會發生什麼事，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綜合發展。

## 二、綜合發展

為了在國際競爭上生存，落後國家必須設法跳躍，跳躍的過程與結果難有定論，這就進入了國內層次。對此，托洛茨基的判斷相當謹慎：

跳過中介階段的可能性當然不是絕對的，它的程度最終取決於一國的經濟與文化實力。此外，當那些自外借來的成就設法適應在地較原始的文化時，落後國家給它們摻水（debase）的舉動也不罕見。由此看來，這個吸收的過程有著自相矛盾的特質。……

落後國家採納先進國家的成果時，會受到自身脈絡的各種影響。舉例來說，彼得大帝在軍事與工業上引進西方的技術和訓練方式，反而是為了強化農奴制，確保榨取勞動的管道。從歐洲輸入的軍備和貸款鞏固了沙皇制度，延遲了俄國發展。俾斯麥由上至下地結合了「鐵與麥」的手段也是同樣道理。當然，也可能出現像德國與美國最終在經濟上用掉英國的情況。

面對跳躍，無法預測結果，至少能指出其過程的形式，這樣就來到「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後半部「綜合發展」：

---

<sup>65</sup> 托洛茨基早年投身運動時曾參加民粹派團體（*Narodniks*），沒多久他就轉向馬克思主義。俄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一直與民粹派競爭，同時深受他們影響（Pipes 1960），列寧也一直保有這方面的理論與政治傾向（Clarke 1998）。在西方資本主義的進逼下，19世紀俄國的知識份子和抗爭者在思索俄國命運時很難不與西歐對比，何況德國的改革和統一幾乎是同一時期的事，這個前車之鑑也是對比的一環。「不平衡發展」在當時並不是一個罕見的觀點。

從不平衡的普世規律 (universal law) 中衍生出另一個規律，由於沒有比較好的名字，我們或許可稱之為**綜合發展**——以此表示把旅途中不同階段拖曳在一起、綜合分殊步驟、古老與更為當代的形式混溶 (amalgam) 之情況 (Trotsky 2008: 5)。

首先，呼應前文提到的普世性，如果不平衡的規律是普世的，那麼「綜合發展」很難不是，畢竟它是從不平衡規律中「衍生」出來的。其次，「綜合發展」的名稱是托洛茨基幾經思索後才取的，顯然他意識到術語和概念是否匹配的問題，因此前文討論「不平衡發展」術語與概念的落差並非空穴來風。第三，「不平衡發展」發生在國家之間的比較，落後國家為了生存不得不跳躍，「綜合發展」則是國家內部新舊階段或力量的交融，規定了跳躍的結果。

跟「不平衡發展」比起來，Davidson (2006, 2015) 認為，提出「綜合發展」才是托洛茨基的獨到之處。我們可以根據這個規律去判斷國家發展的類型，這些類型又反映了各國內部新舊力量交融的不同狀態。據此，Davidson 把 20 世紀的國家大分三類，儘管二戰之後資本主義經歷不同形勢 (1970 年代起的各種經濟危機、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和 1990 年前後蘇聯的瓦解)，這些類型仍舊發揮影響，「不平衡與綜合發展」一直運作著。

第一，西歐和美日諸國：在 19 世紀結束前發揮「歷史落後的優勢」，「綜合發展」的結果是在 20 世紀前期擠身列強，除了彼此在政治經濟上持續競爭，也共同爭搶著支配世界上其他國家，引領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時期。第二，在帝國主義面前毫無招架之力的殖民地或依附國：「不平衡發展」在它們和強權之間相當明顯，這些國家卻沒有因「綜合」而「發展」；在無法有效動員和組織政治權威的情況下，引入的各種新力量未能撼動既有的社會關係，許多非洲國家就是血淋淋的實例。第三，俄國、中國和土耳其等昔日帝國或絕對主義國家：它們大致保有政治疆界的自主性，並未完全淪為殖民地，相對容易成為資本主義出現和發展的溫床，因為封建基礎的持存，資本積累在此的矛盾更加劇烈。

把「綜合發展」放回建築隱喻，問題就可以表述如下：在發展階段各異的社會之間轉移的生產力，在引入特定社會之後，究竟是受到既有生產關係——「一國的經濟與文化實力」——的限制更大，必須適應它、隨著階級鬥爭而提高或降低，還是對生產關係的改變更大，使生產關係成為其桎梏、最終促成它的轉型？

這是很難說的。這種表述的微妙之處在於：絲毫沒有離開「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關係，卻有了不同的意義——適應或矛盾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在空間上跨越疆界互動的結果，不只在時間上於單一社會內部發展。

所謂的「不同階段」、「分殊步驟」和「古老與更為當代的形式」，既然可能包含（新）生產力和（舊）生產關係，那麼也可能包括（新）生產關係和（舊）生產關係，畢竟在有特定生產關係適應一定水平之生產力的意義上，**新生產力的引入其實形同新生產關係的引入**。多種生產關係或生產方式（一併考慮統治關係的話）的共存和互動，其實就是一個具體的社會形構。

「不斷革命」的思想充滿了這種新意。在俄國社會形構中，不同生產關係所導致的矛盾表現為激烈且複雜的階級鬥爭（與聯合），最終給政治革命提供了條件。俄國無產階級強大、資產階級衰弱和兩者受制於西歐資產階級的事實，是新的、外來的生產力與既有生產關係「綜合」的結果；無產階級必須與農民聯合，在對抗封建／絕對君主制時一併推翻資產階級專政也是多種生產關係或生產方式「綜合」的結果。

由於考量了空間互動，「綜合發展」——生產關係與（外來）生產力的適應與矛盾、不同生產關係或生產方式的共存與互動——是以「不平衡發展」為前提的，要在「不平衡發展」的脈絡下才會發生；反之，「不平衡發展」之後「綜合發展」也勢必會發生，兩者是同一過程的不同環節，由於屬於不同層次，因此分開命名和討論。當然，我們可以思考是否有一個名稱足以統攝這兩個環節，而不是用以「與」（and）來連結它們，提出「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複合式概念。給這個規律命名想必非常傷腦筋，正如「不平衡發展」在字面和實質意義上的落差情況一樣。

下一節討論「不平衡發展」的世界層次。如果沒有這個部分，我們就很難說明為什麼多個國家會形成一個「差異化**整體**」、在「同一範圍」內競爭（不管是全球還是特定區域），落後國家也無法自先進國家引入各方面成果，最終也不會出現綜合發展。雖然托洛茨基思索「不平衡與綜合發展」時，的確偏向國與國之間的比較與互動，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在討論這個概念時也是這麼做，不過前文提到，托洛茨基把國家之間「經濟一體化及平均化的趨勢」歸因於「分工體系」，而這是與國際競爭不同的另一種秩序。

### 第三節 本體論意涵：與世界體系分析對照

在當代的馬克思主義文獻中，對分工的討論與應用最受矚目的，或許非世界體系分析莫屬。自 Immanuel Wallerstein 以來，這個學派已經從分工開展出許多研究。儘管馬克思也很重視「世界市場」<sup>66</sup>，不過我們不檢視這個途徑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和對批評的回應<sup>67</sup>，而是與之對照來認識「不平衡與綜合發展」。下文概要與批評 Wallerstein 代表的學派，尤其是與「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相關的部分。

#### 一、概要

在社會科學中，Wallerstein 提出的途徑有一大特色：拒絕把民族（主權）國家當作唯一的「分析單位」（unit of analysis）：

我完全拋棄了把主權國家或民族社會這個模糊概念作為分析單位的想法。我認定他們都不是社會體系，而我們只能在社會體系中來討論社會變遷。在這個框架下，唯一的社會體系就是世界體系（world-system）。

這麼做當然是非常簡化的。我只有種類型的單位，沒有多個單位中的多個單位。我把主權國家中的變遷，解釋為世界體系演化與互動所產生的成

---

<sup>66</sup> 這點相當明確，只不過他沒有時間寫下足夠文字。馬克思在《1857-58 經濟學手稿》中說過，想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結論討論世界市場；此外，他也表示，「生產以及它的每一個要素都〔在世界市場中〕被設定為總體，但是同時一切矛盾都展開了。於是，世界市場又構成整體的前提和承擔者。」（馬克思，1995c：181）。這裡的「總體」與「矛盾」跟托洛茨基對「不平衡發展」的雙重理解應該是相符的。

<sup>67</sup> 把 Wallerstein 放回整個世界體系分析的系譜中，他恐怕是離馬克思最近的一位。除了繼續使用「生產方式」一詞（見下註），連現代世界體系的誕生也被設定在 16 世紀。Braudel (1984: 57) 對此感到有些不滿：「我並沒有和 Immanuel Wallerstein 一樣著迷於 16 世紀。困惑他的問題最終不就是馬克思提出的那個嗎？讓我再次引用這個著名的句子『資本主義的生命史始於 16 世紀』。」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 (Marx 2003b：823) 雖然說過「在 14 和 15 世紀，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經稀疏地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最初萌芽」，但他又立刻表示「資本主義時代是從 16 世紀才開始的。」為了拓寬研究視野和避免歐洲中心論，Braudel 和其他世界體系分析作者已經很少把世界經濟的首次出現限定在 16 世紀歐洲。一般來說，Wallerstein 與馬克思（主義）之所以有時顯得格格不入，主要是因為前者強調分工和貿易，後者著重分析生產和生產關係。然而，這兩種社會關係並不是兩條不相交的平行線。本文第六章會嘗試將它們整合起來。

果。但這麼做也讓事情複雜化。在現代，我可能只有這一種例子。假設我是對的，正確的分析單位就是世界體系，主權國家就要被看成這個單一社會體系中諸種組織性結構中的一種。除了書寫這個體系的歷史之外，我還能做什麼呢？(Wallerstein 1974: 7)

在 17 世紀之前，人類歷史是由「世界帝國」周而復始地確立、擴張與衰落所支配的；此外，尚有一些微型部落。最重要的是，帝國會抑制資本積累，打壓商業活動，它們只能在政治實體的邊沿遊走。現代「世界體系」的出現意味著資本突破了這些障礙，透過日益擴大的國際分工和隨之而來的商品貿易首次形成「世界經濟」(*ibid.*: 348)。這裡所謂的「世界」尚不等於佈滿地表的「全球」，而是指社會行動者滿足生存需求所倚賴的範圍，儘管隨著資本主義擴張，「世界」很有可能與「全球」重合：

在 15 世紀晚期和 16 世紀早期，我們所稱的歐洲世界經濟(world-economy)出現了。這不是一個帝國，但卻像龐大的帝國一樣幅員遼闊，並且和它有某些共同特色。但它不同，而且是新的。這是一種這個世界此前尚不知曉的社會體系，……不像帝國、城市國家和民族國家，它是一個經濟實體，而不是政治實體。事實上，它在其範圍(bounds)(很難說是邊界[boundaries])內包含了帝國、城市國家和興起中的「民族國家」。這是一個「世界」體系，並不是因為它包含了全世界，而是因為它比任何法律定義的政治單位還要大。這是一個「世界經濟」，因為該體系中各個部分的基本連結式經濟的……(*ibid.*: 15)。

這幾段文字已能顯示托洛茨基和 Wallerstein 的共通性：重視世界和國際層次，只不過目前看來，Wallerstein 的主要對象是前者。

國際分工使世界經濟分為「中心」、「半邊陲」和「邊陲」。分工的內容主要是生活必需品，Wallerstein 認為「長遠來看，必需品比奢侈品在人類經濟主軸上的作用更大。」(*ibid.*: 42)<sup>68</sup> 在現代世界體系的中心，也就是占支配地位的地區

---

<sup>68</sup> 由於不將奢侈品交換列為定義世界體系的指標之一，Wallerstein 的典範後來遭到修正。對一些



或國家，工農業生產率和資本積累的程度最高，技術和機械化水平也高。邊陲的經濟活動多為勞力密集，出口項目集中在原料和農產品。半邊陲在各方面都介於兩者之間，功能是緩衝兩極的衝突：「這些中間地區（就像帝國內的中間團體）多少轉移了邊陲地區團體對中心國家施加的壓力，也轉移了在國家機器中或藉此對中心國家施壓的團體。」(ibid.: 350) 透過國際分工，原本在世界經濟體系之外的地區或國家逐漸被納入，整個體系日益擴張，「中心」、「半邊陲」和「邊陲」的結構不變，佔據這些位置的國家卻會改變。<sup>69</sup> 這個進程一直持續到 20 世紀。

在國際分工中，不同區域的「勞動控制方式」(mode of labor control) 不盡相同，而「每一種勞動控制方式對特定種類的生產來說，都是最適合的。」(ibid.: 87) 邊陲地區多為強制性勞動，如 16 至 17 世紀東歐的再版農奴制和美洲種植園的委託監護制 (encomienda)。雖然與西歐 15 世紀之前的封建主義類似，農民束縛於土地上，但西歐的「勞動控制方式」更限於家庭經濟和地主的戰爭需求，東歐與美洲則是為了資本主義而生產，剝削程度依賴市場，剩餘產品輸往中心。中心國家不是沒有強制性勞動，只不過是間接的，主要通過雇用勞動來完成，因為邊陲地區提供廉價穀物，使中心的工商業發展保有外部條件，只需相對少的農業勞動力。「若不這樣，就不能確保一種使資本主義體系存在的剩餘流動方式。」(ibid.: 87) 這就形成中心對邊陲的剝削<sup>70</sup>。

值得一提的是，對 Wallerstein 來說，資本主義是這種「世界經濟」或「世界體系」的唯一「生產方式」<sup>71</sup>，而不是其中某一地區的生產方式，所以「資本主

---

研究者來說，正是因為把分工限定在必需品，他無法處理前現代的世界體系，好比在更加自給自足的時代或地區，交換或遠程貿易仍然存在，只不過內容多半不是必需品，而是奢侈品。Janet Abu-Lughod 研究的「13 世紀世界體系」是這方面的代表。

<sup>69</sup> 「中心」、「邊陲」和「半邊陲」有時候指「地區」而非「國家」，是因為對 Wallerstein 來說，邊陲的政治自主性不強，可能只是規模較小的政治體或力量較弱的殖民地，中心則往往能採取國家的形式。

<sup>70</sup> 關於中心與邊陲的「不平等交換」(unequal exchange)，Wallerstein (2014: 31-2) 提的不多。在政治經濟學方面，最著名的理論是 Emmanuel (1972)，亦可參考 Howard and Kind (1992) 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脈絡下的簡介。把不平等交換建立在（勞動）價值的國際轉移上，已經引發不少爭論與批評（見 Bernal 1980, Birkan 2015 的整理）。

<sup>71</sup> 雖然 Wallerstein 使用「生產方式」一詞，但不是在「生產關係」的意義上使用。如前所述，後者已被「勞動控制方式」取代。因此，當他說「在 16 世紀，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基礎的歐洲世界經濟出現了」(Wallerstein 1974: 67) 時，並不是說歐洲世界經濟以「西歐」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基礎，而是說「整個歐洲」都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我們可以合理地質疑：在同一

義與世界經濟體只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在這個意義上的資本主義有著多重政治體，「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夠不斷繁茂，正是因為在這個世界經濟範圍內存在的不是一個政治體系，而是多個。」(ibid.: 348)

## 二、批評

接著看看這種途徑有什麼問題，可以如何幫助我們。它的問題在於受限於一個「單數本體論」，可是卻能幫助我們從體系的視角看到另一種「不平衡與綜合發展」，補足托洛茨基沒有說明的地方。我們分兩點來談。

首先，當 Wallerstein 把世界經濟或世界體系視為一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時，似乎是對生產方式採取了我們在第二章所說的第四種定義，也就是包含多種生產關係的社會形構，其中資本主義「占支配地位」，而我們以該生產關係命名生產方式；資本主義不再是「某個國家或地區」的生產關係——這會陷入「主權國家或民族社會」的窠臼——而是多個國家或地區及其中生產關係互動下的單一體系自身。

這種定義的生產方式之所以存在「占支配地位」的生產關係，是因為後者可以利用其他生產關係來再生產，因而有所謂的「支配」。在此，再生產作為一種機制（不管是交換關係如市場，還是國際關係如戰爭）被特定的生產關係利用，臣服於體系中的優勢單位或生產關係。當 Wallerstein 說各地「勞動控制方式」能夠適應整個體系而存活時，他的意思是：各個單位的生產關係共同臣服於一套再生產機制，被一個宏觀的分工體系所利用。這就不免引起如下嫌疑：結構（世界體系）本身能夠脫離行動者（各個國家或地區及其「生產關係」或「勞動控制方式」）獨立存在，不是由它們的互動所構成，也不是被其中的優勢單位所主導，有把單位化約至體系的危險 (Skocpol 1977)。

不少人初讀「世界體系分析」的相關著作，都會為其宏觀視野折服；作者們考察的空間不只限於特定國家，還橫跨不同文明，帶領讀者看到相距遙遠的各個地區相互依賴的事實，其中行動者透過生產力或其他物質的交換，彼此又連結起來。然而，這些開闊的書寫固然涉及「多個」國家、地區或文明，它們的真正對

---

段時期，如果西歐不存在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分離和一定規模的雇用勞動，Wallerstein 是否還能談論「整個歐洲」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國內部特定生產關係帶來的影響恐怕還是至關重要的。

象卻始終不是這些複數單位或行動者，而是（如其途徑名稱所示）它們構成的單一體系，一個凌駕並作用在各個部分之上的整體。

這個整體是一個單一而抽象的社會，只不過不是發生在某個國家「之內」，而是座落在多個國家「之上」，世界體系不外乎這樣的社會。因此，這個途徑固然超越了民族國家的藩籬，卻沒有超越民族國家預設的「單數本體論」（singular ontology）（Matin 2013: 7）或「本體論的單數性」（ontological singularity）（Rosenberg 2013），反而延續了它，以單一世界體系取代單一國家或地區。

第二，對世界體系分析學者來說，上述批評或許有失公允，畢竟 Wallerstein 不也用心良苦地提到地區或國家之間的剝削，因而有「中心」、「邊陲」和「半邊陲」之分嗎？的確，行動者之間的互動不容否認，但正是在此，我們應該注意這套權力階序的命名視角：體系。托洛茨基對「先進」與「落後」的區分不完全是就體系，也有很大一部份是就行動者「之間」——而非「之上」——的關係或比較來說的，也因為這樣，「不平衡發展」容易偏向國際競爭的理解。就此而言，托洛茨基和 Wallerstein 可以互補<sup>72</sup>，考量世界體系分析其他作者對「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思考，這點就會更明白。

對他們來說，人類早期歷史的「不平衡發展」根源於「自然資本」的不平衡地理狀態（Chase-Dunn and Grell-Brisk 2016: 211），中心與邊陲之分於此誕生；而 Chase-Dunn and Hall (1997: 78) 認為，半邊陲區域是創新的沃土，離邊陲地區不遠又持續模仿與學習核心地區出現的新事物，「許多半邊陲的政治體可能致力於某種形式的混合發展」（Chase-Dunn and Grell-Brisk 2016: 208），進而「產生轉變系統結構和積累方式的新制度性形式」（Chase-Dunn and Hall 1997: 79）。Chase-Dunn and Grell-Brisk (2016: 207) 更直接表示：「在形構半邊陲發展的觀念中，托洛茨基筆下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概念扮演了重要角色。」

從體系的視角出發，他們概括了托洛茨基、Alexander Gerschenkron、文化人類學家 Elman Service 和史家 Carrol Quigley 的理論，指出他們對理解「半邊陲」的貢獻，但隨即表示：

---

<sup>72</sup> 西方學者在這方面的討論比較少見，可參考 Staeger (2014) 的初步嘗試和 Mielants (2016) 的批判。在與世界體系分析相關的依賴理論（尤其是在談論拉丁美洲的歷史發展時）方面，也有部分作者注意到托洛茨基的貢獻（Chilcote 2009）。

這些途徑的一大問題就是，都以發展的水平或階段來陳述。因此，它們完全忽略了在體系內部，社會之間關係的階序及結構層面。它們很少去注意在一個更宏大的、由社會所結構化的區域性階序中，落後或半邊陲地區之趕超作為向上移動的重要性。……核心／邊陲階序和不平衡發展的再生產程度，受每個世界體系所決定 (Chase-Dunn and Hall 1997: 82)。

至於半邊陲，則「依賴存在於任何特定世界體系中核心／邊陲關係的本質，這是因為核心、邊陲、半邊陲都是依賴脈絡的關係性概念」(ibid.: 79)。

總之，即使可以用「不平衡與綜合發展」來描述國家或地區之間的關係，該關係也是世界體系這個「社會」賦予的成果，並非各國及其統治階級的競爭所能完全形塑的。一方面「不平衡發展」指的是**體系**的階序，不僅僅是國家或地區之間不同性質或歷史進程（如生產關係）的比較；另一方面與其說單一國家或地區內部會發生「綜合發展」，不如說**體系**階序會互動，而互動的結果發生在體系的某個部分，即半邊陲地區。易言之，國家或地區之間的互動與其說是它們「自己的」，倒不如說是「體系的」，核心與（半）邊陲是各個國家或地區在體系中的**角色**，「綜合發展」是體系角色互動的某種**結局**。

### 三、國內、「國際」與世界：三層次本體論

綜上所述，「綜合發展」可以像橡皮筋或黏土一般被「拉向」世界層次或體系的一極（世界體系分析），也可以被「拉向」國內的一極（托洛茨基）。這裡無意比較托洛茨基和世界體系分析，而是想藉由他們的互補指出「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在本體論上的特殊性。

首先，雖然我們用「結構」和「行動者」這對社會理論的常見概念批評世界體系分析的偏失，但「不平衡與綜合發展」超過了它們所蘊含的本體論層次。一般來說，結構和行動者的用法只涉及兩個層次，「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卻涉及三個層次：國內、國際與世界。若要使結構和行動者的問題類比於這三個層次，就必須談論社會結構之外的「環境」或進入行動者的「內在」，如心理或生物學機制，這才納入了第三個層次。

其次，這三個層次中有一個是最特別的：國際。因為國內和世界都屬於前文提到的「單數本體論」，也就是以抽象而單一的社會存在為前提。相反，如果不把國際僅僅設想為統治者、統治階級成員或（民族）國家之間的互動，而是兩個以上社會的並立與互動，在理論作業起始即把社會外部因素納入考量，本體論就從「單數」轉為「複數」（plurality）了。

傳統的社會理論在討論結構與行動者的問題時，習慣把結構的形成、發展與改變以及行動者互動的結果、過程及脈絡等，設想成發生在抽象而單一的社會內部，社會發展本身因此也是單線的。單數本體論通常會導致兩種情況：排除國際因素，聚焦在國內行動者與社會結構之關係；排除國內因素，聚焦在國際構成的單位與系統層次。

第一種情況，論者把研究對象限於國內社會，不考慮國外因素或「必要時」才考慮。舉例來說，Barrington Moore 在解釋中國共產黨在二戰後的勝利時，曾多次訴諸它在國際因素方面的「幸運」，而納入國際因素來解釋革命的 Theda Skocpol (1973: 29) 便質疑：「如此系統性採納的解釋性因素，真的能被稱作『幸運』嗎？」(cf. Rosenberg 2013: 226, n1) 言下之意，Moore 並沒有一開始就納入無可避免的國際因素，或者在本體論上考量國際向度，只在需要的時候臨時或特別增添 (*ad hoc*) 上去。這裡的問題當然也和「方法論民族主義」有關。

第二種情況，論者把研究對象限於國際社會，排除國內因素，這種做法尤其發生在試圖確立國際關係 (international relation) 作為一門學科和人類實踐領域的獨立性的國際關係 (International Relation) 學者手中。一個有趣的例子是結構現實主義代表 Kenneth Waltz。他在回應批評時曾提到涂爾幹，表示社會理論對構思國際政治理論的重要性 (Waltz 1986)。Waltz (1979) 的理論就是在充分考量「系統層次」和「單位層次」的互動後建構出來的，形同把國與國的關係類比於國內社會；<sup>73</sup> 國內層次並非研究對象，而是思考的資源，其理論只有兩個層次。

---

<sup>73</sup> 長期以來，部分國關學者一直努力跟一種思維方式鬥爭：「國內類比」(domestic analogy)。Hedly Bull (1969: 35) 說：「國內類比把國內社會個人間的經驗推為國家間的經驗，在此論證下，個人間為了和平生活而臣服於一個共同權力，正是國家間亦當如是之基礎。」作為「英國學派」(English School) 的代表人，Hedly Bull 和 Martin Wight 批評現實主義背後的霍布斯邏輯，認為「國際社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有自身的秩序而不需臣服單一權威，有內在的邏輯而能獨立於國內社會被研究。因此，「國內類比」這個詞要從反面來理解，即「不能類比至國內」。雖然如此，我們還是可以透過「整體／個體」、「系統／單位」或「結構／行動者」來構思國際處境。

Waltz 的例子之所以有趣，是因為他其實嘗試過在「系統層次」和「單位層次」之外整合國內層次；如果這項任務完成了，便出現了三個層次，可是基於下述理由，他沒有做。在《國際政治理論》(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中，他曾指出理論應滿足三個要件：一，為龐雜的經驗現象劃定範圍，因此理論必須是限定的；二，指出該範圍中各種行為與結果的規律以及結構的模式；三，具有創意，符合直覺 (Waltz 1979: 9)。因此，他雖然承認「國際政治經濟理論」比「國際政治理論」更好 (Waltz 1990: 31)，但基於第一個要件，國際政治作為現象應該被單獨圈出，作為理論也應該被單獨建立。

同樣的，他也鼓勵學生，若要有好表現，「就要專注在分開的國內和國際政治理論，直到有某人想出怎麼把它們整合起來。」(Waltz 1986: 340 粗體為筆者所加) 大概不會有人否定國內政治對國際政治的影響，可是「但為理論故」，必須將兩者劃開，再說也很難想像怎麼把兩者整合起來，Waltz 後來接受 Halliday and Rosenberg (1998: 379-80) 訪問時再次承認，一個整合性理論「會比國際政治的簡單理論好很多……然而，沒有人想到要怎麼做。我想了很多，但沒有想出來該如何做，至今也沒有人做到。」

要怎麼做？兼具三個層次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或許就是答案。不過如前文所述，這個概念尚未充分開發。為此，我們已經參考了 Wallerstein 的理論，看到世界體系分析對世界層次的偏向（顧名思義）。這個層次是重要的，卻不能脫離較低層次的行動者互動<sup>74</sup>；當這些互動（不管是地緣政治競爭，還是商品及生產力的流通）不夠發達時，世界層次就很難形成，即便體系已經在地表的若干地區出現，也尚未凌駕全球，Abu-Lughod (1991: 6, 35-6) 就把 13 世紀的世界體系

---

Waltz 的做法就是如此。此外，Michael Walzer (2015) 在其經典作《義戰與不義之戰》(Just and Unjust Wars) 中也用了國內類比來論證何以反侵略戰爭是一種義戰，「雖然國內類比是相當重要的知識工具，卻無法對國際社會提供一個完整而精準的描繪。……我只是為了分析的簡潔而忽略它。」或許對英國學派來說，國際上不存在主權者，國家之間的關係是透過各種「規範」來維繫的，但問題是，這樣的推論有擺脫「國內類比」嗎？即便不應該進行「國內政治類比」，他們還是很難拒絕「國內社會類比」，所謂的「國內類比」有這兩種類型。

<sup>74</sup> 在世界體系分析中，由全球分工或貿易構成的世界層次相當於 Waltz 的「系統層次」，只不過前者是經濟的，後者是政治的，是由多個國家作為「單元」所構成國際結構。Waltz (1979: 38) 也批評 Wallerstein 試圖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同時解釋國際和國內的政治情況——「中心」、「邊陲」、「半邊陲」的權力階序（國際）和它們內部的「勞動控制方式」（國內）——混淆了理論的第一個要件，也就是為現象劃定清楚範圍。

分為八個，這些體系沒有任何一個掌握領導權，雖然彼此連結，但相互穿透的程度和統治對方的能力還是很弱的。

一旦世界層次建立，隨著資本主義擴張，國際層次又有臣服於它的可能。從 Wallerstein 的觀點來看，「沙俄試圖在與西歐國家的軍事競爭中生存下來」之類的表述凸顯了俄國的（半）邊陲性質，我們完全可以從世界體系的高度「俯瞰」克里米亞戰爭，將它視為資本主義擴張、收編（半）邊陲國家的過程在軍事上的標誌性事件。國際層次的獨立性似乎沒有世界層次強。

托洛茨基強調「國家對立」和「世界經濟一體化與平均化的趨勢」之間的矛盾。現在的問題是如何確保這個矛盾不偏向一隅，避免矛盾中止、動態消失。就像多個行動者（人類個體）處於國內社會關係，多個行動者（國家）也處於國際社會關係。如果國際社會關係僅僅被設定為結構化的世界經濟，相關分析就會像 Wallerstein 所做的那樣，隸屬單數本體論，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也就成了一個抽象的社會。

再次，要讓矛盾持存，真正轉向複數本體論，所謂的「國際」恐怕也不能按照字面意義「國家之間」來理解。到目前為止，「不平衡與綜合發展」都發生在國家之內（新舊文化、歷史階段與社會關係的綜合發展）、之上（世界經濟）和之間（國際競爭的不平衡發展）。問題是，國家這個制度究竟具有多大或多強的「覆蓋力」？

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的任何一個國家都存在發展和性質各異的多個地區和群體，隨著時代越晚近、國家越龐大，這些地區和群體可能越複雜；不僅如此，它們還能穿透國家邊界，直接位處多國交界。不管這些邊界是穩固還是浮動，也不管這些國家的領土是大還是小，國家都不可能完全覆蓋這些地區和群體、令它們成為「國家內部」。這些地區和群體也同樣會出現「不平衡與綜合發展」。<sup>75</sup> 因

---

<sup>75</sup> 舉例來說，在探討封建歐洲轉向絕對主義時，即便編年史表明某國君王專制確立，我們也不能期待所有地方勢力就此安定，特定地區通常還有強健的領主「伺機而動」，更不用說城市商人團體往來於各國之間，而這些地區的政治積累實力都是「不平衡發展」的。對他們來說，君王甚至只是一個暫時凌駕他們之上的領主而已。不說遠的，只看 21 世紀台灣。以政務官是否收賄作為民主化指標之一，各個縣市也是「不平衡發展」的，花蓮和台北在這方面就不處於相同的民主化進程，前者可能是後者十年或二十年前的程度；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政策往往也有「時差」，前者可能已經忙於應付各種後現代社會問題，而後者才要設法現代化（也可能相反）。此外，台灣的企業資本也是跨國移動與連結的，近十年來尤其西向中國。中國同一個時期內，沿海和內陸城市的工業化時程表也不一樣。更重要的是，時差發生的這些地區還會彼此互動。以上現象都不是

此，為了讓國際層次不被世界層次吞沒，就有必要將國際深化為「社際」(the inter-societal)，即多個社會之間無法被國家化約的共存與互動狀態。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三層本體論中「國際」是真正特別的。

這並沒有否定國家仍是經驗上最有能力進行「覆蓋」的制度或組織，也是發生「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最主要場所。重點是：第一，國家不能不以社會為基礎；第二，在社會總是複數的、多的、彼此各異且互動的前提下，國家也才是複數的、多的、彼此各異且互動的；第三，在這種複數本體論的視野中，國家與社會從來不是「一對一」的關係。當然，複數國家是如何從複數社會中出現，進而成為最有能力進行覆蓋的制度或組織，就是一個歷史和理論問題了。

無論如何，在本體論上，國內<sup>76</sup>、國際和世界分屬三個層次。國內層次總是涉及國家（或社會）內部的性質與發展，很難不受外界影響，憑著既有狀態與這些影響互動、融合，儘管仍然處於單一實體內部；世界層次（當它確立時）既是複數實體互動的結果，也作用在複數實體上。國內和世界層次都是一個整體，不管指的是國內（階級）社會還是世界（分工）社會 (Denemark and Thomas 1988: 48)。中介它們的國際層次是一個充滿複數實體的人類社會實踐向度，我們可以深入它們各自的內部，探究其性質與發展（國內），也可以觀察它們在時間中可能共同構成的新的單一整體，探究其性質與發展（世界）。

由於已經上升到本體論，這裡的討論開始具有普世性，「多個國家與多個社會」的歷史與理論問題和這三個層次的關係，將在第六章討論 Justin Rosenberg 的反思時再進一步討論。

#### 第四節 方法論意涵：與 Alexander Gerschenkron 對照

前文強調國際向度和複數本體論時忽略了歷史。把歷史置入複數本體論，社會發展（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矛盾、階級鬥爭與政治革命等）就不再取決於單一

---

以國家為單位的。

<sup>76</sup> 嚴格說來，「國內」只是「某種社會實體之內」的代稱，只不過在當前的討論中，最具代表性的實體仍是國家。這裡在用語上的曖昧性其實和前註「國內類比」一樣，domestic（亦有家庭內部的意思）並不一定是「國內」，而是某個實體內部。此外，「內」或「內部」也只是相對而言的，應視討論主題而定。



時間軸，每一時間軸會相互干預，因為行動者能參考「前車之鑑」、借鏡「他山之石」。下文以發展經濟學家 Alexander Gerschenkron 的思考來闡述這個特質。

任何一位大致了解托洛茨基思想的馬克思主義者在讀過 Gerschenkron 的作品後，應該很難不聯想到托洛茨基。雖然提到馬克思並且也研究蘇聯經濟，但 Gerschenkron 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至少表面上看來不是）。他的研究對象主要是 19 至 20 世紀歐洲的工業化進程，相對來說沒有那麼「政治」。《歷史視野下的經濟落後》（*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的主要命題可以概括如下：「當一個落後國家最終發起工業化時，其工業化進程與更先進的國家相比，將顯示出極大不同。」（Gerschenkron 1962: 7）這個宣稱看似否定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說的「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欠發達的國家展示了後者未來的圖景」，Gerschenkron 卻承認德國在 19 世紀下半葉遵循了英國早期的道路。我們怎麼理解這種前後不一致？

#### 一、方法：比較、連結與整體

關於歐洲工業發展的進程，Gerschenkron 不打算拒絕普世規律：「歐洲的工業發展，經常依據得自英國經濟史的經驗材料而建構的一般模式來描述。這種方法並非沒有價值。正是因為在所有的工業化過程中存在著共同特徵，所以這種方法過去擁有、現在仍然擁有某種解釋力，甚至具有預測的價值。……但同樣真實的是，……當然人們日益深入某一主題時，他們必然會在這個或那個領域碰到並不適合這種一般模型的東西。」這時研究者怎麼處理這種情況？兩種選擇：

將事情視為例外，並按照這種方式來處理它們。或者，他可以通過將它們帶入一種新的、儘管不一定是更複雜的模式，來把這種對於原始模式的偏離做系統化的處理。這並不是經濟史所特有的，相反，它是所有的科學進步都必須遵循的路線。

「系統化的處理」不只是研究者主觀地連結各個案例或異例而已，還有很明確的客觀所指：「每一個發生的歷史事件都會改變隨後所有事件的過程。英國的工業革命以及其他國家的此類事件都影響了隨後所有的工業化過程。」（*ibid.*: 41）將

個別案例與典範對照時，就應該去設想：當前案例對「一般模式」的偏離是否正好是受此典範或指標影響的結果。

回顧資產階級革命，對它的挑戰多是以例外來看待歐陸各國革命的狀況。雖然沒有討論歷次資產階級革命之間的相互影響，但「後果主義的觀點」正是把資產階級革命典範放回資本主義起源與擴張這個龐大而持續發生的「系統」中。相同的，Gerschenkron 也反對「把單個區域上的產業演進的關鍵特徵視為相對於標準模式的特殊性、特質性或例外，而是作為一個落後等級體系的一級或部分」。與社會科學常見的「比較」對照，這種方法更為全面。

德國社會史家 Jürgen Kocka (2003: 44) 曾指出，比較應和「連結」或對「關係」的考察整合起來，因為「比較的動作預設了被比較事例在分析上的分離。但是這不代表我們可以無視或忽略這些事例之間的相互關係……而是要藉由分析這些相互關係，把它視為被比較事例之間產生異同與分合的因素，使其成為比較架構的一部份。」值得注意的是，他認為已經有人這麼做過：

以 Alexander Gerschenkron 對歐洲工業化的經典比較為例。他多少把歐洲工業化視為一個整體，而同時，他又比較了其部分或區塊，即不同國家內部的工業化過程。他非常看重這些國家的相互關係，好比資本、勞動、工具、觀念的進出口，以及歐洲不同國家的工業化實行者在感受、模仿、傳遞和拒絕上的過程。他向我們展示了，某些相互關係促成了歐洲工業化在國家型態上的相似性，另一些則產生了重要的差異。(ibid.)

用 Gerschenkron (ibid.: 42) 自己的話說，把國家視為一個有意義的、能夠供人提取各種資料的研究單位「無疑是正確的」，但是：

若人們孤立地考慮任何一個國家，他們……就無法理解其產業發展問題。落後當然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它預先假定了更先進的國家存在。此外，只有通過比較幾個處於不同落後程度的國家之工業化過程，人們才有希望把某個既存工業發展中的偶然性因素與那些可以合理地歸因於一國發展的歷史滯後的因素分離開來。最後，正是因為落後國家也構成了包括更先進國家在內的

一個更大的區域的一部份，所以歷史的滯後可以按照某種特別易於理解的方式被克服。

跟托洛茨基一樣，首先，Gerschenkron 採用複數本體論，研究對象都是「多個國家」。其次，在比較之下，這些國家在工業化程度上有先進和落後之別，它們構成的國際關係是「不平衡發展」的。第三，雖然沒有提到「綜合發展」，但 Gerschenkron 把落後國家放進整個「區域」或「落後等級體系」，和共處其中的先進國家並列，這個區域所代表的整體相當於前文提到的「世界層次」。這裡的方法論意涵和「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在本體論上區分國內、國際和世界相應，可以分別稱之為比較（針對分開的各國內部性質來比較）、連結（觀察它們的關係或相互影響，如模仿、傳遞或拒絕）和系統化或整體化的歷史考察（這些國家共處之整體或共同具有的特色或目標，如工業化）。

## 二、案例

現在透過 Gerschenkron 提供的案例說明系統中落後國家實施工業化，「克服歷史滯後的方式」；在這方面，它們既同且異。

首先，工業化不是任意的，落後國家必須在以下兩個方面形成張力才有實施的條件：一方面現有經濟活動阻礙了工業發展，另一方面工業發展給該國帶來期望；此外，也要有足夠自然資源 (*ibid.*: 8)。當他進一步提到「只要某些可怕制度（如農奴制或政治統一的普遍缺乏）依然存在，就沒有任何工業化的可能」(*ibid.*)時，「張力」的「兩個方面」很難不讓人聯想到生產關係和生產力，而張力就是兩者的「矛盾」。

其次，假定障礙排除且自然資源足夠，即國內實施工業化的機制開啟，我們也不能認為各國工業化的方式會相同，因為「工業化固有的機會將和一國的落後程度按照同一方向發生變化」(*ibid.*)。「落後程度」必然是連結性或關係性比較的結果，而「定義落後程度的一種方法，就是用落後國家中缺少的那些在較先進國家中成為工業發展前提的因素來衡量。」(*ibid.*: 46)

舉例來說，英國工廠的建造得益於既有的、自發的大量私人財富，這些財富構成原始資本積累。可是縱觀 19 世紀，沒有一個歐陸國家展開工業化時，像英

國一樣擁有充分的資本積累。Gerschenkron 羅列了落後國家的等級體系：「在經濟上，德國比法國落後，奧地利比德國落後，義大利又比奧地利落後，俄羅斯比前述國家都還落後。」(ibid.: 44) 當缺少條件又必須工業化時，資本積累是否不再是工業化的前提，因而「資本原始積累的概念沒有保留下什麼東西……每一個案例都必須進行獨立的研究」(ibid.: 46)？

別急著拋棄前提。研究者和落後國家要做的，是去尋找短缺因素的「替代模式」(ibid.)，把先進國家工業化的「原因」當作「結果」(ibid.: 50)；換句話說，它們也需要資本積累，但不是依靠事先存在的私人資本家或財富（因為幾乎沒有這些東西），而是透過制度性因素在事後把資本生產出來。

Gerschenkron 區分了三種地區，「先進地區」、「中等落後地區」和「極端落後地區」，並把資本的來源同時按照時間和空間排列成一個階段性體系：

階段	先進地區	中等落後地區	極端落後地區
I	工廠	銀行	國家
II		工廠	銀行
III			工廠

表 2：資本來源的階段性體系

資料來源：摘自 Gerschenkron (1962: 355)

這三個地區由 19 世紀的英、德、俄代表（詳細說明可見 Selwyn 2011: 431 整理的表格），介於其間的還包括法、義、保加利亞等。針對落後國家，Gerschenkron 強調技術的跨國引入；就像托洛茨基一樣，他在意「一國的經濟與文化實力」；換句話說，引入之後的當地脈絡、如何對待引入的技術等問題才是重要的。

以德國和俄國的對照為例，當工廠在這些地區出現時，由於德國勞動者在嚴酷的容克莊園受過剝削，相對能適應工廠制度，國土的統一和國家權力的確立也有助於工廠勞動。德國面對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取得更多資金與信用投入工廠建設和隨之而來的大規模生產，銀行的協助在此相當必要。反觀俄國，當工業化正式實施時，距離農奴的解放已有一段時間，工廠勞動者相對不能適應剝削方式，

因此非常需要國家權力的協助；同時，如何取得更多資金投入工廠建設的問題尚未解決，因此同樣要依靠銀行。

從這裡可以大致看到，當先進地區的生產力跨國引入時，落後地區固然可以「跳躍」，即托洛茨基所說的根據「歷史落後的優勢」來「跳過中介階段」，但這是要付出代價的。事實上，**每一次的引入都進一步代表歷史先機已被搶占**。以鐵路建設為例，英國固然需要步步歷經「中介階段」，但它在建設鐵路時並無前例與之競爭，各方面成本可以漸進投入，建設時的條件已經具備。反觀其他正要引入鐵路的國家，一方面正面臨強烈的生存壓力，在區域內處於落後位置；另一方面要一次性處理鐵路搭建外的鋼鐵原料工業、科學知識教育、鉅額融資機構、養成群眾遵守契約之精神等歷史任務。

簡言之，我們固然在區域競爭下討論了一國處理新技術的方式與結果，但其意義要放回整個區域的進程來理解。一旦如此，就會看到一個工業化時機**打開和關閉的階段性體系**。在這個進程中，不只先進國家搶占歷史先機，原本落後的國家一旦發展起來，當更落後的國家嘗試發展、成為區域成員時，「門檻」就會提高，因為體系的「遊戲規則」會在每一次先行者加入後改變，落後國家的制度創新就要付出更高代價，一次性地完成多項歷史任務。Gerschenkron 舉了義大利和保加利亞為例，認為與德俄兩國相比，它們沒有分別善用銀行和國家來實行工業化，錯失了發展良機 (Gerschenkron 1962: 198-9, 362-3)。

Gerschenkron 概括了上述現象：

一個國家的工業發展越晚，其工業化的大爆發在實際來臨時所具有的爆炸性程度就越大。此外，更大的落後程度是與更強的追求大規模工廠和企業的傾向以及更便於形成各種密集度不同的壟斷的條件相聯繫的。最後，一個國家越落後，它的工業化就越可能在某種有組織的指導下進行，依據落後程度的不同，這種指導的中心可能是投資銀行，在國家庇護下的投資銀行的活動，或者是官僚機構的控制。

歐洲工業史不再是「一系列對『最初』工業化的單純重複，而是一種逐漸與那個初始工業化相偏離的有序體系。」(ibid.: 44) 再用 Kocka 的話說，Gerschenkron

以各國工業化進程為對象，「羅列了其根本相似性和重要差異性，並以『同樣的問題及功能等價物，但不同的解法』加以概括。」並且進一步，「把研究中被比較的事例看作歐洲工業化全面性體系的要素。他利用它們在體系中的不同位置（「相對落後性」），一是它們〔工業化〕的不同時機，二是交互影響，即彼此關係的歷史，來解釋其差異。」(Haupt and Kocka 2009: 9) 落後國家採取的各種「替代模式」只是用看似偏離普遍前提的方式來執行普遍前提。

### 三、「不斷革命」再探：簡評與啟示

Roxborough (1979: 24-5) 曾把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和「不平衡與綜合發展」視為上述理論的「馬克思主義等價物」。不過，誰才是誰的等價物很難說，近來已有馬克思主義者 (van der Linden 2012) 指出，Gerschenkron 不太可能在不了解托洛茨基和其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情況下寫出這些作品。無論如何，最後來看看托洛茨基與 Gerschenkron 的異同。

首先，在理論對象上，托洛茨基從全球資本主義的宏觀邏輯談到了最微觀也最具易變的政治過程，即革命；Gerschenkron 則僅限於歐洲工業化進程和各國為求生存所努力實現的制度創新，鮮少關注階級政治。

其次，雖然 Gerschenkron 研究了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但並未把工業化進程放入帝國主義鍊條（及其資本主義基礎）的歷史架構，理論範圍因而未納入政治不自主國家，畢竟對（半）殖民地來說，要組織、重建和調動單一權威來實施工業化是有難度的；若能確定帝國主義（或資本主義）在整合並促進其他國家發展時，也會阻礙其中一部分國家發展——「不平衡發展」的「兩種趨勢」——落後國家的前景就會更不確定。如此一來，「不同於最初工業化的發展模式」就可能與「不（或低度）發展模式」並陳於更簡約的解釋架構下 (Selwyn 2011)。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雖然兩人都使用連結性或關係性比較來分析個別單元及其構成的整體和歷史，但 Gerschenkron 的對象範圍較小，明確提出了研究方法，所以我同意 Rosenberg (2013: 202) 的看法：Gerschenkron 的理論比托洛茨基「印象式的表達」更清晰、更有系統性。在這個意義下，Gerschenkron 可以幫助我們釐清托洛茨基的思考，這也是本節討論這位發展經濟學家的用意。

回到不斷革命和歷史唯物論的理論模型。我認為，可以把資產階級革命典範和不斷革命思想視為 Gerschenkron 理論的「工業化等價物」；換句話說，也可以把他的「資本來源」表格換成「資產階級革命執行者」表格：

階段	英法	德	俄
I	資產階級	地主貴族	無產階級（與農民）
II		資產階級	地主貴族
III			資產階級

表 3：資產階級革命執行者的階段性體系

表 3 顯示，資產階級革命這個「普遍前提」不會失效，只是以偏離的方式不斷與前例整合：從法國開始，每一次革命的發生都給其他國家潛在的被革命對象帶來警惕，使他們搶先執行資產階級的行動，採取有利於資本主義擴張的改革，而自身不用是資產階級。這個改革若成功，就可以避免革命（德國）；若失敗或不斷推遲，鬱積已久的反抗力量只會更強勁（俄國）。

19 世紀的維也納會議是對法國革命（和拿破崙戰爭）的防堵，正是在這個防堵中，馬克思和恩格斯見證了封建地主執行的資產階級革命。歷史曾向資產階級打開的革命時機已經關閉，無產階級也無力革命，反革命成了主導力量。不過在資產階級革命的「階段性體系」中，封建地主的消極革命還是逐漸養成了城市的獨立性、多少解放了工人與農民（不管是在主觀意識還是客觀處境上），歷史最終為他們敞開大門：革命固然發生在個別國家，可是**國際地、歷史地**來看，卻是一連串跨國過程；封建地主在個別國家可能封死了資產階級本身革命的道路（德國），卻在另一國家間接促成了工農群眾的革命條件，使他們負起資產階級未完成的使命（俄國）。這個時機下的革命要一次性地執行多項歷史任務，資產階級民主只是其中之一，無產階級革命包含了資產階級革命，「爆炸性」最大也最富創造性。

在歷史唯物論的模型上，Gerschenkron 的理論同樣表示了特定（新）生產力的引入需要有與之相適應的（新）生產關係（此外也需要其他生產力配合）。社

會轉型機制仍由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構成，但必須進一步被納入國際脈絡，我們必須去問：第一，特定生產力是何時首創和引入／輸出的？第二，首創和引入／輸出生產力的社會生產關係分別是什麼？第三，轉型成適應於（新）生產力的生產關係或「形構」一個多種（新舊）生產關係或生產方式並列和互動的社會，引入該生產力的地方還能採取與前例相同的方式嗎？

第一，生產力「何時」首創和引入／輸出的問題不再是一個「時間」問題，如「西元幾年世界上什麼地方發明或引入重犁」，而是空間和時間混合後的「時機」問題，如「重犁發明或引入／輸出時，周遭是否已有之或把它使用到了什麼程度、對各地造成了什麼影響」，只要這個生產力是有影響力的，亦即最終促進生產關係的改變，這個問題就能導引我們觀察多個國家（或地區）的「不平衡發展」。

第二，生產力出現或移動時不同社會的生產關係「分別」是什麼的問題，也不再是一個純「比較」問題，如兩種（以上）生產關係能夠賦予其中行動者什麼能力，而是兩種（以上）生產關係透過該生產力如何「連結」在一起的問題，這樣的提問導引我們分別去觀察「國內」和「世界」的「綜合發展」，這裡的「綜合」既可以指兩種生產關係的互動，也可以指新生產力與既有的或舊生產關係之互動。

第三，如果必須引入特定生產力，因而必須形構新的社會或轉型為新的生產關係，但又無法根據前例來執行——歷史先機已被搶佔，曾經允許特定生產關係與該生產力相適應的歷史時機關閉了——那就只能在「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前兩個提問的框架）下找尋、判斷、進入歷史時機再次開啟的時刻，發揮「歷史落後的優勢」，用各種靈活的方式達成目的。這些方式或許和前例不同，但在目的包含了前例提出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情況下，落後國家或地區並沒有推翻前例設下的普遍規律，反而用更具創造性的方式證實、捍衛了它。

托洛茨基和 Gerschenkron 都在理論起始就把對象設定為複數的。只有從這個本體論出發，才可以從三個方面展開研究：第一，因為這些對象共處一個整體——不管是資本主義起源與擴張還是工業化——所以能探討它們的關係和連結（輸出、模仿、國際性的壓制或反抗）；第二，在整體中，這些對象又分屬不同部分，因此能比較它們的內在（資產階級革命的「領導階級」或實施工業化的「領導組織」）；第三，連結與比較、整體與部分都發生在歷史中，相互影響，工業化



是一個「進程」，資本主義起源與擴張更是一個「長時段」的過程，各個部分（國家或地區）都以獨特的方式發展，同時保持、擴大並豐富和複雜化了工業化和資本主義這個整體。





### 第三部份





## 第六章 複數問題：國家體系與資本主義

第五章花了不少篇幅分析「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概念，指出本體論和方法論的意涵。不過，托洛茨基的脈絡始終是資本主義的擴張過程，因此「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意義是很限定的，似乎只發生在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兩種生產關係在國際政治上的碰撞。儘管他聲稱這是「普世規律」，但相關書寫並不夠。

本章將一步步試探這個規律的普世性程度，我們的目標仍是理論性的，以一位頗受矚目的學者 Justin Rosenberg 為焦點。在此之前，有必要了解「不平衡與綜合發展」是因為什麼問題而在近來的國際關係學科和馬克思主義獲得關注；當然，我還是以馬克思主義為主。

繼本體論和方法論意涵之後，本章第一節將交代「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跨學科意涵，我們可以藉此知道馬克思主義面臨的理論困境：國家體系與資本主義的關係是什麼？國家體系是怎麼出現的？為什麼它在資本主義持續擴張或全球化的今日仍然屹立不搖？這些問題之所以重要（和麻煩），是因為它們反映了馬克思主義看似無法消化而「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已經內建的「國際」向度（*the international*），一個人類社會非常根本的實踐領域。

第二節和第三節分別介紹政治馬克思主義者和 Alex Callinicos 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後者為此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分析增添了「現實主義環節」。我們也順此在第四節討論資本主義內部（而非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碰撞時）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第五節是 Rosenberg 對 Callinicos 的質疑。

部分政治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國家體系的持存是「封建遺緒」，在歷史上與資本主義沒有必然關係，未來甚至有可能被資本主義全球化超越，儘管其他政治馬克思主義者有不同看法；Callinicos 雖然同意回到封建主義社會關係，但他表示一旦資本主義在這個體系中誕生和紮根，「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性質必然會使國家保持複數，國家體系很難被超越。Rosenberg 把批評拉得更遠：「國際」是一個普世現象，無法被馬克思主義倚賴的「生產方式」所掌握。

## 第一節 國家體系、複數問題與國際歷史社會學的可能

2006年，為紀念《總結與前瞻》及「不斷革命」思想問世一百年，Dunn and Radice (2006) 集結了近二十篇和「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相關的文章。作者們把焦點放在馬克思主義的常見主題，如革命、世界經濟、勞動問題和個別國家的案例分析，其中也不乏對這個概念的釐清。除了 Davidson (2006) 簡要的思想史爬梳外，Barker (2006) 試圖延伸托洛茨基的用法，以此指涉資本性質，即資本主義內部或眾多資本之間的關係，也進一步包括人類歷史本身的發展。當他極富野心展開討論時，提到了另一位國際關係研究者 Justin Rosenberg。

事實上，近年來把「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列為關鍵字的學術論文，幾乎都徵引了這位國際學者的說法。對某些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這是挺「出人意料」的 (Davidson 2015: XVII)。身為一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和革命家，托洛茨基關注的是人類歷史進程和特定社會關係的轉型，他提出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怎麼會在這個學科受到重視（或好奇）呢？

與史學、社會學、政治學或經濟學不同，作為一門學科的國際關係，如其字面所述，把視野限定在兩個以上的國家，以它們的**關係**為對象。這種命名方式直接暴露了學科的若干問題：關係中的國與國是否構成超越它們的「層次」？如果是，這個層次有何特質？何不直接以該層次命名，卻要用「單位」（即國家）之間的關係本身來命名？此外，我們是否需要一個在所有國家「之上」的國家或組織來規範各國行動，就好像國內有一個中央權威？或者，國家「之間」自然會形成規範，該規範無須由某個相當於國家的組織來代表與執行，國際上亦能如社會一般多而有序？就算國際關係是一個獨立對象，作為一門學科也有其正當性，國家之間的互動如何能不受國家「之內」影響？如何在保持學科獨立性時，避免與國內領域斷絕？

前一章在討論「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本體論意涵時，已經部份地回答了這些問題：正是因為這個規律帶有「國際」層次，包含了三個層次（除了國際，尚有國內與世界），所以能讓人**一次性地**設想國家「之上」、「之間」和「之內」的互動。即使不了解托洛茨基，讀者從字面上也可以感受到「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不尋常：說得白話一點，不平衡發展應該是「什麼和什麼」的不平衡發展，綜合發展也必然是「什麼和什麼」的綜合發展。「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主詞是複

數的、兩個以上的單位。就此而言，出發點和國際關係確實相似。

更重要的是，對於渴望把國際關係「社會（學）化」和「歷史化」的學者來說 (Buzan and Lawson 2015, Hobson, Lawson and Rosenberg 2010, Hobson and Lawson 2008: 433-4, Lawson and Shilliam 2010, Lawson 2015: 316)，包含了國內社會關係和發展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能助他們一臂之力，順道超越這個學科的幾場經典辯論。

### 一、從國家到國家體系

如果「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引起部分國際關係學者關注，那麼馬克思主義者也應該反求諸己，感到自己的「遲鈍神經」（而非政治經濟學或史學等「敏感神經」或神主牌）被挑起了才對。

自從蘇聯解體和冷戰結束，馬克思主義者面對的全球現實是：雖然資本主義持續滲透世界各地，國家卻仍然以複數的形式存在。《共產黨宣言》描述的資本挾著廉價商品「摧毀一切萬里長城」(Marx and Engels 1956-83d) 之勢並未發生，否則何以國際地緣政治 (geopolitical) 競爭依舊頻繁？為什麼各個國家並未真正受到所謂的全球化影響而權力減弱，出現所謂的「全球國家」？或者，針對國家體系——由複數的、多個國家組成的系統——與資本主義的關係，也可以用 Callinicos (2007) 的話來提問：「資本主義需要國家體系嗎？」我們怎麼處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多國問題」(many-state problem) (Callinicos 2009)？

馬克思主義傳統向來不乏「國家」理論的建構，除了列寧的名著《國家與革命》(Lenin 1990a) 外，建築隱喻「國家形式之秘密」的段落 (Marx 2003a: 894，或見本文第二章開頭引文) 往往是最直接的理論資源。承第二章有關統治關係的介紹，國家是統治者施行統治的制度，抽象的統治關係表現為這個具體制度。然而，這種思考容易把統治關係和國家限制在統治與被統治、剝削與被剝削的「垂直」關係中，忽略了它們的「水平」關係，即統治者之間和剝削者之間的區分與互動。

相同現象反映在建構國家理論的爭論上。為了回應 1960 年代國家對市場的介入，以及歐洲幾個社民黨執政後面臨的政策問題，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研究在 1970 年代極為盛行，主題集中在國家的起源及自主性，因而有「國家壟斷資

本主義」(State Monopoly Capitalism)、社會民主主義國家理論、「國家推演爭議」(State Derivation Debate) 和 Edward Miliband 與 Nicos Poulantzas 的著名討論 (Clarke 1991)。我們無法多加介紹，重點是 Barker (1991: 204) 在回顧「國家推演爭議」時所指出的，論者們

對待國家的方式都停留在不當的抽象層次，特別是將國家看作好像是以單數形式 (in singular) 存在一樣。然而，資本主義是一個世界國家體系，資本主義國家採取的形式是〔多個〕民族國家的形式。

從「國家」轉為「國家體系」，意味著理論對象不只是「一套特定的壓迫或行政制度」——表現(被)統治與(被)剝削的垂直關係——還是多個「社會疆界總體」(societal-territorial totality) (Halliday 1994: 79)：由多個「壓迫或行政制度」為(被)統治與(被)剝削所劃定的多個範圍。這呼應了上一章提到的「複數本體論」和托洛茨基「不平衡發展」的「國家對立」(這必然以多個國家的存在為前提)，更貼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政治現實。

然而，在理論座標上，國家體系正好處在馬克思主義強調的社會關係的「斜對角」：社會關係要麼處於個別國家內部，要麼超越個別國家、由多個國家構成(如 Wallerstein 的世界體系)，國家體系的複數性或「多」都繞過了社會關係。

第二章介紹歷史唯物論的原則時，特別加入交換關係，指出它除了在生產關係「內部」結合生產資料與直接生產者，也在生產關係「外部」透過不同使用價值的流通連接不同生產關係，多種生產關係可能同時存在。為了思考它們的共存與互動，以及特定生產關係的支配與再生產，「社會形構」的概念登場。然而，這個概念是單一而抽象的：可以指某個單一主權籠罩的國內社會，也可以是超越國家層次的國際社會。研究者在一個範圍內分析「占支配地位」的生產關係，以及與之相應的統治關係，可是這個概念無法一次性、無化約地指向複數的、眾多的或兩個以上的國家。它能做的，要麼是分析眾多國家中的一個社會，要麼是把眾多國家化約為一個社會來分析。問題是，現實中的國家總是複數的，它們必然相互影響且在一定程度上介入或建構社會。就像前一章提到的 Kenneth Waltz 所說，如果可以，何不把多個國家之間的互動納入理論中？



## 二、複數問題：顯而易見，難以捕捉

當馬克思與恩格斯說「我們據以開頭的前提，不是任意的，不是教條，而是一些實際的前提……這些前提可以用純粹經驗的方式來確認」(Marx and Engels 2016: 9-10 粗體為筆者所加) 時，多個國家或複數國家的現象本身的確「可以用純粹經驗的方式來確認」，這點無庸置疑，畢竟誰能反對世界上總是有「很多」國家呢？那麼該如何把這種複數性納入理論？

這個問題離開了歷史唯物論，甚至也離開了理論的操作邏輯：對現實對象進行抽象，然後重建為思維對象。因為研究者在抽象時，首先就排除了現實對象的「雜多」，聚焦在自己「圈出」的對象，現實對象之間相互干擾的情況在理論中暫時被擱置，以便探詢本質。馬克思自己就是這麼做的：「為了在純粹的狀態下對我們的研究物件進行考察，避免次要情況的干擾，我們在這裡必須把整個貿易世界看作一個國家並且假定資本主義生產已經到處確立並佔據了一切產業部門。」(Marx 2003b: 670n 粗體為筆者所加)

在《資本論》第一卷「商品的拜物教性質及其秘密」的段落中，馬克思曾以「人們自己一定的社會關係」(*ibid.*: 90) 為機制，解釋「勞動產品的物理性質以及由此產生的物的關係」在人們面前表現為「完全無關的」「商品形式和……價值關係」的情況。馬克思將社會關係類比為視神經，指出「物在視神經中留下的光的印象」表現為「眼睛外面的物的客觀形式」，而非「視神經本身的主觀興奮」(*ibid.*: 89)，因此很難感受到「人們自己一定的社會關係」。就像莎士比亞《凱薩大帝》布魯圖斯對凱薩所說「若無外物反射，雙眼不能自視。」(The eye sees not itself. But by reflection, by some other things.)

延伸這個類比，我們不妨說：「眼睛外面的物的客觀形式」，即現實對象，一旦經過理論操作，無論什麼影像或風景，在頭腦中便呈現為「一片」或「一個」思維對象。可是別忘了，不只現實對象本身是雜多的，最終由無數視神經組成的眼睛也是「一雙」或「一對」的，成像管道是雙重的、複數的，研究者必然是在現實對象相互干擾的情況下進行研究。抽象和理論真能從「一」而終嗎？誠如前兩章所述，「不平衡與綜合發展」作為一種分析框架，似乎因為俄國 19 世紀所處的國際競爭形勢作為「外物反射」，讓托洛茨基敏於「自視」複數國家的存在與互動，以及在其中動員革命和構思革命脈絡的歷史事實，最終將革命事業依託於複雜的國內社會關係和國際支援，突破了抽象和理論從「一」而終的狀況。

與此不同，Teschke (2006: 330) 認為，「深受 19 世紀早期各種歷史哲學的影響，在他們〔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個別著作中，空間被時間大量遮蔽。由於被設想為每個單一社會 (every single society) 內在發展的動力，思考歷史進步的引線在未被問題化的情況下，進一步將世界社會視為一個整體。」這裡無法討論 19 世紀的歷史哲學，不過可以循線看看歷史哲學的代表人物看待「複數」和「多」——或不如說「算數」和「數量」——的問題。黑格爾在《邏輯學》中討論「算術」時有這麼一段話：

算術是一種分析科學，因為發生在這個主題中的所有規定和差異，並不來自其中，而完全是自外輸入的。內在關係並不是在立即的呈現中給定的，而是要經過認知的努力才能被獲取，算術的對象則不會在自身中安放一個知識上被掩蔽的內在關係。算術不只沒有包含概念和相應於概念化的智識任務：它根本就是概念的對立面 (Hegel 2010: 178)。

換句話說，「複數」或「多」之所以不易被（從歷史唯物論的「社會形構」到理論操作的邏輯）掌握，是因為太明顯了——即黑格爾說的「在立即的呈現中給定的」——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用純粹經驗的方式來確認」，無須建立在區分表象與本質的深度上。

有別於透過「認知的努力」才能獲取的「內在關係」（性質、概念和規定等不立即呈現），「算術的對象」不被「掩蓋」。據此，要思考眾多單位或數本身的「規定和差異」，只能「自外輸入」，因為算術的對象（數）本身不具有這些規定和差異。必須注意，當黑格爾說算術是「概念的對立面」時，並未否定將數概念化的可能，畢竟他也說過「數 (number) 是對思想自身外在化的純粹思想」，因而「介於感官和思想之間」 (ibid.)。言下之意，「多」或「複數」仍是概念，只不過是不同於規定和差異的概念，後者外在於數，兩者未必不能整合。

黑格爾很早就意識到我們的提問，並且思考過解決辦法：「自外輸入」各種規定至數本身中。托洛茨基提出「不平衡與綜合發展」時，雖然並未重新架構歷史唯物論的建築隱喻，但在其思維中，應該有一套複數本體論，這個本體論不斷在其筆下的「歐—俄」或「歐—俄—中」對照表現出來。正是有此設定，才能讓

生產力、生產關係和階級鬥爭等範疇在不同社會穿梭、跨越國界：用黑格爾的話說，托洛茨基「自外輸入」這些範疇到不可化約的「多」中。

歷史唯物論是否因為上述的「複數問題」而顯得不足？在所有理論都有限定對象的意義上，當然是。可是回到研究綱領的性質，歷史唯物論還是能自我補強和辯護，在捍衛「硬核」時，令自己更進步。如果托洛茨基可以自外輸入諸範疇到競爭中的多個國家，那麼反過來說，這些範疇本身也可以「自內輸出」：

第一，「人類有提高生產力之理性」或「生產力有提高的傾向」的命題是否意味著「實現該傾向和理性的來源只能來自於社會內部」？不然。跨國引入生產力更高的原料、生產工具和勞動力不僅可能，更是常見事實；此外，行動者也能因為外來的或非經濟考量的刺激，提高單位時間內勞動成果的產量與品質。這些情況都滿足提高（發展和使用）生產力的要求。<sup>77</sup>

第二，「生產關係因為與生產力相適應而維持、相衝突而轉型」的命題，是否排除了生產關係可能由特定階級帶頭「模仿／趕超」其他社會所形塑，因此可能從其他社會「移植」過來？也不是。就算整個社會的生產關係都是殖民統治或國際競爭的結果，還是要與一地的生產力保持適應或衝突的關係。如果生產關係可能來自社會外部，階級鬥爭就可能參照現有生產關係的外部來源，遵循或改變其鬥爭模式；從馬克思到托洛茨基，許多革命者都不斷思考這個問題。

第三，「統治關係使生產關係的再生產」命題，不只包含了統治與被統治、剝削與被剝削的垂直關係，更包含了一套水平關係，為（被）統治和（被）剝削的行動劃定界線，這是因為統治本身必然涉及社會的內外區分。（被）統治者之間和（被）剝削者之間的區分與互動（水平關係），能夠影響且又奠基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區分與互動（垂直關係）。在這個前提下，此一命題不見得會動搖，端視能否從外部或內外區分來理解。

歷史唯物論時常被用來分析單一社會的內部情況，但硬核（建築隱喻）本身並沒有這種限制；在適當的詮釋與操作下，還是可能建立在複數本體論上。這就是為什麼托洛茨基大方地利用歷史唯物論，卻好像越過了歷史唯物論。

---

<sup>77</sup>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時期，馬克思和恩格斯似乎透過「交往」這個頗具跨域性質活動的概念勾勒了類似理論圖像：「一個地方所獲致的生產力，特別是發明，是否會在往後的發展中失傳，完全取決於交往的擴展。」（Marx and Engels 2016: 66）

### 三、國際歷史社會學？

當國關學者感到把國際關係——自理論伊始，便立基在「多國」或「複數」本體論上——歷史化和社會（學）化的重要性，因而尋求歷史社會學（*historical sociology*）的幫助時，歷史社會學者又怎麼面對國際關係呢？

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的經驗性應用，除了史學之外，還時常被歸類在歷史社會學。這個領域現已得到許多承認與鼓勵，部分學者若非主張史學和社會學嚴格說來差異不大，就是認為兩者應該整合起來（Abrams 1982, Burke 2005, Calhoun 1998），好的史學著作總以社會學和社會理論為基礎，而社會學和社會理論也不可能不放進歷史來考察。

雖然如此，整合一點也不容易。顧名思義，歷史社會學仍是社會學的分支，基本上「史家著作被用來服務社會學目的」（Delanty and Isin 2003: 3），後者往往會尋求在比較中分析，並且不乏專門回答「大問題」（Mahoney and Rueschemeyer 2003: 7）的著作，如現代國家的出現和資本主義的起源；在這種情況下，很難不以抽象的理論預設或模型法則來解釋長時段、大規模的歷史過程。如果能跟倚賴各種技術從殘跡來確認過往現象然後加以細緻描述的史學整合，誠然是幸事，但兩者鴻溝之大卻考驗學者的能耐：具體的細節如何能夠證明抽象的理論？如果一個細節無法證明，那要累積多少才可證明？理論固然可以附上更多規定來降低抽象程度，但「大問題」又要如何回答？

對 Goldthorpe (1991: 211-2) 來說，這已經不只是實踐上的難事，更是理論上「個殊式」（*idiographic*）和「通則式」（*nomothetic*）學問之間的差異：史學是個殊式的，史家透過描述單一的、獨特的現象試圖特殊化（*particularize*）；社會學是通則式的，社會學家透過制定應用在各種現象的理論來一般化（*generalize*）。這種對立是必然的嗎？如何能夠避免？以下看法受到 Gareth Stedman Jones (1976) 和 George Steinmetz (2005) 的啟發。

事實上，史學和社會學之所以面對這種對立，以及整合的必要和困難，並不是因為它們本身真的如此不同，而是在解釋的問題上（礙於本文篇幅與主題，我們只討論這個部分），幾位代表性的史家和社會學家採取了實證主義的做法，早期開創者們（如蘭克和孔德）也是以此實踐史學和社會學的。

實證主義一方面不否認觀察與描述的重要性（事實上，它正是以經驗主義為基礎的），另一方面又超出觀察與描述，透過歸納的方式找出法則，建構模型，進行解釋。這種規律和模型是根據現象的重複而來的；換句話說，是多次觀察到**兩起（以上）事件先後發生**後所歸納的結果。把這個結果當作法則，在推論過程中就成了前提。透過觀察，當類似的先行事件發生時，研究者就能預測和解釋後發事件。因此，解釋是以現象的重複本身來說明特定事件的發生。問題是，真正要被解釋的難道不是現象的重複本身嗎？僅僅具有「相關性」（correlation）的兩起（以上）事件如何能成為解釋項？

要解釋這種休姆式的（Humean）因果關係，必須超越經驗界去設想一道不可見的深層機制。機制是一種傾向性過程，處於特定關係中的實體被賦予某種特質，並根據該特質展開具有特定傾向的過程。只有經過機制，我們才能多次觀察並歸納兩起（以上）事件的先後發生，而機制式的關係本身卻是不可見的，只能在重複的現象中表現自己。

因此，如果社會學和史學之間有任何對立，也是首先發生在不可見的深層機制和流變的經驗界之間，而不是經驗界的兩個方面：尋找「通則式」理論、建構模型（社會學）和確立「個殊式的」現象描述（史學）。這兩個方面本來就是互相需要的循環，我們卻先把它們分開（**現象和模型**畢竟不同，所以可以區分），再因為它們分開而企圖令它們相互學習（**現象和模型**相輔相成，所以能進行一定程度的對話）。這或許就是史學和社會學長期整合，成果卻若有似無，至今仍充滿問題的原因。

這也是為什麼第一章不從「歷史社會學」而是從（歷史哲學中的）「歷史理論」開始。暫時把理論限定在解釋的話，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談的主要是社會關係，即導致經驗界一連串重複現象的機制。由此出發，歷史和社會、史學和社會學確實沒有根本差別。不過我們不只需要觀察歷史社會現象，據此建構模型（儘管它們仍然很重要），還要以各種機制設想歷史社會的可能動態，或從歷史社會現象回推可能的機制，然後再以先後發生的事件或重複的現象來試探、證明這些機制的存在。由於並未排除經驗界的存在，以機制為中心的歷史理論還是可以表現為具體的史學和社會學實踐，因此仍然是一種「歷史社會學」，只不過其性質不同於前述版本。

雖然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或「歷史社會學」強調機制（如生產關係、生產方式或社會形構）的作用，但誠如前述，國家之間的互動與連結或「國際機制」（international mechanism）（Rosenberg 1996: 8）仍然不在建築隱喻的討論之列。跟馬克思主義比起來，受韋伯影響的學者似乎更具優勢，他們在吸收與批判國際關係的（新）現實主義學派之後，已經將國際因素整合進既有的歷史社會關係框架（Hobden 1998, Hobden and Hobson 2002, Skocpol 1979）。然而，「國際」在此未必表現為不同單位（個別國家或社會）的連結，也可能只是不同單位的比較，而比較往往預設單位之間的分離。

以 Theda Skocpol 《國家與社會革命》（*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為例。她以國家同時應對國內社會和國際形勢兩方面的變化為框架，比較法國、俄國與中國革命的原因和不同型態。然而，從 Gerschenkron 和托洛茨基的方法論來看，她呈現的革命固然發生在歷史和多個國家中，卻不是歷史地發生，也不是國際地發生，因為革命的「先行者」和「後來者」之間的連結是不明的；由於 Skocpol 的方法是「比較分析」，法、俄、中三國革命更像剪接在一起的不同片段，雖然在「社會↔國家↔國際」的框架下得到關照，但「國際」卻不能置放在 18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整個現代化進程或資本主義擴張中，成為（反）革命勢力跨地區先後傳遞的渠道，或者每一個案共在的大環境或外在因素。當然，跟 Barrington Moore (1966) 比起來，這麼做已經是相對進步的，外在因素不再被歸於偶然。

更重要的是，在解釋上，國家應對國內社會和國際形勢的框架也類似韋伯的「理想型」（ideal type）（Kiser and Hechter 1991: 3），都是從選定的現象（在此即多次觀察到的革命）中歸納出來，然後一體適用於不同時空的「類似」（既非無關也非同一）現象，即有同有異、值得分析的對象。這就是 Skocpol (1979, 1984: 378) 自承的 J. S. Mill 「異同法」（Method of Difference and Agreement）。這種用於比較歷史社會學的方法已經擁有一些追隨者（Mahoney and Rueschemeyer 2003）。不過，這卻是實證主義和經驗主義的，而誠如 Burawoy (2009: 179) 的批評：「Skocpol 的歸納方法把因果過程（causal process）化約為因果關聯（causal associations），因果力量化約為先在條件。」遠離了機制的實在論（realism）（Steinmetz 2005: 142）。

回到馬克思主義面對的國家體系和國際機制問題。如果國家對疆界、貿易或勞動力流動的控制，並未在資本主義的擴張或全球化中消滅或緩解，馬克思主義

就必須承認國家體系——不再是單數的國家——具有某種程度的「強韌性」，進而說明它們的出現、持存以及與資本的關係。當國際關係學者願意透過「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反思他們關注的問題時，如果馬克思主義者也能透過「不平衡與綜合發展」——這可是馬克思主義者自己提出來的啊——理解國家體系、國際關係或「國際」，那麼一個以深層機制為基礎的馬克思主義「國際歷史社會學」(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ociology) (Rosenberg 2006) 或許能慢慢浮現。

在 21 世紀的今日，雖然戰爭與革命不如一次大戰之後三、五十年間來得激烈、頻繁和大規模，但國家體系（這是戰爭爆發的框架）和資本主義（這是革命急欲挑戰的對象）的力量卻不曾減弱。「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思想在 20 世紀初的出現，是立基在當時國際競爭的力量和無產階級革命的目標，當它在 21 世紀復興時，是否能在更全面的脈絡下說明國家體系與資本主義的關係？現在來看看幾家馬克思主義者的說法。

## 第二節 封建遺緒：政治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所謂的「政治馬克思主義」(Political Marxism) 是法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史家 Guy Bois (1985: 115) 提出的，用來批評 Robert Brenner 解釋中世紀晚期封建危機的方式。後者認為，僅僅依靠人口循環，並不能解釋歐洲各地在封建危機後的不同結果，還必須在人口循環和人地比例變化的基礎上，根據不同地區的階級團結程度和鬥爭結果來解釋。Bois (1985: 115-6) 認為，雖然 Brenner 企圖平衡階級觀點在當代史學界被忽視的現況，但過度訴諸階級力量對比，「掏空了歷史唯物論基本概念——即生產方式——的實質」，有脫離客觀生產力規律、淪為「唯意志論」的危險，並把這種傾向稱為「政治馬克思主義」。這個標籤後來被 Ellen Wood 採用，再根據 Brenner 的幾個原則發展出整個學派。<sup>78</sup>

Brenner 的理論以「社會財產關係」為核心。這個概念不只涉及生產者和剝削者的關係，還包括生產者之間和剝削者之間的關係。對她來說，由於封建主義

---

<sup>78</sup> 1990 年代以來，政治馬克思主義在英語馬克思主義學界具有相當影響力，Wood (1997, 2011, 2015) 積極介入政治思想史，下文會看到的 Teschke (2002, 2003) 和 Lacher (2002, 2006) 在國關理論上批評全球化和現實主義，前文提及的 Comninel (1987) 則和法國革命史學的修正主義者一起強烈批評資產階級革命的概念。近年英國薩塞克斯大學 (University of Sussex) 更有政治馬克思主義小組，見網站「政治馬克主義與社會科學」(Political Marx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的直接生產者（農民）直接佔有生產資料，剝削者（地主）要獲取他們的剩餘勞動，不管藉由勞役、實物還是貨幣的形式，只能訴諸「外於經濟的強制」手段而無法依靠市場上的勞動力買賣；同樣的，農民由於能夠直接生產，也會避免把生活必需品的取得寄託在不穩定的市場。

身處特定「社會財產關係」的行動者也會展開他們特有的「再生產規則」。農民傾向多樣化生產、早婚和組織大家庭，並且因後代增多而日漸細分土地；至於地主，雖然盡可能榨取農民剩餘勞動，但由於必須倚賴他們的剩餘勞動，故不能將他們逐出土地，只能與其他地主競爭，設法分配更多社會剩餘勞動，而獲得的部分將主要用於武裝軍備，而非開發生產資料、提高生產力。Brenner 將此類比於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稱為「政治積累」(political accumulation)。在中世紀歐洲，政治積累的結果就是封建國家的日益集權化。這個概念成了幾位馬克主義國關學者解釋國家體系出現的重要資源。由於在第七章還會介紹 Brenner 的說法，這邊不多著墨。

#### 一、封建主義「剝削方式」下的國家形構

由於地主獲取剩餘的方式若非以強制手段剝削農民，就是強化、集中化政治組織，既提高剝削農民的程度，也打擊其他地主，故前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總是「由政治建構的」。Teshcke (2003: 75n9) 就直言，封建「生產關係內部並不存在經濟剝削」；或者更徹底地說，「地主與依附的農民之間實際上並無生產關係。」Lacher (2006: 37-8) 也表示：

只有在資本主義，中介剝削的財產形式才是「經濟的」，才與控制物而非控制人有關……剩餘只有在生產過程本身中被榨取……階級關係也才是「生產關係」。

對政治馬克思主義者來說，生產關係這個範疇要有效，就必須以經濟領域的獨立為前提，因此若要理解前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慣用的「生產方式」就要替換成反映社會財產關係的「剝削方式」(mode of exploitation) (Comninel 1987: 174, Lacher 2006: 78, Teschke 2003: 53-7)，資本主義因此不再是某種「特殊的經濟類



型」，而是一種「權力的社會配置」(Lacher 2006)。Wood (2006: 15) 認為，「剝削的『環節』有兩個：剩餘勞動的利用和維持它的強制權力」，只有在資本主義，分別對應到這兩個環節的「經濟」和「政治」才彼此分離，否則只要在前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就是合一的。

根據政治馬克思主義，建築隱喻顯然不適用於前資本主義，第二章已經批評過這種觀點。「剝削關係」或「剝削方式」成了定義封建主義社會關係的標準，似乎統治者可以只憑政治而活，無視生產資料的局部壟斷與分離，即「多—少」的分配格局。可是，封建主義理應有它自己的「經濟」。此外，由於在前資本主義下，「剝削方式」是判斷社會類型的主要標準，只要它改變，新的生產方式也就跟著出現。下文會看到，絕對主義榨取農業剩餘的方式與封建主義不同，所以成了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在「生產關係」這個概念已經不適用於封建主義的前提下），介於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這同樣是「政治」被過度放大的結果。

無論如何，「外於經濟的強制」手段確實存在，我們只要把它放回第二章定義的生產關係，還是可以奠基在經濟基礎上。Benno Teschke 從剝削方式和階級鬥爭出發，在《1648 年的迷思》(*The myth of 1648*) 中駁斥了現代國家體系誕生自西伐利亞和約的通說。為了讓討論更具體，我們有必要看一看他筆下英法兩國的發展路徑。

### (一) 英國

一般來說，英國封建財產關係始於 1066 年諾曼征服 (Norman Conquest)。與當時法國卡佩 (Capetian) 王朝權力分散的政治結構（到處都是領主和騎士）(Brenner 1996: 251-5, cf. Teschke 2003: 107) 不同，身為諾曼公爵的征服者威廉 (William the Conqueror) 的權威相當集中。<sup>79</sup> 由於掌握大量財富和戰士，加上英

---

<sup>79</sup> 在威廉治下，英國大約有一千五百多個直屬封臣 (tenants-in-chief)，他們又把土地再分封給八千多位次級地主。受封之後，每一塊封地 (manor) 都有地主自己的部分，即領地 (demesne)，也有他們再分封給其他地主的部份，最終由農民直接使用；在此階序下，農民是最底層的。他們必須把耕種成果（不管是勞役、實物還是現金）分給地主、教會和國家。必須注意，我們不能說封建階序下的農民或任何層級的地主具有資本主義意義的土地「所有權」(ownership)。在層層分封、層層有權使用和收租的情況下，所謂的所有權頂多是「多重所有權」(multiple ownership) (Patriquin 2004: 201-2)。「多重」不光是指「上下之間」(君主和直屬封臣、地主和農民)、上級領主和下級領主共有一塊土地，放眼中世紀中葉起的封建歐洲，有時候更是指「內外之間」：因為

格蘭地形孤立、自然疆界明確，威廉能直接對所有自由農課稅，而受封莊園的貴族也都向他效忠王權，並對治下農奴收取地租；「財產雙軌制」——王權直屬和貴族受封的土地——仍在英格蘭延續。君王維持著公認的統治權（*bannum*），統治階級相對團結。

這種財產關係很不穩定，特別是剩餘榨取不足時。14 世紀中期以後，黑死病爆發，勞動力銳減，地主為了挽回收入，只能透過各種方式增加地租，因此引來農民反抗。在勞動力與土地低比率的情況下，根據財產雙軌制的傳統，農民企圖成為自由農，掌握對土地的終身使用權或設法自由持地（*freehold*），抵抗地主任意收租；為了反對農民，地主則設法將閒置土地納入莊園，在土地轉讓時堅持收租權、以租賃持地（*leasehold*），甚至任意喊價。

至 17 世紀末，全英地主已控制超過百分之七十的耕地。在這個過程中，起初由於勞動力與土地的比率低，農民還能成功抵制高額租金，但隨著人口恢復、勞動力與土地的比率提高，越來越多農民背負高額租金承租土地；加上 16 世紀起，英國羊毛及成衣出口迅速成長，地主為獲取大片完整土地進行畜牧，便提高租金，迫使大批農民流離失所。租金的競爭進一步導致農民階級的內部分化：付不出的農民被迫離開土地，懂得減少成本和技術創新的佃農因而致富。喪失土地所有權的農民，除了受雇於工廠，就是受雇於這些新興富農。直接生產者與生產工具分離，不得不為市場生產，「農業資本主義」（*agrarian capitalism*）（Brenner 1985a: 296-7, 301, Brenner 1985b: 46-9）<sup>80</sup> 出現。

---

戰事與家族聯姻，單一地主可能受封自兩個以上的上級領主（Bloch 1962: 211-2），而這樣的封地往往分散各地（因此為了巡視領地和收租，他們要在各地移動），出現一地二主（或甚至多主）的情況。這也造成政治權力階「上下」和「內外」的紊亂，見下文。這裡的意思並不是說歐洲所有封建國家或地區都「一樣紊亂」，而是要根據統治階級的內部競爭——**在這種封建所有權的架構下**——來觀察它們在不同時期的不同結果，因此我們會看到英、法和東歐地區的不同動態。

<sup>80</sup> 這個概念在理論上意味著要先有農業的資本主義，才可能發展工業的資本主義，在歷史上也傾向回溯特定國家（在此即英國）工業化之前的農業發展，尋找其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出現的大致時間。Albritton (1993)（受到宇野弘藏和 Thomas Sekine 的影響）認為無法在 17 世紀之前的英國找到農業資本主義的證據。他甚至表示只有到了 19 世紀，英國農業才資本主義化，真正的（或純粹的）資本主義邏輯總是工業的，勞動者必須是無產者，價值才能被創造和增殖。基本上我同意 Brenner 的說法（但不同意引伸出的階級鬥爭決定論），因此也追隨 Zmolek (2000) 的批評，即資本主義的一般（純粹）形式確實是工業的，但這在歷史上代表必須有勞動者離開土地，成為無產者，土地也要能夠買賣，而這些情況要發生，必須一方面考量階級鬥爭的非意圖後果（否則誰願意離開自己的土地？），另一方面把農村當作階級鬥爭的主要場所（為了生產生活資料，即便離開自己的土地，也不會任意離開農村）。英國資本主義當然與早期的羊毛買賣、外包體制和重

至此，地主或土地貴族要取得剩餘，不再能憑藉「外於經濟的強制」手段，反而只需雇用勞動力，按市場機制剝削。在新的財產關係中，土地貴族成了新興資產階級，並以議會為中心，與君王鬥爭。1688 年光榮革命之後，主權實際上已歸於議會。這些資產階級並不因此擁有武裝，反而因為不再需要武裝而使君王成為名義上的「最高指揮官」(Brewer 1989: 43-4)，以公共名義壟斷暴力。更重要的是，儘管議會掌握了昔日專屬君王的徵稅權，卻由中央指派的官員課徵貨物稅、關稅和土地稅，而非沿用包稅制 (tax-farming)<sup>81</sup>，這種做法「使英國成為歐洲第一個能夠完整紀錄政府收支的國家」(ibid.: 129)。不僅如此，由於君主仍試圖重振其稅收特權，資產階級遂將自己納入稅收對象。這麼做旨在制衡君王，但客觀上卻使私人不再享有免稅特權，「政治」和「經濟」進一步分離。在單一主權下，權力的「上下位階」也不像前資本主義那樣混亂。

雖然英國進入了新財產關係，但歐陸各地仍處在地緣政治積累中。面對這般國際環境，英國「一國資本主義」(capitalism in one country)<sup>82</sup> (Lacher 2006: 82) 無法避免戰爭，只不過這時戰爭的意義已經截然不同。Teschke (2003: 253-4) 表示：「系統性的公共課稅和財政控制的副作用，就是創造了一套優越的公共信用體系。正因為稅收是可預期的和安全的，債權人有了更強的動機貸款給政府。公

---

商主義有關，但像 Albritton 等人側重這些外部因素是不夠的，農業生產關係本身就有重要的變化和影響；正是因為他們把焦點放在外部因素，所以忽略了階級鬥爭帶來的生產關係轉型，也就無法構思農業資本主義。Zmolek 和 Albritton 的爭論延續了很久 (Albritton 2000, 2002, Zmolek 2001, 2004)。捍衛 Robert Brenner 和英國農業資本主義的歷史研究可見 Spencer (2014)，尤其是第九章以後。

<sup>81</sup> 這項制度在古希臘已存在，指的是「國家將政府的最高徵稅活動承包給最高的投標者，後者只需事先付給國家某個定額的租金就可以保留其他的稅收收入。」(馬駿 2003: 72) 包稅制多用於間接稅，君王與包稅者之間採短期租金契約，由於稅收經過私人中介，不受中央管束，往往導致包稅者任意收租、層層剝削。

<sup>82</sup> 就像托洛茨基批判史達林「一國社會主義」，認為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內不可能獨存於一個國家一樣，17 世紀在英國誕生的新財產關係，雖已按照資本主義「命令」(imperative) 運作，但其持久發展卻需要相應的國際市場，否則「在缺乏國際資本主義體系的情況下……生產力改革的動力很弱，而且大幅受限於國內市場的需求。」(Wood 1991: 101) 這種情況甚至延續到 18 世紀。英國工業革命初期便只要求少量固定資本的投入，很少人願意在這方面長期投資，「技術創新就像從前一樣，都是在特殊情況下由對科學、理論或教育沒什麼興趣的『老師傅』(practical men) 引進的。」(ibid.) 直到其他國家採行資本主義，首創國才有了更適合的發展條件；矛盾的是，由於這些國家（先是美、法，後是德、日）可能直接利用首創國的技術和相關知識，反而能由國家領導進行「消極革命」，發揮「後進優勢」。

債不再是國王的債務——〔借貸者〕容易被騙——反而成為國債（National Debt）（1693），由新設的英格蘭銀行（English Bank）（1694）管理。」這些國債受到議會保障。

英國外交政策也不再從朝代利益，而是從議會代表的國家利益出發。這在當時是「世界歷史之首創」（*ibid.*: 257）；也因此，與其他國家打仗時，英國君王不再以私人身份參與，而是表現為一國之姿，「內外區別」於焉成形。18 世紀起，英國更基於國家安全與經濟發展考量，設法避免捲入歐陸戰爭，實行以資本主義與強勢海軍為後盾的著名海外侵略：「藍海策略」（Blue-water policy）。七年戰爭之後的英國已鮮少侵犯歐陸。光榮革命至 1815 年維也納會議期間的七場英法戰爭，基本上英國只輸了美國獨立戰爭（*ibid.*: 259）。18 世紀歐陸各國面對的已經是一個超級強權。

## （二）法國

到 14 世紀時，法國的統治中心已經出現，但這只是在封建財產關係中政治積累的偶然結果（Teschke 2003: 109）；在此之前，法國處於「封建無政府」（*ibid.*: 69-70）狀態，卡佩王朝權力分散的政治結構不存在英國的「財產雙軌制」。

統治階級為了進一步獲取農民剩餘，內部鬥爭相當激烈，領主可能因為戰敗而被王室或更強勢的貴族併吞土地。農民反而能利用統治階級的分裂，訴諸公社和王室的力量令地主讓步，王室也樂於協助農民。「每當在地貴族為挽救其收入危機而加重任意稅或習慣役時，農民暴動和君主的法律支援，便導致去中心化的領主政體走向長期衰退。」（*ibid.*: 108）最終，農民取得了土地的終身所有權和人身自由，農奴制幾近崩解；在統治階級中，領主和騎士逐漸消失，君主權威重新站上封建階層體系的頂端，開始有了稍微穩定的疆域。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自由農幾乎完全占有生產工具，政治與法律等壓迫手段也從農村撤出，但實際上只是上移中央；貴族在朝任官、服從絕對君王，也讓剝削形式由分散的地租轉為更為集中的稅收。受到羅馬法復興的影響，民法與公法的區分既使封建統治階級的中央權力重新穩固，也使私有財產受到保障，貴族反而只能透過在朝任官的依附形式延續統治。因此，這個「社會形構是封建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國際規模上的複雜結合，有著逐漸崛起的城市資產階級，以及成

長中的原始資本積累。正是這兩種對立的生產模式在單一社會中的交織，產生了絕對主義的**過渡**形式。」(ibid.: 428-9, 粗體為筆者所加)

對政治馬克思主義而言，所謂的「過渡」難免帶有目的論之嫌。在 Teschke 看來，當時的「資產階級」不從事資本積累，反而和貴族一樣購買朝廷職缺，獲取「公共」收入。因此，兩者關係並非處在不同財產關係下，反而藉同一財產關係共生，分配君王的剝削成果。與其說絕對主義國家是「**獨立的剩餘榨取器**」(Brenner 1986: 55)，為特權團體分配剩餘，不如說君王把國家看作私人財產，從前擁有私人土地與各項領主權力的「佩劍貴族」(*noblesse d'épée*)讓位於專門任職於朝廷的「穿袍貴族」(*noblesse de robe*)，零碎的封建勢力統合於單一主權之下。這意味著君王與貴族之間的政治軍事衝突減弱，因為主權絕對化與剩餘價值的分配相互依賴。Teschke (2003: 191) 認為，絕對主義既非封建主義（因為領土整合、君王與貴族的衝突方式改變，剝削方式也不同）也非資本主義前身（因為「政治」和「經濟」仍未分離），而是自成一格的 (*sui genesis*) 的生產方式。

君王與特權階級的共生必然以戰爭和農民剩餘的強力榨取為代價。Bonney (1991: 352-3, cf. Teschke 2003: 181-2) 指出，「法國稅收持續增長，1600 年的毛稅收總計有 2500 萬，到了 1608 年和 1621 年，則達到近 3280 萬和 4280 萬里弗爾 (*livres*)。1635 年，對西班牙宣戰時，法國稅收持續攀升，一年平均 1 億 1500 萬里弗爾，雖然大部份是以高額利率貸款來的。」與英國不同，法國的信用體系以君王為中心，國家債務實為君王債務；同樣的，16 世紀末到 18 世紀中的幾場大戰（如宗教戰爭、三十年戰爭和法西戰爭）只能算是君王戰爭，每次結束都發生財政危機和破產。在這種情況下，貸款給君王的風險高，而君王為了籌措更多經費，除了賣官，還出售各類封號和專賣權。Teschke (2003: 183-4) 總結：「王室產生戰爭資源的嘗試，根本無法擴張中央政府的範圍（雖然有許多機構），反而透過將越來越多的政府權力轉讓給私人行動者而減低其自主性。受限於這個結構性阻礙，君王要產生額外收入只能對農民課重稅並對外進行政治積累，不管是採取戰爭、婚姻，還是以重商主義 (*mercantilism*) 的形式對外貿易<sup>83</sup>。這些都加強

---

<sup>83</sup> 婚姻是封建時期以來相當標準的政治積累手段，因為涉及長子繼承權 (*primogeniture*)，所以與統治、進而是榨取剩餘的權力有關（中世紀晚期，歐陸政治體的零碎化，即導因於長子繼承權下土地的不斷分封）(Teschke 2003: 91)。此外，對政治馬克思主義來說，這時的重商主義仍是一種政治建構的對外貿易政策，並非現代的（即「政經分離」的）、以生產為中心的資本主義。前現代的性質反映在商船對海軍力量的依賴，海洋也被視為地緣政治競爭的對象之一。雖然英、法、

了對特權人士網絡的政治依賴，侵蝕了農業經濟的生產力。」18 世紀末爆發的法國大革命只是統治階級內部剩餘分配不均所引起的鬥爭，絕非史家們認為的開啟資本主義和現代社會的「資產階級革命」(Comninel 2003, 1987)。

在英國資本主義已經出現一段時期的整個 18 世紀，法國仍處在前資本主義中。儘管統治階級的階層體系已經不如封建時期那麼混亂，疆界也逐漸清晰，但「政治」與「經濟」並未分離，「公權力」(實際上是絕對王權)仍能介入經濟生產。處於「一國資本主義」的英國，此時的軍力已令絕對主義國家望塵莫及。直到 18 世紀末，在工業革命的衝擊下，原本施加於英國的地緣政治壓力反而透過英國前所未有的經濟發展反射回歐陸。基於政治積累的邏輯，歐陸統治階級為了確保既有財產關係，必須採行資本主義，出現「消極革命」(Lacher 2006: 93)。總之，自成一格的絕對主義進入資本主義，就像封建主義進入資本主義，都是階級鬥爭和統治階級競爭的「非意圖性後果」，歐陸統治階級是出於非經濟考量而引進資本主義的。

## 二、國家體系起源三階段與批評

循著農民與地主的階級鬥爭和地主之間的政治積累(地緣政治)競爭這兩條線，Teschke 和 Lacher 區分了現代國家體系起源的三個階段。

首先，是封建主義下眾多領主的「零碎化個人支配」(parcellized personal domination)，他們的競爭不只讓權力位階「上下」不清，更讓疆界「內外」的區分時常浮動。第二，是絕對主義君主的「普遍化個人統治」(generalized personal dominion)，由於「剝削方式」是區分不同時代的標準，絕對主義能以更有組織的方式剝削農民，也就成了與封建主義不同類型的社會關係。在這個時代，透過收編貴族(如法國)，君主與其他領主的權力位階上下日漸明確，疆界內外的區別也更為固定，唯政治與經濟尚未分離，君主仍將國家視為其個人統治工具。第三，只有英國在歐陸的絕對主義時代完成了「一般性非人格治理」(general impersonal rule)，具有資本主義的主權形式(Lacher 2002: 159)<sup>84</sup>。總之，直到 17

---

荷與西等國在 16 至 17 世紀的海權競爭衍生出「公海」(*mare liberum*)和「領海」(*mare clausum*) (譯為「閉海」，即壟斷特定海域航行權，更方便與「公海」對照來理解)的爭辯，但前者不具有現代意義下去主權化的特色，反而只是供幾個海上商業強權共同占用資源的場所 (*ibid.*: 201)。

<sup>84</sup> 這三個區分來自德國史家 Gerstenberger (2007)。不同的是，Gerstenberger 利用的是比較方法，

世紀中期，歐陸仍處在絕對主義的社會關係中，「支配『西伐利亞國家體系』特定動態——國際關係學科的基本迷思——的是前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關係。」(Teschke and Lacher 2007: 573) 國家體系要是「現代的」，還得等到資本主義出現。

那麼，這跟「多國」問題有什麼關係呢？政治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當代的多國狀態來自絕對主義；正是從那時開始，領主之間的紊亂競爭——「零碎化個人支配」——才趨緩，國家之間的疆界也才跟著清晰，在「普遍化個人統治」的條件下，國家的複數形式浮現出來。因此，**現代國家體系歸根到底是「歷史遺緒」(historical legacy)** (Lacher 2002: 148, Lacher 2006: 60, Teschke 2003: 145-6)，這是地主之間長期（地緣）政治積累的偶然結果。

這種觀點既表明現代國家體系的社會根源，更意味著除了英國，**資本主義在歐陸的起源是發生在國家體系已經存在的前提下**。既然如此，國家體系就不是因為資本主義才出現的，資本主義反而出現在國家體系中，兩者關係是偶然的。回到國家體系與資本主義的問題，隨著資本主義全球化和「經濟」與「政治」的日漸分離，雖然以國家體系為基礎的地緣政治在當前是事實，但要被資本主義超越並非不可能。

這種說法面臨的批評之一就是：即便資本主義在全球擴張，「政治」因此與「經濟」分離（如果我們接受這種對資本主義的定義），也不能解釋何以（分離出來的）政治不會繼續保持其「歷史遺緒」，即複數形式。真正的問題在於 Teschke 和 Lacher 對於資本主義的想像。資本主義固然「生於」國家體系內部，卻不代表它不能轉而控制國家體系，若資本本身就具有多重性和對立性，「歷史遺緒」難免被強化；在這個過程中，現代國家體系就不只是往昔社會關係的殘餘，勢必要披上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的外衣而有新的內容。

同為政治馬克思主義者的 Wood (2002) 就不同意他們的主張。她認為，即便資本主義在國家體系中誕生，因此較後者晚出現，但越是將全球整合進其運動範圍，就越需要國家來管理資本支配的行動者，國家體系也會因此而持存。Wood 的說法一方面有功能論之嫌，未能回答資本主義令國家體系持存的機制問題；另一方面，還是無法解釋為什麼國家就是「複數」的，換句話說，功能論無法說明

---

雖然也研究不同國家（如英法）的財產關係，但不像 Teschke 和 Lacher 經由政治積累的概念考慮這幾個國家的互動。

功能表現出來時所採取的「特定（即多國的）形式」。

總之，當我們問「資本主義是否需要國家體系」時，第一，應該避免功能論的解釋方式，因為不管「需不需要」，內在於資本（家）的某些需求或必然性在現實中是否發生都取決於一套「機制」；第二，「需要與否」指向兩件事：一是國家體系的「出現」，也就是一般所稱的「現代國家體系的起源」——資本主義導致國家體系出現嗎？政治馬克思主義否認了這點，現代國家體系來自於封建主義和絕對主義的階級鬥爭和地緣政治積累；二是它的「延續」，這也是冷戰結束之後大家好奇的問題——資本主義會讓國家體系延續嗎？並不是所有作者都認為地緣政治必然維持。

### 第三節 現實主義環節：Alex Callinicos 的觀點

針對資本主義是否需要國家體系的問題，Callinicos 提到馬克思主義的不同立場，他自己也吸收了前述政治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試圖把國家體系的持存及其意味著的「現實主義環節」整合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理論。我們沿著下表來討論：

資本主義 國家體系	不需要	需要
消亡	A. 終極帝國主義 B. 帝國 C. 非正式帝國	
延續		D. 新帝國主義 E. Ellen Wood
出現	F. 政治馬克思主義	

表 4：「資本主義需要國家體系嗎？」諸立場

資料來源：整理自 Callinicos (2007)



根據 Callinicos (2007) 的理解，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考茨基認為 Rudolf Hilferding 所謂的「組織資本主義」(organized capitalism) 最終會超越國家這個層級，跨國整合諸多資本，使戰爭對資本家來說顯得不理性，形成「終極帝國主義」(表格 4 的 A)。此外，Hardt and Negri (2000) 也在《帝國》(Empire) 中表示，作為地緣政治基礎的國家體系，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最適運作來說，已非必要(B)。而 Panitch and Gindin (2003) 則主張，二戰之後，美國已經建立了一個有效讓其他資本主義領導國家臣服於其霸權下的「非正式帝國」(informal empire)(C)。總之，就算資本主義持續影響國家和國際關係，當代國家之間的組織方式已經大致超越了地緣政治的格局。

Callinico 不贊成這些觀察。他自承屬於列寧與布哈林的「新帝國主義」理論(D)<sup>85</sup>，但是出於兩個原因，不用這個傳統中常見「帝國主義之間的對抗」(inter-imperialist rivalries) 的說法：首先，國與國的衝突未必發生在「強權集團」(Great Powers blocs) 之間，這種情況在近年已不常見，因此改用「地緣政治競爭」——包括國家之間關於安全、領土、資源和訊息的競爭——較恰當。第二，地緣政治競爭之說，較能與韋伯派社會學者和國關理論的現實主義傳統對話，尤其馬克思主義總被他們批評「忽視了國際體系所獨有的競爭類型，而支配這個超歷史現象的邏輯，不能被化約成階級剝削。」(ibid.: 538)。把資本主義與地緣政治並列討論，就像 Harvey (2003) 把當代的帝國主義視為資本邏輯與疆界邏輯交叉建構的結果一樣，能避免功能論，而這正是 Ellen Wood (E) 的偏失。

然而，Callinicos 馬上面臨如下質疑：地緣政治和經濟的解釋力孰輕孰重？Pozo-Martin (2006) 就認為，這麼做很可能傾向現實主義，甚至是「解釋上的多元主義」(explanatory pluralism)。不管是資本邏輯與疆界邏輯，還是地緣政治和經濟，「宣稱兩個邏輯交叉或互動，無法告訴我們其中一者對另一者的相對因果優先性。」(cf. Callinicos 2007: 540) 怎麼回應這個質疑，使其論證更加完善？

首先，Callinicos 從封建主義出發解釋國家體系的「出現」(F)，類似前文提到的政治馬克思主義。根據 Robert Brenner 的看法，在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無論是剝削者還是受剝削者，都沒有動機提高生產力或引進新技術。統治階級改善物質生活的主要方式就是擴張疆界，也因為這樣，他們把剩餘勞動投入軍事設

---

<sup>85</sup> Callinicos 和 David Harvey (2003) 都很重視地緣政治，為方便起見，我們用「新帝國主義」來描述他的立場。

備和政治組織。中世紀晚期到現代早期的歐洲國家體系，不只出自一連串偶然的軍事政治權力，而是根源於封建社會財產關係，以及階級行動者為了獲得生存資料所採用的再生產規則。在這個國家體系的框架下，資本主義的出現又賦予不同國家不同程度的競爭性優勢（起先是荷蘭與英國）。為了取得戰爭中的勝利，各國競相發展工業資本主義，進而導致「戰爭的工業化」。這個過程固然令國家越來越依靠資本主義，眾多資本也為了保障其利益而以國家為中心聚集起來。經濟和地緣政治對抗使國家與資本互賴，這又來自於國際競爭對資本之間競爭的臣服。

其次，僅憑這樣的描述，地緣政治和經濟的關係（何者在因果上更為優先）還是很曖昧的。於是，Callinicos 調動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使用的方法。他認為馬克思在三卷《資本論》的敘述於不同層次推進，層次之間的關係是「非演繹的」(non-deductive)；換句話說，每一次規定的引入，都是為了解決越來越複雜的問題，而這些問題是在論證過程中逐步遭遇到的，每一個規定要由它們在整體論證中所處的位置來解釋，因此它們「具有的特質不能化約為先前配置所規定的特質。」據此，Callinicos 想說的是，

這個程序應可運用在任何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解國家體系的嘗試……在發展令人滿意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理論的更大企圖中，國家體系將被理解為一個可區別出來的 (distinctive) 規定 (或毋寧是一組規定)。……當然國家體系要具有可區別出來的特質：如果沒有，它就無法承擔解釋的角色。這個特點的含意就是，在任何對國際關係和形勢的馬克思主義分析中，必然有一個現實主義環節 (realist moment) (*ibid.*: 542)。

這個「現實主義環節」可以把「國家管理者的策略、算計和互動放入危機趨勢和階級衝突的脈絡中，而此脈絡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任何階段的本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國家體系理論提供了「微觀機制」(micro-mechanism) (*ibid.*: 543)。地緣政治被放入資本主義來理解，因此必須以資本的力量為前提，受其影響；它又是一個有特定解釋對象（國家管理者的行動）的規定，所以不會被化約為經濟。

第三，雖然以馬克思的方法來避免化約論，但問題只解決一半。Callinicos (*ibid.*: 544) 承認：

國家體系的複數 (plural) 特質還是有待追問。為什麼會是許多國家呢？這僅僅是承繼自「政治積累」的前資本主義過程之偶然歷史事實嗎？或者，還有內在於資本主義的任何東西傾向讓國家保持複數？我的答案是：有一個托洛茨基稱之為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趨勢存在。

回到馬克思對市場中個別資本競爭的分析。為了獲取高於平均值的利潤，即超額利潤 (surplus profits)，儘管壟斷是一種方法，但個別資本必然會設法開發新技術，資本主義的動態正是來自競相追求超額利潤而不斷提高的生產力。這個在技術和利潤上走向差異化的整體過程，就是「不平衡發展」規律。然而，不平衡發展又來自事前創新的平均化，以至於個別資本的競爭優勢消失，超額利潤亦然。Callinicos 認為，這個趨同的過程就是「綜合發展」規律的核心；由此，又展開新一輪對超額利潤的追求。這種動力避免了「許多資本」整合為一，這個過程是資本主義的內在傾向，而非偶然特質。<sup>86</sup>

最後，通過 Harvey (2003: 101-8) 和 Harman (1991: 7-10) 的說法，Callinicos 把經濟上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導向地緣政治：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稠密的群聚（好比工廠的群聚位置）為國家疆界奠定了空間基礎。它們既會要求也能支持國家提供有效的資源。當然，其他歷史的、當代的、偶然的因素有也影響，不過資本主義在地理上資源的不平衡分配卻是這一切的離心推動力。

綜上所述，Callinicos 解釋地緣政治的方法可歸納為兩個步驟。第一，找出社會關係：國家體系（或地緣政治）的「出現」來自封建主義的政治積累，而這又根源於其社會財產關係；至於國家體系的「延續」，則以業已誕生的資本主義為基礎，後者從封建主義過渡而來，國家體系的複數特質也以眾多或多個資本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為基礎。第二，賦予國家體系一定程度的解釋力：由於國

---

<sup>86</sup> 儘管 Callinicos 沒有多做說明，但這裡的「綜合發展」應該理解成多個資本中生產力較低者吸收生產力較高者創新成果的內在過程，競爭的資本因而會暫時趨同。同第四章所述，多個資本也構成「差異化整體」，符合托洛茨基「不平衡發展」的兩面性。這也是本章第一節開頭提到 Barker (2006) 對托洛茨基的延伸：把「不平衡與綜合發展」應用到資本主義內部或眾多資本之間。

家體系的「出現與持續」被放置在生產方式中，為避免功能論和經濟化約論，應該將它構思為生產方式的「現實主義環節」，在「允許地緣政治的規定性（determinacy）」時，「否定它有實質的自主性（autonomy）。」（Callinicos and Rosenberg 2010: 152)

#### 第四節 資本主義（或多個資本）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

Callinicos 的論點值得進一步思考。在進入 Rosenberg 的質疑之前，這一節要先岔出來討論兩點。第一，必須再次強調，托洛茨基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發生在資本主義的擴張過程中，因此在生產關係上，就是發生在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之間；Callinicos 提醒我們，資本主義內部或眾多資本之間也是「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第二，Callinicos 提到馬克思的方法，為了更完整地理解其說法，這裡有必要回顧一下《資本論》的敘述方式，我們從這一點說起。

##### 一、《資本論》的敘述方式

雖然一般來說，《資本論》屬於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範圍，但我們還是可以把它視為歷史唯物論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上的具體化。這裡當然無法討論三卷本的著作，下文只能大約分成四個步驟（多半集中在第一卷前幾章），順著馬克思所謂的「抽象力」<sup>87</sup> 來看看他在第三卷的特定主題上對複數單位——眾多資本——的思考。

首先，面對現實中的研究對象，我們只能將其中的一部份或說一個規定在思維中抽象出來，畢竟人的頭腦不可能在第一時間掌握全部經驗事實、看清其內在理路。<sup>88</sup> 為了最後能夠更完整地認識現實對象，第一個抽象出來的規定必須具

---

<sup>87</sup> 馬克思說：「分析經濟形式時顯微鏡和化學試劑都沒有幫助，必須用抽象的力量取而代之。」（Marx 2003b: 8）抽象是一種分析的工作，藉由排除各種干擾因素而讓現實對象在思維中暫時以最純粹的形式存在。由於現實對象並非如此，故任何一個抽象都是不足的；要更全面地認識現實對象，只能不斷地從中抽象，再一次次地把分析出來的「規定」綜合起來。Sweezy (1942: 11) 認為，馬克思所用的正是現代理論家所稱的「逐步逼近」（successive approximation）（現實對象）的方法。

<sup>88</sup> 這種帶有實在主義認識論意涵的說法可見馬克思（Marx 1995a: 42-3），關於抽象（力）的使用可見 Ollman (2003) 的系統性討論。

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哪怕因為尚未考慮其他規定而顯得籠統、不夠具體。《資本論》最一開始的商品就是這種程度的抽象。

第二，仔細分析抽象出來的這個規定，了解其內部各個元素之間的關係和據此而來的動態。必須注意，能夠被抽象出來的規定，在現實中就是存在的，也因此是會變化的。由於在現實對象中，這個規定本來就和其他未被抽象出來的部分相互構成與影響，所以在思維中，對它的分析必將面臨一些問題而無法持續。舉例來說，在《資本論》第一卷前三章的討論中，馬克思固然一路從商品交換談到貨幣起源，但當貨幣作為資本與商品買賣，進而產生剩餘價值時，還停留在流通領域就無法為剩餘價值的產生找到答案。

第三，這個時候，就要引入新的規定，設法解決之前面臨的問題。這些規定可以和先前的規定一樣處於同一層次，也可以處於不同層次，但是無論如何，新的規定都要以先前的規定為前提，並且為之增添新的細節。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四章談到勞動力的買賣時，一點也不違反前三章對商品交換的分析，而且正是因為這些分析，勞動力得以被當作商品看待，而前三章商品交換的範圍也就擴及勞動力這種獨特的商品；一旦引入勞動力商品，我們就可藉由資本家對它的使用離開流通領域，進入生產領域，剩餘價值的來源也就得到解答。在此，**政治經濟學（批判）和歷史唯物論的根本範疇「生產關係」**交會了：勞動者與生產資料分離，為了與生產資料連結，他們必須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在雇用關係下工作，勞動過程同時是價值增殖過程，無償勞動也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總體剩餘價值的來源。

第四，依照研究對象的範圍和研究者的目標，抽象的工作可以視規定引入的程度或多少而停止，然後開始綜合此前所有規定。詳細分析生產領域之後，馬克思在第一卷的最後部分碰到了資本主義起源的問題。但是，他並沒有對「原始積累」多加描述，畢竟其研究對象是資本主義，故不順此往封建主義時代前去，而是回頭邁向資本主義的商品流通領域，探討資本再生產過程，這也是《資本論》第二卷的主旨。<sup>89</sup>

---

<sup>89</sup> 在第二卷中，與本文主旨相關的段落，同時可能也是前述世界體系分析會需要的文本，或許是馬克思在討論產業資本的循環時所說的：不管它作為貨幣資本還是商品資本，都「是和**各種極其不同的社會生產方式**的商品流通交錯在一起的，只要這些生產方式同時是商品生產。」這些商品可能出自奴隸制生產、中國或印度的農民生產、荷屬東印度下的公社生產、俄羅斯農奴制國家生產、狩獵民族的生產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受到在它的發展階段**以外**的生產方式的制約。」

第三卷則是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的「綜合」。這時商品世界不再只有錢與物的交換和階級鬥爭，也不只是資本再生產，而是眾多資本（家）之間的競爭：

資本在其現實運動中就是以這些具體形式互相對立的，……因此，我們在本冊中將闡明的資本的各種型態，同資本在社會表面上，在各種資本的互相作用中，在競爭中，以及在生產當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識中所表現出來的形式，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了 (Marx 2003a: 29-30)。

馬克思現在開始嘗試解釋各種經濟現象，如利潤率下降趨勢（與反趨勢）。這也是《資本論》整個敘述過程中最「具體」的部分，因為「它是許多規定的綜合」(Marx 1995a: 42)。

我們可以這麼說，至少在敘述方式上，「多個」資本是臣服於單一而抽象的「一般」資本的。馬克思必須在確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闡述（勞動）價值對商品交換世界的總體規範（第一卷前三章）和（剩餘）價值產出的機制（第一卷第四章起）——之後，才能向具體踏出下一步。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作為「最簡單的範疇」，在整個敘述過程中是一個「折返點」：既是抽象過程（從商品分析出發）的終點，也是邁向具體（多個資本的競爭）的起點。多個資本接下來被「放進」這個在一定時間和範圍內產生的價值總體。

大約認識《資本論》的敘述方式之後，我們應該可以理解 Callinicos 在給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添加「現實主義環節」的同時，如何能保留國家管理者的決定性又去除其自主性。因為馬克思引入新規定的標準不是純概念的推論或「演繹」，而是解決問題的需求。引入的新規定來自於舊規定，因此並無自主性，但又能繼往開來，對接下來的敘述和新問題具有決定性。

---

(Marx 2003c: 127 粗體為筆者所加) 雖然注意到「外在作用」，馬克思隨即指出：「但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趨勢是盡可能使一切生產轉化為商品生產；它實現這種趨勢的主要手段，正是把一切生產捲入它的流通過程；而發達的商品生產本身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產業資本的侵入，到處促進這種轉化，同時又促使一切直接生產者轉化為雇用工人。」(ibid.) 馬克思並沒有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把一切生產捲入它的流通過程」或「直接生產者轉化為雇用工人」時，被入侵的社會將主動或被動地採取甚麼作為、「捲入」或「轉化」的過程是否真會順利地促成資本主義的擴張。不過，從商品流通勾連了不同生產方式的世界市場視角來看，馬克思已經清楚指出「不平衡發展」的事實。

## 二、多個資本的競爭

馬克思顯然不是沒有注意到複數問題，《資本論》第三卷就是證明。只不過這裡的「多個」不是前文強調的國家，而是單一國家內的「多個」資本。這與馬克思揀選的參照對象（英國）有關，也與他的研究目的——資本主義的「運動規律」（Marx 2003b: 10）——有關。對 Callinicos 和 Barker 來說，馬克思雖然沒有使用「不平衡與綜合發展」這個術語，可是卻以這種方式思考多個資本的互動。我們把討論限定在「利潤率平均化」的部分，不涉及它的下降趨勢和經濟危機等問題。

馬克思把資本分為「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前者用來支付硬體設施，如原料、機器和廠房等生產資料，後者則是用來購買勞動力。因為利潤在本質上來自剩餘價值，而剩餘價值又是由勞動力與生產資料結合之後，在實際勞動過程中所進行的無償（剩餘）勞動所產出，「利潤率」因此指的是剩餘價值與總資本的比例。由此看來，似乎增加可變資本的比例才是增加剩餘價值、進而是利潤的方式，畢竟剩餘價值要由勞動力的使用來發動。

然而，資本家之間的競爭和勞動者與資本家之間的鬥爭，往往會促使不變資本的比例增加，即「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因為一方面，有效率的機器可以降低成本，讓資本家在面對競爭時存活下來；另一方面，掌握有效率的生產資料才能阻止工資提高，也就是用「死勞動」（機器）取代「活勞動」（工人）。這個過程同時也是社會勞動生產力的提高。

馬克思指出，在競爭中的各部門之間，只有資本有機構成符合社會平均水平者方能實現生產出來的剩餘價值；換句話說，並不是所有資本都能完全實現剩餘價值。資本有機構成高於社會平均水平者，將獲得資本有機構成低於社會平均水平者的部分剩餘價值。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競爭中的資本在一段時間內處在定量的總體勞動價值中，而生產這些價值的社會勞動生產力又有一個大致水平，故低於社會平均水平者形同浪費現有生產力，而高於平均者則節約了社會生產力，社會總體的剩餘價值在這些競爭的單位之間分配。

同時，資本有機構成較低者的利潤率也會高於資本有機構成較高者。一旦利潤率高於平均水平，就會吸引其他資本進入該部門，直到供過於求，價格下跌，進而引起利潤率下降。相反，在資本有機構成較高的部門，由於一開始的利潤率低於平均水平，資本容易撤出，直到供不應求，價格上漲，利潤率才隨之提高。

資本在部門之間流通所形成的動態趨勢，就是一種利潤率的平均化。然而，平均利潤率作為一種趨勢，在一段時間內是可以被資本家事先確認的。因此，利潤率平均化的確切機制，其實就是高過平均利潤率以獲得「超額利潤」的競爭企圖。雖然實行壟斷有所幫助，但「超額利潤」最終有賴於生產技術和勞動組織創新所帶來的生產力提高。

所謂的「不平衡發展」正是發生在上述多個資本之間。不過必須注意，儘管如前文所述，不平衡的主詞是「多個」單位，但並不表示它們不構成一個整體。在這裡最明顯的就是，多個資本所欲競爭——也就是分配（而非生產）——的是**同一總量的剩餘價值**，這些又是社會剩餘勞動的產出，最終奠基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不平衡發展的各個單位，即競爭的多個資本，首先具有分配同一剩餘價值總量的共通性；只有這樣，它們才能相互比較，形成「不平衡」的態勢。由於試圖提高生產力來獲得超額利潤，「不平衡發展」至少包括了各個資本在現有生產力發展程度上和利潤率上的差異。

面對超額利潤和生產力提高帶來的優勢，競爭中的資本（家）就有跟進的壓力。然而，他們也可能猶豫並延遲創新，因為必須考慮這麼做的風險：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未必會直接提高利潤率，還得面臨勞動者的抗爭；換句話說，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在個別資本（或企業）中可能發生衝突。「綜合發展」所指的一方面是引入新技術後個別資本的不確定狀態，另一方面則是眾多資本跟進後，某些資本原有超額利潤降低、消失、利潤率平均化的狀態。當然，競爭不會停止，在總是試圖獲取超額利潤的情況下，一旦利潤率將近平均化，定有其他創新生產力被採用，新一輪的「不平衡」又將展開。<sup>90</sup>

如果上述多個資本的競爭（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討論對象）也和多個國家的競爭（托洛茨基的歷史唯物論討論對象）一樣，呈現「不平衡與綜合發展」，進而構成「差異化整體」，只不過前者發生在資本主義內部，後者發生在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之間，那麼封建主義內部是否也有「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就是這個規律能否有足夠普世性的最後一塊拼圖。第七章將嘗試回答這個問題。

---

<sup>90</sup> 一般來說，針對《資本論》第三卷中眾多資本的互動，論者們頂多從「不平衡發展」的角度切入，見 Weeks (1997, 2001)，很少去設想其中「綜合發展」。利潤率平均化及其不平衡發展也可見 Mandel (1991: 13-21) 的簡介。



## 第五節 在生產方式之外：Justin Rosenberg 的質疑

政治馬克思主義者和 Callinicos 都同意從封建主義政治積累——根源於封建生產關係——尋找現代國家體系的根源。不同的是，前者認為資本主義與國家體系的關係是偶然的，而後者認為資本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特質必然會維持國家的複數性。

然而，他們的主張還是可以受到質疑：既然封建政治積累是行動者們的非意圖後果，因此具有高度偶然性，為什麼結果不是促使「單一國家」的出現，而是形成國家體系？此外，上述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並未排除技術與利潤「趨同化」的局面或階段，列寧在駁斥考茨基的「終極帝國主義」時，也並未否認這在「純粹經濟」上的可能性<sup>91</sup>；換句話說，就算資本是複數的，也未必總是差異的；就算資本是差異的，也未必不能在競爭中趨向同一（好比被併吞）。

易言之，就算國家體系的出現和延續在歷史上取決於社會關係，也不能保證社會關係在理論上就是「多重性的」、「複數的」和「差異化的」。<sup>92</sup> 這裡的質疑不是要拒絕歷史分析，而是想指出：若能在理論上事先拒絕「單一」或「單數」社會的任何可能，則國家體系（或地緣政治）的「複數特質」就更能獲得解釋。難道不正是因為「複數性質」在社會關係的層次上有待確定，Callinicos 才需要在馬克思主義的國際理論中引入「現實主義環節」嗎？這就是 Rosenberg 質疑 Callinicos 的要點之一。

另一個要點，如果這個現實主義環節的引入涉及《資本論》的方法，我們何不稱之為「自由主義環節」(Callinicos and Rosenberg 2010: 152)？就像現實主義是「國家管理者自發意識形態 (spontaneous ideology) 的理論闡述」，自由主義本質上也「處在社會的表象上，……在競爭中，以及生產代理人本身的日常意識

---

<sup>91</sup> 列寧 (Lenin 1990b: 406) 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是這樣說的：「如果純粹經濟的觀點指的是一種『純粹的』抽象概念，那麼，說到底只能歸結為這樣一個論點：發展的趨勢是走向壟斷組織，因而也就是走向一個全世界的壟斷組織，走向一個全世界的托拉斯。這是不容爭辯的，不過也是毫無內容的，就好像說：『發展的趨勢』是走向在實驗室裡生產食物。」

<sup>92</sup> 舉例來說，Callinicos 表示：「這就是為什麼我喜歡 Brenner 政治積累的概念：它提供了部分地說明多重性的唯物主義方式。」但問題仍然是，這個「部分地」指的是什麼？從下文可以看到，其實就是我們所說的「現實」或「歷史」，那麼「理論」的部分呢？如何直接在理論上就把社會關係判定為複數的？這就是 Rosenberg 想做的。

中」，即馬克思嘲諷的「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Marx 2003b: 204)。一旦採取這個類比，「現實主義環節」就很難完整安放在生產方式中。

Rosenberg 跟著 Callinicos 討論起《資本論》。馬克思從「自由主義環節」的商品交換展開討論。他的方法旨在「給看起來不證自明的現象和範疇，設置一個未被發現的社會關係基礎 (substratum)，這個設置稍後在解釋上產生了徹底不同的用語。然而，最有意義的是，《資本論》的第一個這種操作，早在提到工資勞動或任何對自由主義的直接批評之前就有了。……我指的當然是馬克思首先處理的這個問題：什麼是價值實體？」

這個先於「什麼是剩餘價值」的挑戰，就是要找出物物交換背後的人類關係內容。這個內容不用出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是「簡單的、個別的或偶然的價值形式」。馬克思觀察到，在物物交換的關係中，「相對價值形式」總是會把其他物看成自己的「價值表達形式」，而不論它們實際上來自什麼人類活動。「一切價值形式的秘密都隱藏在這個簡單的價值形式中。因此，分析這個形式確實困難。」(Marx 2003b: 62)

Rosenberg 認為，只要經過物物交換，人類關係採取的形式就會有些特殊：

一方面它是顛倒的：人與人之間的實際社會關係（畢竟物本身無法交換），表現為物與物之間的量化關係……另一方面感性的物化 (reification) 表達了人類行動性 (agency) 真實的「對象化」(objectification)：這內在於作為人類活動的交換中，並藉由『物的工具性』顛倒並折射了出來。這還是一個可解決的謎，而非沒有實體的幻象。根據馬克思的說法，如果要社會學地穿透資本主義關係表現出來的真實卻神秘的表象，這個謎就必須被解決 (Callinicos and Rosenberg 2010: 162)。

換句話說，「只要物物交換了，不管在哪一種社會，社會關係的顛倒與物化形式就會暫時地、哪怕是遲緩地被暴露出來，而資本主義社會則將這個社會關係獨特地發展成價值的『社會實體』。」(ibid.)。Rosenberg 進而表示，馬克思嘗試解剖的這個簡單價值形式「以濃縮的方式 (*in nuce*) 存在於每一次交換中」，社會必要抽象勞動作為一種系統性存在，只會發生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因此，如果沒有

關於價值的討論，「剩餘價值的理論就會變得，嗯，很庸俗：只有算數，沒有本體論……。」(ibid.: 162)<sup>93</sup>

回到「現實主義環節」的問題。如果在馬克思的資本主義分析中，「自由主義環節」倚賴的物物交換及其價值關係是不可或缺的，而它們帶來的「顛倒」與「物化」又延伸到資本主義之外（或之前），那麼「現實主義環節」所意味的地緣政治，真的還能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或特定社會的分析所「消化」嗎？

如果在歷史上，地緣政治多重性（multiplicity）的事實，超過了社會的任何個別形式，原則上，從這個事實本身產生的任何規定就無法從任何給定的生產方式特殊性（particularities）中推導出來……因為這個事實本身不是特殊的，而是一般的（general）……。(Rosenberg 2010)

「一般」到什麼程度呢？「根本沒有社會的發展不受與其他社會的關係的影響。而且，沒有一個更廣泛的社會形構之發展軌跡不包括一個意義重大的向度，該向度由它的每個部份之互動路徑所構成。」然而，這個很難在經驗上否認的事實卻很少成為建構社會理論的前提：

古典社會理論……的恆久力量，在於它有著前學科劃分（pre-disciplinary）的整體論野心：古典作者們意在提供社會發展作為一個整體的理論。或許他們勢必沒有達到目標，但綜觀其觀念中的各種空隙，有一個對國際理論的意義特別重大。古典傳統……從未在理論上清楚說明社會發展作為一個歷史現

---

<sup>93</sup> Callinicos 對這個部分有所批評，但他似乎失焦了。Callinicos (ibid.: 173) 認為，Rosenberg 的說法「無法掌握價值關係中系統性與強制性的特質，以及經濟行動者臣服於提高生產力及降低成本之強制，而這又來自於競爭性互動。孤立的交換行動本質上無法傳達這點。」可是 Rosenberg 並未否認「價值只有在發展的資本主義下才具有真正重大意義」(ibid.: 162)，也清楚表示過資本主義社會「將這個社會關係獨特地發展成價值的『社會實體』」(見前引文)。針對簡單價值和價值先後順序的問題，Callinicos (ibid.: 173) 引用 Gérard Duménil 的說法表示 Rosenberg 「錯了」，因為「不同層次的規定是共時存在的，而非呈現出一個歷時過程。」雖然這個主題有爭議，但馬克思 (Marx 1995a: 43) 確實說過「簡單的範疇在比較具體的範疇以前是否也有一種獨立的歷史存在或自然存在呢？要看情況而定。」換句話說，在敘述過程中較先引入的規定或層次，固然在資本主義下和其他規定或層次共時存在，但卻不代表它們在時間上不可能先於資本主義。

象的多線性及互動性向度。」(Rosenberg 2006: 308)

這個「一般性事實」被現實主義挪用，轉換為國際關係的本體論。現實主義思想之所以「稀薄」(thin)又「有力」(powerful)，正是因為立基在社會多重性的本體論，直接將多重性「顛倒」和「物化」為國與國之間的複數關係。因此，頗為無奈的是，現實主義的知識狀態就是：「它是我們現有的唯一國際理論，但卻是錯的。」(Callinicos and Rosenberg 2010: 166, 8) 現實主義是「一個問題的徵候，而非拯救的配方」，像 Callinicos 一樣以「非演繹」的方法把它作為一個環節整合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分析中，恐怕難被消化，因為我們「缺乏分析工具來打破它」。一旦引入，就「已經太遲：問題本身及其解決屬於更高的層次——歷史唯物論本身的一般抽象。」(ibid.: 165)

Rosenberg 認為，國際關係學科中的馬克思主義批評者和同情者在回答類似問題時，總會遇到同樣困難：「從馬克思『生產方式』概念所提出的把社會『垂直』分為階級的理論，無法推導出政治破碎 (political fragmentation) 的『水平』事實……所產生的因果壓力和行為模式本身。」面對這個難題，他們往往採取兩種做法：

不是把社會結構的社會內在的 (intra-societal) 範疇施加在社會之間 (inter-societal) 的現象，因此模糊了可能從地緣政治多重性 (geopolitical multiplicity) 本身的事實所產生的規定 (即「國內類比謬誤」[fallacy of domestic analogy] ……) <sup>94</sup>，就是允許一個不知來源何在的、附加的「地緣政治」邏輯來修改或過度規定……較為嚴格的「社會學」原因 (或可被稱作「原始現實主義」[proto-realism] 問題……) <sup>95</sup>。不管哪一種方式，「國際」的事實……都避開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化工作 (ibid.: 151)。

---

<sup>94</sup> 這是 Hedley Bull (1969: 35) 的著名說法，指的是一種類比式推理，在無法掌握或充分認識某個對象的時候，以既有的其他對象 (的特質) 來類比。Bull 想講的正是國際政治不能從社會來理解或類比至社會，國內類比因此是一種謬誤。

<sup>95</sup> 在解釋某些社會現象時，因發現國際或國外因素也有影響而臨時把它們加入，並未一開始就在理論上把這些因素視為可能性之一，前文幾次提及的 Barrington Moore 就是這麼做。

要處理這個問題，既不能把國際關係化約成資本、忽略其因果力量，也不能物化國際關係，採取現實主義的無政府邏輯 (*ibid.*: 151-2)。這個目標不易達到，因為國際關係理論在現實主義的主導下已經將國家多重並立的格局自社會關係抽離出來，而古典社會學理論又習慣把社會看作單一而抽象的，即使為了比較而觀察並假定多個社會的共存，在分析它們的動態和結構時，仍然視之為彼此隔離的實體。

「為了把……社會之間的向度理論化而把分析的各個動態與比較環節拖曳在一起的做法，是我們沒有見到的，即使在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擴張時，其分析單位必然涉及不只一個社會時也是一樣。」(Rosenberg 2006: 312) 由於社會發展本身多線和互動的本質被「壓抑」，無政府狀態才會作為一種社會的外在因素在缺乏理論深度的情況下於現實主義國際理論中「回返」。下一章，我們試著描述 Rosenberg 能夠提出什麼工具來消化現實主義。





## 第七章 作為普世規律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

「不平衡與綜合發展」近年來備受矚目，要歸功於力推它的國際關係學者 Justin Rosenberg。憑《市民社會的帝國》(*The Empire of Civil Society*, 1994) 獲頒「多依徹紀念獎」(Deutscher memorial prize) 的他，在 1996 年頒獎致詞時雖然表示這個概念很重要，卻沒有賦予它超過原始意涵的用法。當時 Rosenberg 還很明白地將「不平衡與綜合發展」放在資本主義的地緣政治脈絡，指出托洛茨基因為注意到這樣的「國際機制」(international mechanism) (Rosenberg 1996: 8)，所以能對資本主義的發展提出嶄新看法。

不過，從 2000 年批評「全球化理論」(globalization theory) 開始，「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就像一個超歷史規律，潛伏在他的後續著作中，越發具有解釋力，甚至成為「理論」(Rosenberg 2013)，可跟國關理論的「無政府狀態」(anarchy) 和「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 等企圖將國與國關係視為恆常現象的關鍵詞分庭抗禮。2006 年至今，他不再以生產方式分析特定現象；儘管他表示這仍是必要的 (Callinicos and Rosenberg 2010)，卻將全部心力都投注在「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歷史延伸上。

這就不禁讓人好奇：他在批判全球化理論時遇到什麼問題，以至於從 2006 年起的〈為什麼沒有國際歷史社會學？〉(*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ociology*) 一改過去思路，大膽地從特定社會關係的說明轉向了普遍社會規律的陳述？這個「不平衡與綜合發展」有何內容和必要性，讓他花費心力，也吸引了其他學者積極對話 (Allinson and Anievas 2009, Callinicos and Rosenberg 2010, Hobson 2011, Kiely 2012, Matin and Anievas 2016)、共同倡議並應用至不同領域 (Anievas and Nisancioglu 2015, Anievas 2014, Brophy 2017, 2018, Cooper 2013, Makki 2015, Matin 2007, Nisancioglu 2014, Shilliam 2009)，當然也不乏強烈批評 (Ashman 2010, Davidson 2018, Rioux 2015, van der Pijl 2015)？

本章從 Rosenberg 的論戰作品《全球化理論的蠢話》(*The Follies of Globalization Theory*) 出發，第一節和第二節簡述該書前三章的主旨。Rosenberg 的「兩路戰線」似乎相互矛盾：既以社會生產關係解釋現代國家體系，又嘗試捍衛人類社會必存之「國際」向度 (the international)。確認了全球化現象不具有首

要性後，有待解釋的就是冷戰之後地緣政治倚賴的「多國」體系或國家體系為什麼還是那麼顛撲不破的問題，我們在上一章已經看到他對 Callinicos 的質疑。第三節聚焦在 Rosenberg 的理論建構：「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如何具有普世性、這樣的普世規律有何內容、這麼做會面對什麼問題等。第四節將嘗試回應他對「社會多重性」的探索，以及普世性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如何整合至歷史唯物論的問題。我認為，馬克思少數從分工解釋人類「共同體」過渡到「社會」的段落是很有幫助的，歷史唯物論將因為其中的複數本體論預設而更加豐富，也能為普世性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奠定基礎。

## 第一節 Justin Rosenberg 對全球化理論與現實主義的批判

《全球化理論的蠢話》是回顧和批判 1990 年代起全球化理論熱潮的小書，對象包括三位國關理論、政治哲學和社會學作者：Jan Aart Scholte、Rob Walker 和 Anthony Giddens。他們的共通點是：承認全球化勢不可擋，認為這個現象改變了人們慣有的時空經驗和社會關係，因此有必要重新思考、甚至改造既有的社會理論。

由於 Rosenberg 對 Scholte 和 Walker 的討論較能帶出他後來的「轉向」，且工整地對應了兩種看似對立的思考方式，因此下文不介紹他對 Giddens 的批評，Rosenberg 批評 Scholte 的方式又可連同他對現實主義的批評一起看。

### 一、對全球化理論的批判

在這個階段，Rosenberg 的目標是反對物化 (reification)：全球化理論和現實主義國關理論都是特定社會關係物化的理論表現。他區分了「全球化理論」(globalization theory) 和「全球化的理論」(a theory of globalization)。後者不反對全球化的可能，只是將它視為有待解釋的現象，把全球化現象理論化。前者則將全球化現象當作解釋項 (*explanans*)，社會關係是被解釋項 (*explanandum*)，全球化現象無須被理論化，而是要重新理論化既有社會關係。所謂的全球化，反映在交通與通訊技術進步導致的空間凝縮和時間加速，社會關係因此改變，社會行動者直接以全球為範圍，國家疆界的突破是明證。這也反過來代表全球化理論要站得住腳，必須承認西伐利亞和約是現代國家體系之濫觴。



Scholte (2005: 15-6) 試圖指出全球化的內容。如果全球化是一個新現象且又能充當解釋項，那麼它所指的現象就是社會理論解釋過的，好比（資本的）國際化、（人的）自由化、（思想的）西方化、現代化或普世化等，而應該是空間本身的去疆界化（*deterritorialization*）或超疆界性。這意味著全球化的主詞是發生巨變的社會空間本身（Rosenberg 2000: 46）：行動者「位置」、彼此之間的「距離」及其所處空間的「劃分」，都受到某些疆界（特別是國家）的限制，現在這些疆界被打破，唯一疆界只剩全球，只有全球才是行動者位置、距離和空間劃分的限制和來源；電話、貨幣或貸款、跨國公司（確切地說，「全球」公司）和國際組織（全球組織）等都是全球化的行動者，沒有一個問題侷限在國家內部。

Rosenberg (2000: 4-7) 指出，這種把空間本身拉抬至解釋機制的途徑忽略了以往社會學家的努力。社會理論向來不乏空間和時間的討論，但每當這麼做，馬上就會面臨對不同空間觀念相互比較的問題。舉例來說，當空間被視為「空的」（*empty*）、無內容因而有待填補、行動者能在其中被定位的客觀存在時，我們就會發現其他文明的行動者對此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研究者不得不去問：對空間的特定看法根源何處？最終不可避免地還是要回到特定社會關係：「在時空的專門研究中……把解釋項和被解釋項之間的常見關係顛倒過來的舉動——以便讓時空自身成為解釋的根本基礎——也是受到廣泛抵制的。」（*ibid.*: 6）

對 Scholte 來說，全球化的有力表現在於去疆界化對西伐利亞和約以來國家體系的威脅，這讓全球化別具歷史意義。由於疆界主義受到國家主權相互獨立的影響，故全球化現象反而要求從現實主義的角度解讀西伐利亞體系的意義。一般來說，自 1648 年三十年戰爭結束以來，中世紀錯落無序的領土配置似乎暫告段落。不過 Rosenberg (2000: 19-20) 提醒我們，從 17 世紀中期到 20 世紀中期（這也是 Scholte 所認為全球化最勃興的時代）的三百年間，還得插入 18 世紀末英國的工業化，而資本主義就在國家體系四處滲透。

雖然這個過程具有 Scholte 所謂的超疆界性，但同樣明顯的是，這個超疆界性又能跟主權國家及其疆界主義相安無事。對此，我們不禁要問：全球化威脅到主權國家體系了嗎？全球化真的是一個新現象嗎？Scholte (2005: 8, 20, 129) 只表示，20 世紀中期的全球化已在西伐利亞體系「乍現苗頭」，並讚賞馬克思對全球化的出現有「先見之明」。Rosenberg (2000: 19) 有些無奈地評論：

馬克思一點也不需要先見之明。已在英國工業革命中運作的社會關係，其實解釋了這個受全球化理論家矚目的現象。最遲在 1850 年代以前，馬克思已經為此產出了一套社會學解釋，只消應用到今日國際體系，便會令全球化理論的蠢話顯得多餘。

Scholte 的「全球化理論」和 Rosenberg 的批評可以歸納如下：至少自 20 世紀中期以後，全球化作為一種時空範疇的深刻改變，成了一種擺脫社會關係又反過來解釋社會關係的現象，因為它幾乎瓦解了西伐利亞和約和疆界主義；然而，全球化現象和西伐利亞體系這個對子卻可以被馬克思提出的社會關係所解釋。

這個解釋的具體內容是什麼呢？不妨翻閱《市民社會的帝國》，Rosenberg (2000: 30-8) 對 Scholte 的反駁並未脫離這部著作的思路。雖然該書沒有提及全球化，但對全球化的批評卻是題中應有之義，書名本身已是一個「明示」。這部由博士論文發展出來的著作旨在批判現實主義的國關理論。Rosenberg (1994: 9-10) 認為現實主義有三個基本命題：

1. 國際政治主要被理解為多個主權權威之間互動的領域，這個領域與國內政治是分離的。
2. 這個領域的明確特色是由「無政府狀態」的條件給定的，意思是，對分殊性「民族利益」(national interests) 的競爭性追求，發生在沒有更高權威進行調控的情況下。
3. 結果是國家之間的關係本質上帶有強制性，藉由權力平衡的複雜運作，這個關係規定了國家在國際上的行為方式。因此，理解權力平衡也能解釋國際政治。

對現實主義者來說，這些命題不只解釋了現代國際政治，更能說明國際政治的歷史。在依序回顧了 E. H. Carr、Hans Morgenthau 和 Kenneth Waltz 等國關理論奠基者的思想之後，Rosenberg (*ibid.*: 36) 認為，現實主義無法關注「持續變化的國內形式」，不了解「主權本身的意義受限於歷史」的事實，國際政治不能那麼空洞地分析。

這不代表我們只要再「多談」國內政治，視之為「平行」於無政府狀態和權力平衡的基礎即可。Rosenberg 同意現實主義有其正當性，畢竟揆諸過往而不只當前，我們很難否認國家管理者或代理人（從統治者到外交人員）及其互動所具有的獨立性。然而，就算如此，我們還是可以從社會關係出發把國際體系「理解成——理論化成——更寬廣的、更具包容力的社會秩序中的一個層次或向度。如果是這樣，就不能僅僅在國際層次（the international）上談論國家體系本身的特質，因為其制度和實踐將不可避免地反映社會權力的形式，而後者又是在特定歷史下由社會結構所給定的。」(ibid.: 45)

## 二、回到封建社會關係

如何從社會關係來理解國家體系？Rosenberg 的方式和上一章提到的政治馬克思主義者非常類似。他認為在現代國家（體系）出現之前，西方中世紀不存在獨立的經濟領域，後者完全是現代產物 (ibid.: 53)。封建地主和農民的關係是一種橫跨當時歐洲多個地區的結構性原則，使「一組規定了統治者與被治者之間互動的權利、義務和資源——這些都根據社會位置而有不同分配——制度化。」(ibid.: 47)

在封建社會關係中，經濟活動和政治權威的運用是不分離的。一般來說，世襲采邑結合了個人對土地和生產性勞動的撥用權和政治管轄權。因此，一方面采邑作為個人之間締約後的占有物（而非公家機關）歸領主所有；另一方面只有通過政治上的命令和臣服機制，即農奴制，經濟上的剝削或剩餘榨取才會發生，故「政治」和「經濟」很難區分。由於人身依附，直接生產者同時遭遇了經濟和政治的不平等。把現實主義所謂的「國際政治」或「國際體系」放回中世紀，就應該從這種深層社會結構來考察。

與此不同，在現代或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中，「政治」和「經濟」出現了形式上的分離，我們可發現（看似）「純粹」的政治和經濟兩個領域。經濟方面，雖然直接生產者的人身依附沒了，卻一方面轉為物質依附，另一方面則由於一無所有，自身勞動力只能轉換為商品在市場上出售。剩餘的榨取不再需要國家或政治力量的直接介入，僅憑平等的勞動契約，剝削「就被重新建構為市民社會的私人活動」(ibid.: 125)。政治方面，國家要做的是保障勞動契約的穩定，對社會實施一定程度的集體管理，維持內外和平，避免介入剩餘榨取。在規範上，直接生

產者的經濟不平等不出現在政治上，國家代表了所有人的共同利益。資本主義國家的主權成了「純粹」的政治概念：對內，國家外於市民社會，避免與其他團體分享權力；對外，抗拒其他國家干預，同樣避免其他團體分享國際上的代表權。

Rosenberg 不這麼認為。他建議我們根據 Ellen Wood 的說法<sup>96</sup> 來看資本主義政治與經濟的分離；如此一來，國家主權的真實意義才會浮現出來：

確切來說，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的分化是政治功能本身的分化和它們在私人經濟場域與公共國家場域的個別配置。該配置反映兩種政治功能的分離：緊扣剩餘勞動榨取與撥用的以及與一般公共意圖相關的……經濟的分化事實上是政治場域內部的分化 (*ibid.*: 126)。

換句話說，經濟領域的勞動契約自始就發生在不平等的結構中（生產者和生產資料的分離），而這個不平等又受到國家的保障。在封建社會之後，勞動的臣服只是改變了形式。因此，我們要注意，「不要把資本主義下政治和經濟（或國家和市民社會）在形式上的分離誤以為支配關係真的撤出生產領域。」 (*ibid.*: 84) 主權絕非中立的，其真正型態是階級力量，因為它鞏固了私人活動的政治權力。勞動力商品的買賣和價值增殖過程，嚴格說來都不是純粹經濟的，它們架構出了經濟領域的政治向度。

一反自由主義國家的理論，Rosenberg 和 Wood 的上述觀點表明資本主義的國家主權從社會關係「獨立」出來後，事情尚未結束：它的部分政治力量根植並作用於生產。主權並未完全「離地」，以此為基礎的整個國際體系也不例外。這就滿足了 Rosenberg 既承認國際體系的（相對）獨立性，又視之為社會秩序中一個向度的主張。這種觀點也與現實主義不同：在政治上，把無政府狀態定性為現代國際體系的本質，頂多只能確認後者不再屈服於帝國的行為模式；在經濟上，

---

<sup>96</sup> 有關資本主義政治與經濟區分的問題，可見 Wood (1981) 的重要討論，該文亦收錄在 Wood (1995)。Wood 把 Brenner 對中世紀階級鬥爭的強調延伸到資本主義的起源與發展。在資本的原始積累時期，直接生產者與生產工具的分離無疑是高度政治性的，「資本來到人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流著鮮血和骯髒的東西」，這也構成了日後（看似）純粹的經濟和生產領域。然而，經濟和生產領域的階級鬥爭不妨礙價值增殖過程可以不依靠國家直接介入的事實；換句話說，經濟仍然是一個結構（見本文第二章），充滿「政治性」並不代表它能與「政治」混淆。

只談國家之間的權力平衡就無法發現「看不見的手」。如果我們了解資本主義國家和經濟的階級性質，確認「資本主義是唯一允許在他國管轄權下剝削生產性勞動的歷史制度」(*ibid.*: 87)，那麼現代國際體系是否截然不同於帝國就很值得懷疑了——「市民社會的帝國」正在體系中擴張。

這個滲透各國疆界卻不直接在武力上摧毀國家的帝國誕生自工業革命之後的英國，這正是「全球化」之濫觴；全球化因此可以「被解釋」。那麼，向來被認為建構了現代國際體系的西伐利亞和約呢？Rosenberg 指出，正好就是已經轉型為資本主義的英國並未出席 1648 年的會議，西伐利亞合約發生在歐陸的絕對主義國家之間，主要參與者法國在當時仍苦於封建政權的分裂<sup>97</sup>。即便絕對主義有別於中世紀紊亂的疆界劃分和等級制度，政治也尚未與經濟分離，公共的政治場域和私人的經濟場域還結合在專制君王手中。就算國際體系是無政府狀態，而國家之間仍維持著權力平衡，17 世紀的國際政治也必須被看作封建社會關係的國際向度。<sup>98</sup>

## 第二節 「國際」的本體論問題

了解 Rosenberg 認識現代國家體系的方法後，再回頭來看他對 Walker 的分析，我們的思考可能會一時間轉不過來，因為 Rosenberg 這時的說法似乎正是他過去批判的。

嚴格說來，Walker 並非全球化理論家，只不過他的特定論點時常被全球化理論家引用。他的途徑是救贖論式 (soteriological) 哲學人類學 (Rosenberg 2000: 61)，主權和現代國家體系被視為人類根本困境的解方，這些困境表現在三組本體論上的對立：普遍與特殊、自我與他者、時間與空間 (*ibid.*: 51)。

當中世紀基督教神學的等級秩序和延續面臨危機時，主權成了解套方式。首先，在普遍與特殊的問題上，國家體系的出現允許人類在主權內部擁有自己的獨特文化；同時，主權本身又成了人類追求安全和自由等目標的共同基本框架——

---

<sup>97</sup> 在法國史上，1648-53 年的投石黨 (*Fronde*) 動亂一般被視為法國確立絕對主義前的最後一波貴族動亂。

<sup>98</sup> 這個主張很類似後來的 Teschke (2002, 2003, 2005)，進一步討論可見其他從政治馬克思主義途徑理解現代國家體系起源的著作，如 Lacher (2005, 2006)。

「一個體系，多個國家」解決了普遍與特殊的衝突。其次，劃清自我與他者（或內部與外部）後，我們才有可能發展自己的獨特文化，排除總是陷入混亂的國家外部或國際領域。第三，因此可以看到，國際上的時間總是重複和循環的，只有國內的空間才能帶來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想像，時間也才有發展 (*ibid.*: 56)。

在本體論的層次上，把主權和國家體系看作人類困境的解方，代表理論對象已經不僅止於制度，而是更一般的、人類社會固有的國際向度本身。矛盾的是，在 Walker 書中，這些特質卻是從現代早期歐洲這個特定時空抽取出來的。如此一來，「國際」作為一種歷史現象，就有可能被近來「時空關係的基本重構」所瓦解，國際體系也可能被削弱 (*ibid.*: 57)。也是在這個意義上，Walker 站上支持全球化理論的立場，受到相關論者喜愛。

#### 一、確立「國際」本體論

Rosenberg 認為，Walker 這麼做等於把一般性抽象（作為人類社會固有特質的「國際」本身）混淆為具體對象（國際體系），正好與現實主義把歷史上現代歐洲的國際體系誤認為一般性抽象相反而相似。對 Walker 來說，「國際的問題架構不能從超歷史的範本中抽取出來，國際的存在本身及其問題，根源於現代早期歐洲的特定歷史解方。」 (*ibid.*: 68) 然而如果是這樣，在全球化理論呈現的「後國際」世界——國家疆域被打破——中，傳統的國關理論甚或國關理論本身就會顯得不合時宜 (*anachronistic*)；如果「國際」不被化約為特定時期的形式，如現代國家體系，那麼即使到了「後國際」世界，國關理論及其代表的「國際」本體論也不可能被消弭。全球化理論家等於混淆了一般性和特殊性，國際關係理論本身應有存在的正當性。Rosenberg (*ibid.*: 69) 問：

面對全球化理論預設的新理論框架，我們或許會希望捍衛古典社會學的主張〔就像上一節 Rosenberg 做的一樣〕，但也想要用同樣方式捍衛國際關係學科嗎？如果可以，國際這個獨有的問題架構有什麼值得捍衛的傳統觀念？

他想要「魚與熊掌兼得」。為了徹底反擊全球化理論，光是如前一節所述，從社會關係出發來論證現代國家體系的特殊性還不夠。理由很簡單：如果「國際」總

是根源於特定歷史脈絡，缺乏自身的本體論基礎，那麼全球化現象就有可能取消同為歷史現象的國際體系。

事實上，Rosenberg (*ibid.*: 3) 自己也承認，批評「解釋項」與「被解釋項」的混淆無法徹底駁斥全球化理論。畢竟特定社會現象成熟之後（在此即全球化）反過來具有解釋力的情況並不罕見，好比貨幣原本只是一種商品，必須和其他商品交換，但在廣泛使用後，也能成為商品交換的目的和基準。Rosenberg 自己舉的例子是，資本主義的邏輯已經成了現代社會的解釋項，但它本來應該被前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所解釋。因此，就算全球化現象可以被社會關係的轉型所解釋，當它成為一個普遍現象時，還是有可能改變時空範疇和社會關係。如此一來，倚賴「國際」這個特質的國關學門是否也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弔詭的是，把無政府狀態和權力平衡事先「公設化」的現實主義反而沒有這層困擾，但若我們要求的更多，在拒絕現實主義的同時，還企圖從社會關係確立「國際」本身，給出「國際」本體論，又該怎麼做？不是回頭擁抱現實主義，但也必須承認它的洞見：

以國際關係之名，現實主義在實踐上和智識上，堅持有某些東西不能被化約的做法是正確的。對於有某些不可化約的歷史一般性，會在不同時間和地點以不同形式重複發生，它的觀察也是正確的。在與其他社會的互動中，所有社會回答了形式相同的問題，也就是來自地緣政治下〔社會〕共存（co-existence）的一般性事實。這些答案作為國際思想的超歷史準則被重複提及，反思它們可獲得真正的智慧，因為這的確能幫助我們把國際（在時間歷程上）的一般性事物篩選出來…… (*ibid.*: 80-1)。

Rosenberg「圍堵」Walker 的方式，就是築起一道屬於一般性抽象的「國際」防線。這道防線不能像無政府狀態一樣沒有變化，也不能與社會脫節。「我們只需這個經驗上的假定：在人類歷史的可知範圍內，多個社會秩序（social orders）總是共存著（co-existed）。難道有人會不贊成這點嗎？」(*ibid.*: 80) 就算全球化再怎麼有力量，也不可能在本質上掩蓋社會本身的**複數性質**。

確實很難有人不贊成，但內容如此「稀薄」的概念又有何用？多個社會（秩序）共存？——然後？前一章提過黑格爾的洞見：算數是概念的對立面，「多」已經「在立即的呈現中給定」。重點在於這個普遍與特殊如何合作。

## 二、普遍與特殊

馬克思曾經批評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把漂流到荒島上的魯賓遜個案當作人類的普遍狀態，Walker 也以這樣的批評回敬那些把國家體系視為永恆的作者們。Rosenberg (*ibid.*: 74) 則認為，Walker 忽視了馬克思的方法論原貌，陷入了「顛倒的魯賓遜」(inverted Robinsonade)，反而誤以為個案就能顛覆普遍狀態。馬克思的批評還有另一個前提：不同的生產方式必須被「生產一般」貫穿，無論其形式如何變化，生產一般或抽象的「生產」本身不會也不應該被取消。當馬克思批評經濟學家把資本主義「解釋為獨立於歷史的永恆自然法則，從而資產階級關係作為不可侵犯的自然法則悄然降臨在這種……社會」時，當然是反對以「特殊」取代「普遍」，但這不就代表「普遍」必須存在嗎？

僅憑抽象的一般性概念，當然無法解釋特殊現象，但要解釋特殊現象卻不能沒有一般性抽象的概念。因此，「一般性抽象的問題並不是它本身不能被採用，而是如何與更侷限的歷史範疇以特定方式發生關係。事實上，馬克思主張，只有把歷史特殊範疇和一般抽象結合起來，前者的解釋力才會實現。」(*ibid.*: 71) 如果沒有抓好兩者的區分並適當地結合它們，就會出現兩種理論後果：要麼歷史特殊範疇被溶進一般性抽象概念（現實主義和資產階級經濟學），要麼一般性抽象概念被歷史特殊範疇所取代（Walker 和全球化理論家）。

「普遍」與「特殊」的區分與結合或「差異」與「統一」(*ibid.*) 不只表現在上述的歷時（diachronic）面向，也表現在共時（synchronic）面向。馬克思討論社會生產時，把它放進更廣泛的再生產脈絡，考量了生產與「分配、交換、消費之間的總體關係」。該關係有同樣道理：「生產、分配、交換不是同一的，相反，它們是整體性即統一性中的差異性構成因素。」總之，馬克思分析社會生產和特定歷史現象時，都經過「雙重瞄準線」（twin crosshairs）(*ibid.*: 72)，拋棄一般性抽象斷不可行，「生產一般是一個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點提出來，定下



來，免得我們重覆，它就是一個合理的抽象。」(Marx 1995a: 26)

回到 Rosenberg 為「國際」的辯護。就算理論上「國際」的抽象程度足以類比於「生產一般」，其內容在歷史唯物論中卻非常陌生。不管是生產還是「勞動一般」，都與生產或勞動的單位「數量」沒有直接關係，Rosenberg 將「國際」立基在「總是有多個社會共存」這個普遍的經驗事實，容易因為涉及數量問題而顯得沒有那麼抽象。

不僅如此，從抽象的「數量」著手，只要將其單位設定為國家或任何封閉實體，離現實主義就不遠了，畢竟無政府狀態和權力平衡莫不以數量為前提。這就是 Rosenberg 企圖從「國際」和現實主義保留下來的概念嗎？他 (1994: 28) 在分析 Waltz 的權力平衡時這麼懷疑過：

如果這個〔國際〕體系，只是由個別單位的數量和相對力量所施加的一套外在〔於國家的〕限制，那麼除了它們之間……數量上的差異和權力的分配之外——數學上的可能性已事先給定——變化還能有什麼意思呢？但是，這當然不是我們所謂的歷史變化（粗體為筆者加的）。

Rosenberg 顯然是把變化限定在歷史—社會的範圍內。然而，橫向的、水平層次的或量上的不同，真的不能帶來實質的改變嗎？或者說，若能帶來變化，是在什麼意義上而言的？近年來，他相當重視數量本身帶來的變化，這也是他對托洛茨基辯證觀的解讀結果 (Rosenberg 2012)。在他的詮釋下，「不平衡與綜合發展」也特別著重這一點。

綜上所述，當全球化理論家認為國家體系式微並試圖說明時，Rosenberg 和其他馬克思主義者（見前一章）反而需要說明國家體系仍然穩固的原因，所謂的「國際」也在這一正一反的對立中，成了兩種問題架構的交叉點。《全球化理論的蠢話》指出「多個社會（秩序）共存」的事實，但這個特質現在有了更清楚的名字：「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其應用範圍和實質內容遠遠超過 Callinicos 和托洛茨基的限定用法。

### 第三節 邁向普世方案

Rosenberg 試圖以「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兼顧前述對社會關係的重視以及承認多個社會共存的觀點。這個規律在他手中已經不限於前一章 Callinicos 描述的資本動態，還貫穿了人類歷史。針對《俄國革命史》正式提出「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著名段落 (Trotsky 2008: 5 或見第四章第二節引文，這裡不重複引用)，Rosenberg 提醒我們存在著特殊與普世兩種解讀。

第一，托洛茨基是在相當特定的脈絡和動機下提出這個概念的。以俄國革命的歷史根源來說，「不平衡與綜合發展」是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互動所產生的現象。為了在國際上競爭，沙皇引入資本主義，以便增加軍事力量。從托洛茨基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是在假定地緣政治正在運作的情況下，比較國家之間的不平衡發展，並且分析不同生產方式在特定國家內部的綜合發展，最終擬定階級鬥爭（與聯合）的戰略。不過，這個過程僅限於資本主義存在及擴張的時期，因此發生在不同生產關係之間。Rosenberg (1996) 受獎的講稿就是在這個意義寫下的。如此一來，「不平衡與綜合發展」仍然不足以解決「古典社會學 vs. 國際關係理論」、「社會關係 vs. 多重社會共存」或「社會和國際」等失之交臂的情況，因為國際關係本身並不是在資本主義這個特定社會關係中才存在的。

第二，托洛茨基又從另一個方向把「不平衡發展」和「綜合發展」視為「普世」或「最一般」的規律。既然如此，它就超越了資本主義，不只是與其它生產關係（如封建主義）互動所產生的特定現象。有別於第一種解讀，這種「普世版本」認為「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內在於歷史過程本身」，因此「托洛茨基克服了從社會學來定義國際的障礙。」(Rosenberg 2006: 309) 延續建構「國際」本體論的目標，現在他把「國際」定義為「特別是發生在不只一個社會共存其中的社會現實向度」(ibid.: 308)，「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就是這些社會共存的普世關係。<sup>99</sup>

---

<sup>99</sup> Rosenberg 不是在這方面努力的唯一一人，也不是最早的，另一位遵照托洛茨基說法把「不平衡與綜合發展」視為普世規律並以此理解世界史的研究者，是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 George Novack (1980)，他曾任美國托洛茨基辯護委員會（之後即為著名的杜威委員會）的秘書。如果不是 Rosenberg 具有國際關係理論的特定關懷，Novack 的表述其實更清晰易讀。Novack (1976: 101-2, 4-5) 回應其他馬克思主義者對拉丁美洲發展狀況的質疑時，也澄清了「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兼顧社會「內在」發展和「外在」影響的本質。

## 一、不平衡發展

這個規律是對人類世界的一般描述：不管處於什麼時間點，總是有「多樣的社會和不同的規模、文化形式及物質發展水平」存在。在經驗上，從來沒有社會發展的單一道路：「如果我們把這個一般性的現象概念化，就必須從承認這點開始：它總是涉及在時間上共存的社會的情況（instances）、層次（levels）和形式之多重性（multiplicity）。」（*ibid.*: 314）

Rosenberg 以 Eric Wolf (1982) 名著《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所「觀察」到的 1400 年為例表示，要了解當時的世界就要「從地理學開始」，也就是包括地質學和氣候變異（variation）在內的整個地球表面。我們會看到，大草原和可耕地的區分規範了舊世界人類活動的軌跡，在溫帶的西北歐、亞熱帶的西非、北印度和中國之間有著廣大游牧活動及居民。在至少五個主要文明共存於地球的不同地區中，中國有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度；印度的種姓公社正如細胞分裂般增多；伊斯蘭世界的商業網路發達，奠基在綿延甚廣的城市鏈條上；在基督教歐洲的領土則持續分封和再分封；中南美洲的道路尚無車輪，城市尚無書寫，許多動物尚未馴化。在這些文明中，有許多政治實體，每一個都有自身的發展軌跡。

眾多異質社會以「非共時的同時性」（asynchronous simultaneity）（*ibid.*: 315）共存於 1400 年，歷史是「不平衡發展」的。問題是，我們如何能把這個經驗上如此複雜的世界一般化？這些分殊現象儘管複雜，卻非毫無秩序，而是「一個本體論上的整體」（an ontological whole）：

人類發展就是這樣的整體。1400 年，它不是一個因果上統合起來的整體，卻是一個本體論上的整體。在生物演化（biological evolution）更廣而持續的過程中，這個整體由於其質上顯眼的特徵而被圈出，也由於至今其無盡卻最終有窮的存在時段（span）而受限。雖然這無疑是很明顯的經驗性陳述，但正是這樣的觀察，它作為一個理論前提有著令人驚訝的效果。因為一旦我們這麼說了，政治碎裂性（political fragment）理應不可化約的事實，即國際（the international）所特有的問題架構之基礎，本身就可在分析上被看作一種特質的具體化，更具有一般性人類存在的社會歷史特質——其固有的不平衡性（unevenness）。這個更具一般性的特質同時表達了數量上的多重性以及

社會文化形式、發展水平、地理範圍和歷史時間在性質上的多重性 (*ibid.*: 316)。

這邊可以歸納「不平衡發展」的特點：第一，作為一個必須存活的類屬，不管人類有多少差異，他們首先是一個生物演化的整體，這是就其共通性而言。第二，在這個共通性下，「不平衡發展」意味的本體論「多」或「多重性」，既是量上可數的（即社會和政治實體的複數性），也是質上相異的（即社會和政治實體發展之間的差異性）。

如此一來，托洛茨基「不平衡發展」涉及的兩個面向——在資本主義時代是「世界經濟一體化與平均化的趨勢」與「國家對立」——就有了更放諸四海皆準的前提，只不過這個前提是抽象的，必須視具體時代和關注主題而添加細節。

## 二、綜合發展

Rosenberg 再次引用 Wolf (1982: 18) 表示：「人類可曾有任何時候人口獨立於包覆他們的更廣泛關係，不受更大的力場所影響？」伴隨「不平衡發展」而來的是外交 (diplomacy) (Rosenberg 2006: 319-20) 或 Van der Pij (2007, 2010) 所說的「對外關係」(foreign relation)。一旦把社會之間的互動納入生物演化整體的考量，「用社會理論的話來說，要定義任何既存社會的具體存在，其再生產條件就不能限於社會關係的『內部』結構，後者往往形塑了古典社會理論的起點。由於社際共存 (inter-societal coexistence) 的赤裸事實，這些再生產條件總是包括了那些作為外交管理對象的外在條件。」(Rosenberg 2006: 320)

由於社會之間彼此相關，接下來就必須考慮它們的因果模式 (*ibid.*: 322)。這時，就無法停留在人類整體的制高點，必須進入眾多社會構成的眾多群體。Rosenberg 把這些群體比喻做「星叢」(constellation)，這些社會構成星叢般的群體，儘管群體的邊界和成員都會變動。為了讓說明更具一般性並盡可能延續托洛茨基的思路，Rosenberg 選了前現代的俄羅斯當例子。

俄羅斯的國家形構起自 9 世紀斯堪地那維亞貿易的羅斯 (Rus) 在波羅的海和君士坦丁堡之間的長期水上工作。以基輔為中心的原始國家從那時候起，就藉由奴隸貿易和部落的剩餘與君士坦丁堡互通有無。在這個過程中，東正教、西里

爾文 (Cyrillic) 和拜占庭的商法漸漸把基輔整合進拜占庭的對外關係。不過，幾次十字軍東征令拜占庭貿易大受影響，後者在政治上開始分裂，基輔則在 1240 年被蒙古征服，土地也分裂為相互競爭的幾個公國。莫斯科的中心位在東北方較安全的森林地帶，作為蒙古的附庸國與半共和制的諾夫哥羅德城邦及封建的立陶宛競爭。莫斯科成為「俄羅斯」，是在立陶宛於 1677 年戰敗之後。然而，全力西進的俄國斯此時面對的，已經是進入絕對主義國家時期的西歐諸國，而這種制度正是彼得大帝設法學習和輸入的。

雖然從這樣的敘述看來，商業往來使基輔與君士坦丁堡屬於同一群體，莫斯科、諾夫哥羅德和立陶宛的短兵相接也讓它們處在一個「星叢」，基輔因為與拜占庭互動而間接受到十字軍影響，至於莫斯科之所以能從蒙古脫離，則跟帖木兒王朝進攻金帳汗國有關。不僅如此，蒙古對歐亞大陸的短暫統一促成東西方之間的商路穩定，進而讓包括十字軍在內的歐洲商人嚮往東方。換句話說，「星叢」之間也會相互影響。

每一個「星叢」都是眾多社會構成的群體，分屬不同群體的個別社會彼此要聯繫，往往要經由它們構成的群體，而群體邊緣的社會更容易與另一個群體邊緣的社會互動。「作如是想，則每一個星叢的每一個成員，本身都是自己專屬的實體星叢的中心，即使它在一定範圍內同時又佔據了鄰居們構成的不同星叢中的不同位置。」(ibid.: 323) 如果再把群體邊界和成員的變動等因素引入，社會之間的互動就沒有一個中心點，我們很難採取單一視角來審視歷史進程。

Rosenberg 認為，上述充滿「連鎖效應」的因果模式或「多重視角」的因果關係 (ibid.: 322-3)，不只發生在社會實體之間，也發生在它們內部，只不過後者受到政治組織的調節和干擾。在此，Rosenberg 區分了綜合發展的兩個層次，或不如說兩個難以割裂的層次。

第一，與社會內部不同，在社際面向上，沒有一個最高行動者打斷「綜合發展」的過程，這個過程是在參與其中的所有社會施盡外交方式、互動手段下經年累月進行的。如果最後形成某種秩序，該秩序也是「社會再生產浮現和自生的特質。」(ibid.: 323) 在通常情況下，這些秩序或稍加持久的關係隨時會受到威脅，威脅可能來自含糊不清的國際法，也可能來自民族認同。換句話說，「國際」並不穩固。Rosenberg 說：

從「國內類比」的世界觀來看，這種現象表示，國際作為一個社會生活的領域並不完整，它的問題還要靠移植「國內」領域的契約商定……來解決。相反，從綜合發展的觀點來看，它們在定義上完善了「社會」(the social) 本身的知識建築。這反映了發展的戰略面向，而這個面向用了從單一社會的概念中無法抽取出來的方式，給社會的「國內」特質添加了許多規定 (*ibid.*: 324)。

這裡比較特別的是，Rosenberg 不只把「綜合發展」視為國內現象（見下一點），也把它視為國際上浮現的體系或社會現象——可能形成秩序也可能因為威脅而中斷——用第四章「不平衡與綜合發展」本體論意涵的話來說，**這個「世界」層次的形成是很難預先確定的。**

第二，如果這個方面是不穩固和多變的，那麼「國內」當然也不是封閉的。與上述相同但相對的是，「我們應該在理論的最深層次上拋棄任何如下想法，也就是分析上社會能在與其他社會互動之前形成。」(*ibid.*: 325) 上述俄羅斯 9 世紀以來的發展意味著不存在一段「前綜合發展的俄羅斯」。新舊融合、古老到現代的跳躍不只有技術發展在時間上的意義，更表示在空間上國際會「入侵」社會。

因此，「綜合發展」有兩個特點：第一，世界或體系的層次完全可能受到較低層次（不管是國際互動還是單一社會內部的運動）的影響而崩壞；第二，國際和國內若即若離、相互影響，要像現實主義那樣把國際徹底與國內分開，在理論上是不可能的。

### 三、整合與反思

這就是 Rosenberg 把「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延伸為普世規律的大致思路。我們可以從他的敘述中感受到許多用語的不確定，不過從「不平衡發展」到「綜合發展」，有幾個本體論概念是確定的：

1. 整體：在人類世界中分殊複雜的社會，最終可歸結為生物演化的過程。
- 2.1 多—量：社會不是單數的，而複數的。

- 2.2 多一質：在這些複數社會中，遍布著不同的性質或特質。
- 3. 互動：這些互不相同的單位不只彼此並列，也持續互動。
- 4.1 單位一之內：社會內部必然受到國際層次的影響。
- 4.2 單位一之間：複數社會的互動本身，即國際層次。
- 4.3 單位一之上：單位之間互動浮現的結果，也確保這些單位的再生產。

從字面上看，「不平衡發展」預設 1，指向 2.1 和 2.2；「綜合發展」指向 3，確切地說，經過 4.2，發生在 4.1 和 4.3。1 到 4 完成了一個折返：抽象到具體，整體到多重單位，再到多重單位的內部方面和它們互動浮現的方面，這時一開始的整體再次出現，但已經不再是那麼混沌，而是有一個清楚的條理——即「不平衡與綜合發展」規律——埋藏在複雜的表象下。

Rosenberg (2010) 最近又將這些分析向前推進一步。回顧上述兩種解讀（特殊和普遍），第一種，也就是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常見觀點，並未反思「政治多重性」及其衍生出的地緣政治的根源，而毋寧是預設了它：

托洛茨基的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如此醒目，是因為他在『假定國際存在』——也就是政治多重性持存——的情況下，對社會做了唯物主義的分析。然而，政治多重性的事實本身並沒有成為理論分析的對象：它沒有被不平衡性（unevenness）所解釋（*ibid.*: 168）。

托洛茨基的做法其實類似 Callinicos 為資本主義添加「現實主義環節」，面對新形勢，把新規定（國際競爭）納入既有規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雖然遵從「具體形勢具體分析」的原則讓馬克思主義更加靈活，但「國際」卻是外在的：「政治多重性的動態從外部（from without）額外規定（over-determining）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過程。」（*ibid.*: 167）

第二種解讀把「國際」視為內在的，人類歷史社會發展的社會多重性被代換成政治多重性。第一種解讀固然因為額外添加（*ad hoc*）國際向度而未能考察這個層次的深刻意義，第二種解讀卻將這個規定「刻入」歷史社會發展本身，假定

了社會和政治實體的重疊，因此接近現實主義，似乎只有這樣才能討論「多」：

假定不平衡性總是涉及數量上的多重性 (numerical multiplicity)，但為什麼就理應如此呢？……不平衡性也能在各個社會內部充分顯現，無須總是與它們的政治碎裂性有關，社會之間的政治碎裂性事實又能如何說明呢？如果不能回答這個問題，就無法聲稱在社會學上把國際理解為一個發展的向度 (*ibid.*: 169-70)。

由於政治多重性的效果最明顯，我們很容易由此出發，討論複數社會下多個社會的互動。為了回答這個問題，Rosenberg 離開現代早期的 1400 年，把討論範圍延伸到史前時期的人類，參考了世界史和考古學相關文獻，試圖說明「政治多重性的浮現」。

#### 四、政治（多重性）的浮現

原始人類以採集狩獵遊群 (hunter-gatherer bands) 為單位四散地表各處，地理位置對應著不同的氣候與生態，自然環境的差異使他們的生產力「不平衡」。在持續移動、與不同環境和其他遊群互動的過程中，他們有時候會共同生活、應付環境，以異族通婚的方式生育下一代 (*ibid.*: 180)，完成人類的再生產。不同血親家族也會形成網絡，進行簡單的貿易和交換，當然這又以遊群身處不同自然環境為前提。<sup>100</sup>

但是，到了定居階段，儲存剩餘產品就成了面對環境變異的主要方式，人類再生產的空間邏輯從擴散轉為結核 (nucleation)，異族通婚和共生的需求降低，更自成一格 (self-contained)。<sup>101</sup> 當農業有剩餘時，可換出容易腐化的生活資料，

---

<sup>100</sup> 這個階段的採集狩獵遊群有三個特色。第一，因為規模小，除了性分工之外，很少有其他種類的分工，這就減少了諸如經濟、政治、軍事等部門的區分。第二，缺乏分層 (stratification)，也就是統治者和被治者之間的差別，而這是「政治性」的根本特質。第三，為了再生產，常常和其他遊群共生，這種狀態很難區分出「內外」邊界。在人類定居之前，這些特色沒有很重大的改變 (Rosenberg 2010: 173)。

<sup>101</sup> 由於食物儲存意味著集中在特定地方，因此會引來獵捕者的注意，「團結」起來就有助於抵抗這些行為。長期防禦外部獵捕者就會需要特別有能力的個人，儲存起來的食物也成了人們長期倚



換回容易保存的奢侈品，這些東西能作為日後再交換生活資料的媒介，獲取這些東西以及掌握獲取它們的管道也形成權威，令定居群體有了階序（*hierarchy*）的差別——政治性（*the political*）出現。既成的權威鞏固了農業生產，更持續通過貿易與其他部落保持聯繫，原始國家生成（*ibid.*: 174）<sup>102</sup>。政治權威來自對剩餘的控制，這又會促進對外擴張；在物質上控制貿易產品、在外交上控制與其他團體的互動管道，也都有助於鞏固地位。此外，語言（特別是通用語）也在這時因為與鄰邦溝通的需求而越來越發展。

雖然「在這個過程產生第一個『國際』政治體系——在第一個多國體系中政治位階的內在持續性足以透過維持系統層級的效果和壓力來讓它們有自己的歷史（而不是迅速導致參與單位的內爆）——之前，還有許多步驟」（*ibid.*），但早期酋長制的過渡階段已經有了許多相關特徵，政治性在社群中的出現反映在「內外」邊沿的（*lateral*）差異，「政治多重性」（*political multiplicity*）的現象於是出現。

即便如此，早期國家的發展程度並不足以令其成員完全待在地上，社會關係的效力反而遠遠超過政治權力的有效範圍。在「內外區分」不牢固的情況下，凝結出來的國家數量有限。社會發展不斷溢出國家的收攏範圍。「政治」以人類在社會關係中的生活為前提，「國際」又是在「政治」出現之後顛簸而生的。

Rosenberg 利用 Buzan and Little (2000) 和其他世界史家的著作帶出了「前國際」狀態，政治多重性的出現因此有了深層社會原因，即人類歷史發展的「不平衡發展」與「綜合發展」。這就超越了第一和第二種解讀，因為政治多重性也被自然和社會本身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解釋了。回到托洛茨基的脈絡，我們可以說：資本主義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有其（用馬克思的話說）「洪水期前（*antediluvian*）的根源」（Rosenberg 2010: 187）；或者說，「不平衡與綜合發展」作為一般性抽象，會隨著不同時代（不同社會結構和地緣政治）有不同表現，在資本主義擴張過程或全球化下最為顯著。

---

賴的資源（*ibid.*: 173-4）。

<sup>102</sup> 有關原始國家或早期國家（*early states*）以及 Rosenberg 思考的「政治的浮現」或「政治生成」（*politogenesis*）（Grinin and Korotayev 2009）等主題，除了參考部分代表性的歐美人類學者著作（Claessen and Skalkin 2011），俄羅斯學者 Leonid Grinin (2008, 2009, 2003) 也從宏觀的演化角度比較了不同早期國家並對它們的發展加以分期。

## 五、回顧與批評

Rosenberg 質疑 Callinicos 為何不用「自由主義環節」命名新規定時，並沒有否定商品交換對勞動的物化只有在資本主義最明顯，而是說：一旦發現商品交換的秘密，就會知道這件事在資本主義以前就存在了。「不平衡與綜合發展」也是一樣道理：雖然在資本主義時代的國際競爭最明顯，但它由來已久，只是現今以最發達的形式表現出來。如果是這樣，人類社會就總是有一個多重社會並立和互動的向度，這是未來國際競爭的社會基礎。

再舉一例。馬克思提到亞里斯多德「缺乏價值概念」，因為只有在商品交換很普遍時，一切勞動才表現為「等同的人類勞動」，這是勞動力不平等的奴隸時代不能理解的 (Marx 2003b: 75)。當然，奴隸時代還是有勞動，但勞動在當時的意義與在資本主義時代的完全不同。同理：「不平衡與綜合發展」不只存在於資本主義（如表現為德國與美國對英國的趕超），更不受限於資本主義，因而能成為一個抽象：「不平衡與綜合發展」是一個貫穿人類歷史的規律，猶如在資本主義「抽象人類勞動」和奴隸勞動之外，尚有勞動本身或「勞動一般」(Marx 1995a: 46)。<sup>103</sup>

然而不可否認，單獨來看，這樣「蒸餾」出來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已經變得非常單薄了。Ashman (2010: 184) 就稱之為一碗「稀粥」(thin gruel) 並批評：「說社會以複數形式存在只不過是在描述而已，這既無法解釋這些社會之間混合起來的動態……也無法提供這些社會之間差異與不平衡的解釋。就算在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可以辨識出某些接近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東西，我們也只能用討論中的特殊生產方式理論來探照這樣的現象、它們的關係和動態，亦即要去

---

<sup>103</sup> 從「洪水期前」的說法到馬克思對亞里斯多德「缺乏價值概念」的討論，都顯示了「具體」和「抽象」的辯證。誠如 Brophy (2018) 所言，這裡涉及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比歷史唯物論再高一個抽象層次的辯證哲學或辯證唯物主義。雖然抽象必須在具體中展現或以具體為例，但若具體之間要在時間上相關（如轉型）和在空間上相連（如互動），就不可能拋棄抽象。以「契約」為例，資本主義時代的契約肯定有其獨特之處，好比依賴市場的運作和主權國家法律的保證，但我們還是可以從農民和地主之間的私人關係研究封建主義時契約，而且不難追溯契約最古老的形式，如個人之間的口耳誓言。不管契約在各種時代有何具體內容或特點，它們都不會違反契約該有的抽象形式。因此，「抽象與具體的劃分根本不會減損我們對『不平衡與綜合發展』作為資本主義規律的理解；事實上，它加強了我們對『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理解，因為討論不再陷於非此即彼（either/or）的典範並強迫我們在『不平衡與綜合發展』超歷史或資本主義特定版本之間做選擇。從一開始，辯證唯物主義的邏輯就揭示了這種選擇的謬誤。」簡言之，具體和抽象始終不同，卻相互滲透。

發展有決定性的抽象。」<sup>104</sup> Davidson (2009: 18) 也表示：「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只有在資本主義工業化及其導致的在歷史上獨特的社會才會到來。」並認為 Rosenberg 固然很努力地取出托洛茨基理論的重要意涵，這些意涵卻有「過度延伸該概念之嫌」(ibid.: 16)。

我認為，如果不是概念本身有延展性，以及托洛茨基本人相當有限的討論或讓「不平衡與綜合發展」處於「實踐狀態」(表現為「不斷革命」)，相關論者也無法任意延伸。真正的問題不是過度延伸，而是「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如何落實在特定歷史階段，特別是前資本主義時代，或者是前資本主義過渡至資本主義的時期(在托洛茨基筆下，這個規律不只發生在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之間，還透過「不斷革命」應用在資本主義過渡至社會主義的時期)。這麼做至少能證明這個規律並不如 Davidson 所說的只限於資本主義時代，因此有著比托洛茨基的應用更廣的普世性。

Rosenberg (2010: 159) 自己也承認：「『不平衡』與『綜合』這兩個謂詞的主詞仍是『發展』，這表示這個一般抽象只能透過具體說明特殊的歷史結構來具體化。」Callinicos (2010: 154) 在與他通信時則說：「你一旦嚴肅地探索穿越大跨度時空的社會間性(inter-societal)，要兌現一般抽象，你就不得不以更加歷史的特定生產方式為基礎來分析。」總之，我們不應該把 Rosenberg 和 Callinicos 的對話視為對立，因為他們兩人都覺得，分別從「生產方式」和「一般抽象」出發也許可以在「中點」相遇(Callinicos and Rosenberg 2010: 153)。Rosenberg (2010: 152-65) 就三番兩次地認為「不平衡與綜合發展」應該整合進歷史唯物論。

可惜，觀察 Rosenberg 的後續著作卻遲遲不見這番實踐。Alex Anievas 和 Kerem Nişancıoğlu (2015: 61) 對其說法的批判性接納是有道理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不是理論本身，而是在廣泛的歷史唯物論研究綱領中的一個方法論修整(methodological fix)。在不同歷史階段，發展為何、如何、在什麼形式上是不平衡與綜合的，只能被更具體的範疇，以及伴隨以生產方式為中心的分析而來的規定所表明。」所謂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只能「在且透過歷史上不同的生產方

---

<sup>104</sup> Ashman (2010: 194) 進一步表示：「托洛茨基的理論特別與資本主義相關：『古代與當代』的融合在形式上並非超歷史的，而是很現代的。這不是起初或首次過渡到資本主義的理論，而是『晚期』資本主義發展的理論——亦即這個發展是在資本主義已經存在於某些地方的脈絡中，或許也可說是其結果。」

式來操作」(ibid.: 62)。

在進入前資本主義來「兌現」普世規律之前，下一節試圖呼應 Rosenberg 的主張，花一些篇幅把「不平衡與綜合發展」整合進歷史唯物論。Rosenberg 在思考社會和政治多重性時，並沒有回到馬克思的文本，反而直接訴諸當代人類學和世界史家的著作。我們嘗試用馬克思（主義）的概念和術語思考社會多重性的出現。傳統的建築隱喻只是「獨棟建築」，無法在歷史理論方面構思社會多重性，遑論從政治多重性出發的國家體系，前文已多次提到「社會形構」和「世界」層次的單數問題，這裡不再贅述。透過分工和馬克思對共同體到社會的討論，可以建立一個「多棟林立」的視野，為日後所用。不過必須事先聲明，馬克思的文本並不是針對上述問題而來的，因此這仍是我的詮釋。

#### 第四節 延伸建築隱喻：回到馬克思

我在第二章特別討論了向來不包含在建築隱喻的交換關係。一方面，它連結直接生產者與生產資料、使勞動發生，內在於生產關係；另一方面，它讓勞動成果流通於交換各方，使用價值得以消耗，這些成果（產品、商品和金錢）可能來自不同生產關係，這時的交換關係外在於生產關係。

這一節指出，交換關係還帶出與內／外在於生產關係不同的第三面向：分工 (division of labor)。分工的邏輯或問題意識迥異於生產關係，馬克思很少單獨討論分工<sup>105</sup>；世界體系分析則直接加以應用，沒有把它放回歷史唯物論；馬克思

---

<sup>105</sup> 馬克思對分工的關注比較常被提到的是《資本論》中「社會分工」和「工場手工業分工」的部分，前者是各種社會型態共有的，後者是資本主義獨具的 (Marx 2003b: 397-8)。「在工場手工業中，保持比例數或比例的鐵的規律使一定數量工人從事一定職能；而在商品生產者及其生產資料在社會不同勞動部門中的分配上，偶然性和任意性發揮著自己的雜亂無章的作用。」此外，「在工場內部的分工中預先地、有計劃地起作用的規則，在社會內部的分工中只是在事後作為一種內在的、無聲的自然必然性起著作用，這種自然必然性可在市場價格的晴雨錶的變動中覺察出來，克服著商品生產者的無規則的任意行動。」(ibid.: 393-4)「社會內部的分工越不受權威的支配，工廠內部的分工就越發展，就越從屬於一人的權威。因此，在分工方面，工廠裡的權威和社會上的權威是互成反比的。」(ibid.: 395) 跟工場手工業比起來，大工廠裡面的分工又不一样了。「工場手工業所特有的以分工為基礎的協作又出現了，但這種協作現在表現為各個局部工作機的結合」。在機器生產中，工場手工業的「主觀的分工原則消失了」，「整個過程是客觀地按其本身的性質分解為各個組成階段，每個局部過程如何完成和各個局部過程如何結合的問題，由力學、化學等等在技術上的應用來解決」(ibid.: 417) 這些重要的區分是就政治經濟學意義來談的，尤其是

主義研究者一來在這方面的專著較少 (Llorente 2005, 2006, Rattansi 1982, Ware 1982)，二來不太知道該怎麼在建築隱喻中安放這個概念。<sup>106</sup> 我們依序分析它的概念、與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關係，以及與社會多重性的關係。

## 一、分工的概念

分工的邏輯不同於生產資料和直接生產者「壟斷／分離」及「結合」的問題意識，而是勞動當作給定的。與生產關係關注「生產資料」在社會行動者之間的分配不同，分工關注「生產任務」在社會行動者之間的分配。就像生產資料的分配形成空位，生產任務的分配也會形成空位：在分工中，這些空位使佔據其中的社會行動者根據產品的特定使用價值以及生產這些產品所需的生產資料來勞動，勞動力（已經）與最終相應於特定使用價值的特定生產資料結合，開啟特殊勞動過程。用馬克思 (Marx 1998: 445) 的話來說：

分工作為一切特殊的生產活動方式的總體，是從物質方面、作為生產使用價值的勞動來考察的社會勞動的總體形式。

如果建築隱喻的生產關係屬於「社會生產關係」，那分工就更偏向「物質生產關係」或「工作關係」(work relations) (Cohen 2000: 112-4)。

與特定生產資料結合、生產特定使用價值時，直接生產者必須和其他相同處境（但與不同生產資料結合、生產不同使用價值）的直接生產者透過某些方式相遇，否則就無法生存，畢竟沒有一個人能生產生活所需的全部使用價值。在生產關係上，生產資料與直接生產者不結合，人類就不能勞動、生產和生存；在分工

---

馬克思藉此批評亞當斯密把資本主義和所有時代的分工混為一談。不過，我們更在意的是分工的歷史唯物論意義及其對「複數問題」的可能回應。

<sup>106</sup> Shaw (1978: 32-6) 把分工視為生產關係的一種，Rigby (1998: 20-3) 則認為分工屬於生產力。Llorente (2006) 批評 G. A. Cohen 對分工的討論以及認為馬克思主張共產主義應該廢除分工的通說。他指出，馬克思希望廢除的是工場手工業型態的分工（見前註）和物質及精神的分工，而不是分工本身，目的是希望人人從事有意義的分工和工作。Llorente (*ibid.*: 233, n3) 承認不知該如何把分工安放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建築體系」(architectonic) 中，只是指出分工在馬克思歷史理論的重要性。

上，不同使用價值不結合，人類同樣無法生存。也許在人類歷史早期，個體生存需要的使用價值不多，能夠獨自一人生產全部生活所需，但是作為團體成員，我們很早就脫離這種狀態。直接生產者的相遇方式就是交換，不管是透過金錢中介還是以物易物，甚或由某種程度的權威進行安排。這就何以交換關係會帶出與生產關係不同的面向，並且與分工結合在一起。幾乎沒有交換是不以分工為基礎的，畢竟兩個相同的東西沒有必要交換。

如果生產關係使人類分為階級（原始共產主義除外），直接生產者付出剩餘勞動、生產資料壟斷者榨取剩餘，那麼分工就使每一人類個體不再生產全部生活所需。由於個體是「不全」的，所以必須相互依賴，在他們結合之後構成的整體中介下，共享勞動成果。因此，分工關注「整體與個體」的關係，當我們說原始共產主義的社會行動者「全有」生產資料時，雖然是在表述生產關係，但這些個體也被他們身處其中作為整體的團體所中介，因此仍然可能涉及分工。此後，不管生產關係有何變化，分工沒有停止過。就像馬克思 (Marx 2003b: 397-8) 說的：「整個社會內的分工，不論是否以商品交換為媒介，是各種社會經濟形態所共有的。」有關「整體與個體」的問題在隨後的各種生產關係中並未消失，只是反映在剝削者或統治者正當化剝削行為的意識形態：總是設法證明或宣稱自己代表整體（從家庭、部落到整個社會，乃至全人類）。

## 二、分工與生產力

在個體方面，當生產任務日益細瑣、由越來越多直接生產者承擔時，只要他們順利相遇，透過交換關係滿足全部生活所需，整體的生產力就會提高，因為每一個直接生產者都專注自己的生產，用特定生產資料生產單一使用價值。從人類整體提高生產力的理性出發，個體的生產任務也可能被有意識地指派，由更多更適合操作特定生產資料的直接生產者承擔。和生產關係一樣，分工也會和生產力發生正向關係。不過，正如「階級理性」可能與「人類理性」衝突，生產關係阻礙生產力的提高，「個體理性」同樣可能與「整體理性」衝突<sup>107</sup>，分工也可能阻礙生產力的提高。

---

<sup>107</sup> 「隨著分工，也就進一步有了『單個人的或單個家庭的利益』與『所有互相交往的個人』之『共同利益』之間的矛盾，而且這種共同利益並非單單在想像中作為一種『普遍的東西』而存在，反而首先是在實際上作為（分了工的）個人之間的相互依存而存在。」(Marx and Engels 2016: 38)

生產力就算提高，卻可能「表現為一種完全獨立於並脫離於個人的東西，表現為與各個個人並存的一個獨立世界，其理由是：個人——他們的力量就是生產力——是分散地並彼此對立地存在著的，而另一方面，這些力量又只有存在這些個人的交往和聯繫中才是實際的力量。」對個體來說，這時的整體完全是外在力量，明明是他們互動的結果，卻看似與己無關。下面兩段引文描述了這個問題：

只要人們還處在**自然成長**的社會中、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間還存在著分裂、只要活動還不是自願地而是自然長成地分化的，那麼人自己的行動就會對人來說變成一種異己的、對立於他的力量：是這種力量壓迫著他，而不是他支配著這種力量。因為分工一旦開始，則每個人就被迫有了一個特定的、封閉的活動範圍，它不能逾越這個範圍……而且如果他不想失去生活資料，它就必須持續如此。

社會活動的這種「自我固定」、我們自己的產物之整合為一種實質的暴力——它統治我們、超出我們的打算——這是迄今歷史發展的主要環節之一。……（被分工所規定的）不同個人間的「共同活動」本身並非自願地而是**自然長成的**，所以這種「社會的力量」就並不對這些個人表現為它們自己的、聯合起來的力量，反而是某種異己的、在他們之外的暴力……這些發展階段不僅獨立於人們的意志和進程之外、甚至反而還指揮著人們的意志和進程。（Marx and Engels 2016: 38-9 粗體為筆者所加）

專注生產特定使用價值時，人類個體固然共享整體勞動成果，卻可能因為生產任務的細瑣化而不識「整體與個體」的連結，只考慮自身利益。由於不用生產生存所需的全部使用價值就能（透過交換）生存，個體便有機會在自己的生產任務上降低勞動生產力；當多數個體都這麼做，整體生產力就會下降。所謂的「異化」就是以「整體與個體」之間的關係在個體主觀上不被察覺為前提的。就像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衝突或適應關係一樣，分工和生產力的關係也有類似邏輯。

### 三、分工與生產關係

雖然分工與生產關係有前述類比上的差異，但是兩者很難分開。事實上，**生產資料的分配（生產關係）不可能不同時是特定生產資料的分配（分工），而特定生產資料又是為了生產特定使用價值。**例如，當我們設定直接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的「局部分離」（即生產資料按照「多—少」來分配的格局）時，雖然是在談論封建主義生產關係，卻一直預設生產資料是用來生產農產品的，而直接生產者就是農民，中世紀晚期到現代早期的歐洲以農業為主要生產任務。不管是農民、農業還是農產品，涉及的都是滿足人類生存所需的特定使用價值。有別於此，工商業多半出現在城市。

若不以農業社會為對象，封建主義生產方式的概念根本無法成立；資本主義則是馬克思以英國工廠為對象所構思的生產方式。更重要的是，由於工人沒有糧食就無法過活，《資本論》不得不涉及資本主義農業和地租的問題。相反，封建主義可以不討論工業問題（儘管城市和農村還是有相對低度發展的工業），因為農業可以提供最基本的生存資料，農業社會自成體系。可是，工業社會卻必須以農業為基礎，與之共同構成一個體系，儘管農業的邏輯已是資本主義的。<sup>108</sup> 因此，作為一種社會關係，所謂的生產關係是在分工正在發生的前提上談論的。**生產關係不只不能和分工分開，還必須預設分工的存在。**

當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結合，勞動過程開啟時，生產是作為一個單位或單元而存在的，它可能是「莊園」也可能是「工廠」。然而，這必須發生在所謂的「農業社會」或「工業社會」，「農」和「工」都是立基在特定生產任務（從特定生產資料到使用價值）的特殊勞動，屬於分工範疇。打個幾何學的比方，分工是一個「面」，生產單位是包含在面之內的「點」。分工和生產關係在現實中無法分開，我們只是在有關特定主題的敘述時才把它們分開。

此外，原始共產主義的生產資料雖然是「全有」的，生產資料透過整體分配給全部個體，但除了與生物需求最接近的分工（如性分工），其他分工也會慢慢出現，只要人口慢慢增加，生產力慢慢提高。換句話說，分工在階級尚未出現或並不明顯時的生產關係中就存在，在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出現後，也並未消失。如此一來，就有可能從分工的角度來理解生產關係。

---

<sup>108</sup>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把工農業分工稱為「一般的分工」，其下的次類型（如工業方面的輕重工業，農業方面的漁牧業等）則是「特殊的分工」。



就階級的出現來說，分工必須足夠細瑣，承載生產任務的個體（即人口）也要多達一定數量，彼此更要有相遇的管道、互補良好，最終導致生產力提升到一定程度，社會上才可能出現一群不用勞動、以獲取剩餘為生的人。在前封建主義和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晚期，分工和生產力必然分別到達這樣的水平，不用生產的地主階級和能夠專門治國的統治階級（從資產階級手中獲取「二手」剩餘）才能出現。

因此，剝削者和統治者的出現也是分工發展的結果。原本紮根在特定使用價值和相應生產資料的生產任務，得以衍生出確保這些任務被執行，但本身卻不屬於生產的其他空位：一方面是組織生產，不直接進行勞動，也就是間接生產，我們在此看到剝削，地主和資本家都是這樣的行動者；另一方面是確保生產組織、令使用價值順暢交換，我們在此看到專門治國的統治階級或國家管理者。這兩個方面大致對應了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前者的統治關係尚未獨立，與交換關係重合，而後者的統治關係已經相對獨立於交換關係。

誠如《德意志意識形態》所言：「分工發展的各個不同階段，同時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種不同形式。這就是說，分工的每一個階段還根據個人與勞動的財力、工具和產品的關係決定他們相互之間的關係。」(Marx and Engels 2016: 16) 不過分工的水平是特定生產關係出現的基礎，並不代表生產關係不會作用在分工，就好像生產力的提高是特定生產關係出現的基礎一樣（生產關係分配的生產資料都是生產力，而生產關係至少要在一段時期內提高生產力），生產關係也可能使生產力降低或提高。

舉例來說，在封建主義生產方式中，剝削者兼統治者為了在競爭中存活，可能不斷將農民無償付出的剩餘「投資」在軍事設備與技術，以至於分工的精進多半發生在軍事（和其他奢侈品）上，在生活必需品方面則相對低落。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剝削者（資本家）在擴大再生產時，也可能為了提高生產效率而雇用更多被剝削者（勞動者），賦予他們更細瑣的生產任務，讓他們專注在更細小的生產環節（當然，這個過程也與生產力的提高相應）；<sup>109</sup> 此外，整個社會也可

---

<sup>109</sup> 分工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確立很重要。這裡涉及「形式臣服」(formal subsumption) 與「實質臣服」(real subsumption) 的區分，可見第八章第二節討論外包體制的段落。這兩種臣服的標準並不是勞動者是否與生產工具分離；它們的勞動者其實都與生產工具分離了，重點是勞動力的生產任務是否進一步被分工（而不只是協作）給「支解」掉、徹底被資本指派與吸納、為生產力的發展和價值增殖服務。「勞動者與生產工具的分離」作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根本格局要確立

能因為眾多資本（家）的競爭，出現更多新興行業，產生更多以往想像不到的使用價值和生產任務。最後，在資本積累的推動下，「個體與個體」關係的問題更可能從國家中的各個地區上升到世界中的各個國家，出現不平等交換的情況，這也是世界體系分析學派的專長主題。

### 三、社會多重性的來源：分工體系及「社會」的出現

回到「整體與個體」的關係，我們可以仿照世界體系分析的原則說：若全部個體的生存所需都得到滿足，分工中的整體就形成一個「體系」，這個體系是個體經由分工和交換所組成的整體，生存所需被滿足的範圍就是體系的邊界；這個邊界不會固定，而是保持動態，但無論如何都是存在的。長期來看，分工是「自然長成」的，因此體系會持續擴張，就像生產力有提高的傾向一樣。不過，「自然長成」不只有自主發展的意思，更有「離開自然，進入社會」的意思。現在，我們試著進入社會多重性的問題。

對馬克思和恩格斯 (Marx and Engels 2016: 36) 來說，分工會自主發展：「分工起初只是性行為方面的分工，後來則是由於天賦（例如體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己或『自然長成地』做出了分工。」在以家庭為核心——從血緣關係出發，延伸出各種「**共同體**」，包括氏族、部落和酋邦等——的原始共產主義中，分工已經存在，不管勞動產出的使用價值有哪些、是否夠細瑣。

只要共同體的地理位置及自然資源不利於生產全部生活所需，就必須與其他共同體展開或多或少的交換，這時的交換就立基在共同體「之間」的分工，這些共同體形成一個體系。當然，若共同體「之內」能夠大致維持生活所需，它們之間的分工就沒有內部分工來得重要，共同體多少可以自為體系。

除了**自然分工**和共同體的存在，馬克思還曾簡要說明**社會分工**的出現。共同體被「化整為個」，透過分工和交換，本屬不同共同體的個體被納入不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體系，也就是社會。這時分工就從自然的或性方面的分工進入社會分工。「社會內部的分工以及個人被相應地限制在特殊職業範圍內的現象……是從相反的兩個起點發展起來的。」第一個起點：

---

並持續發揮作用、使更多勞動者與生產工具分離，顯然還取決於其他條件，馬克思對此的態度是相當謹慎的。某些研究者 (Davidson 2012: 576) 把「形式臣服」對應至外包體制（即勞動者向商人出賣其非勞動力商品的過程），「實質臣服」對應至勞動者與生產工具的分離，是有問題的。

在家庭內部，隨後在氏族內部，由於性別和年齡的差別，也就是純生理的基礎上產生了一種自然分工。隨著共同體的擴大，人口的增加，特別是各民族間的衝突，一個氏族之征服另一個氏族，這種分工的材料也擴大了。

第二個起點：

產品交換是在不同的家庭、氏族、共同體互相接觸的地方產生的，因為在文化的初期，以獨立資格互相接觸的不是個人，而是家庭、氏族等等。不同的共同體在各自的自然環境中找到不同的生產資料和不同的生活資料。因此，它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產品，也就各不相同。(Marx 2003b: 407 粗體為筆者所加)

馬克思繼續表示：「交換沒有造成生產領域之間的差別，而是使不同的生產領域發生關係，從而使它們轉化為社會總生產的多少互相依賴的部門。」因此，就第一個起點來說，「原本非獨立的東西獲得了獨立」；就第二個起點來說，「原來獨立的東西喪失了獨立」——社會分工產生。

這幾個段落非常重要，因為它凸顯了馬克思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操作，我們也可以從這裡推論社會多重性的存在。

首先，社會是一個比共同體（自然分工體系）更龐大、細瑣的分工體系，人們在其中透過「交換」結合了「不同生產領域」（可以理解為前文所說的特定使用價值、相應的生產資料和特殊勞動等生產任務），彼此作為獨立個體（而非附屬於共同體式的整體）滿足生存所需。

其次，馬克思之所以能藉分工設想社會的出現，一個很清楚的預設就是：**共同體是眾多的、複數的**：「不同的共同體在各自的自然環境中找到不同的生產資料和不同的生活資料」。作為自然分工形成的體系，共同體的邊界或許鬆散、浮動，規模或許容易透過血緣關係重組、擴大（就像 Rosenberg 提到的採集狩獵遊群一樣），邊界卻必然存在，數量也絕非單一。有了邊界就能討論邊界之外的其他整體，然後設想多個共同體，我們就能一次站穩「兩個起點」：共同體之內和

之間。於是，一方面自然分工在共同體內部突破共同體，另一方面社會分工在共同體之間慢慢建立、瓦解共同體——分工帶領人類「離開自然、進入社會」。

第三，這種概念操作不起眼，卻極富深意，因為**我們沒有理由認為（共同體瓦解之後出現的）社會不是眾多的、複數的**。在人類歷史中，自然資源在地表分配的不平衡直接影響共同體的數量與分布，這又影響它們進入社會的步調，以及這些社會的數量與分布——突破共同體後，根據分工而來的社會仍是複數的，這也就是社會多重性的來源。**Rosenberg** 在提到早期人類的貿易時，其實道理也是一樣的。

據此，我們應該把所謂的「社會形構」理解為「形構中的社會」。作為脈絡或環境，多個社會必然影響其中的個別社會；作為組成元素，多個社會也能在另一個層次構成新社會。社會形構不外乎是個別社會或新社會。和馬克思說明社會分工一樣，這種做法使用了同樣的概念操作：首先，從複數本體論出發，設想多個「團體」或「地區」的存在，不管是共同體還是社會；其次，同時就「團體」或「地區」內在狀態和外在關係來考量。因此，所謂的社會分工不只是社會之內的分工，也是社會之間的分工，甚至社會本身就是分工的結果。

綜上所述，分工的重要性在於它透過交換而產生的「結合」具有形成體系的功能。一旦體系（有邊界的整體）形成，建築隱喻就有了**空間意義**，而不只有**時間意義**。生產力的提高確實可以發生在個別社會或普世歷史，由行動者基於階級或人類理性來執行，但也可以是多個社會相互作用的結果；在以分工為基礎的交換關係中，相遇的產品可能包括作為生產力的生產資料，行動者可以因為「個體理性」（特定生產任務）而不只是階級或人類理性跨社會地交換生產力。生產關係**本身**無法交換，卻可以透過生產力的交換而在不同社會出現，為了與特定社會中新或舊、引入的或既有的生產力相適應或矛盾。在統治關係的範圍上，分工體系畫出的界線既可以在其內部，也可以遠遠超過其範圍，延伸至外部。總之，從生產力、生產關係到統治關係，都與分工形成的體系交織。

#### 四、延伸建築隱喻

現在，可以根據分工體系的概念延伸建築隱喻，把建築隱喻既有的和本節額外討論的概念整合起來，見表 5，下面分兩個部分討論。

抽象	D	C	B	A
5			(統治關係)	統治關係
4		(生產關係)	生產關係	
3	(低度交換)	交換／國際關係		(對外) 統治關係
2	(低度分工)	分工		
1	生產(力)			

表 5：延伸建築隱喻

### (一) 抽象層次

表格左側數字 1 到 5 是不同層次的抽象：生產(力)、分工、交換／國際關係、生產關係和統治關係。進行抽象時，這些概念可被單獨討論，儘管在現實中它們的對象相互關聯、無法分開。前文應該已經盡可能交代了它們的內涵。經典的建築隱喻只有 1、4 和 5 三個層次，並沒有納入 2 和 3，但在馬克思的其他著作中還是可以看到它們的蹤跡。後兩個層次不只會影響其他三個，而且可以幫助歷史唯物論的「硬核」更有力地深入前資本主義，避免建築隱喻只限於資本主義的質疑。

共時地來看，抽象 1 最宏觀，抽象 5 最微觀，以此類推。越宏觀越能在長時段發揮作用，效力也越隱微，不易被行動者經驗到，「生產力有提高的傾向」和「人類有提高生產力的理性」都是在這個意義上說的；此外，儘管發揮作用，宏觀的層次卻必須被相對微觀的層次中介，我們已經看到生產力與分工及交換、生產關係、統治關係的互動。相反，越微觀越能在短時段發揮作用，雖然必須以長時段作用為基礎，卻能作為各種事件深入日常生活，觸發實踐上的具體改變，容易被個體行動者經驗到，第二章就是在這個意義上簡述階級鬥爭和政治革命。無論如何，抽象層次會相互影響。

在這些層次中，馬克思沒有花多少篇幅討論分工。若複數性要在建築隱喻找到一席之地，我們通常只能往(對外)統治關係——統治者／剝削者的水平關係——探索，也就是國際關係。不過，從馬克思主義者對國家的討論來看，這麼做

也是相對少見的；更重要的是，這並非社會意義而是政治意義的劃界，僅當分工細瑣到一定程度（前提又是生產力有一定水平），才有專職統治的行動者和相對獨立的統治關係出現。那麼，作為統治關係和生產關係前提的「社會關係」和「社會又在哪裡呢？本節指出，由分工構成的若干體系（或幾何學的「面」），即多個社會，必須事先被預設。

如果採取生產方式的第二個定義，也就是暫時不考慮上層建築，只聚焦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上，即抽象 1 和 4，建築隱喻就是沒有邊界的，只能表示生產的發生及其「壟斷／分離」格局，這麼做或許有助於歷史分期，卻毫無空間意義。如果納入統治關係，即抽象 5，又聚焦在統治關係的內部性，不考慮剝削和確保剝削的範圍或邊界，結果也是一樣，此即包含上層建築的典型建築隱喻。只有考慮抽象 2 和 3 分別代表的分工和交換／國際關係，同時擴張抽象 5，使統治關係包含「對外」統治關係，我們才能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勾勒出輪廓，賦予建築隱喻空間意義，複數本體論也才是可能的。

## （二）歷史時期

由於概念所指的現實對象發生在歷史中，這些抽象層次都涉及時間面向，我們必須斷代地去理解前述抽象概念之間的關聯，也就是表格上方不同時間切面（A 到 D），它們大致對應了不同的歷史時期。

A 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統治關係在此之所以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抽象，是因為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成為一個經濟結構，其運作無須（儘管不排斥）統治關係介入。B 是封建主義生產方式，統治關係不是不存在，而是與交換關係（抽象 3）高度重合，形成政治結構；第二章已經說明，我們以括號表示。C 是階級不明顯或根本不存在的生產方式，這是一種「全有」的生產關係，本文僅以原始共產主義為例，這裡也以括號表示；分工早在其中發展，即內在於共同體的自然分工，初步的社會分工也許已經或正在成形。D 是連分工都相當低落、甚至完全自給自足的時代，屬於人類歷史的最早期。

雖然把這五個層次當作概念來分析歷史，但它們本身正是來自於歷史，多多少少按照順序歷時地出現，這點我們「可以用純粹經驗的方式來確認」。作為一種歷史理論，歷史唯物論嘗試說明 D 到 A 的過程，解釋必然穿插著歷史事實的

「經驗確認」和各個層次的分析與應用（史學實踐本身不能偏廢經驗和理論，見第一章）。本文主要聚焦在概念的部分，在涉及轉型過程和發展方向的問題上只限定在 B 到 A 的過程，也就是所謂的資本主義起源或過渡階段，見下一章。

表 5 可化為圖 4，圖中分成三個區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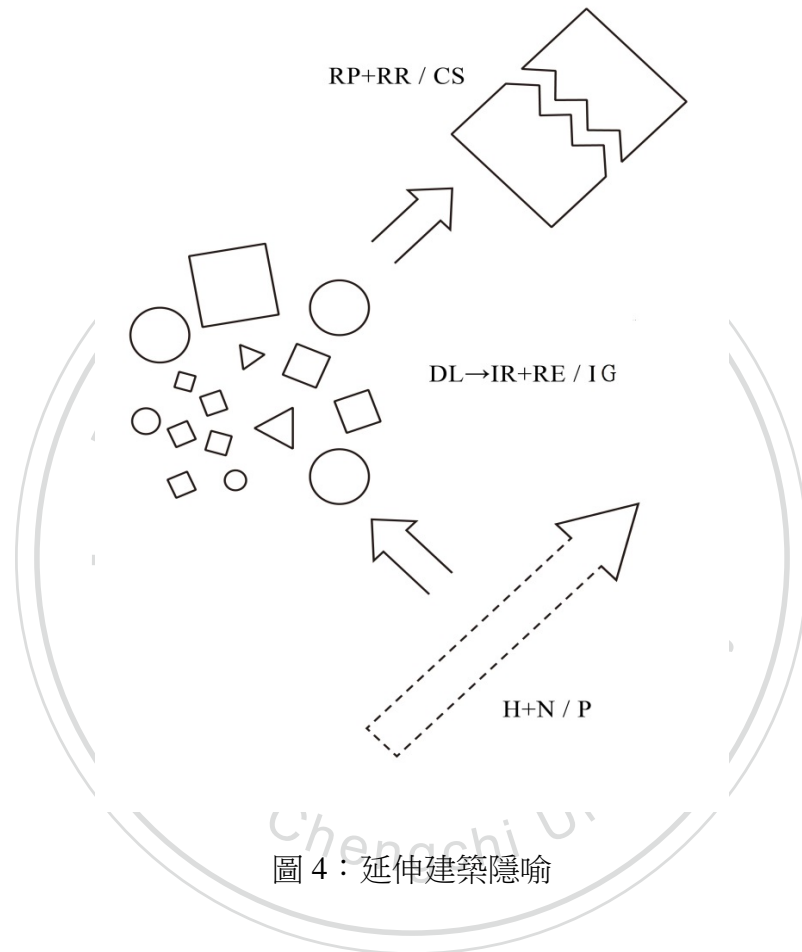


圖 4：延伸建築隱喻

最下方：向右上斜的箭號，長方形部分為虛線；H 為 Human（人類），N 為 Nature（自然），它們構成「人與自然」的關係，P 為 Production（生產），箭號代表生產力提升作為人類歷史的傾向。中間偏左處：圓形、正方形和三角形等圖案代表人類社群或團體的分散、規模和暫不論內容的差異類型，DL 為 Division of Labor（分工），在歷史上導致 IR（International Relation，國際關係）和 RE（Relation of Exchange，交換關係）的出現，在這兩種關係中社群或團體保持互動（IG，Interaction of Groups）。右上方：斷裂的方塊代表生產關係（和統治關係）的轉型，RP 和 RR 分別為生產關係和統治關係（參考第三章圖 1 和 2），CS 是 Class

Struggle，即階級鬥爭。英文字母之間的「／」區隔了關係和行動。沒有底邊的兩個實線箭號（向左上和向右上）為抽象層次的遞進，相當於表 3 中抽象數字 1 到 5 的遞增。每一次抽象層次的遞進（或具體化）都不排除前一層次的續存，後一層次都以前一層次為前提。最後，這三個區塊都各有自己發展的歷史，並且相互影響。

如果有了眾多社會這個複數「基盤」，藉由複數性增添空間意義，那麼轉型和發展——歷史——就不只發生在單數社會，還會在複數社會之間受到分工、交換關係和國際關係或（對外）統治關係等團體互動所作用，歷史唯物論將不只由「結構理論」、「轉型理論」和「方向性理論」構成 (Callinicos 1995: 95-109 見第一章第四節)，還必須納入第四個次級理論：互動理論。這時的轉型和發展將是什麼樣子呢？這就是「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嘗試回答的。





## 第四部份





## 第八章 歷史延伸的可能：對 Alan Carling 再進一解

托洛茨基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是分析俄國革命形勢的歷史社會框架，他多半直接運用而鮮少反思；為此，第四、五章回到資產階級革命的爭議和托洛茨基的文本，盡可能把其中的國際向度或複數本體論提出，重新詮釋其內涵。在第六、七章中，召喚「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 Justin Rosenberg 有其獨特關懷：為國關理論或歷史社會學奠定國際本體論。他在這個脈絡重新發現了托洛茨基，於是「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經典表述被純化為一般性概念，雖然得到專門反思，卻顯得相當空泛；就像他自己也承認並呼籲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有必要整合進歷史唯物論。

本章將嘗試拉近這種極端狀況——Rosenberg 的一般性概念抽象而普遍，托洛斯基的原始版本具體而特殊——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深掘，檢視**單一生產關係內部**（尤其是封建主義）「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可能，緩解人類普世境遇與資本主義時代之間的「過與不及」。本章的第二、三節透過 G. A. Cohen 和 Robert Benner 對生產力和生產關係（與階級鬥爭）的說明，凸顯他們的張力。第四節介紹 Alan Carling 引入演化理論對這種張力的整合，我將在第五節對這種整合再進一解，指出「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在其中的位置，最後由此看看「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在封建歐洲的運作：絕對主義的出現。在此之前，第一節先指出下文要處理的內容與前面幾章有何不同。

### 第一節 封建主義「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難題

托洛茨基原始版本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發生在「兩個生產關係」之間，資本主義是時代指標，也是非資本主義國家「外在必然性的催逼」來源。這時，國家的「先進」與「落後」之分（托洛茨基和 Gerschenkron 都採用這種說法）是就**強的意義**而言，因為它們分別代表**兩種生產關係**：先進國家有一種生產關係（資本主義），落後國家立基在另一種生產關係（封建主義）。作為歷史唯物論根本範疇，生產關係的抽象程度僅次於生產力（見第三章表 1），因此反映了社會結構的極大差異。在這個差異上，更高的生產力引入俄國，跟進的結果是資本主

義和封建主義在其中融合，生產關係發生改變。

可是，所有生產力的引入都會引起生產關係的改變嗎？在兩國（或地區）**生產關係相同的情況下**，還是可以引入先進的生產力，不會引發另一種與之相應的（新的）生產關係；就算這個先進的生產力發揮更高效率，現有生產關係尚能在一段時間內適應它。這裡若存在「綜合發展」，也不到不同生產關係之間並列、互動和融合的程度，頂多是不同程度生產力之間的搭配、競爭或取代。這時，兩地之間「先進」與「落後」的分別只有**弱的意義**，第六章介紹 Callinicos 描述的資本主義內部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也是在這個意義上談的。除了生產力高低的比較外，當然也涉及生產力的使用程度或轉化成軍事力量後的強弱。

必須注意，兩種生產關係互動時，還是要訴諸與生產力相關的各種競爭；換句話說，雖然只有「強的意義」才能彰顯先進與落後互動和融合時的爆炸性，但上述「弱的意義」始終發揮作用。如果是這樣，我們能否說同一類型或單一生產關係內部亦有「不平衡與綜合發展」？若能，單一生產關係內部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是什麼樣子？

我把幾種「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可能類型整理成下表，並分為四個象限，前文討論只集中在第一、第三和第四象限：

<p><b>第二象限：抽象和特殊</b> 封建主義 (單一生產關係內部)</p>	<p><b>第一象限：最具體而特殊</b> 托洛茨基的原始版本 (兩種生產關係之間)</p>
<p><b>第三象限：最抽象而普遍</b> Rosenberg 的一般性概念 (複數社會並立與互動的超歷史事實)</p>	<p><b>第四象限：抽象和特殊</b> 資本主義 (單一生產關係內部)</p>

表 6：「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四種類型

這裡說明一下分類的用語。「具體」與「抽象」是就理論貼近現實的程度、描述現實的效力而言的。越貼近就越具體，越遠離則越抽象。抽象不代表無效，而是其效力較為稀薄，但也更為普遍。「特殊」與「普遍」是就理論涉及現實的範圍

(在時間和空間兩個面向下)而言的。越特殊就越狹隘、越短促，越普遍就越寬廣、越長久。

現實往往高度複雜，以單一生產關係描述現實，效力必然稀薄，因此也就抽象（第二和第四象限）；如果拋棄「生產關係」，採用「社會」或「社會關係」，那就是最抽象的（第三象限）。相比起來，以兩種（以上）的生產關係來描述現實，其效力更厚實一些，所以是最具體的（第一象限）。不過，不管生產關係是封建主義、資本主義還是兩者的結合，它們都只捕捉了局部的現實，這些現實僅限於特定時空範圍，因此是特殊的（第一、二、四象限）；當然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共存與結合會是最特殊的（第一象限）。若超越生產關係，直接訴諸一般的人類社會性質，那就是最普遍的（第三象限）。

Alex Callinicos 在解釋國家體系的延續（並且用馬克思的方法將「現實主義環節」整合進資本主義）時，已經根據《資本論》大略提到了資本主義這個單一生產關係內部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見第六章第三、四節），因此在這一章更重要的問題是：如何思考封建主義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回答這個問題可以夯實 Rosenberg 的普世方案，也能讓托洛斯基的原始版本增加廣度，延伸到封建主義，進一步歷史化：不只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是「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它們內部也有不同意義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此即第二和第四象限的功能。

討論封建主義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是為了最終在一個長時段的視野下理解資本主義的起源與擴張。在資本主義的擴張方面，托洛茨基從**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兩種生產關係**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看到社會主義透過「不斷革命」誕生的可能。可是，在資本主義誕生的封建主義中，卻不存在兩種生產關係；我們有辦法設想封建主義自身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嗎？似乎非常困難。假如我們要增強「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普世性，猶如 Rosenberg 所做的那樣，就要正視這個歷史唯物論的難題。

這個提問不是鑽牛角尖，也不是純粹理論性的。「資產階級革命」的概念曾給馬克思、恩格斯和俄國革命領導人出了一道難題：是要如其字面所說的，真的由資本家這個「階級」來承擔呢？還是視之為奠定資本主義的「任務」，因而可由其他階級來承擔？答案顯然有深重的政治後果。從字面意義來看，這個概念恐怕從馬克思的時代起就已經相當模糊了；何況到了俄國革命，已經要在「不斷革命」中才能找到自身位置。

「不平衡與綜合發展」這個概念的歷史境遇也是一樣，只不過恰恰與「資產階級革命」相反：它在資本主義擴張的時代和托洛茨基筆下，表現得最清楚、最突出，可以直接按照字面意義來理解（正因如此，所謂的「資產階級革命」才模糊、隱微地被包裹在「不斷革命」中）；可是若將它延伸至資本主義起源時的封建歐洲，恐怕就沒有那麼清楚、突出，我們需要轉個彎、細緻地辨析，方能發現「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運作。誠如 Rosenberg 借用馬克思的說法，在資本主義之前「不平衡與綜合發展」有著「洪水期前的存在」。本章在處理這個問題時，無法給出完備的答案，只能盡量在一些素樸的歷史敘事找尋「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痕跡，可是這個問題本身應該值得馬克思主義者一起研究。

本章有兩個功能。第一，為 Rosenberg 的普世方案找到其他類似說法。有了這個說法作為著力點和對話對象，普世方案才更顯重要，不致淪為 Rosenberg 的個人苦思，而這個說法是一個相對成熟的理論，亦即 Carling 借重的演化理論；在他的協助下，複數本體論是非常清楚的。第二，搭建一座以複數本體論為基礎的理論舞台，指向封建主義歐洲，順道進入絕對主義在其中出現的規律，指認資本主義出現的條件。以下我們先從 Cohen 的歷史唯物論著手。

## 第二節 G. A. Cohen 的兩個命題

雖然被視為歷史唯物論的開創者，但馬克思從未對此做出系統性闡述，反而著力研究作為歷史特定階段的資本主義，幾份被認為是歷史唯物論的文件，不是在其身後出版（如《德意志意識型態》），就是他無意出版（如《政治經濟學批判手稿》）。讓我們再次回顧這個著名段落：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其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合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只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

這些文字固然引起不少「經濟決定論」或「機械論」的解讀與指控，但同樣有研究者進行了細緻且非教條的梳理與捍衛。在《馬克思的歷史理論》（*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中，Cohen 以分析哲學的方法，將馬克思未曾言明的內容命題化，被視為「正統歷史唯物論」（Wright, Levine and Sober 1992: 16）。儘管出版後遭到許多批評，人們終於能夠藉此清晰地理解歷史唯物論卻是公認的事實。下文概括其核心論證，指出相關問題和可能解決方案。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複數本體論的隱蔽元素，只不過被 Cohen 自己忽略了。

### 一、「首要性命題」與「發展命題」

概括而言，Cohen (2000: 134) 透過以下命題重建歷史唯物論。第一，「首要性命題」（Primacy Thesis）：「在一個社會中，生產關係的性質要由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來解釋。」第二，「發展命題」（Development Thesis）：「生產力有貫穿歷史發展的傾向。」第三，「基礎／上層建築命題」（Base/Superstructure Thesis）：一個社會的經濟結構，即「經濟基礎」，解釋了它的法律、政治等「上層建築」與意識形式。<sup>110</sup>

針對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關係，Cohen (*ibid.*: 160-1) 做了功能論的解釋（functional explanation）：

t 時點的生產關係之所以是 R 型，是因為在 t 時點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上，R 型的生產關係最適合生產力的使用與發展。……生產關係穩定持存（endure stably）是因為它們能促進生產力發展。……舊生產關係之所以停止存在，是因為它們不再能加惠生產力，新生產關係之所以出現，是因為它們傾向如此。無法履行功能的生產關係，在被取代之前，會持續一段時間。在這段時間，生產關係的性質要由它們對過去階段生產力的適應來解釋。

---

<sup>110</sup> Wright, Levine and Sober (1992: 16-7) 將「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係稱為「基礎／上層建築命題」。《馬克思的歷史理論》的核心始終是前兩個命題，雖然 Cohen 在第八章討論了「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係，但就像他自己所說的，該書聚焦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這兩個「較為根本的理論概念」上（Cohen 2000: x）。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研究者很少參考 Cohen 的著作，而《馬克思的歷史理論》引發的相關論辯，也多集中在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上。Wetherly (2006) 曾試圖建構 Cohen 的國家理論，但這項目標似乎由於對功能論的討論而被稀釋。由於我們的主題與「複數國家」或其疆界更有關係，因此也不把焦點放在作為統治機器的「國家」上。

解釋特定生產關係的持存與出現，不是回溯生產力如何導致 (cause) 生產關係，而是考察生產關係是否具有促進生產力的作用 (effect)。這個論證可以還原為：先有「R 型生產關係促進 t 時點的生產力」之「傾向性事實」(dispositional fact) (*ibid.*: 259-64)，後才有「R 型生產關係」之持存與出現；它也可以寫成： $(PR_t \rightarrow PF_t) \rightarrow PR_t$ 。雖然「傾向性事實」承認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作用，兩者因而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限制」(mutual constraints)，但生產關係的持存與出現又取決於是否提高生產力，故最終仍是生產力規定生產關係，而非反之。這個說法要站得住腳，必須依賴下一個命題。

Cohen 認為，人類多少是理性的 (rational)，而資源的匱乏 (scarcity) 又是其普遍歷史處境，擁有智慧的人類總會設法改善 (*ibid.*: 152)。乍看之下，生產力低落的前資本主義時代，似乎否定了這個命題。然而，若將資本主義與前資本主義一併考量，在整個歷史上，生產力確實是提高的。這不代表生產力隨時都在發展，而毋寧是說，Cohen 採取了一般歷史 (general history) 的後視觀點：經濟行動者的理性多少是「無關社會的」(asocial)，他們能在不同時代，根據生產力的需求，來改變或保留特定生產關係。據此，Cohen 日後更提出「完全發展命題」(Full Development Thesis)：「生產力有自主發展的傾向。」(Cohen and Kymlicka 1988: 83-4)

必須注意，並不是所有非經濟制度都屬於上層建築，上層建築指的是「可以被經濟結構的性質所解釋的非經濟制度<sup>111</sup>」(Cohen 2000: 216)，在《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中特指法律。至於經濟結構，則是生產關係的總合。對 Cohen 來說，僅憑執行某事 (如提高生產力) 或擁有某物 (如生產工具) 的力量 (might) 而無法律給予的權力 (Wright, Levine and Sober)，經濟結構將是不穩定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故「基礎」需要「上層建築」(*ibid.*: 219-20, 32)。對上層建築的解釋，可以類比於對生產關係的解釋：之所以會有特定上層建築，是因為它具有使生產關係改變或穩固的作用 (*ibid.*: 226)。因此，兩者的關係可以寫成： $(SS_t \rightarrow PR_t) \rightarrow SS_t$ 。<sup>112</sup>

<sup>111</sup> 由於承認經濟與非經濟 (如政治) 分離為兩種「制度」，是資本主義才有的事，即 (政治馬克思主義強調的) 政治與經濟之分化，Cohen (1988: 178-9) 後來澄清，上層建築是一種「現象」或「事實」。

<sup>112</sup> 我們可以合理推知「首要性命題」(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功能論關係) 需要「基礎／上層建



Cohen 的理論圖像可以概括如下：在某段時間內，生產力發展，並有一滿足其發展需求的生產關係持存，上層建築也因為穩固該生產關係而持存；一段時間後，生產力繼續發展，原有生產關係反而成為其「腳鐐」(fettering)；當生產關係必須改變，以致於上層建築不再能穩固它時，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將被更替。此後，生產力繼續發展，新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將會出現。

## 二、功能論問題與兩個命題的衝突

為了更快接近我們的主題，以下不處理上層建築，只討論兩個部份：第一，「首要性命題」的功能論問題；第二，「首要性命題」與「發展命題」的衝突。

第一，Elster (1986: 202-7) 指出，功能論解釋是一種後果解釋 (consequence explanation)：用被解釋項的作用是否滿足解釋項之需求來解釋其存在。與因果解釋 (causal explanation) 和意向解釋 (intentional explanation) 不同，後果解釋並未說明被解釋項出現的「機制」，充其量只能指出被解釋項和解釋項的相關性 (correlation)<sup>113</sup>。其他解釋固然也會面臨同樣問題，但要修正虛假的 (spurious) 因果關係，只要找到真正的因果關係即可；反觀後果解釋，卻不可能迴避因果關係。

如前所述，就算 R 型生產關係能促進 t 時點的生產力，為什麼有了「R 型生產關係促進 t 時點的生產力」的「傾向性事實」(在此，R 型生產關係和 t 時點的生產力只具有相關性)，「R 型生產關係」就會出現呢？對 Elster 來說，一旦找出這個機制，後果解釋要麼是多餘的，要麼是次佳的。功能論解釋在生物學——特別是物種演化的自然選擇 (natural selection) ——中的使用之所以有正當性，是因為動物只能適應環境且無自我意識，可單就其器官是否適於有機體存活 (最重要的功能) 來解釋器官的存在，意向解釋在此不適用。然而，社會與自然不同。在社會科學中解釋行動時，總是涉及人類意向，加上客觀行動在因果關係上的複雜性，功能論解釋難以適用 (Elster 1989: 64-5)。

---

築命題」(上層建築與經濟結構的功能論關係)，但這裡無法加以申論。

<sup>113</sup> 一先一後發生的事物，不代表它們在客觀上有因果關係，反而可能只是經驗的巧合或第三個真實的原因在其背後所導致。

Cohen (1986: 223-30) 認為，功能論解釋本身就是有效的，儘管對被解釋項的起源做詳盡闡述 (elaboration) 能使解釋更為全面。在社會中，我們確實可以在不認識因果機制的情況下開啟它，而這麼做仍有其獨立的實用價值 (好比可以只點燃火柴而不去瞭解燃燒原理)。作為一種後果解釋，Cohen 所謂的功能論其實是站在 (哪怕是極為複雜的) 因果鏈的終點，就客觀結果而論的；換句話說，它不僅不排斥行動者的意向，還能避免簡化複雜的因果關係，適合預測長時段的深層社會轉型。事實上，Cohen 並沒有逃避機制問題，反而還舉出了四種類型 (Cohen 2000: 229-30)：「意圖性的」(purposive)、「達爾文的」(Darwinian)、「拉馬克的」(Lamarckian) 和「自我欺騙」(self-deception)。

就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關係而言，「意圖性機制」指的是行動者能夠認識到生產力的發展需求，據此維持或改變生產關係；「達爾文機制」指的則是行動者在不認識生產力發展需求的情況下，由於社會內部的偶發狀況，以及**與其他社會的競爭**，其行動最終滿足了生產力發展的需求。<sup>114</sup> 顯然，Cohen 的「發展命題」表示「意圖性機制」更能說明特定生產關係的出現與維持。<sup>115</sup>

第二，Cohen (1988: 24) 在答覆批評時，肯定了「意圖性機制」：「人是理性的，會根據生產關係是否允許持續改善生產力，來保留或拒絕它。」然而，這個宣稱很難成立。

首先，在保留或改變生產關係時，行動者往往不考量生產力或其實基於其他考量。馬克思 (Marx 1973: 487 cf. Torrance 1985: 387) 說過：「我們從來不會在古代找到哪一種地產形式最具生產力的研究……問題始終是何種財產方式最能產生好公民。」Cohen (1988: 22) 也承認：「若一個資本家採取有利於生產力的優越工具或方法，他這麼做也是為了保護或增加其利益，而非減輕所有人的勞動。」雖然他堅持：「就算在此，促進生產力的深層理性 (the underlying reason for productive progress) 仍保有其角色」，但這足以顯示，一般歷史中的「人類視野 (或理性)」與特殊歷史階段中的「階級視野 (或理性)」很難重合。

---

<sup>114</sup> 「拉馬克機制」指的是行動者既不需要認識到生產力的發展需求，也不需依靠社會內部的偶發狀況，純粹依靠與其他社會的競爭便能改變或維持生產關係。這個邏輯反應了拉馬克演化理論中的「後天遺傳理論」(theory of inheritance of acquired characteristics)。「自我欺騙」則指行動者設想到生產力的發展需求，但卻不承認，Cohen 將此列入「意圖性機制」的次類型。

<sup>115</sup> Cohen 不採用「達爾文機制」的原因，可見 Nolan (2006)。

其次，就算行動者願意考量生產力，也總是已經處在特定生產關係中，很難判斷這個生產關係是否「允許持續改善生產力」。事實上，在對生產關係做功能論的解釋時，Cohen 同時用了「使用」和「發展」兩個詞：「在 t 時點上，生產關係之所以是 R 型，是因為在 t 時點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上，R 型的生產關係最適合生產力的**使用與發展**。」<sup>116</sup> Wright, Levine and Sober (1992: 26) 提醒我們，可以合理設想一個「生產力發展到一個水平時，出現發展束縛（development fettering），但該發展水平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在使用上仍完全相容的情況，亦即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被阻礙，不過在那些生產關係中，當前的生產力卻能完全且有效地被利用。」在這種情況下，儘管步履為艱，行動者卻察覺不到腳鐐，更別說掙脫。試想，若資本主義從未在一個社會中存在過，行動者（如封建生產關係的人們）如何知道現有生產關係無助於生產力的發展，而新生產關係可以解放生產力？除非我們假設多個社會存在，並且彼此影響、參照，這就是達爾文機制的預設。

不僅如此，Carling (2002: 103) 更指出，「發展命題」中，以行動者的超歷史理性作為生產關係出現和持存的「意圖性機制」，不只難以實現，這種論證策略更與「首要性命題」中的功能論牴觸。如前所述，功能論解釋本身並不排斥行動者意向，但 Cohen 以「發展命題」（特別是「完全發展命題」）支撐「首要性命題」的做法，等於轉向了意向解釋。因此，Carling 稱之為「意向首要性命題」（Intentional Primacy Thesis）：「生產力之所以必然優位於生產關係，是因為改善生產力的意向支配了改變生產關係的意向：這是一個在相關行動者的意識中，一個意向較另一個意向更具首要性的事實。」(ibid.: 104)

總之，雖然說明了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功能論關係（用分析哲學的方式從社會科學哲學的角度反思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的，Cohen 恐怕是當代第一人），但很顯然，他仍然在一個抽象社會的架構下思考這兩個範疇，以及行動者隨之而來理性（或意圖）的擺盪。唯一涉及複數社會的達爾文機制，最終是一條未被選擇的道路，而這條路將由 Carling 走下去。

---

<sup>116</sup> 這段話結束後，Cohen 談的盡是「發展」，而無「使用」：「……生產關係穩定持存，那是因為它們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Cohen 的重點是生產力的發展，人們的確可能只改進生產力的使用（好比加強資源的管理或分配），而非發展（必須透過生產關係的改變）；或者，如「消極革命」，並非為了生產力的發展，而是為了**生產力（在軍事上、在國際政治上）的使用**而改變生產關係。

### 第三節 Robert Brenner 的社會財產關係

與 Cohen 相反，Brenner 從「社會財產關係」(social property relations) 這個獨特的概念出發，解釋生產力的提高與停滯。

#### 一、政治與經濟的重合

第五章提到政治馬克思主義者的主張時，已經稍微看到類似論點，這邊我們直接引用 Brenner (2007: 58-9)<sup>117</sup> 的說法：

規定一個經濟體的微觀經濟學——即個人的合理選擇——的是宏觀結構，也就是馬克思所謂的生產關係，以及我所稱的社會財產關係 (social-property relations)。基於兩個理由，相較於更標準的生產關係，我更偏好社會財產關係。第一，社會生產關係這個詞有時會傳達如下意思：生產所發生的社會結構性框架，是由生產本身所規定的，也就是勞動過程的合作及組織形式。我認為這會造成嚴重誤導。第二，我認為，面對剝削者和直接生產者之間垂直 (vertical) 或剩餘榨取的階級關係，不只有必要將其結構性或限制性作用表露出來，而一般來說，這就是社會生產關係的意思；如果可以的話，更重要的是，呈現出剝削者自身和直接生產者自身中間水平 (horizontal) 關係的結構性或限制性作用。因此，在我的定義下，社會財產關係指的是，直接生產者之間關係、剝削者之間關係和剝削者與直接生產者之間關係的總和，它們使個人和家庭規律地獲取生產資料 (土地、勞動和工具) 和 / 或社會產品本身成為可能 / 得到說明。……

面對歷史所給定且盛行的一套特定社會財產關係，社會中的個體和家庭可被系統性地預期會採取一套特別的相應經濟策略，或者我稱之為再生產規則 (rules of reproduction)，因為在社會財產關係設下的可能性和限制中，這些策略或規則是最合理的。因此，我們可以說社會財產關係規定了再生產規

---

<sup>117</sup> 之所以不引用 Brenner 在 1970 年代的作品，是因為後者的說法儘管更具代表性，卻多屬論戰性質，往往為了答復不同作者而有不同的強調對象，行文也有些犬牙交錯。

則。

……藉由探問每一個人跟隨經濟再生產規則的結果，我們可以檢視或舉出一個經濟體世俗的基本經濟趨勢。<sup>118</sup>

對 Brenner 來說，無論個人還是集體，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下的直接生產者（如農民）往往占有（possess）生存資料，不會成為雇傭勞動者。因此，無論個人還是集體，同樣占有生存資料、卻想取得生產者部份產品的剝削者（通常是地主）便只能訴諸「外於經濟的強制」手段。在這種情況下，生產者和剝削者不用在市場上購買生存資料，亦無須藉由提高生產力，競相出售產品。不僅如此，由於生存資料（如糧食）的供給不穩定，他們還會避免依賴市場。

直接生產者能做的，就是用現有生產工具盡量生產所有日常生活所需，並抵抗剝削者的侵犯（如組織村社）；除非剩餘勞動能在市場上換得等價物（這很晚

---

<sup>118</sup> 這幾段引文值得再三思考。首先，對馬克思主義來說，「財產關係」指的是法律上生產／生存資料的所有權，而非經濟上有效控制物質的事實，這也是為何論及經濟結構時，馬克思主義者多談「生產關係」，即本文所說的間接／直接生產者與生產資料「壟斷／分離」的格局，而不用「財產關係」。然而，從這段引文和 Brenner 在其他地方（1986: 26-7）的敘述來看，之所以要用「社會財產關係」而非「生產關係」，是因為一個政治馬克思主義者奉為圭臬的原則：資本主義的經濟與政治（或法律）是分離的，故可單獨論及（經濟結構中的）生產關係；但在前資本主義，就沒辦法這麼做，因為經濟與政治不可分，只能以「財產關係」稱之。

其次，「社會財產關係」的說法不只考量了農民與地主的「垂直」關係（在經濟與政治尚未分離的前提下），還試圖兼顧「水平」關係，也就是地主之間的（地緣）政治積累（見下文，前文已略為提及）。回到第二章從歷史唯物論的典型用語來看，Brenner 其實採取了生產方式的「第三種」定義：假設整個社會屬於單一生產關係（即封建主義，儘管 Brenner 不用「生產關係」一詞），並且有與之相應的再生產機制。我們知道，第三種定義只是第四種定義的稍為抽象的版本而已，因此用馬克思和 Banaji 的說法，Brenner 等於把地主之間的政治積累視為封建主義社會財產關係的「運動規律」。以上兩點考量亦可參酌 Dimmock (2014: 16-7) 的介紹。

第三，Bernstein (2013: 324) 敏銳觀察到，「Brenner 的『再生產規則』，應用到封建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其理論架構中表達的意圖就和『運動規律』在 Banaji 中的一樣，在這方面他們的確有非常類似的封建主義觀點。」換句話說，Brenner 其實和不少重視前資本主義商品交換和貿易活動的理論家一樣，都重視再生產機制，只不過他為封建主義選擇的主要再生產機制是政治積累，而不是貿易。也因為這樣，把「社會財產關係」重新拆成「生產關係」和「再生產規則／機制」，他就會和這些理論家一樣，面臨何者更具決定性的問題。以上述認知為前提，下文將和 Callinicos (2004: 48) 一樣把「社會財產關係」當作「生產關係」來討論。

才發生)，否則不會特別努力地生產。反觀剝削者，要持續獲取剩餘產品，就不能迫使生產者離開土地；作為農民集體力量的村社，更不可能使生產者與其生產工具分離。因此，剝削者只能嘗試發展強制手段，一來剝削農民，二來與其他地主競爭，獲取更多的生存資料與軍事用品，此即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下「政治積累」的過程 (*ibid.*: 27-32)。

在這種處境下，Brenner 認為，不可能有所謂的「現代經濟成長」：第一，生產講究效率，且其改善是系統而連續的；第二，個別經濟行動者的自利行為（如降低成本、專業化和創新）有利總體經濟成長 (*ibid.*: 24)。他進一步指出 (1977: 32)：

僅當勞動不再占有生產工具、勞動者從直接的支配關係（如奴隸或農奴制）解放出來，資本與勞動力才有『自由』結合在一起，使最高水平技術成為可能。……僅在自由工資勞動者存在的條件下，個別生產單位……才會被迫為買而賣、為存活與繁衍而買、為了在與其他競爭的生產單位的關係中保有一席之地而擴張與創新。」（粗體為筆者所加）

簡言之，這裡的因果關係是：「財產關係形式→個別經濟行動者的再生產規則→經濟發展／不發展的長期模式。」(Brenner 1986: 26-7) 在前資本主義中，確實有過技術創新的紀錄<sup>119</sup>，可是用 Wood (2002b: 6-8) 的話說，這些都不是對經濟行動者施加的「命令」(imperative)，而只是他們的「機會」(opportunity) 而已；只有在資本主義中，經濟行動者才不得不為交換而生產。由於在資本主義下，生產者與生產工具分離，必須出賣勞動力以換取工資，剝削者（資本家）在經濟領域中便能榨取其剩餘價值，不像前資本主義的剝削者（地主貴族）必須動用政治軍事力量，「政治」和「經濟」難以區分 (Wood 2003: 10-1)。<sup>120</sup>

---

<sup>119</sup> 11 世紀，歐洲出現重犁、水車和三年輪耕制。然而，這些技術創新最終趕不上人口成長帶來的需求，因為它們的發明是很偶然的 (Teschke 2003: 92)。中世紀早期，面對人口復甦和長子繼承制下土地不斷分封、資源日益匱乏的情況，統治者為了獲取更多資源，一方面對內大舉開發土地（大量森林、荒地和沼澤被改為耕地），一方面也持續向外征戰。重犁就是在這個背景下誕生的，因為它只有在大片耕地上才能發揮作用。

<sup>120</sup> 「政經分離」作為資本主義的特質，在二十世紀凱因斯主義及各項國家干預措施下，似乎遭

## 二、西歐封建主義動態：階級鬥爭的觀點

有了「社會財產關係」架構，Brenner 接著以中世紀歐洲人口循環為基礎，比較了封建社會財產關係下，法（及德國西部）、東（北）歐和英等國家或地區階級團結程度和鬥爭的結果。

### （一）法國

從 10 世紀的「封建革命」開始，法國的政治結構開始與英國的產生極大差異。在黑死病肆虐過後的法國，人口（相對於土地的）減少使農民能藉由占用未開墾土地和更換地主，爭取固定地租和土地繼承權；待糧食、地租與穀物價格上漲，地主的實際收入減少更多，必須設法佔有更多農地才能榨取足夠剩餘勞動。為此，法國地主才在長期的地緣政治競爭之後，願意與規模更大的地主及王室合作，換得封建國家官職。有別於過往零星分布的地主以地租來榨取剩餘、農民亦利用人口減少和地主相互競爭的優勢來提高議價能力。15 世紀開始，法國的絕對主義國家逐漸建立，轉而以稅收來榨取剩餘。

「因為稅收是建立在中央集權的基礎上，農民不再能利用其流動性和地主之間的競爭來削弱他們的徵稅（即使國家還很小）。因為是具有更大疆界範圍和政治—強制能力的國家在收集稅賦，農民發現自身沒有足夠力量拒絕或抵抗，因為他們自己的組織一般來說都限於農村或與市場城鎮連結的農村群組。」(ibid.: 93) 當然，為了使剩餘勞動源源不絕，法國這個「稅收—官職」(tax-office) 國家也保障農民的人身自由和對小規模份地的所有權。在貴族的殘酷競爭（最後導致合作）下，權力全歸中央，農奴制也被廢除 (ibid.: 91-3)。然而，農民在階級鬥爭中勝利的結果，反而使他們極力維持規模本來就不大的農地，以至於生產力並未提高，生產工具沒有長足進步，法國的資本主義因而延後出現。

---

到了挑戰。國關理論中葛蘭西學派的奠基者 Robert Cox (1981) 便認為，「政經分離」只是 19 世紀英國自由放任主義的意識型態。然而，之所以必須以「干預」來稱政府的行為，正是因為它已經作為一個制度，與市場分離了，而這種現象在前資本主義中是不存在的。

## （二）東歐

在東（北）歐方面，因為東向殖民的貴族分佈零散，個別力量不大，為了鼓勵農民耕作與定居，以獲取更多地租，他們必須提供優厚的地租條件，故一開始農民的議價能力也較高。然而，當西歐人口不再增加，東歐的殖民活動也就被迫停滯。面對剩餘勞動來源的停滯，地主卻因為分佈零散和彼此競爭，無法提高地租。「為了超越隨之而來的統治危機，地主……在很長一段時間後，透過建構一種旨在明確限制地主之間競爭和控制農民流動性的新國家形式確保了當時難以想像的自我組織水平。」（*ibid.*: 94）

與法國或西歐的「對照組」不同，東歐貴族的零散組織反而成了優勢：由於不存在中央集權的王室，也就不需要鞏固農民的人身自由和土地所有權；在這種情況下，農民的組織由於本來就零散而脆弱，更不可能抵抗地主的嚴苛要求。就像西歐的地主一樣，東歐的地主也日漸強化其政治組織，進而形成「長期的封建演化過程」（*ibid.*: 95），只不過採取的政治形式不一樣：西歐是中央集權，東歐則是持續的主權零碎化，而農民回到了「再版農奴制」<sup>121</sup>。

## （三）英國

有別於上述兩例，只有英國（和荷蘭）<sup>122</sup> 結束了「封建演化過程」。自威廉征服以來，英國農民一直在封建農業的架構下勞動。在黑死病爆發之後，和法國一樣，勞動力開始出現短缺的情況，農民議價能力提高。為了避免地租或剩餘勞動減少，地主設法提高租金，農民於是展開一連串反抗。1381 年的暴動儘管以失敗告終，卻開啟了農民反抗的先河；到 15 世紀中期，部分農民已經獲得自由身分，由皇家法庭保有其自由持地（*freehold*）的權利，得以繳納低廉的地租。

---

<sup>121</sup> 西歐農奴制瓦解後，東歐農奴制仍然持續，甚至有加強或新生的狀況，東西歐在這方面的進程是「不平衡發展」的，第八章第三節也呈現兩地在地緣政治積累上的「不平衡發展」。美洲大陸的種植園奴隸制也與東歐農奴制一樣落後於西歐腳步。以西歐為中心，美洲和東歐為邊陲，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出現，學者們在此會針對邊陲究竟在什麼意義上是或不是資本主義展開爭論，見何順果（2003）。從社會財產關係或生產關係出發的 *Brenner* 基本上不處理這個問題。

<sup>122</sup> 究竟荷蘭能否算是第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對政治馬克思主義來說，理論上取決於市場依賴是否已經成為社會財產關係的一部份，即是否已經成為階級行動者的命令，抑或仍只是機會。*Brenner* 和 *Wood* 在這個問題上有不同看法。*Brenner*（2001）認為北尼德蘭（荷蘭共和國）在 16 世紀後半取得獨立之後，已經是資本主義國家，*Wood*（2002a）則認為還沒。



英國統治階級因此面臨了危機。

面對這些農民，地主不像他們的東歐同行對待農奴般能夠強行收租，也無法組成像法國一樣的官僚國家課徵稅收。在不願放棄傳統收租權利的前提下，他們「別無選擇」，只能利用「實質上不怎麼封建的政治階級組織，把他們在農民傳統份地上的僅存權利，轉換成他們自己的無條件所有權。」(ibid.: 97) 這麼做當然有一些前提。事實上，在黑死病爆發的百年之後，人口已經恢復一定水平，人地比率開始走高，議價能力導向地主。由於自由持地農 (freeholder) 的權利受到保障 (儘管如此，他們也日漸出現貧富差距)，原本的公簿持地農 (copyholder) 遂成地主榨取剩餘的主要目標。經由在領地法庭的重新裁示，他們雖然像從前一樣繳交地租，但在督鐸王朝 (1485-1603) 時，租金的本質已經不再是傳統習慣法規範下的地租，而是租賃土地商品的租金，它們也就逐漸轉換為租賃持地農 (leaseholder)，而傳統上地方性的習慣法 (custom law) 也已經被公法 (common law) 所取代。

在整個 16 世紀，藉由國家的幫助，地主鎮壓了許多為了抵抗這種土地性質轉換 (從傳統份地成為出租地) 而掀起的暴動，並透過圈地使農戶與其生產資料分離，成為必須相互競爭的土地承租者和無地或失地的受雇者 (ibid.: 95-9)。最終，三層租佃制出現，從中可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基本格局，這也是我們後來所說的「農業資本主義」。

對 Brenner (ibid.: 98) 來說，地主的上述作為並不是為了創造新體系，只是想鞏固傳統收租權：「英國地主，在他們自己看來，只是按照有著時間加持的古風來行事，並且確認他們的封建權利還能對其傳統佃戶任意施加租賦。」特定社會財產關係中的行動者，無法超越該關係來思考和行動，「再生產規則」始終是為了因應既有「社會財產關係」。這種「弱理性」的觀點與 Cohen 版本的歷史發展觀截然不同。

### 三、「非意圖後果」與階級鬥爭的問題

總之，前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各有其內在邏輯，必須獨立看待，若「把前資本主義至資本主義的過渡當作既有社會形式多多少少是自然的……延伸或長成，且頂多只是量的而非質的轉型，那麼作為一種特殊社會形式的資本主義市場就消

失了。」(ibid.: 7)

Brenner 和 Wood 因此反對兩種目的論，第二章已大略提及。第一，「商業化模型」(commercialization model) (ibid.: 11-21)：正如亞當斯密所說的，人天生有「互通有無、以物易物」(truck and barter) 的傾向，資本主義的誕生就算不是人性使然，其種子也早在前資本主義的市場中埋下。第二，「馬克思主義式的斯密主義」(Marxist Smithianism) (Brenner 1986: 40-2) 或者「新斯密主義的馬克思主義」(Brenner 1977)：主張理性的經濟行動者有提高生產力和強化貿易活動，以此替換生產關係的自然傾向。Brenner 試圖貫徹 1950 年代「過渡論戰」中 Dobb 從階級鬥爭出發的分析，在 1970 年代批評 Sweezy 和 Wallerstein 等人。特別是針對貿易活動的強化和 Wallerstein 代表的世界體系分析，部分論者認為「生產方式和世界經濟是兩種不同的經濟體系，我們無法在理論上，從世界所有地區之間的關係轉移到單一地區內階級之間的關係。」(Bergesen 2015: 105)，Song (2015: 174) 則表示，這兩種途徑有著「無法調和的張力」(irreconcilable tension)。<sup>123</sup> 嘗試用 Wallerstein (和 Frank) 補充 Brenner 不足之處者可見 Gülalp (1981)。

如果前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是斷裂的，那麼過渡如何可能？顯然，不管是個別農民還是村社，都沒有理由使直接生產者與其生產工具分離。可是對剝削者來說，情況卻不太一樣。雖然不論以個別或集體的形式離開土地，農民都同樣被剝削，但當集體離開土地、成為大量的自由工資勞動者時，地主的剝削就算不是更

---

<sup>123</sup> 必須注意，就算是「兩種無法調和的張力」，也不代表這樣的張力不存在於 Dobb 和 Brenner 筆下，我們要小心別把他們的陳述簡化了。首先，Dobb 並未完全拒絕 Sweezy 強調的貿易。以階級鬥爭解釋封建主義的危機後，他轉而訴諸農民階級的分化 (Dobb 1963: 59-62)，也就是富農與貧農的出現，以便解釋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過渡時期，而這個分化又以市場和商品交換的日益普遍為前提。Brenner (1978: 127) 對 Dobb 的批評就是針對這一點。他認為，後者並沒有貫徹以階級鬥爭 (和生產關係) 來解釋整個資本主義起源的方法。

其次，Brenner 並未否定貿易的重要。他除了研究過英國商人的活動 (Brenner 1972, 2003)，更在處理荷蘭的資本主義起源問題上明確表示：「我把中世紀和現代早期歐洲的『商業資本』當作經濟發展不可分的起點，即**必要前提**……但我認為，它的城市工業和商業是封建社會自然長成的結果……遠未能催化經濟發展。……尤有甚者，以貿易為基礎的分工的案例——涉及農業剩餘的交換，這又出於統治階級對農民的榨取，以便透過商人獲得城市 (或有時是鄉村) 手工業者生產的奢侈紡織品和軍事用品——打從定居農業以來就在歷史上重複出現，但在現代早期到來前，總是無法啟動以人均產量成長為特色的動態增長——就算在有此現象的時代，也只發生在高度限定的區域。」(Brenner 2001: 171) 簡言之，就像「再生產規則」的概念所示，Brenner 同時考量了歷史唯物論中的「生產關係」和「再生產機制」，只不過他關心的再生產機制偏向政治積累，因為這對生產的影響比商業活動更迫切。

嚴重的，也會是更隱蔽的。因此，與前資本主義相比，資本主義其實更有利於剝削者。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會有意識地迫使生產者與生產工具分離，「除非帶來現代經濟成長的資本主義財產關係，已經在其他地方存在，並向他們顯示轉型帶來的各種好處」(Brenner 1986: 50)。

然而，這種說法只能假定資本主義存在，因此並非資本主義起源（即首次出現）的問題。不過，資本主義最後確實出現了，故 Brenner 表示，這只能被當作「前資本主義個別行動者再生產規則之運作，以及／或者前資本主義階級之間衝突的非意圖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ibid.: 51)。這個後果取決於階級力量的對比，我們可以按照「個體」和「整體」兩個向度考察農民和地主、生產者與剝削者在既有財產關係施加的結構下是否各自團結為一個階級、相互鬥爭，又或者，因為階級內部鬥爭而成為零散的個體 (ibid.: 52)。

雖然 Brenner 特重階級鬥爭的做法有助於比較各地經濟史，但在「資本主義起源」的問題上，則被偶然性深深壟罩。「非意圖後果」或許可以解釋生產關係的轉型，卻無法解釋歷史發展的方向，用第一章討論歷史哲學的解釋問題時的話來說，可以「走向過去」卻不能「回到當下」；即使生產關係發生危機，依靠階級鬥爭還是不易指出危機及轉型之後的（新）生產關係。因此，Brenner 的理論很難滿足歷史理論的全部要件，特別是其中的方向性理論。

就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關係而言，Brenner 的理論有失偏頗。我們不妨看看 Callinicos (1990: 113-4; cf. 萬毓澤, 2008: 131-2) 怎麼說：

一旦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結構性矛盾被從歷史唯物論之中剔除，我們就不太明白，剩下的理論在任何實質的意義上是否還算得上是一種社會轉型的理論。階級鬥爭本身無法解釋一種生產方式往另一種生產方式的過渡。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公開或隱蔽的衝突，是所有階級社會的固有特色。然而，只有在葛蘭西所謂「有機危機」(organic crisis) 的時期中，這些衝突才會達到比較激烈的程度，而使得佔支配地位的社會體制受到質疑。只有當馬克思主義能夠解釋這類危機的出現時，馬克思主義才算提供了它號稱要提供的歷史理論。

回到歷史唯物論的基本範疇，重點仍然是：應該根據生產關係和生產力這兩個根本性的決定因素來判斷社會矛盾的程度，以及是否處於危機時期，而不能只訴諸階級鬥爭。或者說，

在危機時期，階級衝突的角色變得相當關鍵，社會秩序的轉化已在此時提上了議事日程……這種轉化的必要條件，是由生產方式中各種結構決定因素之間矛盾的加劇所提供。階級力量的對比與階級衝突的結果，有可能潛在地為這種轉化的實現提供充分條件。然而，這樣的結果無法事先被保證。倒退回先前的社會型態，或「鬥爭的各階級同歸於盡」的可能性都不能被排除……在這種「過渡的緊要關頭」之際，階級衝突的角色從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傳遞機制（transmission mechanism）轉變為實現（或不實現）改造既有社會型態的轉化能動者（transforming agent）（Milonakis 1997: 319-20, cf. 萬毓澤, 2008: 131-2）。

這些說法能夠根據不同時期把生產關係、生產力和階級鬥爭安放在適當位置，賦予其一定比重，故能避免 Brenner 和 Cohen 的對立。

然而，就算這幾個根本範疇的關係得到糾正，有別於封建主義又能實質提高生產力的生產關係（資本主義）的出現還是很難得到保證，畢竟「倒退回先前的社會型態，或『鬥爭的各階級同歸於盡』的可能性都不能被排除」。這裡的難題再次反映了建築隱喻建立在「抽象社會」模型上的困境。如果把建築隱喻奠定在社會的複數本體論上，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衝突就能獲得一定程度的緩解，Alan Carling 就是這麼做的。

#### 第四節 對 Alan Carling 的整合再進一解

接下來介紹 Carling 的幾個命題，指認這些命題的困境和「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在其中的可能痕跡。現在先來看看為了同時確保 Cohen 的功能論和整合 Brenner 對階級鬥爭的強調，Carling 是怎麼做的：選擇了 Cohen 拒絕的「達爾文機制」。

首先，他提出「自然首要性命題」(Natural Primacy Thesis) (Carling 2002: 108)：

在匱乏的歷史處境中，每個社會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之部份性質，要由生產力〔所能支撐的〕生存 (subsistence) 水平來解釋。

在生產力是否達至生存水平還是個問題的(史前)時期，自然選擇可以適用於人類：在各個社會中，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保留或出現，取決於它們能否使生產力支撐人類生存，而它們中的某些類型之所以持存或出現，正是因為能使人類生存不再有困難。

在此，生產力的需求還不到**發展**，只限於**生存**。這種「溫飽式唯物主義 (gut materialism) 無法提供一種在所有生產關係體系都通過生存考驗時進行區辨的解釋。如果我們想要這種解釋……選擇 (selection) 的觀念就要延伸到對社會選擇 (social selection) 的包容，以便判斷社會的再生產，包括一個社會在部份由其他社會構成的環境中存活的能力。」(ibid.) 這時，生產力不能只追求溫飽(雖然這個條件不會因為達到而被拋棄)，還必須進一步發展，面對和**其他社會**構成的新生存考驗。<sup>124</sup>

### 一、競爭首要性命題

一旦活下來，就必須面對**多個社會**並存的事實<sup>125</sup>，生存不再只是物質上「溫飽」而已。在跨過這個生存的門檻之後，Carling 提出了「競爭首要性命題」(Competitive Primacy Thesis) (ibid.)：

---

<sup>124</sup> Carling (2002: 111) 因此反對將自然選擇直接照搬到人類社會。雖不能照搬，但就人類不可能拋棄的生物層次而言，仍有自然選擇可以著力的地方。前文中，Elster 對功能論的反對(他認為只能適用於自然界)忽視了這個面向。

<sup>125</sup> 在此聲明：粗體字「其他社會」和「多個社會」都是我為了敘述上的銜接有意添加的。在前文介紹對 Cohen 的相關質疑時，我也刻意提到「多個社會若不彼此影響、參照」很難知道現有生產關係究竟對於生產力有何助益或阻礙。雖然 Carling 並未直接關注複數社會的問題，不過其途徑很明顯地預設了複數社會。

- (i) 兩個不同的生產關係體系彼此競爭，它們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一個較高，一個較低。
- (ii) 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差異，使生產力較高的生產關係體系，勝過生產力較低者。

這個命題不討論生產力發展水平較高的生產關係如何出現(這是下一個命題的任務)，另一方面也並沒有表示生產力發展水平較高者必然勝出 (*ibid.*: 110)，而毋寧是繼續留守後果解釋：長期來看，勝出者必然是生產力發展水平較高者。

不同生產關係相互競爭時，競爭者往往不會選擇生產力發展水平較高者，反而會選擇生產力使用水平較高者，如強盛軍事力量或豐富的物質產出，除非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已經直接反映在使用水平上。但即便如此，競爭者仍是基於使用水平來選擇。在提到生產關係的相互競爭時，Carling (*ibid.*: 112) 自己就承認：一個當前生產力強、潛在生產力弱的封建帝國，完全可能在政治軍事上消滅另一個當前生產力弱、潛在生產力強的初生資本主義國家<sup>126</sup>。

這裡的意思跟本章開頭從「弱」和「強」兩種意義來談「先進」與「落後」國家之分一樣：弱的意義就是指生產力的「使用」，畢竟不管生產力如何「發展」(即上限提高到什麼程度)，總是要被使用、表現出來。在競爭中，強的、能夠提高生產力上限的生產關係，在短期內未必會表現出來，甚至可能被弱的、僅能充分使用現行程度之生產力的生產關係擊敗。在生產關係必須表現為生產力(或者說，生產力始終發生在特定生產關係中)而競爭只能以生產力的使用結果(如地緣政治積累)為中介這兩個方面的共同作用下，我們只能說：長期來看，能夠發展生產力的生產關係就會留下來。這就是資本主義的擴張。

## 二、封建分裂命題

目前為止，與「達爾文機制」有關的都是選擇理論 (theories of selection)，而同屬演化機制的還有另一面：變異理論 (theories of variation) (*ibid.*: 120)<sup>127</sup>。

---

<sup>126</sup> Carling 這裡指的是中世紀的加泰隆尼亞。

<sup>127</sup> 關於演化理論的選擇和變異，在此僅採用 Bertram (1990: 117-8) 的概括：「首先，存在一個由物理環境和其他生物有機體所構成的環境。其次，存在著一些在該環境中存活並繁衍下去的有機

Carling 的「競爭首要性命題」只解釋了特定生產關係——在使用生產力時彼此「較量」——的擴張，即（被）選擇，卻未解釋該生產關係的起源，也就是在世界某處之首創。他接著回到封建歐洲提出「封建分裂命題」（Feudal Fission Thesis）：

像英國這類的農業資本主義，很有可能從像歐洲封建主義這類的社會中產生。

這個命題有兩個前提：「歐洲封建主義在政治上是去中心的」以及「存在著封建主義下人口興衰的循環」（*ibid.*: 115）。在封建主義的**多重政治體**中<sup>128</sup>，難免有一個地區的內部會發生「變異」；在相同競爭行為持續發生的情況下，變異的機率

---

體。物種（species）中的多數成員或許可以被生產出來，但只有那些最能適應環境嚴苛和匱乏者，方能存活下去。在一個給定的種群（population）中，基因突變（genetic mutation）會帶來變異。一個有機體或許會變得具適應性，足以發揮『棲位』（niche）優勢，也可能對捕獵者發展出熟練的抵抗，等等。當然，環境並非固定不變，因為物理環境會改變，其他物種也會改變。」這個理論有兩個層面：第一，眾多單位在其環境中彼此競爭，即何者及其如何存活的「（被）選擇」層面；第二，這個（被）選擇單位的優勢如何出現的「變異」層面。若歷史唯物論可以與此類比，則前者適合討論資本主義的擴張，後者適合討論資本主義的起源。本文到目前為止的討論都屬於資本主義的擴張，接下來才開始觸及其起源問題。

<sup>128</sup> 本章無法直接處理達爾文的思想 and 當代演化理論的新綜合（Modern Synthesis），只能藉由關注這個典範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談。然而，即便是演化理論研究者似乎也對「種群」（population）代表的複數性沒有太大興趣，但這卻是演化理論至關重要的基礎。演化理論的核心概念不是只有變異、競爭、遺傳，還包括了表現型（phenotype）與基因型（genotype）／互動器（interactor）與複製器（replicator）的區分（Hull 1980）以及與複數本體論相關的種群，Hodgson and Knudsen (2010: 9) 清楚表明：

演化涉及的，不只是個別實體的內在轉變，還有與其他實體及它們的環境互動所產生的變化。一旦我們有這種涉及種群的本體論，提出的問題就不只與每一個別實體的發展有關，還與實體如何彼此互動、為何有些實體比其他實體在一些意義上存活得更長久、更成功有關。

簡言之，「只有在多元實體的族群本體論中，選擇才有意義。」有機體在種群中不只發生變異，選擇之後的遺傳也不只發生在親子兩代之間，實際上還會在種群中擴散。這裡的邏輯就好像資本主義在各個國家「擴張」或擴散一樣，不只是個別國家揮別封建主義、進入資本主義的「起源」問題，傳統的歷史社會理論往往聚焦在後者，也就是單一而抽象的社會，未能一次性納入多個社會或國家的互動與比較，演化理論的優勢正是由「種群」代表的複數本體論出發。

不算低，即出現第一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

Carling (1991: 46-69) 透過 Brenner 的理論將各個社會的階級鬥爭視為新生產關係出現的機制，配合「競爭首要性命題」這個特定生產關係勝出的機制，所有論證都待在功能論解釋中，資本主義的起源與擴張無需訴諸「意向解釋」，足以避免 Cohen 面對的困境。未被選擇的「達爾文機制」保留了功能論解釋，為具體解釋資本主義的擴張與起源留下了空位。這些空位由多個社會（地區或政治體）各自充滿變化的生產關係、帶來「非意圖後果」的階級鬥爭和彼此之間透過生產力使用方式的競爭所佔據。

回過頭來看，Cohen 的真正問題其實並非「首要性命題」的功能論解釋，而是當他要完善這個解釋時所採用的「意圖性機制」。馬克思曾說：「**生產一般**是一個抽象，但只要它確實強調與界定了共同面向，並因此避免重複的情況，它就是一個合理的抽象。……不過，這個**一般**的概念，或者說，經過比較而得出的共同面向，本身就是紛雜的複合物，由分歧的範疇所構成。」(Marx 1995a: 190) **長遠來看**，一般歷史理論和行動者的超歷史理性並沒有錯，只是效力過於稀薄（見第三章表 2 對歷史唯物論諸範疇抽象程度的評比），難以說明特定歷史處境下生產關係的出現。

因此，其實無須否定一般歷史理論，只消用一套機制說明它。架構這一套機制有兩個步驟：首先，假定多個地區或其中多個團體的存在；其次，同步考察兩個部分，也就是這些團體的**內在性質和它們之間的互動**，「變異」和「選擇」分別就是這兩個部分。這樣的**概念操作**很明顯立基在複數本體論上，我們熟知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也以此為中介。

Carling 似乎解決了生產力和階級鬥爭的「必然性／偶然性」問題（以及生產關係和生產力兩者關係的說明問題）。單看個別社會（英、法和東歐）的確不能保證資本主義的出現，我們頂多知道在各個社會內部，因為人口循環和階級鬥爭，生產關係充滿變化，隨之而來的生產力可能提高，也可能降低。正因如此，**我們不能單看個別社會，還必須一次性地考慮多個社會的共存與互動**。這是 Carling 的最重要提醒，切合本文主旨。

在他筆下，封建主義的互動方式是（地緣）政治積累或軍事競爭，就算不能預測競爭中何者勝出，至少可以確定：長期來看，最能促進生產力**發展**之競爭者會留下。在生產力的「使用」奠基在生產力的「發展」上、生產力的發展又被生



產關係規定以及社會之間互動與比較等前提下，競爭最終會從「弱的意義」導向「強的意義」，從生產力的「使用」轉往「發展」，後者又涉及生產關係的選擇：最終，Brenner 的偶然性說明會和 Cohen 的必然性說明整合在一起，這個整合的第一步是什麼呢？其實就是承認複數本體論，可是這樣還不夠。

Carling 的整合有一些值得細究的問題，這些問題將帶我們走向「不平衡與綜合發展」，賦予它更高的普遍性，這應該也是 Rosenberg 希望做到的。

### 三、兩條平行線如何交會？

我們已經知道，在「競爭首要性命題」方面，從後果解釋的角度出發，勝出者是「生產力發展水平較高」的生產關係；在「封建分裂命題」方面，各個地區的階級鬥爭（伴隨人口循環），可以導致生產關係的多樣性。那麼，把階級鬥爭的「弱理性」推至政治積累，不從後果解釋的角度出發，而從歷史當下統治階級個別成員的角度出發——對 Carling 來說，競爭者基本上只看生產力的使用或表現——「生產力發展水平較高」的生產關係真的還會勝出嗎？

就算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不可避免地誕生了，也有可能不是勝出者，好比在持存了五個世紀以上（甚至更久）的封建主義中，歷史行動者無法設想一個新的生產關係；或者即使新的生產關係已經存在，也難以識別其差異性。原因很明顯：因為生產力發展較佳的變異一直沒有被選擇到。在脫穎而出之前，它就因為生產力的較佳發展來不及表現，未能及時在使用上超越競爭者，於是在殘酷的地緣政治競爭中遭到消滅；即便未被消滅，也只能適應地緣政治競爭的邏輯，使自身色彩隱沒在「普照的光」。當我們說「長期來看，促進生產力發展者會勝出」，「長期」難道不正是由無數個「短期」構成的嗎？若每一個短期都是生產力使用較佳（而生產力發展較劣）者勝出，「英國」就不會浮上檯面了。政治積累和階級鬥爭都是高度偶然的，而正如階級鬥爭導致的新生產關係可能使生產力提高或降低，政治積累的勝出者當然可能是生產力發展較佳者，也可能只是生產力使用較佳者。

這裡的質疑和 Brenner 對 Cohen 的質疑一樣。當後者強調生產力具有超歷史的自主性時，Brenner 要問：就算承認促進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係終能取代阻礙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係，其中的機制又是什麼？Elster 也是在這個意義上表示，

不能用生產力的自主性解釋特定生產關係的出現，而是要給出「反饋機制」，這才是對現象的闡明。我們的質疑其實就是這個問題的「複數本體論版本」或「國際版本」，為了捍衛 Cohen 的功能論，Carling 似乎並未注意到這個問題。如此一來，「競爭首要性命題」和「封建分裂命題」就像兩條平行線，始終存在一段難以彌合的差距。

把質疑化作正面的提問，我們也可以說：在生產力的使用奠基在其發展，生產力的發展被生產關係規定，而社會之間又持續互動（競爭）的前提下，什麼機制把競爭從「弱的意義」導向「強的意義」，從生產力的使用轉往生產力的發展，進而是生產關係的選擇？從另一面來說，什麼機制使新的生產關係（資本主義）趕上競爭的腳步，適時地發揮生產力，在封建主義時代再生產，最終侵蝕既有的生產關係？有人可能會說，這個機制就是軍事競爭——但這是套套邏輯。問題恰恰是：軍事競爭在此只是「使用」而非「發展」生產力的證明，憑什麼更具發展實力的生產關係就能夠獲勝？

總之，如何說明兩個「偶然」——階級鬥爭和地緣政治積累——能夠「負負得正」地解釋人類生產力發展的「必然」？以上是第一個問題，與資本主義的擴張或新生產關係的（被）選擇有關。如果沒有回答這個問題，Brenner 面臨的偶然性恐怕會加倍。

第二個問題是第一個問題的另一面：「封建分裂命題」表示的生產關係多樣性，固然是各地區階級鬥爭的結果，但在 Carling 筆下，階級鬥爭的過程並沒有明顯受到外在環境或其他地區影響，猶如實驗室中彼此相隔的「培養皿」。培養皿內部的生態史不會受到環境影響嗎？變異機制是純粹內在的嗎？發生在統治階級成員之間——跨地區／政治體／社會——的政治積累難道不會影響階級鬥爭嗎？

試想，在競爭中，如果統治階級觀察到最具立即效果的是生產力在政治積累上的表現，如軍備開發與戰事勝利，那麼封建主義「分裂」出其他生產關係的可能性就會降低，因為統治階級很可能會把剩餘持續投入政治積累，而這正是封建歐洲的主要情況（尤其是易北河以東）。這時，用來解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出現的「封建分裂命題」將會因為「競爭首要性命題」對歷史當下的行動者來說更具說服力而顯得相對蒼白，我們反倒更能說明封建主義的持存，而不是向資本主義的過渡，產生了跟第一個問題一樣的結果。

#### 四、從「競爭學習命題」到「不平衡與綜合發展」

無論如何，Carling 試圖在複數社會並立和互動（特別是競爭）的情況下，調和「人類理性」和「階級理性」，卻因為把地緣政治或國際競爭的行動者動機限於弱理性，再次使歷史的方向性歸於偶然。

這裡的難點在於怎麼給競爭時的理性定性。不可否認，相關行動者確實是從弱理性出發的，他們一開始只能考慮立即的利益，如生產力的使用（軍事上的勝利）。不過，弱理性會逐漸「跨出去」，因為競爭是一系列過程而非單一事件；在類似行為重覆之後，行動者就能從前例中學習，探詢立即利益背後的真正原因。這不是強理性，因為學習與探詢正好代表理性還不具有「洞悉」的能力，或者還不能把真正原因視為一個時代理所當然的知識。競爭的理性會變化，我們頂多能說它有「由弱轉強的傾向」，畢竟學習的成果不只未必正確，還可能一再出錯；此外，即便找到真正原因，最終還是要在競爭上勝出才算數。這是一種介於強和弱之間的理性。

複數本體論在此再度發揮作用。之所以能「從前例中學習」，是因為行動者處在多重社會並立和互動的環境中。所謂的「前例」不僅指歷史上過往的案例，還包括同一時空中其他社會的處境。

參考前例也許看起來很直觀，沒什麼重大意涵，但在單數社會的設定下，卻無所謂參考前例。前文批評 Cohen 的兩個命題時提到，人們不易察覺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發展的阻礙，遑論生產力使用得宜的情況。對 Cohen 和 Brenner 來說，這尤其是問題。因為在他們的模型中，生產關係的改變要麼是因為滿足生產力發展的需求、依靠了超歷史的人類理性，要麼是出於階級鬥爭、依靠了特定時空中的階級理性及其「非意圖後果」。無論何者，生產關係的改變都被設想為行動者在單一整體中——不管是人類歷史還是特定社會——的「一次性決定」，行動者不知道生產關係的改變能否朝有利生產力發展的方向前進；簡言之，沒有可茲參考的範例，後果當然很難不是「非意圖的」。

如果多重社會並立，各自發展且保持互動，不同社會的行動者之間就可以相互參考。這時，他們的理性屬於人類理性和階級理性之外的第三種理性：「團體理性」。不管團體或群體是否被統治階級的成員（或特定個人）所代表，這種理性都能逐漸縫合上述兩條平行線，縮短它們的差距。有了第三種理性，我們回顧一下問題的邏輯，就能列出三條「因果鏈」。

「封建分裂命題」指向各地區階級鬥爭帶來的生產關係多樣性，以社會「內在」性質的變與常為焦點；「競爭首要性命題」則要求這些生產關係轉化為生產力的使用，彼此競爭，因此是一種「由內至外」的表現，我們可以把這兩個命題分別寫成：

1. 各地區的階級鬥爭→促進生產力發展與否的多種生產關係。
2. 為生產力的發展設下限度的多種生產關係（承 1）→生產力的競爭性使用。

Carling 的意思是，長期競爭之後，最有利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係會勝出，而如前所述，我們要為此找到勝出的「複數本體論機制」或「國際機制」。這個機制就在於國際競爭的團體理性，也就是一種「由外至內」的吸收，可以寫成：

3. 生產力競爭性使用的勝敗（承 2）→特定地區的團體學習勝出者，影響階級鬥爭和生產關係動態（回到 1）。

競爭中的行動者受到其他社會影響，從團體理性出發，展開一連串學習、探詢和試錯。換句話說，選擇機制不只在客觀上起著「篩選」的作用——Carling 著眼於特定團體及其中生產關係「被篩選到」的後果——更在主觀上促使競爭者思考「如何被篩選到」並採取相應手段。

選擇機制有其指標，眾多競爭團體根據這個指標（因時代不同而不同，且通常表現為一個範圍）可大致分為三類：第一，被淘汰者，未能進入指標範圍；第二，滿足指標範圍，卻處於範圍邊緣；第三，不只滿足指標範圍，更處於核心或次核心。嚴格來說，所謂的勝出者僅指第三類。選擇機制設下的指標和勝出者的相應表現主宰了整個時代的問題，其他團體必須設法回答。競爭不會在特定時間點上因為有了篩選結果就停止，其他團體要存活，就必須設法向勝出者學習、不斷跟進。因此，因果鏈 3 不是整個過程的終點，而是必須扣回因果鏈 1 並作為因果鏈 2 的延伸與兩者持續形成迴圈，這樣才有所謂的「試錯」。學習和探詢會影響變異，變異的結果又將回到選擇的行列。

起先，基於經驗主義式的觀察，眾多團體往往只學習勝出者表面，嘗試「富國強兵」。在多個回合的試錯後，他們之中的某些團體開始探詢深層社會關係的作用，不斷改良。立基於團體理性的因果鏈 3，就是對前文第一個問題的回答。只有闡明了這個過程、提出這個機制，最能促進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係勝出才是可以想像的。回到人類理性和階級理性的對立。雖然一方面前者在任何時間點上都發揮著多多少少的力量，並且在後果上很難被違反，另一方面後者往往是一時的、局部的，在特定生產關係下比前者更具力量，但兩者確實可以調和。團體理性的引入讓階級鬥爭不像 Brenner 設想的那樣有如「黑盒子」，把地緣政治競爭和隨之而來的因果鏈 3 考量進來，或許能把「黑盒子」轉為「灰盒子」或「半透明盒子」；換句話說，「非意圖後果」還是存在，但非意圖的程度應可減弱。

非意圖的程度之所以無法去除、盒子之所以不會變「透明」，是因為對勝出方式的學習、探詢和試錯永遠不可能使自己成為勝出者的複製品。一方面，競爭中的非勝出者已經具有自己根深蒂固的社會性質；另一方面，學習本身無法做到百分之百的模仿，過程中往往有所添加或遺漏。把這兩個方面一起看，學習成果將變得不易辨識：保留社會既有性質，也包含習自勝出者的元素。這仍然是「非意圖後果」，但與 Brenner 的意義不完全一樣。就勝出者元素和既有社會性質融合的後果而言，仍然難以預期，但我們已經可以判斷融合之後的粗略樣貌，或至少列出幾種可能的後果，就像 Brenner 針對階級鬥爭的結果列出幾種可能的後果一樣（英、法、東歐），但他是純就個別地區的階級鬥爭而言，並沒有在一開始考慮各個地區之間的連結。

有了上述的「國際反饋機制」，前述第二個問題也有了答案：變異不是純粹內在的，變異發生的來源很可能是外在的。必須注意，我們不能把變異「來源」和「場所」搞混。向外學習和探詢真正提高生產力的方式，並不妨礙階級鬥爭內在於社會的事實，就算生產資料「壟斷／分離」的格局因為引入各種生產力或軍事力量而發生轉型（變異的來源），轉型仍然座落在某個地區（變異的場所）。不只如此，當封建國家的疆界因為政治積累而擴大、縮小或合併，當封建國家的數量在一定範圍內因為政治積累有所增減，當政治積累影響階級鬥爭——這些現象往往就是封建主義時代選擇機制發揮作用後的結果——我們還是可以區分出變異的來源與場所。

因果鏈 1 和 2 分別對應了「封建分裂命題」和「競爭首要性命題」，我們不妨將因果鏈 3 對應到「競爭學習命題」。仿效 Carling 的陳述方式，將這個命題放回封建歐洲的討論脈絡，其內容就是：

1. 兩個生產關係體系不論是否相同，其中一者將在競爭中學習勝出者。
2. 學習的目標會從生產力的使用、發展延伸到導致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係。

在演化理論方面，這個命題不是變異或選擇機制，而是「回譯機制」(back translation) (Hodgson and Knudsen 2010: 74, 81, 5)，也就是將後天於或外在於有機體的性狀從表現型導入基因型的程序。<sup>129</sup>

要把這三個因果鏈和命題統合起來，除了「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和（社會）演化理論之外，或許沒有其他更方便的途徑了：「競爭首要性命題」表現了「不平衡發展」的態勢，在引入「競爭學習命題」闡明生產力發展較高的生產關係在競爭中勝出之後，「封建分裂命題」可被視作是「綜合發展」的結果。

我們引入「競爭學習命題」是為了找出「競爭首要性命題」的國際機制，而 Carling 提出該命題則是為了說明資本主義的擴張。然而，「競爭學習命題」的作用力會波及「封建分裂命題」，因為我們很難想像學習勝出者的現象只存在於資本主義既存的情況下。只要國際競爭持續、只要階級鬥爭（「分裂」）持續，即便在前資本主義，學習勝出者的現象也會和 Carling 的兩個命題一樣普遍，所以「封建分裂命題」不可能不涉及學習對外在影響的學習，只要這些影響有助於存活與競爭。

Callinicos 曾提到歷史唯物論有三個次級理論：結構理論、轉型理論與方向性理論。我們在上一章最後一節文末也透過馬克思的文本提到，有必要納入「互動理論」作為第四個次級理論。Carling 在這裡提到的競爭、馬克思對分工的討

---

<sup>129</sup> 我並沒有說表現型能徹底改變、決定甚或取代基因型，基因型的內在性和根本性仍然不可動搖，但會受到外在影響。拉馬克的說法確實與此類似，但「後天遺傳理論」並不排除演化理論揭櫫的基因型和表現性，達爾文晚年甚至很看重變異的外在來源。真正將表現型從變異來源中排除的是維斯曼（August Weismann）(Hodgson and Knudsen 2010: 4)。

論和托洛茨基、Rosenberg 和我在這邊提到的學習與模仿等，應該都可以納入互動理論，在「不平衡與綜合發展」下和其他三個次級理論整合起來，成為更複雜的概念體系。舉例來說，中世紀末到現代早期領主和君王們的競爭、與商人們的合作與分工，各國興起重商主義戰事，學習先輩和對手的技術以利絕對主義國家或先進企業的建成等涉及國際關係和（商品）交換關係的現象，都是互動理論的考察對象。有別於階級關係的「垂直式」思考，各國之間、階級成員之間的「水平式」思考也很重要，在在影響著歷史進程。無論如何，**資本主義的起源不可能是純粹內在的。**

現在，「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在理論上有了更高程度的普遍性：至少能延伸至前資本主義（封建主義）過渡到資本主義的階段，而不限於資本主義既存下的擴張過程。如果連「起源」也受到外在影響，那就意味著起源與擴張的區分已經被編入「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總過程。因此，真正重要的不是資本主義在哪裡出現、從何時開始擴張，而是**資本主義的元素如何在歷史中被「調派」或「配置」**——由外至內進入特定社會，與社會內部既有性質相互作用後，反映於國際，隨後又再次影響社會內部——進而在某個時間和地區重新被組合為競爭中最適合生存的社會關係。這並不是說起源和擴張的區分不重要，歷史研究很難不涉及分期的問題，但這畢竟只是「指頭」而非「月亮」。順著指頭，我們應該去探討哪些元素在「不平衡與綜合發展」下匯聚在哪一個時空，這才是有待觀望的月亮。

## 第五節 絕對主義與「不平衡與綜合發展」

「競爭首要性命題」和「競爭學習命題」並沒有進一步說明競爭的形式。關於競爭的單位，我提出「團體理性」，Carling (1991: 62) 則提到歐洲的多個「地區」。可是這些團體或地區具體上表現成什麼呢？

回到本文第二章的表 1，Carling 為了解決 Brenner 和 Cohen 的對立，實際上處理的對象僅限於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也就是生產方式的第二種定義。要回答團體或地區之間競爭的形式，必須進入第三種定義，也就是考量再生產機制，暫時立基在單一生產關係。封建主義的主要再生產機制就像 Brenner 和政治馬克思主義者所說的，是（地緣）政治積累；用本文的話說，必須把政治結構和生產關係

一起看，並且區分出封建主義生產方式和絕對主義生產方式兩種。<sup>130</sup>

這兩種生產方式是封建主義生產關係的具體化，由於政治結構或（地緣）政治積累成果的差異，封建主義可以分為權力集中和分散兩種類型；在特定的地理範圍內（此即歐洲）持續競爭，團體的多寡和規模都會因此變化。正是政治結構劃定了社會邊界（儘管未必完全有效或持久），我們才能以某國或某地區來稱呼競爭團體，也才能說某國或地區的生產關係如何變化或「分裂」云云。

絕對主義就是權力集中的類型，在相對清晰地畫出團體邊界時，也畫出團體內部政治權力的階序。有別於此，封建主義——作為一種生產方式——仍然是權力分散的。由於絕對主義權力集中，是封建主義——作為一種生產關係——內部的政治結構變化，因此既保留在封建主義內部，又有突破封建主義的傾向。雖然 Anderson (1974: 18) 把絕對主義說成「重新佈署與整頓後的封建支配機器，目的是把農民群眾拖回他們傳統的社會位置」不無道理，但在絕對主義相對地統一了國內市場、集中了君主權力上，其實仍有助於資本的初生。

有了封建主義和絕對主義兩種生產方式的區分，我們就可以從「弱的意義」來回答本章一開始提出的難題：封建主義（生產關係）內部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由於在歷史上我們至少可以從 13 至 18 世紀來考察這個現象，涉及對象廣大而綿長，因此以下僅舉三個例子。

---

<sup>130</sup> 其實在封建主義生產關係中還有第三種生產方式，就是納貢制生產方式。這是帝國的生產方式。就像封建主義生產方式一樣，農民同樣必須上繳剩餘勞動，只不過是採取稅收的形式，而非地租。和絕對主義生產方式一樣，納貢制生產方式的政治結構也是集中而單一的。然而，兩者最大的不同在於納貢制生產方式往往是歐洲東方國家的歷史「起點」（帝國當然也有崩潰的時候，但往往在外族入侵和貴族分權後不久復歸統一，未能向歐洲一樣長期處於分裂狀態），絕對主義卻是歐洲國家試圖逃離戰亂、受到東方國家影響試圖走向大一統的折衷「目標」，規模沒有東方帝國大，因此能以若干數量共存於同一歐洲地理範圍。納貢制與封建主義的差別引起許多爭議 (Amin 1976: 13, Haldon 1993: 79, Wickham 2005: 60)。

對馬克思主義史學和政治來說，納貢制生產方式的提出相當重要。概念上，它取代了另一個惡名昭彰的術語：「亞細亞生產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或「東方專制主義」(Oriental Despotism)。第一，「納貢制」(tributary) 的說法避免地理位置的描述，僅僅就剝削方式而言，歐洲中心論 (Eurocentrism) 的色彩沒有那麼強；第二，與同時代的封建主義比起來，它的「政治積累」力量確實是相對進步的；第三，就馬克思的文本而言，亞細亞生產方式是原始共產主義到階級社會的過渡，而納貢制生產方式卻是一個社會的完成體。Wickham (1985) 原本同意納貢制和封建制是兩種不同的生產方式，在後來的著作中卻放棄這種區分。他和 Amin 一樣把封建主義視為納貢制生產方式的次類型，Berkay (1987) 則提出「普世封建主義」的概念，認為這是前資本主義下最常見的剝削方式。見 Blackledge (2006) 的回顧與討論。



## 一、英國與法國

在百年戰爭期間，英法均設法邁向絕對主義。兩國「高來高去」的過程構成了「不平衡發展」，Brenner 給了簡潔的敘述：

在 13 世紀英法的分歧演化中，最重要的問題……是英國封建「政治」統治階級在組織上的相對進步。讓英國地主成為其農民剩餘之優勢榨取者的，或許是他們較具優勢的自我組織——這個優勢是跟法國地主作為封建集權者和封建積累者相比而言的。在此脈絡下，我們要注意……「不平等發展」(unequal development)……的想法。事實上，在 12、13 世紀，英國封建階級的自我統治看起來之所以「超前」法國，不只是因為它的起點不同，還是因為它在這個領域中，建立在大陸已然達到的成就上，特別是諾曼第。接下來，當法國的中央集權於稍後加劇時，它其實是被英國發展所影響的，而且部分是對英國政治軍事壓力的回應。但是，法國的封建中央集權並沒有跟隨英國的模式，而是隨著時間與之徹底分歧。因此，在後發者能夠建立在封建階級組織於其他地方已然完成的優勢之意義上，封建積累機制的發展不只傾向「不平衡」(uneven)，也傾向「綜合」(combined) (Brenner 1985: 254-5)。

從威廉征服開始，諾曼公爵同時是英格蘭國王，等於和法王平起平坐。到了 13 世紀初，透過子女的聯姻，英格蘭佔有卡佩王朝近半土地。法王菲力二世治下，英國在法領土被奪回到只剩阿基坦地區 (Aquitaine)，成了英王約翰於 1215 年簽訂大憲章的國際政治脈絡。之後的英王仍設法奪回土地 (包括諾曼和安茹等地區)，而這個過程又與王室聯姻及繼承問題糾結。當法王絕嗣而法律不允許女性繼承時，與英王有血緣關係的男性就成為繼承人，1330 年親政的愛德華三世就是這樣的君王；他一旦登基，法國形同屬於英國。法國貴族無法接受，另立菲力六世為王，開啟瓦盧瓦王朝。由於愛德華三世的不滿和兩國在佛蘭德斯商業利益的糾紛，百年戰爭遂於 1337 年爆發。

在英王亨利五世與法王查理六世同於 1422 年巧合逝世前，英國雖然也在戰爭中失去過歐陸領土，但至少保有若干重要港口，而且亨利五世此前已經成為法國攝政王；反觀法國，不斷面臨地方主義的威脅，特別是勃根地公國 (Duchy of Burgundy) 的叛亂，後者更與英國結盟抗法。Anderson (1974: 117-8) 表示：「百

年戰爭迫使法國成為持久戰場，並帶來一連串破壞與荒涼，而英國在戰爭中大部分的優勢並非來自海權。這是英國封建君主制下，高度政治整合與團結的產物。直到戰爭結束前，它利用扈從關係和號召貴族的執行能力，都遠遠強過法國君主制，而後者已被布列塔尼或勃根地懷有二心的封臣搞到心力交瘁，由於未能及早剷除英國在奎恩（Guyenne）的封土而被削弱。如此一來，英國貴族的忠誠又在接連幾位尚武君王領導的成功對外戰事中強固。直到查理七世，法國的封建政體才在新的財政與軍事基礎上自我重整，現在勢頭對調了。勃根地聯盟瓦解，英國力量繼而相對快速地被武裝日益強大的法國軍隊所驅逐。」在戰爭結束前的二十年，法國重新奪回巴黎，香檳和諾曼等地區接連收復；到 1453 年為止，只剩加萊地區仍為英國占領。

在百年戰爭開始，英法統治關係和君權集中的程度是「不平衡發展」的；在過程中，法國一方面設法弭平貴族叛亂、壓制教會，另一方面向英國的政治組織看齊，迎頭趕上。雖然兩國在戰後形成「海峽兩岸一邊一國」的情況，統治關係在法國「綜合發展」的結果卻與英國逐步開展出的「議會式」絕對主義國家完全不同。

在查理七世治下，法國開始有了正規軍和穩定的稅收。從路易十一開始，安茹地區被納入版圖，1477 年勃根地公國也被擊敗。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則藉由聯姻的方式併吞布列塔尼，法國所有雄據一方的諸侯終於權歸君王。不過，這些針對疆域而來的政治積累並不代表法國真正的統一或「現代化」，用政治馬克思主義 (Lacher 2002: 159) 的話說（見第六章），只能算是從「零碎化個人支配」(parcellized personal domination) 到「普遍化個人統治」(generalized personal dominion) 的過程，而這個過程並不順利。除了民族市場尚不存在、各地交通不便、各省高等法院仍執掌大權外，三級會議反而被廢除和停開——這與君權集中正好相反，因為會議的召開往往是君王要求貴族納稅的機會，進而是君權彰顯的時刻，會議的廢除和停開正好意味著地方政治力量的持存與相對自由。

只有自波旁王朝伊始，法國才因連續幾任君王及大臣——亨利四世與敘利、路易十三與黎賀留、路易十四與寇爾貝——建立了絕對主義國家，一種真正君主集權的統治關係，即「普遍化個人統治」。17 世紀三十年戰爭後，西班牙的「黃金時代」逝去，法國成為歐陸第一強權，儘管農民和資產階級的處境每況愈下，直到 18 世紀末大革命爆發。

## 二、德意志地區與中東歐

向東前進，我們會發現，東歐政治結構的動態由於「蠻族」入侵造成的時間差，也可以在「不平衡與綜合發展」下思考。在他們部分定居和退出東歐之後，英法絕對主義國家已經浮現。為了獲取更多土地，西歐君王與地主東向進發，封建主義才真正被引入東歐，因此許多土地是貴族服役（開墾）所獲得的。

相較於西歐版本，這種旨在擴張土地的「殖民性封建主義」(Ganshof 2016: 83-4) 反而使個別地主數量增加、權力高漲，以至於當他們意識到必須效法西歐同行強化王權——如 12 世紀下半葉，為了模仿法國，霍亨斯陶芬家族將絕對君主的概念引入德意志地區——時，既因為「先天不良」（遲來的封建主義）又因為「後天不足」（受到西歐同行們無盡的戰事所影響），「多重封臣關係能夠暢行無阻地走上破壞性的道路」(ibid.: 131-2)，絕對主義國家的君主集權很晚才在東歐發生。<sup>131</sup>

不過一旦發生，便能參考西歐的狀況快速發展，如普魯士和俄羅斯；當然，也有一些地區在周圍絕對主義國家快速建成的環境下，因錯失良機而鑄下悲慘後果，無法集中君權和領土，如波蘭。整體而言，中東歐主權極為零散、破碎，在與西歐絕對主義國家的政治積累構成「不平衡發展」時，君主權力在建立時和地主權力「綜合發展」的結果各地都不相同。

### （一）波蘭

波蘭君主從來沒有成功統治過貴族（「施拉赫塔」，*szlachta*）。他們若非「不在地」，必須仰賴貴族治理、獲取剩餘和換得子女的繼承權，就是軍事及統治力量確實遜於貴族。在 16 世紀前，雖然君主多出自亞蓋羅王朝——父系源於 14 世紀後期的立陶宛大公亞蓋羅，母系源於當時匈牙利國王安茹的路易之女，皆非波蘭本地——但因貴族力量大，往往是選舉產生的。

---

<sup>131</sup> 在從「封土—封臣關係」與英法兩國相比時，Ganshof (2016: 205) 就指出，君王在德意志地區的土地保留非常不易，它們最終都成了地方諸侯國的地盤，再分封的情況尤其普遍，而「近現代的德意志國家——特別是其中的主要國家奧地利、巴伐利亞、普魯士等——就是由這些大諸侯國發展而來的」。

自 1569 年波蘭王國和立陶宛大公國正式組成聯邦（以波蘭共和國為主體）以來，政治積累的能力更強大，巴托雷親王更於 1578 年大敗過沙皇伊凡四世，直到 17 世紀，波蘭仍是東歐強權。此外，議會權力也很高漲：一方面，貴族往往將封地轉為自有土地（這些地區向來缺乏垂直面向上多層級的封建鏈）(Anderson 1974: 222)，他們能更充分而殘酷地剝削農民，農奴制遂得延長；另一方面，貴族各自為政，擁有「自由否決權」(*liberum veto*)，共禦君王，落實 1573 年亨利王條約 (King Henry's Articles) 「君王政而不治」(*The King reigns but does not govern; Rex regnat et non gubernat*) 的原則。他們還以波羅的海為基礎，向西歐輸出穀物，16 世紀後半期的麥類出口量更翻了一番。

基於這些「好運」，波蘭貴族缺乏建立絕對主義國家的迫切感與能力。當周邊地區的絕對主義國家（普魯士、奧地利帝國和俄羅斯帝國）在 17 世紀漸漸出現，波蘭雖然仍有國際地位，卻已不得不對其強鄰霍亨佐倫王朝禮讓三分（為了暫時與之共同抵禦另一強鄰俄羅斯），最終把東普魯士讓給布蘭登堡選帝侯，於 1660 年放棄了對普魯士的宗主權。

除了前述的政經情況，波蘭立陶宛聯邦的日漸衰弱，還必須放在一連串戰事與起義中來理解：第一，1648 年赫梅利尼茨基 (Bohdan Khmelnytsky) 率領哥薩克及農民起義，最終烏克蘭脫離波蘭，後又歸於俄羅斯，這場起義可說開啟了波蘭的「大洪水」(*Deluge; Potop*) 時代；第二，以此為背景，在 1654 到 1667 年的十三年波俄戰爭期間，俄羅斯持續擴大領土；第三，波蘭在第二次北方戰爭 (1655-61) 期間被瑞典入侵，三分之一人口喪失。當地緣政治積累的邏輯仍猛烈進行時，未能及時建立絕對主義國家的波蘭，下場就是在 18 世紀（首次）被入侵和瓜分。<sup>132</sup>

## （二）德意志地區的普魯士

眾所皆知，普魯士原本只是德意志地區的眾多邦國之一。在競爭首要性命題揭櫫的複數本體論上，這個大量政治實體匯聚的地區亦可被視為眾多「培養皿」在歐洲**最密集之處**。因此，除了英法和東西歐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我們也

---

<sup>132</sup> 波蘭史入門可見 Jerzy Lukowski and Hubert Zawadzki (2011)，我在這邊的簡介主要參考他們著作的中譯本。

可以在德意志地區發現「不平衡與綜合發展」。<sup>133</sup>

這個地區的西部向來充斥大量城市，它們的活力（透過商品交換所獲得的豐厚利潤）使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和各地君王與地主雖然覬覦其稅收，卻無法直接加以打擊。這裡的獨立城市在 16 世紀義大利的城市國家開始沒落後，便成為一股強大力量，由於多元零散、各自為政、同盟關係時常變化，絕對主義發展有限。在布蘭登堡、巴伐利亞和薩克森等地，傳統地主的力量相對強大。不過，其中只有布蘭登堡的發展最特別。

17 世紀，波蘭和普魯士的力量大致呈現此消彼長的「剪刀差」，普魯士在巴伐利亞和薩克森相繼展現實力之後，真正稱霸德意志，雖然在疆界上並未統一這個地區。

普魯士與這兩個東部地區相當不同。普魯士貴族（容克，*Junker*）的層級分化程度低，不易在地產規模和統領的騎士多寡上分出大小，唯一的大地主只有君王。這些地主直接與農民勞動過程有接觸，沒有「不在地主」。在這個基礎上，一方面他們受到穀物出口的影響，能從市場角度經營農場（同時獨立於農村的市場也相對少見）；另一方面他們堅持保留農奴制，農民受到殘酷的剝削。此外，地租的繳交較少透過中介；直到菲特列大帝（菲特列二世）之前，幾乎沒有實行包稅制度，這當然與整個貴族階級相對平等有關，這種性質亦可見於相對非人格化、強調團結精神的國家機構。

從 1525 年的宗教改革開始，普魯士作為一個公國出現（臣服於名義上的波蘭王國）；到了 17 世紀三十年戰爭後，普魯士已經擁有自己的軍隊；第二次北方戰爭波蘭重挫，布蘭登堡選帝侯菲特列威廉於 1660 年取消波蘭宗主權，1675 年大敗瑞典之後，更成為「大選帝侯」，著手建立君權集中的各項制度。其子菲特

---

<sup>133</sup> 跟前文一樣，德意志地區的介紹我也參考了 Perry Anderson 的研究。這裡應該說一下《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的理論框架：「典型地說，封建主義內部的跨國互動總是首先發生在政治而非經濟的層面。這恰恰因為它是建立在外於經濟的強制——征服而非商貿才是它首要的擴張形式——的生產方式。歐洲封建主義的**不平衡發展**，在大陸上個別區域之間的武力對比而非貿易對比，有著最具特色且最直接的表達。換句話說，東西部國家的接壤主要是軍事性的。」在東歐方面，「封建主義的**不平衡發展**迫使它們〔東歐絕對主義國家〕在達到邁向資本主義的經濟轉型的可比擬階段之前，符合西部的國家結構。」(Anderson 1974: 197, 202 粗體為筆者所加) 對 Anderson 來說，「普魯士呈現了歐洲**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典型案例。最終，從波羅的海最小最落後的封建領土產生了歐陸最大的工業化資本主義國家。」(ibid.: 236 粗體為作者所加)

列一世參與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對法戰爭（即西班牙王位繼承戰），於 1701 年成為「（在）普魯士的國王」，統領東普魯士（西普魯士仍為波蘭領土）(Ingrao 1979: 39-40)。

雖然神聖羅馬帝國除了皇帝兼任的波希米亞國王之外，不得有其他國王，但實質上普魯士已經躍升為王國。兩代之後，菲特列大帝往統一整個德意志地區邁向一大步。1763 年，他在全歐首創男性義務初等教育，並在一定程度上保護農民以增強兵源和財源，設立國家銀行。最後，在 1772 年與俄國斯、奧地利共同瓜分了波蘭，成功連通東西普魯士。以奧地利為各邦共同敵人，1785 年普魯士透過「王公聯盟」成功整合了北德意志。

### （三）俄羅斯

現在把俄國當作東歐最後一個討論對象。1480 年，金帳汗國被推翻之後，伊凡三世成為俄羅斯的開創者，統一了諾夫哥羅德在內的許多公國，並且制定法典，強化莫斯科公國的農奴制，農奴只有在每年 11 月才能離開土地，並限制在公國內移動。繼任者進一步整合其他封建領地之後，1547 年伊凡四世自封為沙皇。他不只成立了禁衛軍，更以此大舉掃除歷來掣肘君權的貴族，將俄羅斯正式帶往絕對主義；在對外統治關係上，重挫了克里米亞汗國（鄂圖曼帝國東擴的臣屬國），也首次將毛瑟槍射擊編入常備軍，以地道和重砲攻擊要塞。伊凡四世更削弱大貴族波亞爾（*Boyar*）議會杜馬（*Duma*），賦予小貴族決定地租徵收標準的權力。

然而，1558 年開始的利沃尼亞戰爭打擊了俄羅斯的力量。波蘭立陶宛聯邦最終獲得這塊土地，瑞典也獲得愛沙尼亞一帶；再加上禁衛軍肆虐、過分壓制農民，伊凡四世於 1584 年逝世時，俄羅斯幾乎退出歐洲政治。17 世紀前後，戈東諾夫向瑞典開戰，強化對波羅的海的控制，禁止農奴移動，導致許多農村起義。

在「空位期」君權削弱後，羅曼諾夫王朝於 1613 年建立，傾向為大貴族服務，但整個貴族階級內部的競爭卻非常激烈。一般來說，大貴族有能力限制逃亡農奴的追捕期限，小貴族則主張取消期限；三十年戰爭期間，軍事現代化的需求越來越高，小貴族不願配合，大貴族則致力引入外國軍官，建立常備軍。1648 年阿列克謝制定的法典，通過了小貴族取消追捕期限的要求，農奴此後完全被束

縛於土地上；可以想見，農奴起義的規模更大了，1670 年的拉辛起義震撼了整個貴族階級，也使大小貴族再次團結。沙皇費爾多最終於 1682 年燒毀紀錄門第譜系的古書，貴族得以重整，絕對主義國家更加鞏固。

在此基礎上，彼得大帝引入了西歐宮廷職銜，從此貴族不分大小，一律以伯爵或男爵之類的頭銜稱之，貴族議會則從杜馬改為元老院，所有貴族也都必須在軍隊或行政機構服役。大北方戰爭（1700-1721）之後，俄羅斯完全佔領了波羅的海東岸，取得了西向的制海權，雖然敗給鄂圖曼帝國，卻消滅了威脅俄羅斯烏克蘭地區已久的哥薩克人札波羅切要塞。到該世紀末凱薩琳大帝統治時，俄羅斯已經因為併吞了克里米亞汗國、使鄂圖曼帝國邊界後撤，且在把農奴制擴張到烏克蘭地區時又加重了地租，成為東歐最強勢的絕對主義國家。普加喬夫起義後，凱薩琳大帝在 1785 頒布的貴族憲章將農奴送入了真正的末日：從此以後，小貴族保有其領地中的完全司法權，這項權力來自於中央的授予。

絕對主義至此已臻至巔峰。在對外關係上，除了打垮拿破崙的軍隊外，19 世紀的俄羅斯更接連鎮壓了波蘭起義（1830）和匈牙利革命（1849），儼然是歐洲首屈一指的保守力量：有著「最落後」且長久的農奴制以及「最先進」（也就是高度中央集權）的絕對主義國家。不過，也是在這個時候，俄羅斯遭遇了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打擊。1854-56 年的克里米亞戰爭失敗後，俄羅斯終於廢除農奴制。<sup>134</sup>

### 三、重商主義競爭

封建歐洲不是沒有貿易活動，甚至可以說非常興盛。然而，商品交換和城市的興衰卻非常倚賴領主、君主和國家的保護和壓制。用第二章的圖 2 來說，交換關係若要與生產關係連結，必須以統治關係為中介，與之形成一個政治結構。雖然如此，長期來看，商人對統治者的依賴也可能反過來讓統治者也依賴商人，尤其是當統治者意識到商品交換關係有助於（地緣）政治積累的時候。

---

<sup>134</sup> 俄羅斯史入門可參考 Nicholas Riasanovsky and Mark Steinberg (1969) 的通史。這邊提到的拉辛起義和普加喬夫起義都是重大事件，Paul Avrich (1976) 的小書簡要敘述了包括它們在內 17 到 19 世紀的四大起義。

繼威尼斯和熱那亞兩種分別為「保護成本內部化」和「保護成本外部化」(Steensgaard 1973; Arrighi 1994:148-62) 的體制興盛之後，荷蘭超越了它們，從 17 世紀開始，以印度洋和東南亞的海外殖民地和聯合東印度公司突破了地中海的狹小領土與海洋（這是威尼斯的瓶頸），實行「保護成本內部化」（這是熱那亞的瓶頸），儘管最終因為「生產成本」未能像英國那樣「內部化」(Arrighi 1994: 181-2)，卻帶頭開啟了一連串的重商主義競爭。

對於「保護成本內部化」，即一邊擴張海外貿易、一邊以自家軍事力量加以協助的做法，Arrighi (1994: 161) 評論道：

這種發展給荷蘭的積累體制帶來了不利影響。就說一事：把越來越多歐洲國家拖進荷蘭發展道路的「示範作用」(demonstration effect) 因為這種發展而起了一點變化。如同之前的威尼斯，在歐洲的脈絡下，荷蘭告訴大家權力的資本技術 (capitalist techniques of power) 可以產出可觀結果。在 17 世紀下半葉，東印度公司取得的驚人成功，比葡萄牙在過去 150 年的戮力作為強大太多，這代表在適合的情況下，權力的資本技術可以在領土擴張方面擊敗疆界技術 (territorialist techniques) 的。如果單方面集中追求利潤就能使荷蘭「憑空」——靠一個還在為自身主權鬥爭的政府所授予的特許狀，以及阿姆斯特丹金融市場的公開「信用額度」——創造一個強大的迷你帝國，那麼還有什麼阻止得了疆界型組織藉由把自己變身為資本家來建立更強大的帝國？

這裡的「疆界型組織」指的，就是此時已日趨穩固的英法絕對主義國家。它們為了政治積累，必須跟隨荷蘭的腳步，採行各種「權力的資本技術」——當然，從行動者的主觀角度來看，這些國家不希望走向資本主義，它們只是要追趕荷蘭、設法達標。在競爭中，他們不斷開發且使用日後成為資本主義必要元素的各種手段。

我們從 17 世紀中期開始的幾場英荷戰爭（如 1652-54 年第一次和 1665-67 年第二次英荷戰爭）和主要由法國引起的戰爭（遺產戰爭、同盟戰爭等）都可以看到，關稅已經成為國家或君王帶領的（地緣）政治積累武器。這是一種英法兩



國與荷蘭處於「不平衡發展」格局下「綜合發展」的結果，這兩個絕對主義國家已經不得不設法趕上海外殖民的腳步，好比英國《航海法案》中「施荷長技以治荷」的政策路線 (Brenner 2003: 626-7)。英法兩國也紛紛設立東印度公司，相互競爭。荷蘭最終在 17 世紀末的海洋霸權地位遭到驅逐，而 18 世紀最後則見證了英法兩國在印度次大陸上的勢力總對決：在三場卡納提克戰爭後 (Davies 1957: 558-65)，法國落敗，英國正式殖民印度。

#### 四、「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歷史延伸

現在我們分幾個部分統整這一章的重點，把焦點再次放回「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邏輯。

##### (一) 從「時間軸」到「時機點」

從封建歐洲晚期西歐與東歐，以及東歐內部多個政治實體構成的「力場」或提出的「問題」——終結戰亂（消極）／邁向大一統（積極）——來看，幾乎只有法國（和本文並未著墨太多的西班牙）成功或近乎給出了「答案」。和法國一樣，英國被捲入這樣的力場，可是因為新生產關係的出現和議會權力的高漲，它的絕對主義不是歐陸典型的，跟「東方」們（法國、東歐和東方帝國）的歷史進程截然不同。

面對終結戰亂／邁向大一統的提問，英國不是沒有給出答案，畢竟「不及格的考生」顯然是主權持續碎裂、出現再版農奴制的東歐諸邦；但同樣的，我們也不能說英國「考出好成績」，畢竟根據提問，只有收編貴族、強勢參與地緣政治積累的絕對主義國家，如法國（和西班牙），才是終結戰亂／大一統的贏家。

這種無處安置的狀況，意味著英國的性質已經不能用時代的提問來判斷，適當的說法毋寧是：它發生了歷史的「跳躍」（注意，跳躍可能失敗）。農業資本主義出現和 17 世紀資產階級革命（就確立議會權力而言）的發生，代表階級鬥爭和統治階級地緣政治積累的雙重偶然性，配合歐洲分工體系的邊陲位置，使英國「非意圖地」超越了時代的提問、掌握了進入資本主義的先機。

反觀法國，雖然成功步上了時代軌道，但眾多「培養皿」中只要有一個——英國——發生變異，且稍後在一連串的政治積累中活了下來，即成功再生產，那麼根據「競爭首要性命題」，變異成果將持續擴大，影響封建歐洲這座實驗室的

整體生態。18 世紀末的法國一直到 20 世紀初崩潰的土耳其（鄂圖曼帝國），只能設法適應時代的新問題：以剝削剩餘價值為基礎進行資本積累。力場的中心從東方移至西方。Amin (1980: 88) 這段話從歷史時機的角度中肯地概括了上述進程：

當納貢模式在歐洲（透過絕對君主）完成其形式時，一切都太晚了：新的階級矛盾（農業資本主義與製造業資本主義）已經更上一層樓，以至於國家無法以任何實質方式阻止其發展。

不同於「資本主義在英國出現」等 Brenner 和 Carling 的提法，Amin 的敘述方式既比較又連結了英法兩國。法國成為「西歐版本」納貢制國家的代價，就是走進死胡同：這樣一個先進的絕對主義國家，不允許資本主義長期共存。資本不易進入鄉村，因為不管小農們多麼貧困，他們終究獨立握有自身地產。如此一來，資本只能依附城市的新興商人。在與英荷長期的海內外征戰、與西班牙爭霸歐陸的「不平衡發展」中，嚴苛的稅收使農民根據其目標，去推動力量亟待伸張的資產階級，共同展開一場激烈的革命——這正是「綜合發展」低落的代價。

至於東歐，主權零碎和再版農奴制延遲了絕對主義的到來。有趣的是，這種落後性反而使德意志地區在普魯士的帶領（或併吞）下，於 19 世紀初面對拿破崙戰爭的衝擊時，不得不慎思現代化的安全方案，畢竟時代的提問已經不是封建主義式的了，何況前頭還有一個吃過大虧的法國。與西歐的「不平衡發展」促成了「自上而下的革命」，「綜合發展」的成果是先後完成了領土統一和資本主義過渡。憑著貴族的小心行事，新生產關係巧妙地與舊生產關係融為一體，後果可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看到。最終，德意志第一帝國的成就超過了曾經的優等生法國，更和美國一道，在 20 世紀讓幾百年前已開啟資本主義典範的英國顯得老化、衰退。

這裡的討論雖然涉及每一個國家的歷史進程，但因為不是在「單數本體論」而是在「複數本體論」上考察，所以這些歷史進程的個別「時間軸」在不斷受到外在條件的作用下，和內在條件的運動混成為「時機點」；我們應該去問某個單位相對於其他單位是「先進」還是「落後」，也可以從它們是否「回答」了時代

提出的「問題」來判斷它們是落後、符合還是超前於時代，這是一種經由複數本體論折射出來的史觀。在封建主義生產關係下，這樣的本體論具體表現為絕對主義的國際競爭框架。

當資本主義在絕對主義國際競爭框架下勝出，強勢主導社會發展的行動者（通常是剝削者兼統治階級）曾經心心念念的政治組織——帝國或絕對主義國家——在實現的同時，也瞬間陳舊了；它們形同被鎖進另一個時空，而歷史不再按照該時空的邏輯發展。曾經以建立絕對主義為目標的國際體系，現在反而被資本主義的幽靈附身，成了政治馬克思主義者們所說的「封建遺緒」，在 20 世紀之交助長了帝國主義，並作為現今學者們熟悉的「現代國家體系」協助資本積累，最後在 21 世紀初的後冷戰時期吸引 Justin Rosenberg 和 Alex Callinicos 的目光，使他們提出「國際」問題。

## （二）差異化整體的歷史延伸

如果經由複數本體論或「國際」的折射，個別國家的歷史進程從「時間軸」轉化為「時機點」，那麼這些國家也就構成第五章所提到的「差異化整體」。在其中，各個差異部分具有如同世界體系分析所說的「中心」、「半邊陲」和「邊陲」關係，但一方面佔據這些位置的行動者會改變，另一方面這樣的區分不只是「國際分工」這種外在條件所造成，還是每一個單位內外條件循環互動後緊跟時代的程度差異。

第五章曾提到，Neil Davidson 在分析 20 世紀國家面對資本主義擴張時的應對方式和結果時，將它們分為三類：第一，完成趕超任務、追上英國工業化腳步者，如美國和德國；第二，完全無法應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進而完全淪為附庸的落後國家，如非洲諸國和部分拉丁美洲國家；第三，陷入深刻社會危機卻還能動用遭到削弱的中央權威完成歷史趕超之任務者，如中、俄、土。這三類國家共處於資本主義時代，藉由資本主義的「兩種趨勢」——經濟一體化（藉由世界分工、生產力的輸出與引入等發生關聯）和國家之間對立（有了先進和落後的區別）——構成一個「差異化整體」。

在封建歐洲晚期的絕對主義競爭框架下，我們可以看到上述國家的「前資本主義延伸」。透過激烈的政治積累相互競爭與學習，各國保持「不平衡發展」的

關係，並且在各自內部「綜合發展」。結果同樣有三類國家出現：第一，是將地方權力集中於君王的法國，可謂完成了封建主義時代的絕對主義命題，儘管規模無法跟東方帝國相比；第二，設法邁向絕對主義而封建主義又晚起步的東歐，主權持續碎裂、分散；第三，與歐陸有海峽之隔，同屬「絕對主義」但貴族卻異常團結且力量強大的英國。受到政治積累不同程度的影響，貿易活動的表現也可以分為三類：第一，商業早熟而活躍的義大利和東歐；第二，商業晚熟且不算活躍的法國；第三，積極學習商業活躍國的英國。

由此可見，「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可以從資本主義內部和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的相遇延伸至封建主義內部。研究者在資本主義時代能清晰考察其運作，但它在封建主義時代也有不同的內容，「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普世性正好在於它能夠被歷史化。針對第七章幾位論者對 Rosenberg 的批評，列寧 (Lenin 1908: 137) 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中的話或許是很好的回應：

辯證……包含了相對主義 (relativism)、否定和懷疑論的元素，但並不能化約為 (reducible to) 相對主義。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義辯證肯定包含了相對主義，但不能化約為相對主義，這意思是：它承認我們所有知識的相對性，但並不是在否定客觀真理的意義上承認的，而是在我們知識接近該真理的極限是受歷史限定的意義上承認的。

使「不平衡與綜合發展」歷史化就是看到它「受歷史限定」的意義：在資本主義時代，由於發生在生產關係之間，這個意義是強的，來源是資本積累，相對容易被研究者發現；在前資本主義時代（封建主義），意義則是弱的，發生在生產關係內部，其來源是政治積累，需要我們去考掘。既然受歷史限定，便有一個普遍的抽象形式存在，不能「否定（這個）客觀真理」、把它「化約為相對主義」。

這邊的道理跟本文第三章把建築隱喻延伸到封建主義一樣：歷史化或「相對主義」不是抽象性和普世性的取消，而是在面臨具體問題時，重新組合抽象性和普世性的結果。「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和建築隱喻都可以延伸到封建主義，只不過型態會略為改變。

## 第九章 結語

資本主義的起源是綿延好幾個世紀的長時段過程，同時，也發生在封建主義生產關係內部的數個地區。因此，馬克思才會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提出了看似模稜兩可的段落：

勞動者的奴役狀態是產生雇傭工人和資本家的發展過程的起點。這一發展過程就是這種奴役狀態的形式變換，就是封建剝削轉化為資本主義剝削。要瞭解這一過程的經過，不必追溯太遠。雖然在 14 和 15 世紀，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經稀疏地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最初萌芽，但是資本主義時代是從 16 世紀才開始的。在這個時代來到的地方，農奴制早已廢除，中世紀的頂點——主權城市也早已衰落 (Marx 2003b: 823)。

這個段落似乎同時成為解釋資本主義起源時兩種對立途徑的依據：一方面，資本主義出現在 16 世紀的英國農村，因為新生產關係在那邊真正確立，這是 Dobb 的階級鬥爭途徑所不斷強調的；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則是在更早的義大利城市出現，因為連接東方和西歐的貿易據點在那邊最早熟、最蓬勃，這是 Sweezy 以降強調貿易作為封建主義「溶解劑」之途徑的要點。

顯然馬克思用了「資本主義生產」和「資本主義時代」兩個不同用語。在本文中，「時代」指的是特定生產關係「占支配地位」的社會形構，資本主義時代就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占支配地位」的社會形構，或者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第四種定義，見第三章）。這是一種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已經能夠再生產的歷史時期，用 Carling 的話說，通過了「競爭首要性命題」的考驗。至於「生產」，則至少有兩種意思。除了人類為了存活而背負的普世任務外，可以指特定的（社會）生產關係，如資本主義，也可以指與生產相關的社會關係，如為資本主義的出現提供條件或（本身雖然不是資本主義卻）有助於資本主義再生產的外包體制和種植園奴隸制等。

不管 14 世紀的義大利是否已經出現嚴格意義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即直接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的分離（並且非常普遍），又或資本僅止於與生產發生關係而

未深入並改變生產關係，城市國家都沒有通過「競爭首要性命題」的考驗，它們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既早熟也早夭。回到資本主義起源的爭論，若起源僅指「苗頭」，那麼義大利確實是最早出現資本主義的地方。可是，當起源不只有苗頭的意思，還包括了「發芽」——畢竟若沒有經歷全球擴張，使人類歷史籠罩其中，我們就不會討論資本主義起源的問題——那麼資本主義最早出現的地方應該是 16 世紀的英國。

由此看來，僅憑貿易勃興與否斷定資本主義的起源固然不足，單單依靠階級鬥爭改變生產關係來說明資本主義的起源同樣偏頗。就算英國早已出現 Brenner 強調的農業資本主義，沒有商人資本的注入，資本主義時代仍然不會到來，而商人資本的系譜在歐洲至少要追溯到義大利城市國家；在這些地區中，根據「封建分裂命題」，總會有幾處出現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可惜的是，就算如此，它們沒能撐過絕對主義的漫長風暴，只能留下幾種政商複合形式，在未來被荷蘭、法國與英國相繼模仿和超越。

總的來說，資本主義起源必須一方面在複數本體論上來談，另一方面在一個總體過程中來談。它是由「真正辯證的總體所構成；其中，一個國家資本主義發展的停滯碎片將構成下一個國家進一步發展的元素。」(Brandon 2007: 142) 不同地區、不同進程的各個國家，在不同時期都有不同程度的輝煌表現，它們彼此分開又相互連結，每一個國家每一次表現都會影響另一個國家下一次表現，「經過一系列實驗，最終在這兩個國家〔荷蘭與英國〕有了成功的結局 (*dénouement*) 才是設想資本主義起源的適當方式」(Heller 2011: 52)，而非直接「擇一」代表資本主義。<sup>135</sup> 要避免這種情況，在歷史理論上首先要設想複數社會的並列、互動

---

<sup>135</sup> 在討論原始積累時，馬克思 (Marx 2003b: 860-1) 確實把資本主義最終的出現 (亦即通過「競爭首要性命題」) 視為一連串跨國／社會現象的結果。這些現象不只限於階級鬥爭和生產領域，還包括「美洲金銀產地的發現，土著居民的被剷滅、被奴役和被埋葬於礦井，對東印度開始進行的征服和掠奪，非洲變成商業性地獵獲黑人的場所——這一切標誌著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曙光。……接踵而來的是歐洲各國以地球為戰場而進行的商業戰爭。」從前文可知，「商業戰爭」不只用來描述商業如戰爭般殘酷的事實，更能詮釋為商業對政治積累的助長：重商主義。他接著說，「原始積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時間順序特別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國和英國。在英國，這些因素在 17 世紀末系統地綜合為殖民制度、國債制度、現代稅收制度和保護關稅制度。這些方法一部分是最殘酷的暴力為基礎，例如殖民制度就是這樣。」本文目前較少提到國家對社會施加的暴力，但就像馬克思說的，「所有這些方法都利用國家權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組織的社會暴力，來大力促進從封建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轉化過程，縮短過渡時間。暴力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種經濟力。」(粗體字為筆者所

與各自的內在變化。

雖然如此，在這「一系列實驗」中的國家，未必每一個都能代表真正影響我們今日生活的資本主義。經過「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機制，只有少數在新生產關係出現之後還能再生產。從時代的早熟者、落後者、先進者和超前者的區分中可以看到，「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結果符合「安納卡列妮娜原則」，也就是「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All happy families are alike; each unhappy family is unhappy in its own way.) 換句話說，同一機制在催生出千載難逢的成功案例時，也造就了各式各樣的失敗案例。

在資本主義起源的問題上，「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機制有幾個步驟，我們把它們條列如下：

1. 各個政治體的統治者有意識地在「弱」的意義（即生產力的軍事使用）上彼此競爭（國際層次）；
2. 在一次次集中權力、削弱中間階級（這是納貢制生產方式的政治結構特徵）並動用商業資本進行政治積累的嘗試下，各個地區產生了截然不同的結果（國際層次對國內層次的作用，如絕對主義的出現）；
3. 這些結果又為各地同時且持續發生的階級鬥爭，創造了截然不同的條件（國內層次），Brenner 的英、法和東歐三地農業資本主義、小農經濟和再版農奴制就是這些結果；
4. 持續發生的階級鬥爭及其結果反作用在封建國家，進而是地緣政治積累（國際層次），我們看到了這些地方在國際競爭上的表現。
5. 最終，隨著英國農業資本主義的出現和發展，昔日被用來進行政治積累的商業資本也鑲嵌進生產關係，繼而踏出國家的疆域，在國際層次上漸漸起到整合之效（世界層次）。

總之，在各個地區「內部」與「之間」無數回合的循環互動中，特定生產關係會被非意圖地選擇出來。作為把國際的政治積累、貿易活動和國內以生產關係

為基礎的階級鬥爭「兜起來」的總機制或機制的匯聚，「不平衡與綜合發展」使競爭從「弱的意義」逐漸導向「強的意義」、從生產力的「使用」轉往「發展」，進而是新生產關係的選擇和舊生產關係的淘汰。藉由這個機制，階級鬥爭和政治積累的雙重偶然性被「內化」(internalized)進一個追求必然性的理論 (Cooper 2013)。這裡的必然性有兩個意思：第一，在階級鬥爭和政治積累的過程與結果方面，不確定性是「必然的」；第二，對於這些過程與結果，我們「必然」能夠加以分類（如早熟者、遲來者和落後者等），一旦這麼做，「資本主義必然出現」或 Carling 所說的「總會有個英國」就和其他結果一樣，就能根據同一套機制推論出來。

除此之外，並沒有第三個意思：預測哪一些行動「必然」會有什麼結果、哪一些結果「必然」會接著導致哪些行動，或者哪一種結果「必然」會在何時何地出現。這些問題只能依靠經驗，而且多半只能事後追溯，畢竟馬克思主義不是宗教，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更不是一套預言。

Thompson (1965: 47) 在批評 Anderson 和 Althusser 時，也提到了「實驗」，不過是針對他的馬克思主義晚輩與對岸同行發出的重要警告，他說，

「歷史」本身是做實驗的唯一實驗室，而我們唯一的實驗設備就是歷史的邏輯。如果我們給實驗科學強加一些不適合的類比，我們很快就會發現整套事業都無法令人滿意。歷史擔負不起相同的實驗條件。我們或許能以比較的程序，在不同國家的實驗室發現某些相同的實驗結果（如民族國家的興起和工業化），但我們不可能再重回那些實驗室施加我們自己的條件，重新跑一次實驗。

沒錯，但這並不代表 Thompson 極為重視的獨特歷史經驗在各個「實驗室」之間沒有連結，更不代表種種的偶然性不可能整合出一個必然性。這個必然性當然要有一個夠靈活、兼具多層次的本體論基礎，「不平衡與綜合發展」應該能在前述意義下承擔這個任務，成為一個「規律」。

本文目的是從「不平衡與綜合發展」來重述或修補歷史唯物論。第一部分，我們從歷史哲學和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關注的問題出發（第二章），介紹歷史唯



物論的原則（第三章）。第二部分（第四、五章）分別介紹資產階級革命和不斷革命，以及它們的歷史社會脈絡，即「不平衡與綜合發展」，這是托洛茨基持續運用並正式提出的分析架構。第三部分（第六、七章）介紹馬克思主義者對國家體系和「國際」（作為人類實踐的一個根本水平向度）的思考，討論「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普世版本和 Justin Rosenberg 的思考脈絡；第七章最後回到馬克思的文本，指出分工有助於理解「社會多重性」的出現，並且將它重新嵌回歷史唯物論的建築隱喻。第四部分展開另一個嘗試：進一步詮釋 Carling 的命題後，把「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延伸到封建歐洲，企圖證明托洛茨基提出、Rosenberg 倡議的概念可以延伸到前資本主義時代，思考絕對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起源。

總的來說，「不平衡與綜合發展」有以下幾個特色。

第一，在本體論上，它立基在複數本體論，並且跨越了三個層次，國內、國際和世界。第一個層次發生在國家之內，第二個層次發生在國家之間，第三個層次是國家之上。由於在世界層次方面，和國內一樣形同是一個「社會」，因此真正特別的是國際本身；此外，世界層次的形成也必須視時代發展而定，這個整體或社會可能僅限於一個區域，如歐陸或東亞，未必及於整個地球表面，即字面意義的「世界」，要看國家之間的互動而定。第五章第二節介紹托洛茨基「不平衡發展」與「綜合發展」以及第三節與「世界體系分析」對照時，闡述了這方面的特色。

第二，以上述本體論為基礎，在方法論上，「不平衡與綜合發展」主要應用在研究對象是複數的、多個的且彼此相關的案例上。把複數研究對象（或單位）置於一個整體或系統，在它們連結的過程——整體乃針對不同主題而言，如特定地區的工業化進程或資本主義的世界擴張，連結主要指的是「先行者」對「後進者」的影響——中比較它們，而不是視之為分立無關的對象。因此，各個單位內部固然有所異同、值得比較，異同本身卻有可能是相互影響的結果。第五章第四節通過與 Gerschenkron 的對話，凸顯了這方面的特色。

第三，每一個國家或社會的發展都會受到外部影響，因為歷史已經被複數本體論和三層次本體論所折射。外部影響與內部發展的互動，導致個別國家或社會在面臨危機和轉型時，必須以「時機點」而不只是自身的「時間軸」為考量。就內部條件來討論不是不行，但肯定不夠，我們還有必要探問它們相對於其他國家或社會是「先進」的還是「落後」的，從整體或系統上看看它們是否「回答」了

時代的「提問」，判斷它們是落後、符合還是超前於時代。本文在第八章前四節完成對 Carling 的重新詮釋後，第五節以封建歐洲中絕對主義國家形成與互動的歷史為例描述了這些現象。

第四，回到歷史唯物論的原則（第三章），「不平衡與綜合發展」不只包含既有的結構理論、轉型理論、方向性理論，還應該納入了互動理論。因此我們的視野不能只集中在社會內部的生產關係和階級鬥爭以及個別社會和人類歷史的生產力，還需要考量國際關係（不管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封建領主或絕對主義君王）和交換關係（不管是被封建主義政治結構強烈牽動的貿易，還是資本主義經濟結構中的資本）的作用力，因為競爭、分工與學習／模仿等都是直接發生在這個介面的。Rosenberg 在回顧政治多重性的出現時，藉由人類學者的著作簡要勾勒了這些問題（第七章第三節），我也在第七章第四節藉由馬克思討論分工和共同體過渡到社會的關鍵文本，指出在歷史唯物論中納入「多重社會並立與互動」這項規定的可能。

第五，在特殊性或普世性的問題上，「不平衡與綜合發展」是一個能延伸至封建主義的普世規律。它在資本主義的擴張過程中有最鮮明的表現，意義也是強的，但這並不妨礙它在封建主義中以弱的意義保有「洪水期前的存在」。把「不平衡與綜合發展」限制在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的政治相遇上（這是托洛茨基的原始做法，也是馬克思主義者常見的關注脈絡），無法構思它的普世性。進入封建主義單一生產關係內部，以占支配地位的政治結構為對象考察生產方式，封建主義生產關係內部就產生了類型差異，我們可在其中發現「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因此，與其說「外在必然性的催逼」非資本莫屬，不如說催逼的來源和性質因時而異，必須被歷史化：在資本主義時代是資本積累，在封建主義時代則是政治積累。在封建主義中，「不平衡發展」發生在不同政治實體之間，表現為權力集中者和分散者的競爭以及政治實體相互學習統治技術的過程；「綜合發展」則涉及這些發生在「國際層次」和「世界層次」的競爭與學習過程與國內階級鬥爭融合與相互影響的過程。絕對主義是封建主義「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結果之一，一種以封建主義生產關係為基礎，政治結構介於「封建主義主權零碎化」和「納貢制龐大疆界／主權集中」之間的生產方式，資本主義可能由此誕生。

關於「不平衡與綜合發展」，還有許多值得討論的主題，好比經過複數本體論和三層次本體論的折射之後，歷史唯物論究竟在什麼意義上仍然奠基在社會

(生產)關係？它受到「國際」向度的影響有多深？在人類歷史進程的決定性問題方面，「垂直」向度(生產關係和階級鬥爭)和「水平」向度(國際關係和交換關係以及統治者／剝削者／商人階級之間的競爭)究竟孰輕孰重？這不是一個小問題，我在附錄中嘗試回答。

無論如何，藉由托洛茨基和當代馬克思主義者們的討論，「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對歷史唯物論起著重要的校正功用，因此不只是「不斷革命」的歷史社會分析架構和運作邏輯(局限於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的相遇)，更可以上升到歷史理論層次，和歷史唯物論一樣，延伸到封建主義，因此具有一定程度的普世性，使我們重新反思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的特色與不足，回應非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缺乏水平向度考量(國際關係爭和交換關係)的批評。如果本文所述是成立的，接下來有待實踐的，就是將「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帶入世界史和當代社會的研究，在更豐富和複雜的經驗現象中呈現它。





## 參考文獻

- Abrams, Philip. 1982. *Historical Sociolog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Abu-Lughod, Janet L. 1991.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 1250-135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 Albritton, Robert. 1993. "Did Agrarian Capitalism Exist?".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20(3):419-41.
- Albritton, Robert. 2000. "Agrarian Capitalism: A Response to Michael Zmolek."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28(1):147-54.
- Albritton, Robert. 2002. "Debate-Theory and History in Thinking the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A Reply to Zmolek."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29(2):125-34
- Allinson, Jamie and Alexander Anievas. 2009. "The Uses and Misuses of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An Anatomy of a Concept."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2(1):47-67.
- Althusser, Louis. 1990. *Philosophy and the Spontaneous Philosophy of the Scientists & Other Essays*. London: Verso.
- Althusser, Louis. 2005. *For Marx*. Translated by B. Brewster. London; New York: Verso.
- Amin, Samir. 1976. *Unequal Development: An Essay on the Social Formations of Peripheral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Amin, Samir. 1980. *Class and Nation, Historically and in the Current Crisi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Anderson, Perry. 1964. "Origins of the Present Crisis." *New Left Review* 1(23):26-53.
- Anderson, Perry. 1974.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London: NLB.
- Anievas, Alex and Kerem Nisancioglu. 2015. *How the West Came to Rule : The Geopolitical Origins of Capitalism*. London: Pluto Press.
- Anievas, Alexander. 2014. *Capital, the State, and War: Class Conflict and*

- Geopolitics in the Thirty Years' Crisis, 1914-1945*.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Arrighi, Giovanni. 1994.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London; New York: Verso.
- Ashman, Sam. 2010. "Capitalism,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and the Transhistoric." Pp. 183-96 in *Marxism and World Politics*, edited by A. Anieva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Aston, Trevor Henry and Charles HE Philpin, eds. 1987. *The Brenner Debate: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shi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vrich, Paul. 1976. *Russian Rebels, 1600-1800*. New York;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 Balibar, Etienne. 1970. "The Basic Concept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p. 199-308 in *Reading Capital*, edited by L. Althusser and E. Balibar. London; New York: NLB.
- Banaji, Jairus. 2010. *Theory as History: Essays on Modes of Production and Exploitation*. Leiden; Boston: Brill.
- Barker, Colin. 1991. "A Note on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States." Pp. 204-13 in *The State Debate*.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Macmillan.
- Barker, Colin. 2006. "Beyond Trotsky: Extending Combined and Uneven Development." Pp. 72-87, edited by B. Dunn and H. Radice. London; Ann Arbor: Pluto Press.
- Barkin, Kenneth. 1973. "Germany's Path to Industrial Maturity." *Aspects of Imperial Germany, Laurentian University Review* 5(3):11-34.
- Bergesen, Albert. 2015. "World-System Theory after Andre Gunder Frank." *Journal of World-Systems Research* 21(1):147-61.
- Berktaý, Halil. 1987. "The Feudalism Debate: The Turkish End-Is 'Tax-Vs.-Rent' necessarily the Product and Sign of a Modal Difference?". *The Journal*

- of Peasant Studies* 14(3):291-333.
- Berktay, Halil. 1991. "The Search for the Peasant in Western and Turkish History/Historiography."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18(3-4):109-84.
- Bernal, Richard 1980. "Emmanuel's Unequal Exchange as a Theory of Underdevelopment."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ies* 29(4):152-74.
- Bernstein, Henry. 2013.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Agrarian History."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13(2):310-29.
- Bertram, Christopher. 1990.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ew Left Review* 1(183):116-28.
- Birkan, Ayşe. 2015.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Theory of Unequal Exchange and Its Critiqu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5(4):155-63.
- Blackbourn, David and Geoff Eley. 1984. *The Peculiarities of German History: Bourgeois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y*.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lackburn, Robin. 1998. *The Making of New World Slavery: From the Baroque to the Modern, 1492-1800*. London; New York: Verso.
- Blackledge, Paul. 2006. *Reflections on the Marxist Theory of Histor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Blaut, James. 1993. *The Colonizer's Model of the World: Geographical Diffusionism and Eurocentric History*.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Blaut, James. 1994. "Robert Brenner in the Tunnel of Time." *Antipode* 26(4):351-74.
- Bloch, Marc. 1962. *Feudal Society*, Vol. 1. Translated by L. A. Manyon.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Bloch, Marc. 2015. *French Rural History: An Essay on Its Basic Characteristics*. Translated by J. Sondheimer. New York: Routledge.
- Bois, Guy. 1985. "Against the Neo-Malthusian Orthodoxy." Pp. 107-18 in *The Brenner Debate: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 Pre-Industrial Europe, Past and Present Publications*, edited by C. H. E. Philpin and T. H. Ast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nney, Richard. 1991. *The European Dynastic States, 1494-1660*.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randon, Pepijn. 2007. "The Dutch Revolt: A Soci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2(116):139-67.
- Braudel, Fernand. 1984.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 Vol. 3. Translated by S. Reyno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raudel, Fernand. 1992.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The Wheels of Commerce*, Vol. 2. Translated by S. Reyno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renner, Robert. 1972. "The Social Basis of English Commercial Expansion, 1550–1650."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2(1):361-84.
- Brenner, Robert. 1977.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 Critique of Neo-Smithian Marxism." *New Left Review* (104):25-92.
- Brenner, Robert. 1978. "Dobb on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2):121-40.
- Brenner, Robert. 1985a. "The Agrarian Roots of European Capitalism." Pp. 213-327 in *The Brenner Debate*, edited by T. H. Aston and C. H. E. Philpi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renner, Robert. 1985b.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Pp. 30-75 in *The Brenner Debate*, edited by T. H. Aston and C. H. E. Philpi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renner, Robert. 1986. "The Social Basi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p. 23-53 in *Analytical Marxism*, edited by J. Roemer. Cambridge Cambridgeshi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renner, Robert. 1996. "The Rises and Declines of Serfdom in Medieval and Early



- Modern Europe." Pp. 247-76 in *Serfdom and Slavery: Studies in Legal Bondage*, edited by M. L. Bush. London; New York: Longman.
- Brenner, Robert. 2001. "The Low Countries in the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1(2):169-241.
- Brenner, Robert. 2003. *Merchants and Revolution: Commercial Change, Political Conflict, and London's Overseas Traders, 1550-1653*. London; New York: Verso.
- Brenner, Robert. 2007. "Property and Progress: Where Adam Smith Went Wrong." Pp. 49-111 in *Marxist History-Writ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dited by C. Wickha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rewer, John. 1989. *The Sinews of Power: War, 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 1688-1783*. London: Unwin Hyman.
- Brophy, Susan Dianne. 2017. "An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Theory of Law: Initiation." *Law and Critique* 28(2):167-91.
- Brophy, Susan Dianne. 2018, "The Explanatory Value of the Theory of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ttp://www.historicalmaterialism.org/blog/explanatory-value-theory-uneven-and-combined-development>).
- Bull, Hedley. 1969. "Society and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Pp. 35-60 in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dited by H. Butterfield and M. Wight. London: Allen & Unwin.
- Burawoy, Michael. 2009. *The Extended Case Method: Four Countries, Four Decades, Four Great Transformations, and One Theoretical Tradi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urke, Peter. 2005. *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UK: Polity.
- Buzan, Barry and Richard Little. 2000.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uzan, Barry and George Lawson. 2015.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 History,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lhoun, Craig. 1998. "Explanation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Narrative, General Theory, and Historically Specific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4(3):846-71.
- Callinicos, Alex and Justin Rosenberg. 2010.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The Social-Relational Substratum of 'the International'? An Exchange of Letters." Pp. 149-82 in *Marxism and World Politics*, edited by A. Anieva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Callinicos, Alex. 1989. "Bourgeois Revolution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2(43):113-71.
- Callinicos, Alex. 1990. "The Limits of 'Political Marxism'." *New Left Review* 1(184):110-5.
- Callinicos, Alex. 1990. *Trotskyism*. Buckingham Buckinghamshire: Open University Press.
- Callinicos, Alex. 1995. *Theories and Narratives: Reflection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Callinicos, Alex. 2001. "Periodizing Capitalism and Analyzing Imperialism: Classical Marxism and Capitalist Evolution." Pp. 230-45 in *Phas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edited by R. Albritton.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New York: Palgrave.
- Callinicos, Alex. 2004. "Marxism and the International."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6(3):426-33.
- Callinicos, Alex. 2004. *Making History: Agency,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Social Theory*. Leiden; Boston: Brill.
- Callinicos, Alex. 2005. "Epoch and Conjuncture i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42(3):353-63.

- Callinicos, Alex. 2007. "Does Capitalism Need the State System?".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4):533-49.
- Callinicos, Alex. 2009. "How to Solve the Many-State Problem: A Reply to the Debate."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2(1):89-105.
- Carling, Alan and Paul Nolan. 2000.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atural Selection and World Histor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6:215-64.
- Carling, Alan. 1991. *Social Division*. New York: Verso.
- Carling, Alan. 2002. "Analytical Marxism and the Debate on Social Evolution." Pp. 98-128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Social Evolution*, edited by P. Blackledge and G. Kirkpatrick.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New York: Palgrave.
- Carr, Edward Hallett. 2018. *What Is History?* UK: Penguin.
- Chase-Dunn, Christopher and Thomas Hall. 1997. *Rise and Demise: Comparing World-Systems*. Boulder, Colo. : Westview Press.
- Chase-Dunn, Christopher and Marilyn Grell-Brisk. 2016.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in the Sociocultural Evolution of World-Systems." Pp. 205-18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and World History*, edited by A. Anievas and K. Matin. London;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Chilcote, Ronald. 2009. "Trotsky and Development Theory in Latin America." *Critical Sociology* 35(6):719-41.
- Claessen, Henri and Peter Skalník, eds. 2011. *The Early State*. Hague; Paris; New York: Mouton.
- Clarke, Simon. 1991. "The State Debate." Pp. 1-69 in *The State Debate*, edited by S. Clar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 Clarke, Simon. 1998. "Was Lenin a Marxist? The Populist Roots of Marxism-Lenin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3(1):3-28.
- Cliff, Tony. 1981. "Deflected Permanent Revolu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Reprint*, Vol. 5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 Cliff, Tony. 2000. *A World to Win: Life of a Revolutionary*. London; Chicago: Bookmarks.
- Cobban, Alfred. 1970. *Aspect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Norton.
- Cobban, Alfred. 1999.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hen, Gerald Allan and Will Kymlicka. 1988. "Human Nature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Marx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Pp. 171-91 in *History, Labour, and Freedom: Themes from Marx*.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hen, Gerald Allan. 1986. "Marxism and Functional Explanation." Pp. 221-34 in *Analytical Marxism*, edited by J. Roem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hen, Gerald Allan. 1986. "Restricted and Inclusiv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p. 57-83 in *The Prism of Science*, edited by E. Ullmann-Margalit. Hingham, MA, U.S.A.: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Cohen, Gerald Allan. 1988. *History, Labour and Freedom: Themes from Marx*. Oxford; New York: Clarendon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hen, Gerald Allan. 2000.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llingwood, R. G. 1956. *The Idea of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mninel, George. 1987. *Rethink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Marxism and the Revisionist Challenge*. London; New York: Verso.
- Comninel, George. 2003. "Historical Materialist Sociology and Revolutions." Pp. 84-95 in *Handbook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edited by G. Delanty and E. Isin. London: SAGE.
- Cooper, Luke. 2013. "Can Contingency Be 'Internalized' into the Bounds of Theory? Critical Realism, the Philosophy of Internal Relations and the Solution of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6(3):573-97.

- Cox, Robert 1981.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Millennium* 10(2):126-55.
- Croce, Benedetto. 1960. *History: Its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 Davidson, Neil. 2004. "Isaac Deutscher: The Prophet, His Biographer and the Watchtower."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2(104):95-118.
- Davidson, Neil. 2006. "From Uneven to Combined Development." Pp. 10-26 in *100 Years of Permanent Revolution: Results and Prospects*, edited by B. Dunn and H. Radice. London: Pluto Press.
- Davidson, Neil. 2009. "Putting the Nation Back into 'the International'."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2(1):9-28.
- Davidson, Neil. 2012. *How Revolutionary Were the Bourgeois Revolutions?*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 Davidson, Neil. 2015. *We Cannot Escape History: States and Revolutions*.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 Davidson, Neil. 2017.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Modernity, Modernism, Revolution." *rs21: Revolutionary Soci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
- Davidson, Neil. 2018. "The Frontiers of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6(3):52-78.
- Davies, C. C. 1957. "Rivalries in India." Pp. 541-65 in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ume 7: The Old Regime, 1713–1763*, edited by J. O. Lindsa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ay, Richard and Daniel Gaido, eds. 2009. *Witnesses to Permanent Revolution: The Documentary Record*. Leiden; Boston: Brill.
- Delanty, Gerard and Engin Isin, eds. 2003. *Handbook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London: Sage.
- Denemark, Robert and Kenneth Thomas. 1988. "The Brenner-Wallerstein Debat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2(1):47-65.

- Deutscher, Isaac. 1967. *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Russia, 1917-196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eutscher, Isaac. 2003. *The Prophet Armed: Trotsky, 1879-1921*. London; New York:  
Verso.
- Deutscher, Isaac. 2003. *The Prophet Outcast: Trotsky, 1929-1940*. London; New  
York: Verso.
- Deutscher, Isaac. 2003. *The Prophet Unarmed: Trotsky, 1921-1929*. London; New  
York: Verso.
- Dimmock, Spencer. 2014. *The Origin of Capitalism in England, 1400–1600*. Leiden;  
Boston: Brill.
- Dobb, Maurice 1963.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Domingo Sanchez, Juan. 2014. "A Dead Dog Is Immortal. On Louis Althusser,  
Initiation ð La Philosophie Pour Les Non-Philosophes." *Décalages* 1(4):1-14.
- Draper, Hal. 1978. *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Vol. 2.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Dunn, Bill and Hugo Radice, eds. 2006. *100 Years of Permanent Revolution:  
Results and Prospects*. London ; Ann Arbor: Pluto Press.
- Duzgun, Eren. 2018.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Bourgeois Revolutions':  
Disputing the Turkish Revolu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4(2):414-39.
- Elliott, Gregory. 1998. *Perry Anderson : The Merciless Laboratory of Hist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Elster, Jon. 1986. "Further Thoughts on Marxism, Functionalism and Game Theory."  
in *Analytical Marxism*, Vol. 202-220, edited by J. Roemer. Cambridge  
Cambridgeshi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lster, Jon. 1986. "The Theory of Combined and Uneven Development: A Critique."  
Pp. 54-63 in *Analytical Marxism*, edited by J. Roemer. Cambridge

Cambridgeshi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lster, Jon. 1989. "Marxism, Functionalism, and Game Theory." Pp. 48-87 in *Marxist Theory*, edited by A. Callinicos.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lton, Geoffrey Rudolph. 1962. *The Tudor Revolution in Government : Administrative Changes in the Reign of Henry VI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mmanuel, Arghiri 1972. *Unequal Exchange: A Study of the Imperialism of Trade*. Translated by B. Pearce. New York;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Engels, Friedrich. 1956-83a, 〈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導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2，頁216-29，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

Engels, Friedrich. 1956-83b, 〈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1，頁224-31，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

Engels, Friedrich. 1956-83c, 〈恩格斯致馬克思（1882年12月16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35，頁124-6，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

Engels, Friedrich. 1965a, 〈關於普魯士農民的歷史〉，Pp. 279-89 in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1，頁279-89，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

Engels, Friedrich. 1965b, 〈馬爾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19，頁351-69，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

Engels, Friedrich. 1998, 〈德國維護帝國憲法運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10，頁3-109，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

Fischer, Fritz. 1967. *Germany's Aims in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Foster-Carter, Aidan. 1978. "The Modes of Production Controversy." *New Left*

*Review* 1(107):47-77.

- Fracchia, Joseph. 2005. "Beyond the Human-Nature Debate: Human Corporeal Organisation as The'first Fact'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3(1):33-62.
- Fracchia, Joseph. 2014. "Organisms and Objectifications: A Historical-Materialist Inquiry into the "Human and Animal"." *Konturen* 6:41-61.
- Frank, Andre Gunder and Barry K. Gills, eds. 1993. *The World System : Five Hundred Years or Five Thousand?*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Ganshof, Francois-Louis. 2016, 《何為封建主義》, 張緒山、盧兆瑜譯, 北京: 商務印書館。
- Geras, Norman. 1976. *The Legacy of Rosa Luxemburg*. London: NLB.
- Gerschenkron, Alexander. 1962.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Book of Essays*.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erstenberger, Heide. 2007. *Impersonal Power: History and Theory of the Bourgeois State*. Boston;Leiden: Brill.
- Ginsborg, Paul. 1979. "Gramsci and the Era of Bourgeois Revolution in Italy." Pp. 31-66 in *Gramsci and Italy's Passive Revolution*, edited by J. Davis. New York; London Barnes & Noble Books; Croom Helm.
- Goldthorpe, John 1991. "The Uses of History in Sociology: Reflections on Some Recent Tendenc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42(2):211-30.
- Gramsci, Antonio.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Edited by Q. Hoare and G. Nowell-Smith.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Gramsci, Antonio. 2011. *Prison Notebooks*, Vol. 2.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Gray, Marion W. 1986. "Prussia in Transition: Society and Politics under the Stein Reform Ministry of 1808."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76(1):1-175.



- Grinin, Leonid and Andrey Korotayev. 2009. "The Epoch of the Initial Politogenesis." *Social Evolution and History* 8(1):52-91.
- Grinin, Leonid 2003. "The Early State and Its Analogues." *Social Evolution and History* 2(1):131-76.
- Grinin, Leonid. 2008. "Early State, Developed State, Mature State: The Statehood Evolutionary Sequence." *Social Evolution and History* 7(1):67-81.
- Grinin, Leonid. 2009. "The Pathways of Politogenesis and Models of the Early State Formation." *Social Evolution and History* 8(1):92-132.
- Gülalp, Haldun. 1981. "Frank and Wallerstein Revisited: A Contribution to Brenner's Critiqu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11(2):169-88.
- Haldon, John 1993. *The State and the Tributary Mode of Production*. London; New York: Verso.
- Hallas, Duncan. 1979. *Trotsky's Marxism*. London: Pluto Press.
- Halliday, Fred and Justin Rosenberg. 1998. "Interview with Ken Waltz ".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4(3):371-86.
- Halliday, Fred. 1994. *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ancouver: UBC Press.
-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2000. *Empi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arman, Chris. 1991. "The State and Capitalism Today."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2(51):3-54.
- Harman, Chris. 2003. "Analysing Imperialism."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2(99):3-82.
- Harman, Chris. 2004. "The Rise of Capitalism."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2(102):53-86.
- Harvey, David. 2003.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upt, Heinz-Gerhard and Jürgen Kocka. 2009. "Comparison and Beyond: Traditions, Scope, and Perspectives of Comparative History." Pp. 1-32 in *Comparative and Transnational History. Central European Approaches and New*

- Perspectives*, edited by H.-G. Haupt and J. Kocka.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 Hegel, Georg Wilhelm Fredrich. 2010. *The Science of Logic*. Translated by G. Di Giovanni.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eller, Henry. 2006. *The Bourgeois Revolution in France, 1789-1815*.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 Heller, Henry. 2011. *The Birth of Capitalism: A Twenty-First-Century Perspective*. London: Pluto Press London.
- Hempel, Carl G. 1942. "The Function of General Laws in History." *Journal of Philosophy* 39(2):35-48.
- Hesketh, Chris. 2017. "Passive Revolution: A Universal Concept with Geographical Seat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43(3):389-408.
- Hill, Christopher. 1948. "The English Civil War Interpreted by Marx and Engels." *Science and Society* 12(1):130-56.
- Hill, Christopher. 1966. *The Century of Revolution, 1603-1714*. New York: Norton.
- Hill, Christopher. 1980. "A Bourgeois Revolution?" Pp. 109-39 in *Three British Revolutions: 1641, 1688, 1776*, edited by J. G. A. Pocock.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ilton, Rodney and Christopher Hill. 1953.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Science and Society* 17(4):340-51.
- Hindess, Barry and Paul Hirst. 1975. *Pre-Capitalist Modes of Production*. London; Boston: Routledge and K. Paul.
- Hirst, Paul. 2009. *Marxism and Historical Writing* London: Routledge.
- Ho, Ping-Ti. 1998. "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7(1):123-55.
- Hobden, Stephen and John Hobson. 2002.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bden, Stephen. 1998.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 : Breaking*

*Down Boundaries*. London: Routledge.

Hobson, John 2011. "What's at Stake in the Neo-Trotskyist Debate? Towards a Non-Eurocentric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Millennium* 40(1):147-66.

Hobson, John M. and George Lawson. 2008. "What Is Hist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llennium* 37(2):415-35. doi: 10.1177/0305829808097648.

Hobson, John, George Lawson and Justin Rosenberg. 2010. "Historical Sociology." Pp. 3357-75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Encyclopedia*, Vol. 6, edited by R. Denmark and M.-B. Renée.

Hodgson, Geoffrey Martin and Thorbjørn Knudsen. 2010. *Darwin's Conjecture: The Search for General Principle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Evolution*. Chicago;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oward, M. C. and J. E. King. 1992. "Unequal Exchange." Pp. 186-204 in *A History of Marxian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Education UK.

Hull, David 1980. "Individuality and Selection."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11(1):311-32.

Ingrao, Charles W. 1979. *In Quest and Crisis: Emperor Joseph I and the Habsburg Monarchy*. West Lafayette, Ind.: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Jameson, Fredric. 1991.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Jones, Gareth Stedman. 1976. "From Historical Sociology to Theoretical Histor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7(3):295-305.

Jones, Gareth Stedman. 1977. "Society and Politic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ld Economy." Review of *The Age of Capital 1848—1875*, Eric Hobsbawm.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1):77-92.

Kafker, Frank A, James Michael Laux and Darline Gay Levy, eds. 2002. *The French Revolution: Conflicting Interpretations*. Malabar, Fla. : Krieger Publishing Company.

- Kiely, Ray. 2012. "Spatial Hierarchy and/or Contemporary Geopolitics: What Can and Can't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Explain?".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5(2):231-48.
- Kiser, Edgar and Michael Hechter. 1991. "The Role of General Theory in Comparative-Historical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7(1):1-30.
- Knei-Paz, Baruch. 1978.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Leon Trotsk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Oxford.
- Kocka, Jürgen. 1988. "German History before Hitler: The Debate About the German Sonderwe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3(1):3-16.
- Kocka, Jürgen. 2003. "Comparison and Beyond." *History and theory* 42(1):39-44.
- Koivisto, Juha and Mikko Lahtinen. 2012. "Conjuncture, Political-Historica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0(1):267-77.
- Lacher, Hannes. 2002. "Making Sense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 Promises and Pitfalls of Contemporary Marxist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47-64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Globalization*, edited by M. Rupert and H. Smith.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Lacher, Hannes. 2005. "Interna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Territoriality: Toward a New Political Geography of Capitalis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2(1):26-52.
- Lacher, Hannes. 2006. *Beyond Globalization: Capitalism, Territoriality an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Modernit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Laclau, Ernesto. 1971. "Feudalism and Capitalism in Latin America." *New Left Review* 1(67):19-38.
- Laibman, David. 2007. *Deep History: A Study in Social Evolution and Human Potential*.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Lakatos, Imre. 1978.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wson, George and Robbie Shilliam. 2010. "Sociolog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egacies and Prospects."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3(1):69-86.
- Lawson, George. 2015. "Revolu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Society* 44(4):299-319.
- Le Blanc, Paul. 2005.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and the Sweep of History: Focus on Europ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7th Annual North America Labor History Conference, October 20-22, Wayne State University in Detroit (<https://www.europe-solidaire.org/spip.php?article1195>).
- Le Roy Ladurie, Emmanuel. 1979. *The Territory of the Historia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enin, Vladimir. 1908, 《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 《列寧全集》卷18, 頁5-379,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Lenin, Vladimir. 1984-90a, 〈紀念赫爾岑〉, 《列寧全集》卷21, 頁261-8,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Lenin, Vladimir. 1984-90b, 〈「農民改革」和無產階級——農民革命〉, 《列寧全集》卷20, 頁173-81,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Lenin, Vladimir. 1988, 《社會民主黨在1905年至1907年第一次俄國革命中的土地綱領》, 《列寧全集》卷16, 頁185-397,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Lenin, Vladimir. 1990a, 《國家與革命》, 《列寧全集》卷31, 頁1-116,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Lenin, Vladimir. 1990b, 《資本主義是帝國主義的最高階段》, 《列寧全集》卷27, 頁323-439,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Lindenberg, Siegwart. 1992. "The Method of Decreasing Abstraction." Pp. 3-20 in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dvocacy and Critique*. Newbury Park: Sage.

- Little, Daniel. 1986. *The Scientific Marx*.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Llorente, Renzo. 2005. "The Division of Labour." Pp. 96-110 in *Marx and Other Four-Letter Words*, edited by V. Bryson and G. Blakeley. London: Pluto Press.
- Llorente, Renzo. 2006. "Analytical Marxism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Science and Society* 70(2):232-51.
- Löwy, Michael. 2006, 〈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理論〉，萬毓澤譯，《紅鬍鼠》期6，頁44-9。
- Löwy, Michael. 1989. "'The Poetry of the Past': Marx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Left Review* 1(177):111-24.
- Löwy, Michael. 2010. *The Politics of Combined and Uneven Development: The Theory of Permanent Revolution*. Chicago, Ill.: Haymarket Books.
- Lukács, György. 1971.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London: Merlin Press.
- Lukowski, Jerzy and Huber Zawadzki. 2011, 《波蘭史》，常程譯，上海：東方出版中心。
- Mahoney, James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 2003. "Comparative-Historical Analysis: Achievements and Agendas." Pp. 3-38 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edited by J. Mahoney and D. Rueschemeyer.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kki, Fouad. 2015. "Reframing Development Theory: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dea of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Theory and Society* 44(5):471-97.
- Mandel, Ernest. 1970. "The Laws of Uneven Development." *New Left Review* 1(59):19-39.
- Mandel, Ernest. 1979. *Trotsky: A Study in the Dynamic of His Thought*. London: NLB.
- Mandel, Ernest. 1991. "Introduction." in *Capital*, Vol. 3. London: Penguin and New

Left Books.

-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and Engels. 1956-83a,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8,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and Engels. 1956-83b,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9,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and Engels. 1956-83c,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10,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1956-83d, 《共產黨宣言》,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4, 頁461-504,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1998, 〈共產主義同盟中央委員會告同盟書〉,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10, 頁385-96,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2016, 《德意志意識形態 I. 費爾巴哈原始手稿》, 孫善豪譯, 台北: 聯經。
- Marx, Karl. 1956-83a, 〈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13, 頁7-11,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Marx, Karl. 1956-86b, 〈資產階級與反革命〉,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6, 頁118-146,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Marx, Karl. 1956-83c, 〈馬克思致恩格斯(1856年4月16日)〉,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9, 頁44-8,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Marx, Karl. 1956-83d, 《哲學的貧困》,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14, 頁71-198,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Marx, Karl. 1965, 〈法蘭西內戰」初稿〉,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17, 頁535-620,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Marx, Karl. 1970.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Marx, Karl. 1995a, 〈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草稿）〔手稿前半部分〕導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30，頁21-53，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第二版，北京：人民出版社。
- Marx, Karl. 1995b,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11，頁127-240，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第二版，北京：人民出版社。
- Marx, Karl. 1998, 《政治經濟學批判（1859-1861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31，頁417-582，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第二版，北京：人民出版社。
- Marx, Karl. 2001, 〈給維·伊·查蘇利奇的覆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5，頁456-83，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第二版，北京：人民出版社。
- Marx, Karl. 2002, 《黑格爾法哲學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3，頁5-158，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第二版，北京：人民出版社。
- Marx, Karl. 2003a. 《資本論》卷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46，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
- Marx, Karl. 2003b, 《資本論》卷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44，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
- Marx, Karl. 2003c. 《資本論》卷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45，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
- Matin, Kamran and Alexander Anievas, eds. 2016. *Historical Sociology and World History: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over the Longue Durée*. London;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 Matin, Kamran. 2007.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in World History: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State-Formation in Premodern Ira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3(3):419-47.



- Matin, Kamran. 2013. *Recasting Iranian Modern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ocial Change*. Milton Park, Abingdon, Oxon ; New York, NY: Routledge.
- Mielants, Eric. 2016.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in the Longue Durée: Beyond World-System Analysis?". *Spectrum Journal of Global Studies* 8(1):31-45.
- Milonakis, Dimitris. 1997. "The Dynamics of History: Structure and Agency in Historical Evolution." *Science and Society* 61(3):303-29.
- Molyneux, John. 1981. *Leon Trotsky's Theory of Revolu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Mombauer, Annika. 2013. "The Fischer Controversy 50 Years 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8(2):231-40.
- Mooers, Colin. 1991. *The Making of Bourgeois Europe: Absolutism, R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in England, France, and Germany*. London; New York: Verso.
- Moore, Barrington. 1966.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Boston Beacon Press.
- Moore, Jason. 2002. "The Crisis of Feudalism: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rganization & Environment* 15(3):301-22.
- Moore, Jason. 2017a. "The Capitalocene, Part I: On the Nature and Origin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44(3):594-630.
- Moore, Jason. 2017b. "The Capitalocene Part II: Accumulation by Appropriation and the Centrality of Unpaid Work/Energy."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45(2):237-79
- Morton, Adam David. 2010. "Reflections on Uneven Development: Mexican Revolution, Primitive Accumulation, Passive Revolution."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37(1):7-34.
- Morton, Adam David. 2013. *Revolution and State in Modern Mexic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neven Development*.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 Mosse, George. 1947.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the Tudor Constitution." *Speculum* 22(1):18-28.
- Nisancioglu, Kerem. 2014. "The Ottoman Origins of Capitalism: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and Eurocentris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40(2):325-47.
- Nolan, Paul. 2002. "A Darwinia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p. 76-97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Social Evolution*, edited by P. Blackledge and G. Kirkpatrick. New York: Palgrave.
- Nolan, Paul. 2006. "Why Ga Cohen Can't Appeal to Charles Darwin to Help Him Defend Karl Marx (but Why Others Can)." *Science and Society* 70(2):155-79.
- Novack, George 1980. *Understanding History : Marxist Essays*.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 Novack, George. 1976. "The Law of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and Latin America."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3(2):100-6.
- Ollman, Bertell and Tony Smith, eds. 2008. *Dialectics for the New Century*. Basingstoke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Ollman, Bertell. 2003. *Dance of the Dialectic: Steps in Marx's Method*.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Ozawa, Terutomo. 2004. "Veblen's Theories of "Latecomer Advantage" and "the Machine Process": Relevancy for Flexible Produc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38(2):379-88.
- Panitch, Leo and Sam Gindin. 2003. "Global Capitalism and American Empire." Pp. 1-42 in *The New Imperial Challenge: Socialist Register 2004*, edited by L. Panitch and C. Leys. London: Merlin.
- Paolucci, Paul 2007. *Marx's Scientific Dialectics: A Methodological Treatise for a New Century*. Leiden; Boston: Brill.
- Parijs, Philippe Van and Nicholas Vrousalis. 2015. "Analytical Marxism." Pp. 665-7

-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 edited by J. Wright. Amsterdam Elsevier.
- Patriquin, Larry. 2004. "The Agrarian Origin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36(2):196-216.
- Pellicani, Luciano. 1994. *The Genesis of Capit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ity*. New York: Telos Press.
- Pinson, Koppel. 1989. *Modern Germany: Its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Prospect Heights, Illinois: Waveland Press.
- Pipes, Richard. 1960. "Russian Marxism and Its Populist Background: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Russian Review* 19(4):316-37.
- Poulantzas, Nicos. 1973.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 Translated by T. O'Hagan. London: NLB.
- Pozo-Martin, Gonzalo. 2006. "A Tougher Gordian Knot: Globalisation, Imperialism and the Problem of the State."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2):223-42.
- Rattansi, Ali. 1982. *Marx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London: Macmillan.
- Rawski, Evelyn S. 1996. "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4):829-50.
- Rees, John. 1998. *The Algebra of Revolution: The Dialectic and the Classical Marxist Tradition*.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Riasanovsky, Nicholas and Mark Steinberg. 1969. *A History of Rus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igby, Stephen Henry. 1998. *Marxism and Histor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Rioux, Sébastien. 2015. "Mind the (Theoretical) Gap: On the Pover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sing of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Global Society* 29(4):481-509.

- Rosenberg, Justin. 1994. *The Empire of Civil Society : A Critique of the Real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Verso.
- Rosenberg, Justin. 1996. "Isaac Deutscher and the Lost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Left Review* 1(215):3-15.
- Rosenberg, Justin. 2000. *The Follies of Globalisation Theory : Polemical Essays*. New York: Verso.
- Rosenberg, Justin. 2005. "Globalization Theory: A Post Mortem." *International Politics* 42(1):2-74.
- Rosenberg, Justin. 2006. "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ociolog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2(3):307-40.
- Rosenberg, Justin. 2010. "Basic Problems in the Theory of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Part II: Unevenness and Political Multiplicity."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3(1):165-89.
- Rosenberg, Justin. 2012. "The 'Philosophical Premises' of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9(3):569-97.
- Rosenberg, Justin. 2013. "Kenneth Waltz and Leon Trotsky: Anarchy in the Mirror of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Politics* 50(2):183-230.
- Rosenberg, Justin. 2017. "The Elusive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31(1):90-103.
- Roxborough, Ian. 1979. *Theories of Underdevelopment*. London Macmillan.
- Russell, Conrad. 1990. *Unrevolutionary England, 1603-1642*. London; Ronceverte: Hambledon Press.
- Sayer, Derek. 1987. "The Violence of Abstraction: The Analytic Foundation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Sayers, Sean. 1985. *Reality and Reason : Dialectic and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Oxford, UK: Blackwell.
- Sayers, Sean. 1998. *Marxism and Human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 Schneider, Louis. 1984. *The Grammar of Social Relations: The Major Essays of Louis*

- Schneider*.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Books.
- Scholte, Jan Aart. 2005. *Globalizatio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 Seel, Graham 2005. *The English Wars and Republic, 1637–1660*.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Selwyn, Ben. 2011. "Trotsky, Gerschenkron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te Capitalist Development." *Economy and Society* 40(3):421-50.
- Shanin, Teodor. 1983. *Late Marx and the Russian road: Marx and "the Peripherie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Shaw, William 1978.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Shilliam, Robbie. 2009. "The Atlantic as a Vector of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2(1):69-88.
- Skocpol, Theda. 1973. "A Critical Review of Barrington Moore's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Politics & Society* 4(1):1-34.
- Skocpol, Theda. 1977. "Wallerstein's World Capitalist System: A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Critique." Review of *The Modern World-System: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Immanuel Wallerste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5):1075-90.
- Skocpol, Theda. 1979.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kocpol, Theda. 1984. "Emerging Agendas and Recurrent Strategies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Pp. 356-91 in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edited by T. Skocp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oboul, Albert. 1979. "Jaurès, Mathiez, and the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237.

- Soboul, Albert. 2015, 《法國大革命史》, 馬勝利、高毅、王庭榮譯, 北京,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 Song, Hae-Yung. 2015. "Reorienting the Critique of the Capitalist World System Beyond the Dichotomy between Trade Vs. Production Relations." *Journal of World-Systems Research* 21(1):174-83.
- Stalin, Joseph 1957, 〈給葉爾馬柯夫斯基同志的信〉, 《斯大林全集》卷7, 頁193-4,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Steensgaard, Niels. 1973. *The Asian Trade Revolut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The East India Companies and the Decline of the Caravan Trad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teinmetz, George. 2005. "The Epistemological Unconscious of Us Sociology and the Transition to Post-Fordism: The Case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Pp. 109-57 in *Remaking Modernity: Politics, History, and Sociology*, edited by J. Adams, E. S. Clemens and A. S. Orloff.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Stone, Lawrence. 1979.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 *Past and Present* 85(1):3-24.
- Stone, Lawrence. 1996. *The Cause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529-1642*. London: Routledge.
- Sweezy, Paul 1942.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 Principles of Marxian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Sweezy, Paul 1978. "A Critique." Pp. 33-56 in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edited by R. Hilton. London: Verso.
- Teschke, Benno and Hannes Lacher. 2007. "The Changing 'Logics' of Capitalist Competition."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4):565-80.
- Teschke, Benno. 2002. "Theorizing the Westphalian System of Stat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Absolutism to Capitalism."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8(1):5-48.
- Teschke, Benno. 2003. *The Myth of 1648: Class, Geopolitics, and the Making of*

-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 New York: Verso.
- Teschke, Benno. 2005. "Bourgeois Revolution, State Formation and the Abs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3(2):3-26.
- Teschke, Benno. 2006. "Geopolitic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4(1):327-35.
- Teschke, Benno. 2008. "Marxism." Pp. 163-187.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dited by Reus-Smit, Christian and Duncan Snidal.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hatcher, Ian D. 2003. *Trotsky*. London: Routledge.
- Thomas, Peter. 2017. "The Modern Prince: Gramsci's Reading of Machiavelli."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38(3):523-44.
- Thompson, Edward P. 1965. "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English." *Socialist Register* 2(2):311-62.
- Thompson, Edward P. 1978.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Merlin Press.
- Tim, Harris. 2015. "Revisiting the Causes of the English Civil War."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78(4):615-35.
- Torrance, John. 1985. "Re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A Case for a 'Darwinian' mechanism in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Political Studies* 33(3):382-98.
- Trotsky, Leon. 1937.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Trotsky, Leon. 1970.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after Lenin*. Translated by J. G. Wright.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 Trotsky, Leon. 1972, 《總結與前瞻》, 《「不斷革命」論》, 頁1-79, 北京: 新華書店。
- Trotsky, Leon. 1972. *The Revolution Betrayed: What Is the Soviet Union and Where Is It Going?* Translated by M. Eastman.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 Trotsky, Leon. 1973. *The Spanish Revolution, 1931-39*.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 Trotsky, Leon. 1974. "The Death Agony of Capitalism and the Task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in *The Transitional Program for Socialist Revolution*.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 Trotsky, Leon. 1979. "Latin American Problems: A Transcript." in *Writings of Leon Trotsky, Supplement: 1934-1940* edited by G. Breitman.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 Trotsky, Leon. 1998. *Trotsky's Notebooks, 1933-1935: Writings of Lenin, Dialectics and Evolutionism*. Translated by P. Pomp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Trotsky, Leon. 2011. 《托洛茨基論中國革命（1925-1927）》, 陝西：陝西人民出版社。
- van der Linden, Marcel. 2012. "Gerschenkron's Secret: A Research Note." *Critique* 40(4):553-62.
- van der Pijl, Kees. 2007. *Nomads, Empires, States: Modes of Foreign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London: Pluto Press.
- van der Pijl, Kees. 2010. "Historicising the International: Modes of Foreign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Econom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8(2):3-34.
- van der Pijl, Kees. 2015. "The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ociology." Pp. 45-83 in *Theoretical Engagements in Geo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in Political Economy*, edited by R. Desai. Bingley, England Emerald.
- Veblen, Thorstein. 1915. *Imperial German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Macmillan.
- Waley-Cohen, Joanna. 2004. "The New Qing History." *Radical History Review* 88(1):193-206.
- Wallerstein, Immanuel. 1974.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enary*, Vol. 1.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Wallerstein, Immanuel. 1980.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Mercantilism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Vol. 2.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Wallerstein, Immanuel. 1992. "The West, Capitalism, and the Modern World-System." *Review (Fernand Braudel Center)* 15(4):561-619.
- Wallerstein, Immanuel. 2014. *Historical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 Walsh, William Henry. 1967. *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of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 Waltz, Kenneth 1986. "Reflections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Response to My Critics." Pp. 322-45 in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edited by R. O. Keohane.
- Waltz, Kenneth 1990. "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44(1):21-37.
- Waltz, Kenneth.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oston, Mass: McGraw-Hill.
- Walzer, Michael. 2015. *Just and Unjust Wars: A Moral Argument with Historical Illustrations*. New York: Basic books.
- Ware, Robert. 1982. "Marx,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Human Nature." *Social Theory and Practice* 8(1):43-71.
- Weeks, John. 1997. "The Law of Value and the Analysis of Underdevelopmen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1):91-112.
- Weeks, John. 2001. "The Expansion of Capital and Uneven Development on a World Scale." *Capital and Class* 25(2):9-30.
- Wehler, Hans-Ulrich. 1970. "Bismarck's Imperialism 1862-1890." *Past and Present* 48:119-55.
- Wehler, Hans-Ulrich. 1985. *The German Empire, 1871-1918*. Leamington Spa, Warwickshire, UK ; Dover, N.H. : Berg Publishers.
- Wetherly, Paul. 2006. "The Theory of the State in Cohen's Func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Science and Society* 70(2):205-31.

- White, Hayden V. 1973. *Metahistory :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White, Hayden V. 1987.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Wickham, Chris. 1985. "The Uniqueness of the East."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12(2-3):166-96.
- Wickham, Chris. 2005. *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 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 400-800*.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n Demand.
- Wickham, Chris. 2008.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Economic Logic of the Feudal Mode of Produc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6(2):3-22.
- Wolf, Eric. 1982.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olpe, Harold, ed. 1980. *The Articulation of Modes of Production: Essays from Economy and Society*. Boston;London;; Routledge & K. Paul.
- Wood, Ellen Meiksins and Neal Wood. 1997. *A Trumpet of Sedition: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1509-1688*.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Wood, Ellen Meiksins. 1981. "The Separation of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1(127):66-95.
- Wood, Ellen Meiksins. 1991. *The Pristine Culture of Capitalism: A Historical Essay on Old Regimes and Modern States*. London: Verso.
- Wood, Ellen Meiksins. 1995. "Democracy against Capitalism: Renew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Vo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Wood, Ellen Meiksins. 2002a. *The Origin of Capitalism: A Longer View*. London ; New York Verso.
- Wood, Ellen Meiksins. 2002b. "Global Capital, National States." Pp. 17-39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Globalisation*, edited by M. Rupert and H. Smith.

-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Wood, Ellen Meiksins. 2002c. "The Question of Market Dependence."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2(1):50-87.
- Wood, Ellen Meiksins. 2003. *Empire of Capital*. London; New York: Verso.
- Wood, Ellen Meiksins. 2006. "Logics of Power: A Conversation with David Harve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4(4):9-34.
- Wood, Ellen Meiksins. 2011. *Citizens to Lords: A Social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from Antiquity to the Late Middle Ages*. London; New York: Verso Books.
- Wood, Ellen Meiksins. 2015. *Peasant-Citizen and Slave: The Foundations of Athenian Democracy*. London; New York: Verso Books.
- Wright, Erik Olin, Andrew Levine and Elliott Sober. 1992. *Reconstructing Marxism: Essays on Explanation and the Theory of History*. London: Verso.
- Wright, Erik Olin. 1983. "Giddens's Critique of Marxism." *New Left Review* 1(138):11-35.
- Wright, Erik Olin. 1995. "What Is Analytical Marxism?" Pp. 11-30 in *Rational Choice Marxism*, edited by T. Carver and P. Thoma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
- Žmolek, Michael Andrew. 2000. "The Case for Agrarian Capitalism: A Response to Albritton."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27(4):138-59.
- Žmolek, Michael Andrew. 2001. "Debate-Further Thoughts on Agrarian Capitalism: A Reply to Albritton."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29(1):129-54.
- Žmolek, Michael Andrew. 2004. "Debating Agrarian Capitalism: A Rejoinder to Albritton."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31(2):276-305.
- Žmolek, Michael Andrew. 2013. *Rethink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Five Centuries of Transition from Agrarian to Industrial Capitalism in England*. Leiden: Brill.
- 王子夔. 2018, 〈普鲁士歧路—19世纪俄国和奥地利现代化改革中的效仿〉, 《世

- 界經濟與政治》期10，頁105-28。
- 王汎森. 2011，〈時代關懷與歷史解釋〉，《古今論衡》，期23，頁3-18。
- 王琪. 2002，〈德國工業化初期的政經發展〉，《成大西洋史集刊》，期10，頁179-214。
- 何順果. 2003，〈東歐「再版農奴制」莊園經濟的性質問題〉，《歷史研究》，期4，頁111-23。
- 李振文. 2017，〈18 世紀末至 19 世紀中期俄國農奴制的主要剝削形式及其趨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期2，頁125-39。
- 杜建國. 2002，〈托洛茨基的真實面貌〉，《視界》，期6。  
(<http://www.cdjp.org/01/archives/00001366.shtml>)
- 汪榮祖編，2014，《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臺北市：遠流。
- 邢來順. 1999，〈德國第一次工業革命述略〉，《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卷38期6，頁85-9。
- 邢來順. 2001，〈論普魯士統一德國的經濟前提〉，《高等函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卷14期1，頁39-42。
- 邢來順. 2003，〈工業化衝擊下的德意志帝國對外貿易及其政策〉，《史學月刊》，期4，頁77-81。
- 邢來順. 2006，〈論德國政治現代化初期的「防禦性」特徵〉，《史學理論研究》，期1，頁74-85。
- 孫炳輝. 1995，〈論普魯士道路產生的歷史條件及其歷史正當性〉，《史林》，期4，頁95-104。
- 馬駿. 2003，〈包稅制的興起與衰落〉，《經濟研究》，期6，頁72-95。
- 張廣翔. 2010，〈1905-1907年前俄國的歷史選擇〉，《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期2，頁68-76。
- 萬毓澤. 2008，〈歷史唯物論中的結構與行動：資本主義起源論再探〉，《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期71，頁109-56。
- 劉仲敬. 2017，《中國窪地：一部內亞主導東亞的簡史》，新北市：八旗文化。

劉仲敬. 2019, 《滿州國》, 新北市: 八旗文化。

劉祖熙. 2001, 《改革和革命: 俄國現代化研究: 1861-1917》,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瞿宛文與安士敦. 2003.《超越後進發展: 台灣的產業升級策略》, 台北市: 聯經。

